PORTUGAL AMORDAÇADO



轭下的葡萄牙

[葡萄牙]马里奥·苏亚雷斯 著

封面设计/王　堃
责任编辑/刁小林

〔京〕新登字172号



·葡萄牙文学丛书·

ISBN-7-5059-0597-x/I·384
定价：13.95元



·葡萄牙文学丛书·

轭下的葡萄牙

[葡萄牙]马里奥·苏亚雷斯 著

李小冰 王华峰 刘克新 张翠薇 孙龙昌 译

陈凤吾 王志根 校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72号

鞭下的葡萄牙

〔葡〕马里奥·苏亚雷斯 著

李小冰等译

陈凤吾等校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宏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14.25印张 2插页 331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0596-1/I·383 定价：（平）8.30元

ISBN 7-5059-0597-X/I·384 定价：（精）13.95元

作 者 简 历

马里奥·苏亚雷斯生于1924年，是葡萄牙第一民主共和国部长、教育家若奥·苏亚雷斯先生之子。苏亚雷斯先生曾在里斯本大学和巴黎大学攻读历史、哲学和法律，并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年青时，即投身反对萨拉查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为此，曾十二次被捕入狱，并未经审判即被驱逐流放过。他先后参加过几个主张共和及社会主义的组织。苏亚雷斯先生是葡萄牙社会党的缔造者，是该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并连选连任担任此职达十三年之久。他是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多次率该组织代表团出访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及中国。他曾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国务部长，第一、第二及第九届宪法政府总理。1986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并于1991年以70%的选票再次当选连任。苏亚雷斯先生在政治、历史及法律研究领域著述颇多。他的著作《轭下的葡萄牙》一书被认为是对葡萄牙半个世纪以来独裁统治的最为详尽的描述。

葡文版前言

现在第一次用葡文出版的这本书写于1971年我在意大利和法国流亡时期，1972年4月卡尔曼——列维出版社经删节后以《LE PORTUGAL BAILLONNé》① 的书名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它基本上是一部民主人士在法西斯年代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的忠实见证录。从1942年那个遥远的年代起，我就开始投身于这场斗争。所以，它不是一部历史著作，更不是对葡萄牙长期以来国情的深入的政治和社会的剖析。它首先是一部自身经历的见闻录，是在流亡时期写下的随感，目的是想对"4·25"之前所有反法西斯战士反对卡埃塔诺独裁的全面斗争作出那怕是微小的贡献。

读者不难发现本书中存在的时代局限性。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它在某些方面可能显得有所不足。但是，我还是希望不作任何增删而保持它1972年出版时的原貌。我们记得，即使对一些久经考验的自由战士来说，当时的卡埃塔诺政府也不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政权。

本书的主要章节，如"一桩罪行的历史"和"殖民冒险"，鉴于后来出现的一些虽未改变我的基本立场，但不失为重要的、新鲜

---

① LE PORTUGA L BAILLONNé(法文)："被堵住嘴的葡萄牙"。

的事件，本可以写得更丰富、更完善一些。然而，这本“具有时间性的书”，尽管当时葡萄牙对它保持绝对沉默，但在国外，尤其在法国却引起了很大反响。我们今天已生活在自由之中，我认为不作任何修改和增删，让葡萄牙人看到当时的原貌是有益的。

从 1972 年到 1974 年 4 月 25 日凌晨武装部队把葡萄牙归还给葡萄牙人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为国内和国际良知所谴责的制度缓慢腐烂的过程，美好的憧憬和现在我们已生活其中的自由，当然也是新的、激动人心的政治思考的课题。不管这些对出版社是多么重要，它们都不能成为《轭下的葡萄牙》的新的章节。它们将是另一本不同的书的内容，不过现在要写这样一本书还为时过早。当条件允许的时候，我将乐意为之（为什么不呢），但不是现在。对我们所有的葡萄牙人来说，今天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进行历史分析，因为大家正在齐心协力、信心百倍地创造历史。

1974 年 6 月 10 日

于里斯本

·1·
政治见习

很难确定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因为学会独立思考需要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而左右和制约我们采取立场的决定性影响——表面看起来那怕是纯属个人性质的——又是如此互相冲突。

1942 年 10 月，当我以 17 岁的年龄进入里斯本文学院的时候，已有了明确的政治思想立场，至少可以说有了主导思想（其后生活道路上的重大抉择和几乎所有重要步骤均从属于这一思想）：那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被占领的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那怕是微薄的贡献。

通过曲折而畅通的渠道，我认识了一些葡萄牙的伟人。在同他们那令人鼓舞的接触中，我不断读书和思考，审视过去并把它同几十年来可悲的、令人羞愧的现实相比较，对同胞们焦虑不安的重大问题时刻寻找明智的立场，渐渐形成了关于祖国、她的命运、前途以及长期困顿的基本观念。这是沉重而又痛苦的观念，正如我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卡洛斯·奥利维拉诗中说的那样：

“祖国的大地啊！您是我们穷苦人的穷母亲！”

我认为，葡萄牙从根本上说，已是一个支离破碎、备受屈辱的国家，一个有待复苏的国家。用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的话说，

“被内部敌人占领的葡萄牙行将变为石头般冰冷的国家”，一个象 17 世纪和 18 世纪时的那种“僵尸王国”，因为当时她陷入了集权主义和宗教裁判的可悲境地，尽管是另外一种类型。国家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被肆意阉割。必须重新执行 1926 年中断的共和制路线，根据时间、地点、发展、进步的需要，以现代构架重新考虑葡萄牙的问题。赫尔库兰诺、奥利维拉·马尔丁斯、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等杰出人物已提出了这种思想。面对整个伊比利亚和欧洲，必须重新思考葡萄牙的问题，彻底变革社会经济结构，提高人的政治素质，因为他们缺乏经验，思想混乱。

1942 年当我进入文学院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发展成一场人类巨大而决定性的冲突——虽然还远未达到决战阶段。

我们绝大多数的年青人，象务实的国民一样，认同盟国的事业，其狂热程度同后来被称之为“合作性中立”的“新政”倾向轴心国列强的程度是一样的。

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政治和道义上的选择要比目前我们那些彷徨和不满足的孩子们面临的抉择容易得多。战争和迫在眉睫的战斗迫使人们迅速采取明确的立场，从善或是从恶，二者不容混淆。选择是容易的！

当时，我认为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如果问我是什么人或想成为什么人，我就象一部激动人心的战斗影片中的人物那样，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反法西斯战士！萨拉查的葡萄牙政权是纳粹法西斯在葡萄牙的翻版，只不过更圆滑、更虚伪罢了。它实行集权主义，仇视民主与自由，蔑视人在全能的政权（其实是个人专断）面前的各种权利，采用外国的礼仪和徽记——欢呼形式、歌曲、阅兵、“自发游行”等等。

由于共和——自由的家庭教育，我同萨拉查政权的格格不入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刻骨铭心的。

我的母亲是位识字不多，但思想却十分开明的女人，一生都积极赞助我那为政治奔波辛劳的父亲。她的为人和不信神的特性，使她具有一种强烈的反宗教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我父亲尽管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但从君主制时代起，就一直过着充满变故、冒险，几乎是职业密谋家的生活。他参加过反对若昂·佛兰戈独裁政权的斗争（为此被软禁在维拉·维索萨），积极参与过推翻君主制的密谋 —这些密谋引发了1908年1月28日和1910年10月5日的运动。在第一共和时期（1910—1926），他担任过官职：议员和行政长官。1919年，蒙桑托君主复辟阴谋失败后，在多明戈斯·佩雷拉政府中任殖民部长。他曾手执武器反对毕门达·卡斯特洛（1915年5月14日）和希托尼奥·帕伊斯（1918年）的独裁政权，所以1926年5月28日后，他很自然地站到了军事独裁政权的对立面。

反对1926年5月28日建立的独裁政权，就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而言，与人们意料的恰恰相反，至少到西班牙内战开始时是这样。共和国境内的政党（非法的）、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围绕在C·G·T① 周围的工人运动、具有共和传统的陆军和海军的要害部门、共济会、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新天地杂志"派），以及知识青年构成了反独裁斗争的主力军。当时，斗争采取了突出的革命和暴力形式。不断的军事暴动、罢工、流血起义、破坏活动是葡萄牙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期的特征。政府的镇压也是无情的，其强硬程度和希腊校官运动在对抗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可以相提并论。逮捕，不经审讯、没有任何罪名就流放到安卡拉

① C·G·T CONFEDERA ÃSAO GERAL DOS TRABAIHADORES)：劳动者总联合会，简称总劳联。

埃罗伊斯莫、圣多美、帝汶、塔拉法尔、佛得角等地的集中营，大批撤职，各种类型的迫害，审讯中司空见惯的肉刑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成千上万个家庭深受其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事独裁政权从政治、经济，甚至肉体上消灭了第一共和时期最杰出的政治人物、工人运动的骨干和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分子。

1926年5月28日之后不久，我父亲即被解除了在最高财经委员会的职务。他由于参加1927年2月3日到7日的军事起义而被捕，随后又被解除了陆军子弟学校教官的职务（该学校是在他的帮助下创建的）。自1926年到1935年底从最后流放地安卡拉·埃罗伊斯莫的圣若昂·巴底斯塔城堡回来这段时期，他一直是在监狱、流亡（西班牙）和躲躲藏藏中度过的。他积极参加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革命活动，特别是1931年8月26日的革命。乌特拉·马萨多上校和他是这次斗争的主要组织者。

还记得我5、6岁的时候，母亲牵着我的手到阿尔茹贝政治犯监狱探望父亲的情景（后来我对这座监狱十分熟悉，因为1948年我同他一起被关在这座监狱的同一个牢房里）。我也去过圣茹利昂·巴拉古堡。记得在一个寒冷的上午，我到贝尼塞向父亲告别，当时他是第二次被流放到亚速尔群岛。母亲和我怀着无助和愤懑的心情望着渐渐远去的轮船，心都要碎了。地下活动时期，为了偶尔见他一面，母亲常常让我们出奇不意地乘上伪装的汽车，然后多次换乘出租车，兜很多圈子，以便摆脱暗探的监视。我们在罗桑以及后来在列维莱斯的朋友贡德恩特·里贝洛的庄园里度假时，逃亡中的父亲曾以非洲学者的身份化名阿拉乌佐到那里和我们相会过。

童年的往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经过圣·可拉拉特别军事法庭判决后，父亲从亚速尔群岛回到大陆，不久就创办了一所中学（直到1970年去世时，他一直

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他力图重建家中已经完全破碎的经济生活。后来，他长期重病缠身（其间失去了左腿），直到 60 岁时才不得不安静下来，专心致志地照管自己的学生和学校。在 1936 年到 1945 年这段相对平静的年代里，我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父亲的朋友大多来自政治世家，1926 年后全被无情地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共和民主派"。他们习惯在星期天下午聚到一起"聊天"。经常有人和我们一起进晚餐，然后就通宵达旦地进行没完没了的争论。谈话总是围绕着当天发生的各种事件，对世界的进展、希望与痛苦（就葡萄牙而言，痛苦总是多于希望）进行绘声绘色的评论。父亲有把日常事件同自己那充满经验与冒险生活中的大事相联系的特殊才能。朋友们向他描述头面人物的特征，详细解释某些事件的细节，谈自己的见解，讲当天的笑话或我们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丑闻和荒唐事。这些人中有父亲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多次任部长要职的多明戈斯·佩雷拉，前部长，至死不悔的密谋家、在西班牙内战中差一点被枪毙，只是因为奇迹才保住性命的共和派战士乌特拉·马萨多，从西班牙战火中死里逃生的塞沙尔·阿尔梅达（贾伊梅·科特桑和贾伊梅·莫拉斯的战友），从巴黎长期流亡后归来的贾辛托·西蒙斯，平民教育论的忠实信徒、"新天地杂志"派的埃米利奥·科斯塔，前外交部长、爱讲笑话的萨维埃尔·席尔瓦，平民革命家曼奴艾尔·迪亚斯·费雷拉和阿麦利戈·奥利维拉（罗东达广场和 10 月 5 号大街集会中的英雄），等等。

这些谈话自然而然成了我的第一所"政治学校"，它培养了我对公众事业的热心、批判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英雄主义。

我感到西班牙战斗已成了笼罩我家、我的父母以及他们朋友头上的灾难，尽管我当时还不完全了解它的深刻含义——只

是很久之后，我才懂得了它的全部可怕的影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马德里电台那充满英雄气概和焦虑的呼吁，以及对伟大的传奇式的人物阿萨尼亚、英达列西奥·布里埃托、奈格林、米亚哈、“热情之花”①、拉尔戈·卡巴耶罗的热情和崇敬，和对另一阵营的一个名叫盖伊霍·亚诺的人在塞维亚电台话筒前的胡说八道的蔑视！

在我12岁到15岁这段期间，明显感到有两种对立的势力在困扰我：官方亲佛朗哥的宣传鼓噪在报刊上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健忘的“葡萄牙俱乐部电台”不断播放刺耳的军号声（在葡萄牙俱乐部电台的活动中，应该提到1974年4月25日凌晨它那历史性的广播以及从那时开始，它的播音员和技术人员所做的一切有益的工作）。在学校里，同学们都是官方有组织的反赤色宣传的受害者，沉闷得象一潭死水。这和我家那种高昂的、拥护共和的神秘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班牙内战和葡萄牙的大规模镇压简直是并行不悖！

正是这个时候（我想是1936年到1937年我上中学三年级时），我被迫参加了刚刚成立的“葡萄牙 青年”组织。但是对我来说，“葡萄牙青年”就象洒在玻璃窗上的一阵细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从未穿过“绿制服”，也没有行过可恶的法西斯举手礼。虽然名义上担任过“伍长”，但从未佩戴过有“S”字样的臭名昭彰的武装带（S是“值勤”呢？还是萨拉查的标记呢？）②，更没有参加过他们组织的任何游行、示威或集会。我从未喊过“谁统帅我们？”然后又平伸手臂齐声回答“萨拉查！萨拉查！萨拉查！”这实在是万幸！

---

① “热情之花”（LA PASSIONARIA），指当时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

② 葡文中“值勤”（SERVi O）和萨拉查（SALAZAR）均以S字母开头。

在中学将要毕业时(1941—1942),我结识了三个人,他们给我的深刻影响使我更加左倾,反法西斯意识更加明朗。他们是:阿尔瓦洛·沙列马,我的哲学老师,异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尼采和弗洛伊德,具有塞尔吉奥的批判精神(他自称是塞尔吉奥的学生),在我们这些少年人的眼中,亚速尔的长期监禁使他身上罩上了一层浪漫的光环;阿尔瓦洛·库尼亚尔,从各方面看都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目光敏锐,炯炯有神,胆略过人。他刚从狱中出来,教我们地理课,正处于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因为他准备进入地下活动以便重建共产党;阿戈斯迪钮·席尔瓦,我的文学老师,神秘的非宗教主义者,公民英雄主义的信徒,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的朋友,当时正在从事文化宣传和同青年精英接触的工作。他办的"传播手册"很出色,从第一期开始我就是它热心的订阅者。后来,由于出版了《基督主义》小册子,阿戈斯迪钮·席尔瓦同极端保守的天主教上层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导致他锒铛入狱,并在获释后不久背井离乡远走巴西。

这三位在思想和气质上迥然不同的人都给予我以深刻的影响。他们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和现政权都格格不入。同我父亲及其朋友们那些旧式的、和蔼可亲的但过时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相比,他们的立场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也乐意以此来保持和前者的距离)。

在思想上,风格上,甚至在论述国内问题的方式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阿尔瓦洛·库尼亚尔和阿戈斯迪钮·席尔瓦两人就截然不同。他们知道我的话只不过是别人思想的笨拙反应,所以常常通过我进行激烈的辩论。尽管两人都醉心于自己的理想,对现行制度全盘否定并致力于变革被法西斯摧残的祖国,但所走的道路却截然不同。

他们三人只有一次发表过相同的意见,那就是打消我一直

想入法律系的念头。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是统治阶级可憎的、看得见的表现形式。我到反动派的城堡中去干什么呢？到七年级时，他们终于把我的志向扭转到了文学系的历史哲学科学方面。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心血来潮除了使我失去十年光阴之外，几乎是毫无裨益……

当时，葡萄牙文学界出现了后来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的革新运动。由于在审查方面不断遇到麻烦，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刊物几乎都是短命的：里斯本的《魔鬼》(后期由费尔南多·毕德拉·桑托斯所领导)，由一批热血青年所领导的波尔图的《旭日报》，在同代人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科英布拉的诗选《新诗歌》(卡洛斯·奥利维拉、费尔南多·纳莫拉、马里奥·迪奥尼西奥、曼奴艾尔·丰塞卡、若昂·戈索费尔、若阿根·纳莫拉多等就是由此而出名的作家)。

这场运动力求吸收由“俄耳甫斯”①和“风采”引入葡萄牙的现代派革命的经验和成果，它恢复了战斗文学的传统并继承了1870年那一代作家们改革社会结构的理想，所以它介入社会和政治的特点十分突出。我进入文学院时，阿尔维斯·列托尔的最初几部小说已出版，索埃伊洛·佩雷拉·戈麦斯(多年后成了我亲密的同志)也出版了《河叉》。记得这本书的封面是淡玫瑰色的，附有阿尔瓦洛·库尼亚尔动人的插图。这些插图本身就是奋起的呐喊。

我同新现实主义的第一次接触是在《世纪报》举行的阿曼多·巴塞拉尔的报告会上。被誉为“现实之声”的已故的朗诵家曼奴艾拉·波尔图女士也参加了报告会，并朗诵了费尔南多·佩

① 俄耳甫斯(ORFEU)，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善弹竖琴，他演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

索阿的作品。我是由阿尔瓦洛·库尼亚尔带去的，尽管他行动谨慎，但仍不愿意失去发展新党员的机会，因为他知道战斗的文学是政治斗争的前奏。他们一般从阅读列托尔、索埃伊洛或若瑟·亚马多的作品开始，随后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进阿尔茹贝或卡西亚斯监狱进行长期的磨炼！

这年，我曾在若昂·德乌斯博物馆参加过路易·费若的一次报告会。虽然报告会最后以大打出手结束，但我仍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不久，我在阿连特茹文学会馆又参加过一次费尔南多·格拉萨讲解的宗教音乐会（格拉萨是我中学时的合唱老师，葡萄牙现代音乐的伟大革新者，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这样一场纯文化性的演出，竟然也受到法西斯突击队的干预，因为他们认为音乐会“表现了赤裸裸的颠覆精神”！一位名叫卡洛斯·索维拉尔的纳粹青年指挥了这次行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后来在文学院又见过面。几年后，在1962年学潮高涨期间，他当过几天国民教育副国务秘书。

这是我同政治的第一次接触。音乐会中断了，出口处是喊声、嘘叫、拥挤、冲撞，一片混乱。我被抓起来并被送到国家剧院附近的派出所，几小时后经过例行的严重警告并查明在档案中没有前科之后才被放了出来。

我进入文学院的前一年，因“增加学费”而引起的大规模游行使得那一学年成为多事之秋。一方是一小撮维护现行制度和特权阶级的好斗分子——“葡萄牙青年”的骨干——和“天主教青年”中那些赤裸裸的反动分子；另一方是同样激进的少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力图推动那些“仅仅反法西斯”的青年）。而处在两派之间的广大群众却无动于衷。他们自私、谨小慎微、保守、对政治不感兴趣，除足球之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学潮期间，由“共产主义青年”所左右的“反对派”控制了广大的中间群众，他们经常组织辩论和抗议活动。不过，这些活动除了起到某种培养骨干的作用之外，达不到任何其他目的。当时，费尔南多·桑托斯在里斯本文学院炙手可热，其影响直到第二年我在文学院时还可以感到。但是“反对派”是由一小批抱得很紧的人组成，他们使用的诡秘语言只有小圈子里的人才懂，而且醉心于神秘的把戏，实际上对青年群众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通过吉列尔麦·科斯塔·卡瓦略，我同这伙人开始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在中学七年级，而卡瓦略在里斯本大学科学系就读。我想大概是库斯托迪奥·马托纳多介绍我们认识的。

卡瓦略的一生堪称为理想而无私奉献的楷模。他是富家子弟，整个青年和壮年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监狱、集中营和流亡中度过的。当时，他已是一名激进的、忠诚的共产党人。是他第一次不厌其烦地向我批判“自由反对派”并指出它在实践上的缺陷。他忘情地谈起很快就要到来的霞光万道的明天。①

在这些接触中，我还不能说共产党的宣传对我有多大启示。家父和他的朋友虽然钦佩共产党人的牺牲和实干精神，但对他们采用的方式却持保留态度，从而使我对这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宣传产生了某种免疫力。

除去意识形态之外，共产党的方法论中还有某种新的、从未在别的地方看到过的东西深深触动了我：那就是行动！我尖锐地感到，必须对现政权进行某种抗争，以便为在全世界进行的反法西斯总斗争作出那怕是微小的贡献。但是怎么作呢？当时大学里唯一有组织的反对派就是共产党的青年组织。这条路尽管错综复杂、有可商榷之处，但它毕竟是一条道路啊！

---

① 卡瓦略于1972年以重病之身出狱，不久即去世。

1942年是英勇斗争的一年，苏联以其坚忍不拔和大无畏的精神承受了纳粹进攻的几乎全部重压。英国的战斗虽然同样可歌可泣，但已成为战争中翻过的一页。在俄国广袤的大草原上进行的较量远比在北非炎热的沙漠上的战斗更能决定全世界的命运。对这一点，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苏德条约的签订，俄国人对芬兰和波兰的入侵，莫斯科的大清洗，发生在我们门口的西班牙内战，都是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但这些一去不复返的事件并未触及到我的内心深处。当进步力量实现伟大的联盟时，人们无不感到由衷的高兴。斯大林成了人们熟悉的留着小胡子的"乔大叔"。① 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和谐的、充满兄弟情谊的世界啊！

这年夏天，我象往常一样在福斯·阿列辽度假，在科斯塔·卡瓦略的介绍下，在那里认识了刚从法律系毕业的翁伯托·洛贝斯和他的朋友勃兰其·特塞拉、若瑟·阿兰特斯(他们二人后来以共产党的罪名被捕并在狱中关了很长时间)，若昂·安德拉特、马里奥·费雷拉和其他人。翁伯托·洛贝斯已同共产党的领导人彼得罗·苏亚雷斯的妹妹结婚。

这个"假期苏维埃"小组对我一、二年后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大概相差7—8岁的样子)，所以既是小弟弟，又是徒弟，尽管我没有正式加入该组织。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那些亲切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是多么振奋。我感到自己已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名成员，认为它是长长的、秘密链条中的一环，能给葡萄牙一个新的面貌！

我从来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没感到过"神"的召唤，所以不明

---

① 乔大叔(uncle Joe)，乔是JOSEPH(约瑟夫)的昵称。

白在参加某些神秘团体的人身上，这种感情为何那么强烈。但从内心看，我当时并不想和自己的“新身份”相去太远。

俄国的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们在临时弄来的地图上激动地注视着军事行动的进展，尽情嘲笑充斥在《新闻日报》上的为希特勒助威的预言。帝国时期风云一时的瓦斯科·卡瓦略准将为了讨好德国人的朋友，竟然放肆地写道：“从军事上讲，俄国已被消灭了！”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多年后，这个瓦斯科·卡瓦略竟和我父亲以及其他老共和分子一起坐在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罪名是参加了所谓的“1947 年 4 月 10 日反萨拉查的革命阴谋”！

那里的小学教师有一架当地唯一的收音机。晚上，我们摸黑到学校里去偷听 BBC 的广播。当时，偷听 BBC 广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要冒很大的危险……如果要说是罪行的话，那么整个葡萄牙都犯了罪！

这所学校是由铁杆共和派戈兰德拉创建的，课堂里有一块很大的瓷砖壁，上面绘着几位共和时期的大人物的像。西班牙内战期间，画壁被当地的法西斯分子捣毁了，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这种胆大妄为的东西继续扰乱无辜的孩子们”！老师经常指着墙壁让我们看“战争失败”所留下的可耻标记……

福斯·阿列辽的海滩宁静宜人，为数不多的度假者大都互相认识。

1942 年假期结束后，我口袋里揣着若泽·勃杰斯·马塞多的一封介绍信回到里斯本准备进入文学院（生活兜了许多圈子，他今天成了文学院的教授）。他当时是里斯本大学的头号活跃分子，后来又促使我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学生斗争。

我踏上了生活的征程！

·2·
在文学院

文学院在科学院最低处的一所破旧的修道院内，它不佳的名声从罗德里格·拉巴教授的口头禅中可见一斑："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下着进去的学校！"

到文学院需从科学院的旧门进去，下一段长长的走廊式的阶梯，来到昏暗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庭院。那里有5、6间教室，这就是文学院。一所学校的设备——包括使用的教材——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很重要的。教师队伍的"精神"和素质更是非同寻常。几年前，文学院虽然也在这个不敢恭维的地方，但却是个颇有声望的学府，有引以自豪的正式任命的教授，如特奥菲洛·布拉加、阿道夫·科埃辽、列伊特·瓦斯康塞洛、法利亚·瓦斯康塞洛、大卫·洛贝斯等。

文学院的全面没落是和30年代整个葡萄牙各大学的情况相一致的，是法西斯主义上升和巩固、政治清洗、教师和学生的自由受到重重限制的结果。在文学院，罗德里格斯·拉巴、赫尔南尼·希达德和牛顿·马塞多先后被解职。而对教师打击更大的是，在聘任新教师时，完全不以业务能力和学术成就为条件，而是以对当局的政治忠诚和对骨干教授的屈从程度为标准。

如果要对萨拉查政权进行什么严厉的指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多年来在大学（当然不仅仅是大学）疯狂地、不断地实行

的愚民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没有充满活力、奖掖科学、具有批判精神、思想独立、健康气氛、倾向革新和进步的大学，就不可能制定出彻底改变葡萄牙人可悲的生活状况、加速社会发展的政策。在所有资源中，人和人的大脑越来越成为最可宝贵的"资本"，这在今天已是普通常识。

萨拉查政权通过限制大学的自主观念等手段拼凑起一些平庸的、守旧的、墨守陈规和有秩序的、象整个国家一样噤若寒蝉的大学。它们贻误了好几代大学生、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严重影响了多年来葡萄牙的前途。

无庸讳言，在进入文学院时，我对大学、教师和官方教育存有强烈的戒备心。我在17年的生活中，一直不理解一个有骨气、有自尊的人怎么能在如此窒息的条件下当教师。对我和我的许多同学来说，大学教师就是仆从——没有尊严、没有独立思想。在葡萄牙，大学教师不是业务职称，也不是教学能力的同义词。大学教师只是在世俗社会中向上爬的头衔和敲门砖而已。有了这种头衔，就可以在"前厅"恭候各大公司的董事会"聘请"，并到政府去坐"秘书"的宝座。这种说法也许过于偏激。

1947年，我在卡西亚斯被捕，大学里也再次进行清洗。这次清洗波及到布里托·瓦列恩特、费尔南多·丰塞卡、费雷拉·马塞多、恩里克·巴洛斯、塞列斯迪诺·科斯塔等人。这表明，虽然经过政府的多次清洗，大学里的真正人材并未完全"清理干净"，手脚也没有完全被捆绑住。几年前，他们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辞退了巴勃扎·马卡良斯、本托·卡拉萨、马里奥·阿泽维多·戈麦斯、曼奴艾尔·瓦拉达列斯、路易·路易斯·戈麦斯等一批有崇高学术威望的教授，但其他人还是留下来了。他们象潜伏者一样，尽量避开当局令人憎恶的愚民政策，以待有利时机。不管看起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在1962年学校危机期间，仍然发现一

些教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他们进行着消极的、秘密的反抗。这充分表明葡萄牙的知识分子同当局是如何的水火不容！

尽管我对高等教育，尤其是文学院印象不佳，但活生生的现实又远远超出了我最坏的估计……

文学院的气氛给那些充满幻想的莘莘学子们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永远无法估计的。在学生中间，尤其是优秀学生之间普遍存在着失落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身上打下了这种气氛的烙印。

在文学院（我谈的仅是自己的经历），后果是可怕的：教师不称职，对教学毫无兴趣，教材同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级别的不公平令人愤慨，缺乏鼓励。平庸和服从者弹冠相庆。

在我上课的老师中，只有一位是称职的——当时的历史学助教维多里诺·马卡良斯·戈迪钮。在我进入二年级时，由于政治歧视，他的聘任合同被强行中止。另外还有一位孜孜不倦、严肃认真的助教，那就是费雷拉·阿尔梅达，他被当成万金油到处使用，除葡萄牙史和世界史外，还兼教美学、碑铭学和其他课程。

哲学专业只有两名教授：历届学生都敬畏的年高望重的马托斯·罗芒，他是心理学权威，为人有点木讷（我这样讲并没什么偏见，他对我一向很好）；维埃伊拉·阿尔梅达教授，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有着超凡的批判能力（他的作品可以证明）。连这两位也受到当时文学院和教育界冷漠气氛的影响，不能说不是整个体制造成的无法挽救的消极后果。

历史专业只有一位教授：那就是曼奴艾尔·赫勒诺。作为考古学家，他也许有某些成就（谁知道呢？），但作为历史学教授，却实在不敢恭维！

还有谁呢？施瓦巴赫，他是一位同名的老剧作家的儿子，教

我们人文地理，不能说是坏人，可悲的是根本不象个大学教师；德利奥·桑托斯，一个狂热的应声虫，与其说是哲学家，还不如说是个神汉。他在各种哲学课程中跳来跳去（希望同时讨好马托斯·罗芒教授和维埃伊拉·阿尔梅达教授），极其轻浮浅薄；马里奥·奇科，他对自己的仕途比对学生更感兴趣。他是一位美学教授，他的艺术史课虽有某些可取之处，但总的来说平淡无奇。德尔冯·桑托斯和维尔吉尼亚·拉乌两位虽然有一定的业务能力，但不愿和文学院的有害气氛斗争。我只是在最后两年的选修课中认识了他们（当时还是助教）；肥胖的马里奥·阿尔布格尔克是个不学无术、头脑空空的人；最后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莫列拉·萨。他曾被公开指责为剽窃者（家丑不可外扬）。他的保护人马托斯·罗芒有一天对我说（原文照录！）："你们认为这小伙子挺蠢，但你们错了。他只是在说和写上有点困难！"

1942 年到 1950 年我在文学院上学时，教师队伍大致如此（其间我曾三次被捕）。

同教学的平庸和教师队伍的死气沉沉相反，"地下文学院"却十分活跃：学生们在校园里和走廊上开展各种辩论和慷慨激昂的争论。在那里，真正的导师是学生自己。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偶尔弄到一本流行的或有争议的书，就进行热烈的讨论。这和课堂计划毫无关系。我的大学教育大部分应归功于这个秘密的、充满希望和骚动的园地。所谓的学校对我可以说毫无帮助！

我们这一代人的伟大导师无疑应该是安东尼奥·塞尔吉奥。他比别人更多地教会我们如何以自由精神热爱文化，从欧洲和现代的角度批判性思考葡萄牙的问题和在他那特有的、战斗性的杂文中表现出的忠诚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这在当时几乎是规律），却反对安东尼奥·塞尔吉奥——而他还鼓励

我们这样作。他的许多观点有时难以令人理解，尤其是某些政治观点和实际行动。这里有时代的因素(今天已很难说得清楚)。在许多情况下，塞尔吉奥并不完全有理，例如在同本托·卡拉萨的争论和同旧的雅各宾共和派的激烈斗争中，我们就不赞同他的观点。象拉乌尔·普罗恩萨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在他的论文和公开活动中，既有光明也有阴影”。随着时光的流失，塞尔吉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尽管我们同他有分歧，但我们也知道他给予我们的决定性的影响是多么大。对我们来说，他的声音是不容混淆的，他的果敢、勇气堪为楷模。在萨拉查统治的漫漫长夜中，他作为民主信徒的顽强韧性令人赞叹！

但是塞尔吉奥从未作过文学系的教授。这位葡萄牙文化的伟大革新者、忠心耿耿的教育家、葡萄牙当代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却一直被认为不够格在文学院教书！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代葡萄牙史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也未能受聘于文学院，如：贾伊梅·科特桑、杜阿尔特·列伊特、维伊卡·西蒙斯。语言学界无可争辩的权威、教育家、文化名人罗德里格斯·拉巴还被从文学院赶了出来。他不得不远走巴西，以自己的才智为那里的大学增添了光彩。牛顿·马塞多至死也没能再回到文学系。维多里诺·戈迪钮和马卡良斯·维列纳曾短期在那里任教，但因为不够“驯服”，所以没资格当“教授”，尽管他们二位在法国索邦大学以优异成绩取得过博士学位。我们的大学拒聘的还有安东尼奥·萨拉伊瓦、奥利维拉·马格斯、可拉贝·罗萨等人。

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使人们普遍感到心情沉重，它向学生展示了两种泾渭分明的势力：生机勃勃的葡萄牙文化和在路易·格拉西奥协助下，由若埃尔·塞朗主持的正规教育。

在我进入文学系那年，曾有一份小报《地平线》。当时的学生肯定还记得这份主要由文学院学生撰稿的报纸。它反映了真正

的文化梦想和渴望，同那些乌七八糟的“课堂教学”和官方刊物的陈词滥调迥然不同。后来，由于得不到支持，加上审查机关的打击和常常遇到的资金困难，这张报纸终于夭折了。但它却记录了我们“真正的文学院”和有教授、考试、分班级的“官办文学院”的尖锐对立。

这实在是一架消磨人们意志的机器，纯粹出于宽容才把它称为“文学院”。

当时，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领导大都不是通过自由选举而是通过任命产生的，所以在学生中影响不大。

“葡萄牙青年”成立之后，当局认为这个准军事组织应该象意大利的“巴利拉斯”(BALILAS)和德国的“纳粹青年”一样，把所有青年都纳入其中。这样，自第一共和以来以独立自主为特点的学生运动，由于缺乏支持和独立意识，在警察的高压下急剧衰落了。实际上已没有名副其实的学生组织。“葡萄牙青年”虽有官方的支持，却从来没有在大学生中真正扎根。

1944年，科英布拉学生会终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了以法律系学生泽尼亚为主席的领导班子。泽尼亚是当时学生们的偶像，他后来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科英布拉学生的胜利持续时间不长，但却是学生斗争进入新时期的标志。泽尼亚为自己的“胆大妄为”付出了代价——在阿尔茹贝度过差不多两年的铁窗生活。

在文学院，我们也想有一个自由选举的学生会，但未能成功。后来，维多里诺·马卡良斯·戈迪纽教授被莫名其妙的解聘，这在文学院引发了广泛的抗议，也使我最终明白了斗争应在政治领域内进行，而其他都是治标的、不会有效果的行为。戈迪纽教授被解聘一事引起他的学生们自发的强烈抗议，这表明他在我们中间的巨大威望以及学生们对当局的蔑视。戈迪纽教授

当时还是一位不满三十岁的青年！他虽然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也没有等身的著作，但由于他的智慧、严肃认真的态度、非凡的才能和魅力，却成了大家十分尊敬的权威。在文学系，很少有教师象他那样真正对学生怀着满腔热情，他不仅教学生，而且督促、鼓励他们去进行研究。多亏了戈迪钮教授，我们才熟悉了编年史派所应用的历史学新方法。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研究人员。

戈迪钮解聘时，我们进行的抗议除了表明我们对他的热烈声援之外，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他的所有同事都象吓呆的耗子一样毫无例外地沉默了，而学生们却采取了鲜明的立场：我们在商业协会借了一间房，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让他在课余时间继续给我们授课。我们可以缺文学系的课（我就经常这样！），但绝不缺戈迪钮教授的课。学生们诚心诚意地、聚精会神地听他的课，以此作为反抗专横的实际行动。

我从二年级开始才对学生会的政治问题感到兴趣，而过去只是同文学系的“反对派”联系比较密切。用我们的话说，这个“反对派”是由若泽·马塞多“控制的”。其他重要的成员还有巴拉达斯·卡瓦略（他成了我亲如兄弟的朋友）、若阿娜·康比纳、马丽亚·露西丽亚、若瑟·曼奴艾尔·杜阿尔特、纳达尼艾尔·科斯塔、马丽亚·安杰拉、佛朗西斯科·贾内罗、克里斯托翁·桑托斯、我的表弟诺克伊拉·桑托斯等。

如前所说，这是一个同其他高校——医学院、技术学院、法学院、兽医学院——有联系的、组织严密的小组，但它对大学生并不能经常施加影响。另外，我们无法向大学生们提出有连续性的政治纲领，更不要说行动手段了。我们的活动仅限于偷偷地散发共产党以及后来的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提供的传单，在墙上刷标语，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等。在此期间，我阅读了

不少列宁的著作，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多列士的文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尽管此书的作者是位“叛徒”，但它仍是被“推荐”的读物)以及后来经过多次修改的《联共(布)党史》。我们还尽量了解战争的进展情况，因为我们把盟国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坦率地讲，我的活动很少，因为当时任何莫须有的罪名都足以让你在集中营中过几年铁窗生活，如果被警察抓到“把柄”的话。

战争在继续，纳粹法西斯的失败日益明显。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以其巨大的实力投入了战争。苏联成功地抵抗住了纳粹的强大攻势和当时人们所说的“严冬”将军。俄国人以大无畏的精神给纳粹入侵者以沉重打击。

西班牙内战后，长期萎靡不振的葡萄牙反对派开始慢慢抬头。纳粹法西斯的失败意味着伊比利亚半岛上法西斯势力的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必然的结论。西班牙的“蓝色旅”难道不是和希特勒并肩战斗吗？萨拉查不是在墨索里尼像前拍过照吗？全世界民主势力反对纳粹法西斯的命运不是在此一举吗？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葡政权不是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反民主行径表明它们和法西斯主义的命运休戚相关吗？

当时，里斯本成了世界上的“间谍首都”。但葡萄牙人的消息却很闭塞，他们只能从经过审查的新闻影片和潮水般涌来的难民那里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战争把葡萄牙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家”：官方的、打着中立旗号而实际和轴心国狼狈为奸的葡萄牙和被统治、被奴役、以盟国的事业为己任的葡萄牙。

当时，盟国大使馆——首先是英国和美国——在葡萄牙加强了关于战争的宣传。我同这两个大使馆均有接触；并在大学里分发用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影片和机器在一些小俱乐部临时放映室放映的电影票。

这是些逃过检查的战争纪录片，它们解释了盟国反对纳粹法西斯的原因。这种宣传对唤起同学的觉醒、了解令人憎恶的法西斯手段(我们的政府也采用了它们)以及坚定他们为国家民主化而斗争的决心极为有用。在这个秘密的“小机器”帮助下(它从反对增加学费的动乱时期就有，战争开始后幅射到里斯本的所有院校)，我们形成了一个联络网。这个联络网后来变成了强大的学生反法西斯组织，即“青年民主大学生运动”。

大约在1943—1944年，MUNAF(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成立了。一般认为这一功绩应归于当时重建的葡萄牙共产党。由于国际形势和阿尔瓦洛·库尼亚尔的推动，葡共的威望很高。“运动”包括了除库尼亚·列阿尔那伙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民主反对派。当时还有一些有组织的、从事地下活动的政治力量：葡萄牙共和党的老政治骨干(尚有某些力量及活动能力)；涣散的社会党——它分裂为一些彼此对抗的小派别，有的甚至有警察混入；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联盟——它主要吸收所谓自由职业者中的反对派，骨干都是40岁左右的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共济会等。

MUNAF在辛德拉[①]召开了由诺顿·马托斯将军主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之后，发表了一项关于政治形势的声明。字体异常清晰的、象药品说明书一样的声明在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提出了全国民主团结政府的最低纲领，以便从近20年的法西斯统治中清理出一块地方，使葡萄牙走向全新的生活。

我通过两条途径能随时了解到MUNAF的活动：在“运动”执委会和政治委员会都有亲密朋友的父亲和共产党在文学院的组织。前者把MUNAF看作是积极准备中的军事政变的掩护，

---

① 辛德拉(SINTRA)：里斯本附近的小镇，葡萄牙著名的游览胜地。

而后者则力图使它导向全国人民反法西斯起义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领导的犹豫不决、各种战略观点引起的争论、有影响的斗争都没有使我灰心。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信心、没有乌云的时代！

1944 年，我在卡尔达斯·拉伊尼亚度假时碰到了(难道是偶然吗?)费尔南多·桑托斯。在文学院时，我认识他，而且知道他在从事地下活动。他在大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因为他才华横溢，而且还由于他在漫长的铁窗生活中表现出的政治勇气(坐牢是无尚光荣的)。当时他过着充满危险和艰苦的地下生活。我想他是共产党的官员——中央候补委员。

桑托斯是共产党在 MUNAF 的负责人，他同本托·卡拉萨、贾辛托·西蒙斯、若瑟·戈迪纽、莫列拉·康波、曼奴艾尔·塞拉斯一样，都是执委会的成员。除此之外，东部地区的党组织也归他"负责"。所以，那次"碰面"在我的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毫不奇怪的。

当时，桑托斯正在为创建卡尔达斯·拉伊尼亚的 MUNAF 地区委员会而奔忙。药剂师、反宗教积极分子、共和党人马尔托纳多·佛列伊达斯使他遇到了麻烦，因为这位老人为事业所作出的牺牲和广泛活动使他成了当地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在县域列利亚，反对派领导人瓦斯科·卡马·费尔南德斯虽然很年青，但却具有卓越的智慧和政治家风度。由于这两人和我父亲关系密切，我对他们也很了解，所以我能向桑托斯提供有利于在当地政治风浪中航行的资料……

而桑托斯则把我介绍给——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如我们当时常说的那样)，把我同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联到了一起"。这个委员会由一名政治上非常能干的家具工人曼奴艾尔·杜阿尔特所控制(我后来成了他的好朋友)。应他的要求，我们晚上骑自

行车跑遍那一地区，搞些小型的政治文化讲座。听众差不多全是经过挑选的朋友和反法西斯积极分子。讲座大多在农家小院或村中的商店里进行。其中有一次是在离奥比多斯很近的一座锰矿里。

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很频繁，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过人民那样的同情和迅速而自发的响应。尽管镇压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那些年仍然有大规模的罢工，象作家佩雷拉·戈麦斯曾积极参加的利巴特茹的罢工。由于这次罢工，他被迫转入地下，几年之后就在悲惨的境况下去世了。

1944—1945 学年(这将是胜利的一年)，当我返回文学院时，我象一名有经验的战士一样深感责任重大。我对共产主义尚存有许多疑问——尤其是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根据这一理论，它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阶段。它对"资产阶级自由"的镇压使我难以接受。我有意把这些困扰我的怀疑和迷茫驱赶到心灵的遥远角落里，继续往前走，尽力承担起重大的责任，用这样的思想来安慰自己：在打倒法西斯的斗争方面大家没有分歧，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参加这场斗争的……不知不觉中，我从"同路人"变成了有组织的战士！

那一年，桑托斯曾召集各院校最可靠的负责人——20 来名小伙子，在卡巴利卡的树林里开了一次会。为这次持续整整一天的会，事前曾进行过精心的筹划。会上，在"头儿"的建议下，我以全票当选为里斯本共产主义青年"学生会"的领导成员。不久之后，根据西方共产党通过并执行的路线，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就自行消亡了。我负责组织学生的反法西斯运动，因为当时认为可以和 MUNAF 联合起来。随着战斗接近尾声和盟国的必然胜利，环境对我们开展的活动极为有利。

除各国使馆放映的电影外，我们也组织各种娱乐活动，以此

推动文化性的座谈会。我们的活动中心是位于里尼亚斯·托列斯街的"若瑟·埃斯特翁共和中心"。我们同地方的报纸和杂志也有合作关系，它们缺少稿源，而我们却有广泛的联络网。我最初写的一些文章就是在《共和国报》上发表的。

我们从事这些活动的时间远比用在功课上的时间多，瞄准的靶子只有一个：结束战争。我们天真地认为，战争的结束将是全国反法西斯起义的信号！有什么准备吗？没有。一切都是仓促上阵的，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MUNAF 曾试图组织所谓的"反法西斯战斗小组"(简称GAC)。当时的口号是："成立GAC！投入战斗！"对这样的口号，学生会自然是跃跃欲试。这些流动的、对法西斯采取进攻姿态的小组准备在国内制造暴动的形势。当局的政治镇压是非常残酷的，尤其对潜在的政治对手。所以成立任何合法或半合法的反对派是不可想象的。靠武力产生的政权只有得到武力的支持才能存在，也只有靠武力才能推翻！

MUNAF 的要求太高，显然无法达到。几个月后，它的口号就后退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确实的原因！

MUNAF 的领导人是否以为，随着盟军的胜利，"时机"已经成熟？或是仅仅把希望寄托在MUNAF 主席诺顿·马托斯将军指挥的、正在积极准备中的军事起义上？或是因为害怕走这条路的后果？自然……从战争最后几个月看，一切幻想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并非所有的幻想都是有道理的。谁也没有预料到独裁者的抵抗能力是如此之大，因为举国上下都认为他已被自已政治上的亲德倾向和对民主的露骨仇恨弄得"焦头烂额"了(而当时民主的旗帜似乎已在全世界胜利地飘扬起来)。独裁政权的许多追随者都采取了疏远态度，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似乎就要到来。但是萨拉查毫不在乎(他知道西方民主派已同伊比利亚半岛上

的政权分道扬镳)，居然下令全国为希特勒之死志哀！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这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日子啊！

记得那天下午我正在文学系的梯形教室里上“大发现史”课，有人从外面传来战争结束的消息。我立即中断了听课，大声说道：鉴于刚刚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应停止。可怜的曼奴艾尔·赫列诺老师被弄呆了，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作才好。一名亲德的学生反驳我说：葡萄牙是中立国，对一件与她毫不相干的事没什么可庆祝的。由于其他同学也加入了争论，声音越来越大。但听课的近百名学生中的大部分都默不作声，静静地望着犹豫不决、焦虑不安的老师。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人去征求院长的意见，请示是否应该停课。都怕负责任！我们当然不容忍这种态度。经过几分钟的热烈讨论，我们决定大家都走出教室，停止上课。一个非常错误的估计！因为只有5—6名学生走出教室！没有我们几个，课照样进行！我们无法容忍这种无耻行径，于是又返回教室，再次打断老师的讲课。争吵声大得吓人。铃声响了，这堂课算是正常结束了……

这天下午，我们成群结队地走出文学院。我们弄到了各盟国的小旗帜，熙熙攘攘地穿过罗西奥广场向西亚多进发。闹市区的咖啡馆里挤满了人，他们显然都在期待着什么。我们的旗帜不时受到高谈阔论、十分激动的人们的鼓掌欢迎。他们在期待什么呢？显然缺乏导火线。穿着制服或便衣的警察三三两两地站在要道出口，试图驱散人群。他们客客气气，没有发生什么暴力，这无疑是一种鼓励。

晚上，我们再次来到罗西奥广场，决心把研究好的计划付诸实施。我们当时充其量只有十来名大学生，记得当时还有古斯托迪奥·马尔托纳多和奥尔兰多·拉莫斯。我们突然举起一面葡

萄牙旗帜，唱起了国歌。效果是惊人的：周围的人群中立刻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向使馆区进发！到使馆区去！"于是，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穿过复兴广场，沿着大街向拉巴区进发。这时候已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人高呼着"胜利了！胜利了！自由！自由！民主！民主！"偶尔有人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塔拉法尔(集中营)！"

长期受到压抑的对自由的渴望爆发了，人们怎能不放开嗓子高呼呢？里斯本的街上到处迥响着"民主！民主！"的呼声，真是令人如醉如痴！

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第二天上午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停课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文学院，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所有的人都不费力地加入了停课的行列。我同几位女同学(其中包括我未来的夫人)来到巴索斯·曼奴艾尔中学，轻而易举的中断了这所学校的课。当我和一些学生兴高采烈地一窝蜂涌出学校时，正好碰到校长若瑟·萨拉伊瓦。这位瘦小的老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试图使学生们重返课堂。是"那个鬼东西"把他的学校闹得天翻地覆？但此时已没有任何人能约束住这些兴奋不已、一心一意要加入游行行列的年青人了。当我们来到文学院时，人们已排好队在等着我们去"殖民高等学校"和"科技学院"。我们向集合在那里的1000多名大中学生解释说，和集中在卡蒙斯中学的医学院、法学院、兽医学院和技术学院的同学们汇合后才能前往预定的集合地点——拉托广场。我从科技学院二楼窗口第一次向公众发表了演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成千上万各阶层人士在我们的引导下(他们本能地认为我们有"考虑周祥"的计划)，从拉托广场浩浩荡荡地向美国、英国、法国使馆走去。这次游行已真正带有反法西斯的政治性质。人

们不断高呼"打倒法西斯""民主！给政治犯以自由！"

我们向三国使馆递交了一封带有鲜明反对派色彩的信。但是盟国的外交代表不懂这次游行的意义，对我们要求自由的呼声和喊叫仅仅报之以令人作呕的礼节性的感谢，并要求人们保持秩序！我们上当了！"保持秩序"这个词正是萨拉查所需要的！

大约下午3点钟，我们又回到罗西奥，游行队伍汇入了壮观的人的海洋。我们既兴奋又疲惫不堪，深信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葡萄牙人民要求民主、反对萨拉查主义的感情，而且在向受了致命伤的法西斯冲击中赢得了胜利！

我们的头脑太简单了！其实，更大的困难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3·

失去的时机(1945)

我常常问自己,纳粹法西斯灭亡后,萨拉查主义为什么还能苟延残喘下去并逐渐适应了战后的时代?回答是困难的,因为这中间有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有些至今还不清楚。不过,可以给它一个暂时性的解释,因为没有这一说明,就不易了解从战争结束到现在统治我们的这一政权的复杂特点以及我们戏剧性的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曲折。

从我占有的材料(显然是零碎的)出发,尽可能客观地进行思考,就是本章的主要宗旨。

直到1945年,葡萄牙的政权(为了方便,我把它称之为萨拉查主义)一直是一人大权独揽,一切都围绕着他转。这必定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和自身的某种活力。这种漫长的、可悲的存在是反常的时代错误。萨拉查海星般的触角牢牢抓住政权。他对世界的进展及他长期无所作为给国家造成的种种不幸都无动于衷,仅仅对保持权力感兴趣。

萨拉查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思想家,更不是治国治党的里手,而仅仅是个经验主义者。在共和国危难之时,他靠简单的思想上了台并在施行无限权力方面尝到了甜头。这样,简单的行为方式变成了目的。

毫无疑问,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帮了他的忙。但他长期成功的

原因主要应归于他贪得无厌的权力欲和集权欲的恶性膨胀。这种集权欲不受时代和民族利益的影响。他的性格不仅在葡萄牙人中是罕见的，而且对任何人来说，也是病态的。

有人说萨拉查是个独来独往的孤家寡人，几乎不近女色，没有亲密的朋友，没有家庭，对经常与权力相连的享乐和排场不感兴趣。他是在一个组织很好的力量——天主教联合党——的推举下上台的(这使他有种"使命感")。他们把这一"天才"强加给了千千万万的葡萄牙人。天主教把他推上台并帮助他度过了开始的困难时期，为他物色了各种能干的人，为他消除各种敌对势力和矛盾。总之，在决定性的时刻，无论是国内或是国外，他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必要的帮助。

实际上，如果没有写好讲稿，他就无法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声音难听，形象冷漠，毫无才华和魅力可言，是一个没有光彩、平淡无奇的人物。不妨问一下，这位糊里糊涂离开议会的天主教中心党的蹩脚议员、一贯对学生疑神疑鬼的法学院的无名经济学讲师，为什么能统治国家达 40 年之久，并且成为国家命运的绝对主宰者呢？

回答是极其困难的。机遇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简单说起来，可以这样分析：一开始，他就以能干的管家身份忠心耿耿地为教会、军队和某些经济集团服务。西班牙战争爆发后，在新闻检查和政治警察的可耻帮助下，又对他进行了巧妙的神化宣传。此外，他本人也具有为贪得无厌的权利欲服务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要弄权术、笼络人心的天才。

萨拉查对权力有自己的观念——君临天下的至高无上的观念。他不允许对自己的行动有什么道德上的限制或什么费厄泼赖。他既不尊重对手，也不尊重朋友。为了他的政治利益，一切都可以无情的牺牲。为了达到目的，从来不择手段……

由于心理上的缺陷，他不能接受对话，即使在部长会议的小范围内也是如此，更不应说对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了。他无法和人民沟通，新思想和时代的要求无法使他动心。长期执政使他逐渐成了孤家寡人，狂妄自大，病态发作，极端仇恨变革和新生事物。近年来政治僵化、政权囿於僵硬的过时的模式之中，使其无法实行任何革新的计划。这种僵化造成了国家可悲的现实，也是他能长期执政的原因。

所谓"秩序"(象萨拉查狭隘理解的那样)，使他无情地摧毁了所有的反对者(心理上、经济上，有时甚至是肉体上)，包括那些已投入他的阵营、一再声称是他的同党的人。他是人的摧毁者、灵魂的麻醉师，在其周围开出了需要几代人去填补的政治空地！

他对一切批评(包括善意的、温和的)都反应过敏，通过无情的检查(他亲自领导)把国家长期置于"沉默状态"，通过政治警察(也由他直接指挥)，消灭所有可能产生对抗的中心(政党、民众运动、文化团体、纯研究组织……)。他强加于国家的是一种"墓地秩序"，因为它意味着所有形式的、真正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死亡。他不仅禁止任何政党和团体，也禁止自己的党——全国联盟——成为有生命力的组织。在萨氏王朝时期，葡萄牙的新闻也许是世界上最枯燥乏味的新闻：令人厌恶的赞美合唱，没有分歧，几乎每天都是歌颂"神人"完美无缺"天才"的陈词滥调。

萨拉查是最卑视同时代人的葡萄牙人，包括他最了解的那些同党，而对那些懦弱无能的人、腐败分子、行为有过失的和性功能有缺陷的人却有着特殊的偏爱！他的某些特点：内向、冷漠、难以接近、无情使人想起某些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他和葡萄牙人的习惯相反，而是象西班牙人那样把母亲的姓放在名字的最后……

他把国家看作是某种庄园、凝固的世外桃园，应该自我封闭起来，以免受到外界文明的“不洁”影响和污染。广阔的世界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恰恰相反，只能使他感到敌意和格格不入。他很少旅行，从来没访问过海外省，甚至连亚速尔也没去过……“富人阶级”高居人民之上，而他恭恭敬敬地、有效地行使着一名贵族管家的义务，条件是让他“按自己的方式工作”。在这一点上，他从来都不妥协！恩里克·卡尔翁透露了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一性格。他的父亲奥里维拉老先生在圣·科巴地区以“倔子”的诨名闻名乡里。

现代葡萄牙的变化违反了他的意愿，因为事实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国家脆弱的工业化、教育缓慢的普及(群众见闻扩大的结果)，对外部世界相对的开放(大批移民和旅游)，都是无法避免的“恶果”。更糟糕的是萨拉查认为应该永远处于贫穷和无知状态的人民却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觉醒了！

葡萄牙群众的非政治化——面对大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问题无动于衷——使国外所有的观察家感到震惊。葡萄牙有着欧洲(尽管刚刚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低的生活水平和最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数决非偶然。农村和大城市(里斯本和波尔图)的人民继续生活在非人的条件下也决非偶然。他们处在极端的贫困和愚昧之中，被迫大批流落到异国他乡，以挣到祖国拒绝给他们的、为维持起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葡萄牙人才外流或感到“在本国被流放”(葡萄牙唯一获得诺 贝尔奖的埃卡斯·莫尼斯语)也非偶然。葡萄牙在国际上的孤立(“光荣的孤立”——象萨拉查胡说八道的那样)，被迫在三条没完没了的、灾难性的、有害无益的、受到世界良知谴责的、对真正的民族利益毫无补益的战线上作战。这些事实彼此联系又互相影响。

但是，可以这样问一下：有着八个世纪历史、勇敢、智慧、具

有冒险精神、为世界发现了“新世界”的葡萄牙人民为什么束手无策、昏昏欲睡、破败没落到如此地步呢？这是一个使葡萄牙人的自尊心理深感不安和羞愧的复杂问题。找到并非搪塞的解释至关重要。为此，必须从头说起并追溯到“5·28事件”。

有人说“5·28事件”是国家对所谓“民主混乱”自发的、非连续性的反应。事实上，无论是1926年还是1910年，人民和国家机构都毫不相干，更没有想到去保卫它！

参与“5·28”阴谋的是来自各阶层的乌合之众：极端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最反动的君主派分子、天主教徒和仇视民主的共和党人、经济界代表和教会的头面人物。作为背景，有必要指出，国家刚从一次大战的军事行动中摆脱出来（为了把殖民地从外国的觊觎下拯救出来），而且在经济上已处于崩溃状态。

这种形势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随处可以感到，葡萄牙也不例外。1926年，国家为使过时的结构适应欧战后的经济环境，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遗憾的是共和国未能找到对国家及其机构进行改革的有识之士。自由慢慢走向了无政府状态。政党成了毫无威信的巡逻队。议会在人们日益混乱的精神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5·28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今天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军队介入政治（即使是带着最良好的愿望）意味着什么，其后果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对葡萄牙来说，“5·28事件”就是这一普遍规律的最好注脚。

在戈麦斯·科斯塔（令人尊敬的、以勇敢著称的军事长官、反复无常的政治家）背后是一些缺乏政治素养但又渴望掌权的尉官和校官。这些人从希托尼奥·巴埃斯时代就开始进行反对共和体制的阴谋活动。1925年4月18日他们组织了最后一次政变阴谋。在对他们进行的军事审判中，卡莫纳将军一反常态，

对政变分子大加吹捧。这位政府指定的公诉人反而成了受审者的辩护人！

“祖国已病入膏肓！”卡莫纳将军说。这句话后来被不厌其烦地加以重复，而且成了随之而来的军事介入和“军事独裁”的借口。

现在尚没有对这一时期的全面研究，对有些事件的评价往往是偏激的叙述和宣传口号，其可靠性令人怀疑。从1834年到1926年（君主立宪和共和议会），除短暂的间隔外，议会民主给具有悠久历史的葡萄牙带来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和治理方面的进步。但是从1926年开始，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评论：葡萄牙人同政治自由和民主格格不入，他们还未为此作好准备（或天生对此反感）。

第一共和时代的混乱状态——御用历史学家、狂热的君主派若昂·阿迈尔称之为“腥风血雨”——也不断被提到。但对究竟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一混乱，它又是为谁所利用一事却讳莫如深。例如对1921年10月19日事件，科列亚神父写道：“这是现代葡萄牙政治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但却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极端反动派”，说什么他们“干了坏事又作出一付悲天悯人的嘴脸”。

葡萄牙社会很难适应第一次大战后的形势，因为这是一个危机加剧的时期。由于威望下降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历届政府也象王朝末年的皇家一样遇到突出的寅吃卯粮的问题。第一共和的最后一届制宪政府却制定了一个收支几乎平衡的预算——象当时的财政部长马格斯·格德斯教授在回忆录中讲的那样。是1926年到1928年的军事独裁政府（尤其是希奈尔·科德斯破坏性的执政）把预算赤字增大到崩溃的边缘！

人们还提到第一共和时期的雅各宾式的反宗教主义——对

神父的迫害和当时政治家对教会的不容忍态度，但是对“5·28事件”之前的“宗教升平景象”，以及教会同共和政权的和解却闭口不谈。这一和解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应该提到天主教中心参与制宪活动和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阿尔梅达为洛卡德里戴上红衣主教桂冠两件事。

“新的旧共和”——达米昂·伯列斯对希托尼奥·巴埃斯短暂的独裁和蒙桑多君主复辟企图之后一段时期（1919—1926）所说的那样——的特点是内阁更迭频繁和二流人物（共和伟人的先驱）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与政治不稳定相连的是社会动荡——政府没有能力领导和解决问题。无论在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共和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如实行符合人民群众正当要求的进步政策——的无能为力从根本上说还是对反动派有利，因为它们利用无政府主义的泛滥作为投枪来反对合法的共和政府。在二十年代前半期，频繁发生了爆炸、罢工、骚乱和阴谋，从这些事件的背后不难发现一只策划这一切的黑手和聚集在“经济利益集团”（白人共济会）旗帜下的金融和工业界人士的可疑影响。烟草问题、安哥拉和宗主国事件及当时的“财政丑闻”和交易表明，某些推波助澜者是如何转动反动水磨的。它们实际上是为共和的敌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的！

这一“过程”其实和意大利在实行法西斯前一些年的情况如出一辙。只是我们对这一过程尚缺乏充分的研究，而且在政治条件根本改变之前，这种研究也不可能。

“新天地”曾对军事独裁前的情况从进步的、革新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在政治领域内，《葡萄牙集权主义》一书也对共和政府进行了不倦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从这两个方面——甚至包括许多保守的共和党人——时而发出轻率的声音：为反对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要求“一把尚方宝剑”，以便“安内”。奇怪的是经过

几年，共和法制破坏了。在出现把政权从无能的“5·28”军人手中收回的“第三者”之后，他们的所有幻想都无情地破灭了。“5·28事件”反对的老共和党人被彻底击败了，许多人被捕、从经济上被消灭或死于流亡、流放及监狱中（如阿丰索·科斯塔、努诺·克鲁斯、阿尔瓦洛·卡斯特洛、苏萨·迪亚斯、马格斯·戈迪钮）。不仅仅是他们，戈麦斯·科斯塔和“尖刻的评论家”库尼亚·列阿尔一样也被流放了。军事独裁政权的成员之一门德斯·卡伯萨达斯也曾多次被捕。贾伊梅·科特桑、拉乌尔·普罗恩萨、安东尼奥·塞尔吉奥也象“新天地”的几乎所有成员一样经受过流亡、流放和铁窗之苦。君主派分子帕伊瓦·古塞罗象共和党人诺顿·马托斯一样也遭到逮捕和流放。就连集权主义分子自己——那些最早的一直坚持集权的人——也相继被贬黜，象伊波利多·拉包索、阿尔梅达·布拉加、阿丰索·维埃伊拉、阿尔伯托·蒙萨拉斯、罗朗·布列多……甚至天主教徒也未能逃脱掉独裁者的疯狂迫害，象阿尔维斯·科列亚神父的流放和几年之后轰动一时的波尔图主教的流亡就是证明，更不用说共产党人本托·贡萨尔维斯、无政府主义者马里奥·卡斯特拉诺、阿纳尔多·西蒙斯等工人领袖了（后两位死于塔拉法尔狱中）。甚至当局的顽固的、曾为之作出牺牲的追随者也难逃厄运，象翁伯托·德尔卡多和恩里克·加尔旺之流！

各国人民不难看出独裁是怎么开始的：它一旦建立——不管怎么建立，也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就永远无法知道它是如何结束的。不幸的是葡萄牙成了这一格言的可悲的图解！

当军人对治理表现出完全无能、国家财政一片混乱时，萨拉查在总理维森特·佛列伊达斯将军（一位平庸的军人，我在父亲家认识他时已是一位老人）支持下于1928年上了台。他出任“财政独裁者”的条件十分苛刻，而且不容讨价还价。当他进入“军事

独裁政府”时（1926 年他曾短期参加过这一政府），各种宪法上的保障已中止，公众的自由被剥夺，政党、工会和第一共和的主要政治家已被剔除。在所有批评和反对事先已被消灭，有着检查的帮助和政治警察的保护而确信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的情况下，进行独裁统治是容易的！

萨拉查带来了什么革新思想呢？当他声称自己“非常清楚需要什么和走向何方”时，他的纲领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整顿内务”——通过实行新的税收和善于使用旧税收达到增收减支和平衡预算。这一经济学教授讲义中有的、被后来的宣传吹得天花乱坠的“灵丹妙药”其实不过是一位谨慎的家庭主妇就能开出的简单处方。作为凯恩斯之前的“经典经济学家”，萨拉查忠于旧的传统的原则：财政平衡，毫不妥协地捍卫坚挺的货币，不管这些可能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后来国民经济的缓慢发展就是证明）。

萨拉查实行的整顿财政的措施，在国内产生了某种推动作用，因为无能的军官经过两年“军事混战”之后，葡萄牙正处于迷茫之中。统治阶级和保守派把新的财政部长看成“救星”，而他对秩序的崇拜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从他大肆宣扬的保守的天主教主义中，他们本能地感到放心。1928 年到 1932 年就这样过去了。在此期间，萨拉查自然也从“财政独裁者”成了“至高无尚”的独裁者。

这时还是发生了暴力：密谋政变，反政变，军人、群众暴动，罢工，抗议示威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报复和令人憎恶的清洗。萨拉查对所有这些失败的图谋的胜利不能单从“侥幸”来解释（当然侥幸占了不小的成份）。在整个这一时期，国内的保守势力——银行家、大庄园主、富裕阶层和天主教舆论界都积极地站在他那一边。还有，军队的重要部门也手持 武器为他而战。于是从

安东尼奥·费罗的采访报导开始，关于萨拉查的神话开始精心地、孜孜不倦地编织起来……

有必要提起，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法西斯在欧洲上升的决定性年代。到处都掀起了对民主的批评，据说民主会导致国家主权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又使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进攻下束手待毙。在欧洲，阶级的特权受到威胁的资产阶级认为可以在新的法西斯主义中找到真正有效对抗咄咄逼人的工人阶级要求的保护盾牌。

葡萄牙象西班牙一样(她们的历史是如此平行)也未能逃脱普遍规律……

诡计多端的奥斯卡尔·卡莫纳将军接替戈麦斯·科斯塔担任总统。他和自己挑选的总理奥利维拉·萨拉查之间的暧昧关系构成了独裁政权初期的迷人篇章。由于接近卡莫纳的军界和政界为争权夺利的阴谋诡计接连失败，他们开始拜倒在萨拉查的脚下。萨拉查的"天才"也充分显示了出来：运筹帷幄、冷静、无情、恰到好处地耍弄别人……

这段历史终有一天会被披露，暂时无法解释的东西也会得到澄清，那么萨拉查复杂的心理过程的轨迹也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1932年开始，独裁政权的唯一灵魂萨拉查从未担任过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为什么？很难解释，但却表明了他那复杂而诡秘的个性的一个方面。他经常谨慎地避开前台的灯光，宁肯躲在阴暗的办公室里，象入定老僧一样从容不迫地编织政治罗网，象操纵傀儡一样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他把高高在上、神秘、寡言、阴谋、恫吓和封官许愿当作秘密武器交替使用。

萨拉查是一位奇特的独裁者，和他的意大利同类很不一样，因为后者是个喜欢出头露面、四处招谣的人。萨拉查和自大狂、

歇斯底里的希特勒也象昼与夜一样迥然不同。他也许和佛朗哥及贝当有点相似，重要的不同在于佛朗哥和贝当在上台前都是赫赫有名的军人。他同牺牲在希特勒手下的天主教徒、奥地利人陶尔斐斯①也许有某些相似之处。尽管没有“领袖”、“元首”、“首领”之类的头衔，但这位简单称为“萨拉查博士”的总理却扮演了上述独裁者的角色！

与上述独裁者不同的是萨拉查不是靠自己上台的，是愚蠢无能的军人把权力拱手奉送给他的。在葡萄牙，独裁政府先于独裁者出现，这和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都不一样，这就不能不赋予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在葡萄牙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全国联盟”是人为的、马后炮式的产物，在夺取和保卫政权中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也没有产生过把独裁者推上台、迫使其实行蛊惑人心的让步或法西斯式的所谓社会政策的群众运动。在教会支持下，他借助军人，单枪匹马走上了舞台。教会的支持虽然不动声色，但却十分有效。他之所以能站稳脚跟，与其说是由于教会的积极支持，不如说是由于武装部队的惰性和对未来的恐惧。当然，新闻检查、政治警察、经济报复以及由他拼凑的并为他服务的大财团的支持也帮了他的大忙。

直到1933年，萨拉查政权——至此仍是事实上的政权——才试图谋求政治和宪制上的所谓合法性。当时，一直是靠政府心血来潮强行颁布的各种法令来进行统治的（这是1968年之前萨拉查主持的历届政府的一贯特点！）。“殖民法”就是这样强加于国家的，它歪曲了葡萄牙的海外传统，炮制了所谓的“葡萄牙殖民帝国”。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炮制者后来又无耻地断然加以否认！不久又抛出了“政治宪法”（第一稿曾把“殖民法”作为其

① 陶尔斐斯：奥地利总理，1934年7月25日在维也纳为纳粹所暗杀。

组成部分)并由所谓的公民投票通过。在公民投票时,弃权票居然被当作赞成票计算。还有"国家劳工章程",第一次规定了组合原则。

1933年,萨拉查政权已把自己视为统一的、组合式① 和帝国式的共和国,试图把葡萄牙装扮成一个介于具有代表性的政权和法西斯政权(当时在欧洲颇为盛行)之间的混血的杂种政权。国家劳工章程几乎全文照搬了"劳工宪章"和"殖民法"中使用的概念(它们和葡萄牙的传统是如此背道而驰),显然是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启发。"宪法"(部分功劳应归于后来成了君主复兴党主席杜阿尔特·努诺代言人的费萨斯·维达尔)是独裁政权中各派思想的大杂烩,或者说是折衷。

由于西班牙战争的冲击,法西斯的影响显得十分突出:唯一的政党"全国联盟"成立,武装政治民兵"葡萄牙军团"、"海上卫队"以及以青年为主的准军事组织"葡萄牙青年"相继出笼。"各阶级合作主义"作为国家的官方指导学说和解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社会冲突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受到大力提倡。事实上,它仅仅导致了经济上严格的国家控制,确保了垄断的加强,几乎消灭了自由市场,由国家豢养了一个政治——金融——企业管理家组成的贪婪的阶层,确保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互相渗透,把工人阶级纳入了官办的、完全处于屈从地位的所谓"垂直工会"之中。这期间,萨拉查发表了所谓"民主已经破产"、"议会制度和公民自由已失去信任"的咄咄逼人的演说。

可以说直到西班牙战争爆发前,独裁政权在国内一直遭到持续的抵抗,军人多次哗变和群众不断暴动就是佐证。1927年2月7日,1930年7月20日,1931年马德拉的骚乱以及1931年8

① 组合式(CORPORATIVO):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

月 26 日只是其中主要几次流血事件。共和国内的各政党（虽然是非法的）、共济会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如“新天地”）不理睬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尽力煽起抵抗的烈火。受到残酷镇压的、相当虚弱的工人运动——从 1934 年 1 月 18 日的革命罢工（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开始——，由于无政府主义组织“总劳联”（CONFEDERA　ÃO GERAL DOS TRABALHADORES，简称 C·G·T）和“葡萄牙共和无政府联合会”（FEDERA　ÃO ANARQUISTA REPUBLICANA PORTUESA，简称 F·A·R·P）的不断衰落，开始受到共产党（1921 年成立）的影响。流亡在法国的“巴黎联盟”（阿丰索·科斯塔、贝纳迪诺·马萨多、阿尔瓦洛·卡斯特洛等）和流亡在西班牙的贾伊梅·莫拉斯、莫乌拉·平托、贾伊梅·科特桑、努诺·克鲁斯等也向当局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由于警察的系统镇压，国内出现的一些政治组织，如“民主革新”，“社会共和联盟”以及后来转入地下的“人民阵线”几乎都是短命的。

直到 1936 年，国内大体上仍存在着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原有的共和派组织（第一共和的各政党和共济会）、“新天地”旗帜下的社会主义者、一些残存的工人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分子）、捍卫学生会自由的大学生以及在群众中影响尚不大的左翼势力共产党；另一方面是宗教法西斯新秩序的捍卫者——军人（尚未同他们亲手扶植的独裁政权分道扬镳）、天主党、各种倾向的君主派分子（包括罗朗·布列多的“蓝衫”民族工团小组）。

在国内，支持独裁政权的力量明显占劣势，但由于欧洲民主危机、国际法西斯势力上升和大财团、保守阶层和教会的支持，他们却非常活跃。群众的无知和难以形容的经济文化的落后以及缺少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也为独裁政权的生存提供了方便。

萨拉查是各种势力妥协的产物，这些势力包括：君主派和共和派、温和的保守派和极端的法西斯派、带有宗教色彩的“阶级合作主义”的拥护者和民族工团主义者互相妥协的产物。当时的法律条文和理论演说反映了萨拉查这种根深蒂固的优柔寡断和他那混杂的、机会主义的、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折衷特性。1933年的宪法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产物——充满着矛盾和理论上的徘徊和妥协。当然，它维护了选举产生共和国总统（直到1959年德尔卡多将军竞选时才被取消）和国民议会的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因为“选举”常常成为闹剧而从未受到尊重。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作为权力机构的“咨询会议”。单从理论上讲，宪法第8条庄严肯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自由”得到了承认，但先前存在的和后来颁布的法律实际上又取消了这种自由（如审查法、结社法以及使集会权取决于内政部长和民政长官意志的各项法令）。理论上是国民议会（制定法律）和政府（通过“法令”立法）共同享有立法权，但实际上因为“法令”常常可以撤消“法律”，所以在独裁政权存在的40年中，几乎只有政府在行使立法权。

共和国总统作为宪政的关键，可以“自由”解除总理的职务和解散国民议会，他只对“国家”负责（经过1959年对宪法的修改，“国家”因为不再直接选举总统，所以也不再有权要求他“负责”）。事实上，权力完全归于了政府政策的负责人和唯一制定者——总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免部长（他认为这些人不过是他的秘书而已）。

在长期的实践中，萨拉查善于把宪法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它在多变的形势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根本不在乎理论上的连续性和内在的逻辑……有没有宪法其实都一样，因为对他来说，“朕即国家”！

从西班牙战争一开始，萨拉查就清楚地意识到葡萄牙政权

的命运已和佛朗哥领导的叛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所以一开始他就"全心全意"地援助"民族主义者"。虽然西方民主势力宣称"不干涉政策"，而葡萄牙政府也虚伪地声明遵守这一政策，但还是有两万名葡萄牙人加入了"志愿军"同佛朗哥并肩作战。在三年的战争中，萨拉查的两面性、冷静估计、援助叛乱的顽固决心（把上百名逃到葡萄牙的西班牙共和分子交给死神）暴露无遗。在后来的二次大战中和大战后，他的这些"德性"进一步受到了考验……

在西班牙内战接近尾声时，萨拉查已完全和"佛朗哥主义"沆瀣一气。在一次臭名昭著的演说中，他声称"我们竭尽所能而不求报偿。我们必胜，这就是一切！"这里的"我们"是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的胜利敲响了葡萄牙民主反对派的丧钟，他们（尽管很弱）只是到第二次大战将近结束时才又聚集起来。可以说，从 1938 年到 1943 年，在反对派完全解体并销声匿迹的情况下，萨拉查统治起来真是得心应手、为所欲为。

可恶的国内政策也导致了萨拉查对佛朗哥的无条件援助。西班牙推翻共和的"民族主义运动"代表了集权精神对共和给予各省人民的广泛自决权的"复仇"。对于作为西班牙中央集权主义的历史受害者的葡萄牙来说，各个伊比利亚地方主义的确立和胜利———一个向她的各地区民族的广泛自治开放，并公开地转向民主与社会进步的"西班牙联邦"的存在，要合适得多。本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在伊比利亚半岛创立一个经济、文化实体（尊重不同地区的特点和其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其成为欧洲和平和进步的重要因素。遏制咄咄逼人的纳粹法西斯，甚至可以避免二次大战的大屠杀……

与此相反，佛朗哥和同其并肩战斗的“葡萄牙志愿军”的胜利却使西班牙成为一个倒行逆施的、中央集权得到强化的、“西班牙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国家，也把葡萄牙从欧洲孤立了出来。伊比利亚半岛的法西斯分子通过“伊比利亚条约”狼狈为奸，而葡萄牙则把自己绑到了西班牙命运的战车上，成了西班牙与大海之间的一座孤岛，从此置身于进步的欧洲之外。这也是萨拉查主义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世界大战使得葡萄牙在欧洲的孤立状态得以延续下去。在冲突中，萨拉查经常把自己打扮成葡萄牙中立的设计者并以使国家免于战争牺牲而炫耀。真是痴心妄想！葡萄牙之所以能远离冲突主要应归于希特勒的战略决策和使他无暇顾及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态势。在整个战争期间，葡萄牙玩弄了两面派政策：一方面不得不对自己的传统盟友英国保持某种尊重（出于殖民地的考虑），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又站在轴心国一边。而且萨拉查对纳粹的胜利一贯坚信不移，甚至到战争快要结束时还是这样……

对日本占领帝汶之类的可悲事件，萨拉查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应，这清楚地表明后来被称之为“合作性中立”政策的两面性。究竟对谁有利的“合作性”呢？

盟国胜利之后，萨拉查力图用对盟国提供的服务—— 主要是亚速尔基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因为缺乏当时的有关资料，所以很难弄清葡萄牙外交的复杂情况。当时萨拉查兼任外交部长，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在他直接指挥下制定的。马格斯·戈迪钮将军曾是 1947 年 4 月 10 日军事运动的首领，在战争期间也是亚速尔的军事长官，当他在儒利奥·马托斯医院（他被囚禁在那里）去世时，我曾听人谈到他同当时的国防部长费尔南多·桑托斯的秘密通信问题。据说这些通信暴露了政府和这位部长的亲

德本性以及他下令为反对盟国所采取的详细的、极其机密的部署。当时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并导致了戈迪钮将军的辩护人、年青的律师阿德利亚诺·莫列拉(我是在阿尔茹贝狱中认识他的)的被捕,因为他指控这位部长犯了谋杀罪。他之所以这样做,据说是受了他强有力的保护人卡埃塔诺的暗示。事实上,这桩公案被压下了。律师、将军的未亡人和一个儿子(被关了近两个月)均被释放。信件似乎被交了出来,但始终没有透露出来……

还有一位不安分的名叫卡瓦略·席尔瓦的中尉(1947 年我同他一起被关在阿尔茹贝监狱里),战争期间是桑托斯·科斯塔的亲信,曾炫耀说他在伦敦的一家银行里存有能证明萨拉查政府袒护德国的文件。

总之,这期间的全部激动人心的历史仍存在档案柜中、总理府的办公室里或虽然经过了好多年仍然害怕披露出来的人的头脑中……有待人们去发掘。但是可以断言,战争期间葡萄牙采取了两面派立场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事态的发展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这种两面派立场不知会给国家带来多么沉重的牺牲……

让我们回到开始时的问题吧!对国际法西斯失败后萨拉查主义仍然苟延残喘下来这一事实该作如何解释呢?同样的问题(也许更重要)还涉及到西班牙,它同纳粹主义(比如蓝色旅)的关系更为密切。盟国胜利后,西班牙在国际上受到谴责,政治上一直处于"GHETO"的地位。①

恕我直言,答案可以在"西方民主国家"(尤其英国)对半岛国家的背叛中找到,因为它们没有履行战争期间作出的许诺。今天,我们已不再怀疑战后确实存在着一个以伊比利亚半岛和拉

---

① GHETO:原指城市中犹太人或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此处指西班牙处于孤立地位。

丁美洲为基地，并且深深渗入战胜国内的国际法西斯阴谋……；

此外，对共产党在欧洲得势的担心（特别是对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惧怕）以及冷战的爆发模糊了西方领导人的眼睛，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转而支持半岛上的法西斯政权（他们扮演了反共的急先锋）。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世界命运负有责任的人（如欧内斯特·贝文）竟然还是社会党人或自由党人（如美国、英国、法国）！他们看不到残存在半岛上的法西斯主义把欧洲战略上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置于随时爆炸的地位。

我们不得不承认，萨拉查在战后的浑水中施展了非凡的灵活手腕，而且再一次得到梵蒂冈（庇护十二世的梵蒂冈！）外交上的至关重要的帮助。

反对派从几十年的迫害和蛰伏中恢复某些力量之后，天真地认为他们是生活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之中。但萨拉查却未作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他在外交部的帮助下，很快适应了新的形势，匆匆在集权体制的脸上涂抹一些骗人的"民主"油彩！他死死地抓住权力，肆无忌惮，完全缺乏一个负责的政治家应有的原则。例如，他没有（巴西的）热杜里奥·瓦加斯那样的男子气概（看到专制体系破产后有勇气放弃权力，多年后又通过民主途径胜利地重返政坛）。

萨拉查则恰恰相反，在咒骂一通"民主必然失败"之后，居然厚颜无耻地发表了臭名昭彰的、令全国为之瞠目的演说，洋洋得意地承认"胜利的旗帜正迎着民主之风飘扬"，葡萄牙政权归根结底也是"民主政权"！

公民投票的死敌在邀请人民投票（20 年的独裁统治之后）。他说："投票是伟大的义务"。他还许诺进行"自由选举"，"就象在自由的英国那样自由的选举！"

反对派呢？这时反对派自以为在国内已占压倒多数！他们

相信在道义上、思想上、政治上完全臭了的萨拉查主义已被各种无药可救的矛盾所蛀蚀，加之同失败的法西斯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会象一枚烂果子一样倒下去。他们要等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巨大的机会失去了，后来还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还是留待后面慢慢讲吧！

·4·
自由……“充分的自由”

欧战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仅在里斯本，而且在全国出现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标志着国家生活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各阶层人民普遍认为战争的结束势必导致宪法的改变，即“新政”的寿终正寝，国家回到民主生活的轨道上。

怎么回到民主轨道上呢？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极其模糊不清！事实上萨拉查象往常一样沉默寡言，对自己的意图不露一点口风。反对派负责人深知他死抓住政权不放，所以只有通过群众的、军事的或国外的压力才能迫使他下台或至少开放民主。

从欧战结束（1945年5月）到亚洲战争结束（同年8月）的几个月内，反对派确信新的形势完全对他们有利，于是趁机恢复和重新组织起来。当时“三巨头”还在高唱在共同战斗中取得的友好关系，而人民并不知道盟国已通过幕后外交加紧了利益和影响的争夺！丘吉尔还没有发表著名的“富尔顿警告”，即“从巴尔干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铁幕已降临在本大陆上”。

MUNAF通过地下活动来协调反对派的各种力量，为自己出版的报纸（仅仅发行了几期）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民族解放报》。但是对于达到“解放”的战略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犹豫不决。老的共和党和自由党机构、各种倾向的社会党人士一致

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军队才能结束由他们制造和维持多年的这种政治格局。而共产党人却揭露军事叛乱的危险，把精力完全放在了人民群众的旨在进行全国反法西斯起义的行动上。

虽然经过1944年和1945年的大罢工(其间出现了几位真正的工人领袖，如被警察杀害的亚历山大·迪尼斯)，但群众仍然十分谨慎，这并不奇怪。多年的残暴镇压使得最大胆的人也畏缩不前。罢工的权利不仅被取消，而且被认为(现在仍然如此!)是犯罪行为。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由于某些基本产品的投机猖獗和配给的荒唐政策(只是对穷人的)，共产党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其中有几次还导致了大规模的罢工。当时的《前进报》上充满了这类斗争及其曲折和牺牲者的报导，其中包括共产党和一些左派人士。在利巴特茹罢工期间还成立了由若泽·莫尼斯(曾率领“自愿军”参加过干涉西班牙的战争)为首的工厂动员委员会。无数人被捕，罢工工人象牲畜一样被集中到小广场的斗牛场中。

但是罢工——即使再大规模的罢工——也还不足以推翻现政权。

英国工党的胜利——它公开宣布恢复君主制、实行社会改革和进步政策(国有化、贝佛里奇的社会保险计划、贝文的医疗政策等)——更加鼓舞了葡萄牙的民主派。

当得知工党的巨大胜利时，我曾认为这是可以避免“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民主途径达到社会主义的证明。埃内斯特·贝文后来采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政策，整个说来是不公正的，而且表明他们对苏联和刚成立的“人民民主国家”发生的情况完全无知，使我对自己如此信赖工党感到懊悔。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特别是艾德礼政府在社会和英联邦方面的成

绩还是积极的。

在反对派中，对工党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有的人对此更加欢迎。由于在我国什么事情都是姗姗来迟，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我们中间出现了短命的“工党”（当然是秘密的）。这一严密组织的总书记——卡斯达涅伊拉·洛博律师（1947 年我同他一起被关在阿尔茹贝）——在 4 月 10 日的军事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个月内，在自由职业者、军界、政府职员、青年和某些开明的工人中间，几乎都在公开谈论着反对现政权，认为它的垮台已迫在眉睫。葡萄牙社会停滞和失败的痼疾——恐惧——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消失了。当时，警察的镇压几乎全部是针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但许多人还记得战前甚至战争期间的种种暴行（没有审讯的长期监禁、处死、折磨、拷打、流放到荒岛和遥远的帝汶、在审讯中使用电镣铐等），例如在所谓的“壳牌公司密谋案”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家公司的一些职员卷入了此案）。这次所谓的“密谋”实际上是一场亲英运动，目的是在葡萄牙成立一个（在德国入侵我国领土的情况下）装备良好的抵抗网。警察破获后（1943 年时，政治警察强烈亲德，好几位头目都在盖世太保中接受过“实习”，据说克拉姆曾亲自到葡萄牙“传授过他们的方法”）。这些民主派分子被捕后受到拷打，后来被长期投入塔拉法尔集中营，象体育记者康迪托·奥利维拉（《球报》的创始人）和科英布拉的医生费雷拉·科斯塔（在 M·U·D 年代，我同他们的关系相当密切）。

他们是真正的民主派，一点共产党的味道都没有。但政府对他们的“待遇”却完全是对付共产党的那一套。这并不是说——这一点必须说清——针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应有不同的“对待”，我绝没有这个意思！警察的镇压、暴行和拷打，不管用在什么人

身上，都同样是不道德的、令人憎恶的、应该受到谴责的！自从战争结束后，政府的宣传竭力想使国际舆论相信，它的镇压政策仅仅是针对共产党人的，目的是要遏止共产党在葡萄牙的惊人繁衍。但这不是事实，尽管从西班牙战争开始后共产党人一直是主要的受害者！

1945 年 8 月，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萨拉查主义的军人运动(更确切地说是军民运动)即将爆发。共济会的前“龙头”、MUNAF 主席诺顿·马托斯将军领导了这一运动并得到各总部和各军区的广泛支持。

这一年，我在鲁索度了几天假，还记得我父亲在当地的活动。那时不断有军人和文人带信来。家父是马托斯将军的老朋友，而且被视为这一革命组织中绝对可靠的核心人物。

我不知道 MUNAF 中各派政治组织是否都知道这一秘密，我想不会。我甚至想由米格尔·桑托斯准将领导的负责准备举事的军事委员会是个完全独立于其他政治机构的特殊东西。具体说，我相信比如共产党应该是被排除在计划之外的。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民兵骨干组织，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明显倾向共产党，在密谋中起着突出作用，杰出的若瑟·维列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反法西斯活动的不倦的鼓舞者，在 M·U·D 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多年后却在莫桑比克的一次愚蠢的车祸中丧生！

象多次——简直可以说一贯——发生的那样，举事在最后一刻失败了。最后时刻的优柔寡断、害怕承担责任、关键部队的军官调动，一句话，领导人缺乏决断和勇气！几个月的紧张活动白费了，由此引起的沮丧情绪是巨大的。这种灰心丧气的情绪在推动军人举事的文人中间尤为明显。

不过话又说回来，M·U·D 也正是这种沮丧情绪的产物！

据我所知，这一想法出自律师特奥菲洛·桑托斯和马里奥

·阿尔维斯的一次谈话中。当两位知道八月起义内幕的人——桑托斯是家父同军人间最可靠的联系人之一——垂头丧气地评论自己的革命憧憬再次失败时，他们想通过举行一次讨论政治局势的公开会议来试探扬言举行“充分自由选举”的政府的立场。要理解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想法代表着怎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需要回忆一下葡萄牙当时的政治形势。

到 1945 年，萨拉查政权已存在了二十年。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它从来不允许反对派有丝毫的合法活动。对政府来说，反对派是不存在的，因此它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从集权主义的简单心理看，反对派是和叛国一样的有罪。对反对派来说，如果他们胆敢在中央集权制度下露头，回答他们的就是镇压和暴力。

萨拉查确曾说过要举行“选举”，而且是“将象在自由的英国那样自由”的选举，但人们都把民主的宿敌的这些话看作是一个政治阴谋，是“让英国人看的官样文章”。但是……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尤其是当根本迅速解决的希望破灭的时候……

当时这样想的人还不到四十岁，属于在独裁政权出现时进入大学的一代人。他们曾经进行过英勇的斗争：闹学潮、罢课、各种抗议活动，以反对大学中的法西斯组织，其中许多人甚至和罗朗·布列多的“蓝衫队”、集权分子、警察和独裁政权的军队进行过搏斗。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尝过萨拉查监狱的滋味和它的政治警察的“威慑手段”（独裁者无耻地把这称为必要的“应急手段”）。

按法律规定，需向里斯本民政长官递交一份请求召开公众集会的申请，但为这份申请征集到必要的签名并非易事。这一简单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国家保安警察”的威力吗？

这份历史性的申请书的签名者共有十一人，几乎全是我在学校闹学潮时的同学和朋友：马里奥·阿尔维斯、特奥菲洛·桑

托斯、曼奴艾尔·门德斯、古斯塔沃·索罗门钮、若瑟·马卡良斯·戈迪钮、小阿丰索·科斯塔、阿曼多·阿当·席尔瓦、曼奴艾尔·卡德里诺·杜阿尔特和三名老战士，其中两名是“新天地”的成员：卡马拉·勒伊斯博士和阿尔伯托·卡特亚斯博士，另一位是三十年代流亡在西班牙的老共和派分子、商人卡纳斯·佩雷拉。

出乎所有的人——首先是签名者——的意料之外，申请被批准了。签名者至少在当时没有受到任何报复！原因在于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已进入了后来被称之为“充分自由”的阶段。这就是在每次选举前的短短一个月之内，独裁者“稍微”放宽了检查，允许反对派露露面，只要他们遵守“分散秩序”，或者说“没有组织的”原则，因为所有政治组织(“全国联盟”除外)仍被禁止活动。

对集会的发起人来说，要在48小时之内找到场地、在国内具有威望的会议主持人和起草提交政府的请愿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干这件事的人几乎全对合法斗争缺乏经验。他们一生中从未投过票，也未参加过选举工作。在葡萄牙，已经有20年没有进行过名副其实的选举了！

没有哪个剧院的老板愿意向这样的政治集会出租场地。私营企业的局限性使得他们缺乏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政府的报复。甚至连老共和党人、30年代反对独裁的军事密谋的一贯资助者——游艺场的主人里卡多·戈翁斯也不敢！

最后只好借用位于旧的本福莫索街上的“康迪托·列伊斯共和中心”的一间小厅，勉强能容纳200来人。会议主持者是第一共和时期的部长巴勃扎·马卡良斯。1940年，他因在自己主办的法律杂志《诉讼》上大胆抨击和教皇的“契约”而被里斯本法学院解聘。他两边分别坐着阿丰索·科斯塔(第一共和时期一位

大人物的儿子、索邦大学法律学博士。1933年其大胆的博士论文《民主、议会主义和公民投票》却未获里斯本法学院的通过）和特奥菲洛·桑托斯（当时已具有为共和事业服务的丰富阅历）。当晚唯一的发言者（他宣读的致政府的呼吁书由听众用欢呼的形式通过）马里奥·阿尔维斯也是第一共和时期一位部长的儿子！

尚不满20岁的我也是1945年10月8日举行的、后来被称之为"历史性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新天地"曾为这次会议出版了专号（上面登出了所有与会者及签名者的名单）。为我弄到请柬的是常到我家去的若瑟·维列纳，他同我父亲有着"革命的情谊"。

那个难忘的夜晚给予我的激动、担心和兴奋如同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还历历在目。当时的气氛充满着希望与焦虑。秘密警察耀武扬威地在会场附近晃来晃去。会发生什么事呢？一夜之间闻名全国的利马·阿尔维斯出尽了风头。他以激昂慷慨的语调宣读的呼吁书堪称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这份适时诞生的文件不回避任何重大问题，对独裁政权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批评，目标清楚、格调高雅，没有威胁和恐吓的言辞。它呼吁为自由选举创造起码的条件，虽然不敢奢望象"自由的英国那样自由的选举"，但也应该是"诚实的选举"。具体是什么呢？就是在近20年的"充分自由"时代人们一再要求而从未实现的条件：新闻自由；集会和宣传自由；结社和进行合法政治活动的权利；参加并监督人口普查；监督选举计票和清票；大赦政治犯。

当沉着镇定的马里奥·阿尔维斯呼吁取消佛得角集中营（俗称"塔拉法尔"）时，会场里顿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会议结束前，费尔南多·卡尔桑提议出席者声援发起者并在刚刚宣读的呼吁书上签名。这一建议在欢呼声中被通过。这就是后

来一再谈起的“民主团结运动”名单产生的经过！

第二天上午，所有的报纸（虽然不在主要版面，但却以突出的地位）报导了这次集会。全国从长期昏昏欲睡中突然惊醒了。“民主团结运动”（M·U·D）开始了！

如果说全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空前自发的热情响应了集会的呼吁，一点也不为夸张！从北到南，从大陆到群岛，从本土到非洲殖民地，到处举行集会支持10月8日通过的呼吁。在窒息的新闻检查下刚刚松一口气的报纸终于登了一点点使公众感兴趣的、可读的东西。国内各行各业中成千上万备受尊敬的人——作家、大学教授、艺术家、科学家、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高级职员或普通职员、各种职业的人纷纷在“民主团结运动”的呼吁书上签名。他们希望自由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发表谈话，提出建议和解决办法，开展批评，表达自己对民主的信念和对独裁的厌恶。成群结队的人在街上等着各种报纸，特别是下午的《共和国报》和《里斯本日报》。报童手中的报纸常常被一抢而空，国家开始呼吸了……只有亲身感受过当时的气氛以及街上、各地的政治集会上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情绪，才能理解国家已被窒息到了何种程度，是多么渴望得到解放！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萨拉查应该体会到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失望吧！无可否认，举国上下都反对他！这位生性不相信人民有决定自己命运能力的人，在政治上怀疑自己的同类，心理上冷漠无情，就象对待海底深处的鱼类一样。此时此刻，他对自己的同胞一定怒火满腔、深深失望并有着不可消解的鄙视和仇恨！

《共和国报》几乎每天都登罗萨·马尔丁斯的文章。此人从前写过不少小册子，是个自由君主派人士和自由的鼓吹者。报童在罗西奥广场高兴地叫喊着：“罗萨讲话啦！罗萨讲话啦！萨拉查麻烦啦！”

短短几天内，“民主团结运动”(M·U·D)象狂潮一样席卷全国。在所有县治、省会和许多村镇都自发组织起了声援《呼吁书》委员会。11名发起人被从各地涌来的声援者“淹没了”。没有准备、没有人手、没有政治组织，甚至连一张放打字机和电话的桌子也没有，一切都要临时拼凑，真是要命！

“民主团结运动”总部临时设在金子路101号马里奥·阿尔维斯律师的办公室里。一切都涌向了那里：众多的激动人心或毫无意义的题辞，热情洋溢而又言不及义的慰问信，在最后一分钟想搭乘列车的机会主义者、冒险家、理想主义者、警察和……一些蠢货！

我在阿勒奥萨·费奥、古斯托迪奥·马尔托纳多及其他不多几位已记不清姓名的人陪同下也到了那里，以组织起来的大学生的名义表达了学生们的声援。我们提议召开一次青年集会以便正式表明支持民主团结运动的呼吁。一开始，不知疲倦的卡多索·维列纳把我们引见给小阿丰索·科斯塔和索罗门钮。当时卡多索几乎经常呆在阿尔维斯的办公室里。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对共和国的挚爱关注着席卷全国的运动。后来我们同马里奥·阿尔维斯谈了话(由于朋友们的支持和自己的谨慎行事，他已是运动的头号人物)。我们受到了热情亲切的接见(这一点要说明)，而且立即接受了我们的加入申请。这样就诞生了独裁统治时期也许是最大的青年群众运动——青年民主团结运动(即青年M·U·D)！

M·U·D临时机构的成立并非一帆风顺。MUNAF可以说被M·U·D挤垮了。现在的政治组织(从共产党开始)反应迟钝，因为它们更适应地下活动，所以让我们捷足先登了。当时正处于大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联盟”的新干部由于是各县委员会的核心人物，所以都受到了重用。德高望重的老共和派人士在

各地也成了风云人物：在波尔图有安东尼奥·戈麦斯，赫尔德·里贝洛和桑托斯·席尔瓦；在布腊加有多明戈斯·佩雷拉；在法鲁有席尔瓦·诺布列；在里斯本有巴勃扎·马卡良斯；在维亚纳·卡斯德洛有罗德里戈·阿布列乌；在阿累格里港有维列斯·卡罗索；在累里亚有马尔多纳托·佛列伊达斯；在丰沙尔有贝斯塔纳·儒尼奥尔；在瓜达有我父亲及其他人。但是运动的真正力量是新人——三四十岁左右的人。他们对过去没有责任，主张面对未来、面对社会正义和人类发展，但又不排斥第一共和的自由豪放的传统。

民主团结运动的第二次选举在里斯本古堡附近的塔勃达旧剧院的小厅里举行。这次会议奠定了运动的组织基础并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如果没有遗漏的话，他们是：巴勃扎·马卡良斯、彼得罗·毕达、本托·卡拉萨、马里奥·阿尔维斯、曼奴艾尔·门德斯、阿当·席尔瓦和阿尔维斯·列托尔(后者很快为路西安诺·莫乌拉医生所取代)。从名单上可以看出在人员组成和政治倾向上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这中间有 MUNAF 和 M·U·D 明显的协调努力。

随着竞选运动的深入，萨拉查显然不准备满足 M·U·D 提出的正常竞选中应有的起码条件。面对萨拉查的顽固拒绝，反对派该取何种态度呢？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没有人提出这一问题，我认为它们在下列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唯一合乎逻辑的、可行的道路是弃权”！这场选举象以往一样必定是一场闹剧，所以不能以自己的参加使其合法化！

随着在其后的活动中取得的经验增多，这种想法才渐渐失去了市场。当时治安警察的档案尚未更新补充，所以选民登记册也没有象 M·U·D 出现后那样得到核查。战后，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都渴望变革，他们将会毫无畏惧地同反对派一起参加投

票。选举中的“舞弊系统”还没有“科学化”，再说当时也没有这种必要。所以把一些可能改变整个制度的议员选进国民议会是完全可能的。但这都是事后才觉悟到的，而事实却是冷酷无情的：在政治科学中，是不可能对任何设想进行实验的！

萨拉查对反对派如此固执的“幻想”是一清二楚的，这一定使他感到可笑。葡萄牙当局在各国政府和国际舆论面前对自己合法化的需要，如果说不是一点没有，至少也是微乎其微的。萨拉查知道，西方民主政府不会干任何事情来帮助改变伊比利亚半岛的“现状”。他随便装装门面就可以迷惑国际舆论并使其反动政策得到开脱。再说，长期反共的、与轴心国狼狈为奸的半岛独裁者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军事上会服服贴贴地向他们作出种种让步。西方政府害怕自由和民主在别人家里产生的后果。他们错误地认为在世界两大集团对峙的情况下，全球性的战略要求同半岛可能出现的政局不稳甚至民主化的出现是不相容的。由于害怕现在，他们宁肯牺牲未来！这样在国际上就开始编织起关于萨拉查的神话：一位慈祥的、温和的好独裁者，他以虽然过时但却是可爱的方式治理着自己的人民，而且为人简朴、严于律己、关心臣民的福利和秩序……

1945 年，反对派中还没有人充分了解国际政治交易中已清楚出现的这一路线。后来的意识形态和出于理论上的连续性的考虑更加模糊了有识之士的政治现实主义。

当时，萨拉查的宝座已有所动摇，但有些因素却帮了他的大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团结运动中央委员会下令停止已在全国各地展开的宣传活动。这个命令铸成了大错，它沉重地打击了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激情，给了独裁政权喘息的机会。反对派给国人留下了“规规矩矩”的印象也许与此有关吧！看起来（当时我远远地关注着反对派曲折的战略），这也是 M·U·D 领导人

胆怯的结果。当他们得知库尼亚·列阿尔、列洛·波特拉(《太阳报》社长)和画家吉列尔麦·菲利浦要在小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后,竟然担心他们会“喧宾夺主”……

顺便提一下,库尼亚·列阿尔当时是反对派政策的“眼中钉”。旧日的恩怨(他反对戈麦斯和马托斯的运动,一贯攻击共和党,在独裁统治初期同反动派勾勾搭搭——“新天地”对此曾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使得反对派的领导把他当成政治瘟疫一样拒之千里。正如我提到的,他的名字未列入 MUNAF 和塔勃达剧院会议出席者的名单中(努诺·西蒙斯也一样),甚至包括所有在世的第一共和时期老政治家的名誉委员会中也没有他的名字。

不管怎么说,由于害怕库尼亚·列阿尔(他在公开讲话中从未放弃过对 M·U·D 领导人的攻击)或者另外某种我不知道的理由,停止宣传集会的命令也许是反对派政治在 1945 年 10—11 月间所犯的最大错误! 总之,它给高涨的群众热情泼了冷水,而这种热情是迫使政府让步的唯一压力。

另外一个错误——尽管这和 M·U·D 领导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全局却有影响——就是后来受到公众广泛而不公正议论的轰动一时的“名单事件”。

有必要费点笔墨谈谈这一点,因为这是萨拉查政府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也是独裁者寡廉鲜耻的铁证。他不惜采取最肮脏的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附议“呼吁书”的活动从 10 月 8 日大会当天就开始了,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各阶层的人在利马·阿尔维斯的办公室里排起了队,然后再到特林达德街运动临时总部去签名(报纸每天都登出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单)。不仅里斯本是这样,全国到处都是如此……

年迈的共和国总统卡莫纳接见了M·U·D领导人。他们徒劳无益地呼吁组成一个不偏不依的、确保选举活动在真正自由气氛下进行的过渡政府。为了增加呼吁的份量，他们向报界声明仅在里斯本就有5万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这是事实！但是老奸巨滑的萨拉查却从这项声明中找到了进行恫吓的借口。他通过内政部长对反对派的声明提出了怀疑。当时的内政部长是波得辽·莫尼斯将军(1962年任国防部长时策划了反萨拉查的政变)。为了安抚惊慌失措的萨拉查分子，他说“局势既不会倾向选举，也不会导致开枪。”几天后在布拉加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就是这个莫尼斯又口吐惊人之语：“如果1910年有足球的话，共和国也不会建立起来！”

M·U·D的领导人没有察觉到正在布置的陷阱。所以当政府建议把呼吁书签名者的名单交给共和国检察院(理论上是独立的机构)时，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加以拒绝，对向公众显示一下运动的力量和重要性有着很大的兴趣，尽管运动发动起来后还一无所有！

负责保存上述名单的是律师马里奥·卡斯特洛博士。他奉领导者的命令交出了名单，而事先并未得到政府的任何书面保证，虽然它一再声明不会进行任何调查和报复，只是想证实一下反对派讲的统计数字是否属实。

政府虽然公开地、郑重地作出了许诺，但却没有遵守。它无耻地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后果接踵而至。清洗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正在亚速尔服役的普里尼奥·席尔瓦上校，他立即被撤职！随后又有大批军官被撤职。在政府官员中，在教师队伍里，在各个公共机构和国家有影响的部门，凡是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的就足以构成被开除的理由，或者在晋升和竞争中受到歧视。

签名者后来一个个被召到内政部，反复查问他们“为什么”

和“怎样”签的名。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也去了那里。他们的目的有两个：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恫吓反对派（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和对政治警察的档案加以补充！

后来，M·U·D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委员会（以波尔图为首）拒绝交出支持者的名单，而且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里斯本M·U·D领导人、尤其是马里奥·卡斯特洛律师的运动，指责他们交出名单的卑怯行为。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公正的了！正如律师在致利马·阿尔维斯的一封义正辞严的公开信中所解释的那样，名单是那些人亲自写下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名字作为反对派公布出来（否则他们就认为自己没有参加运动），而且名单在交给共和国检察院时也得到了保证，他怎么能预见到政府会自食其言，背信弃义呢？

在政治上，萨拉查从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这是他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他长期执政的可悲理由之一。

1945 年 11 月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反对派全部弃权。政府大肆吹嘘自己的“胜利”，说什么这是“空前的”，因为议会象至今为止一样仍由 120 名萨拉查的忠实仆从所组成。这些人以自己的沉默买到了毫无用处但却收入丰厚的议员席位！这样的丑剧能骗得了谁呢？

就在选举的前几天，政府用前所未有的严厉检查规定重新扼杀了新闻自由。沉默的帷幕又可怕地降临在全国的大地上。贪得无厌的、不负责任的大资产阶级继续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心安理得地加以享用。对反对派来说，20 多年的充满着希望的破灭和战斗的失利的漫长时期又将重新开始。人民不得不俯首贴耳地生活在一个象被外国政府占领的国度里一样——作为最大的反抗就是伤心地远走异国他乡。作为手无寸铁的牺牲品，对支离破碎的国家的声誉负有责任的有识之士成批地落

入政治警察的手中——他们的痛苦呐喊甚至无法惊醒沉睡的国民意识……

·5·
不屈不挠的反对派(1945—1949)

在"充分自由"的第一阶段(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以1945年11月的所谓"选举"告终),内阁总理的无能和缺乏政治手腕的弱点已暴露无遗。除了独裁之外,他找不到别的统治办法。

政府明确表示不准备在任何方面同反对派妥协,更不会作什么重大的让步。尽管反对派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据许多观察家估计,代表了绝大多数选民),成了民族的精英,但却不得不三缄其口,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讲坛。

由于地理原因,葡萄牙在战后被列入了所谓的"自由世界",尽管没有人认为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在西欧,政党象雨后春笋般出现。由于实行多党制,反对党纷纷参加民主机构的正常的、自由的活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唯一的例外(可悲的是,希腊经过长期曲折的内战之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大部分政治上负责的葡萄牙人都认为这种局面是"暂时性"的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以为当局很快就会被迫作出深刻的改变。法西斯西班牙在国际讲坛上受到公开的谴责(许多国家甚至只承认流亡的共和政府),而葡萄牙则不可避免地伴随邻国在短期内势必要发生的变革或革命而发生变化。

然而,强硬的葡萄牙政府却把"民主团结运动"内的反对派置于极其微妙的境地。"充分自由"的龙头被关死,报纸噤若寒

蝉，运动的临时总部被关闭。反对派至此为止尚未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一般认为，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容忍反对派的“准合法”地位，也就是说，默认了这一事实。

全国各地的“民主团结运动”委员会在“选举”之后拒绝解散，因为它们提出的政治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民主阵营的各派势力之间，占优势的意见仍然是“强行实现合法化”，尽管许多反对派人士认为这种坚持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把政府撵下台！

战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政治委员会已经成了“民主团结运动”委员会的徒有其名的重叠机构——在许多地方，两套班子都是相同的人马。由于内部分歧而瘫痪的“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在战略方面已无力沿着坚决组织革命的道路前进（而这又是它的唯一宗旨），显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49 年它寿终正寝为止。

象“民主团结运动”这样的准合法组织，只有伴之以强大的、团结一致的地下运动，才能促使政权的崩溃。

当一个政府阻止了所有合法的、能够导致正常权力移交的渠道之后（象葡萄牙的情况），暴力就是唯一的出路了（不管是政变、军事政变、暴动、起义或革命）。组织这一活动是“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的历史使命，但它无力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一使命只好落在“民主团结运动”的身上：靠其领导成员的牺牲和毅力燃起反现政权斗争的火焰，而实际上它却完全无力这样作。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们（我和几位大学同学）走访利马·阿尔维斯博士之后，立即开始在里斯本各高等院校组织支持“民主团结运动”的学生会。我们成立了 M·A·U·D（民主团结学生运动），并提议组

织一次公开的选举大会。大会原定在塔勃达剧院（当时已租给维多利亚电台）举行，届时我将作报告。但到最后一刻，会议被禁止了。《新天地》出了专号，刊登了原定在会上宣读和通过的主要文件。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我结识了“民主团结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首先是在大学享有巨大政治威信的德高望重的本托·杰苏士·卡拉萨教授。他当时还年青，但却已经有了白发，颇具学者和音乐家风度，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印象。他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谈吐高雅、笑容可掬，令人不禁肃然起敬。毫无疑问，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人之一。在同他关系密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年中，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卡拉萨教授于1948年6月去世。

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由我起草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事先已得到各院校学生的赞同，提出了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学生们的主要要求。尽管M·A·U·D对自己的独立性十分看重，但我记得在会前大家还是认为应把文件提交M·U·D领导人审阅。为此，我和一位名叫诺夫阿斯的经济系同学来到位于阿尔梅达·索萨街的教授那堆满书籍的简朴的家中。陪同前去的还有几位负责筹备大会的同学。由于不知道教授会对文件提出什么建议和批评，我不免有点紧张。但卡拉萨教授很快使我们摆脱了拘谨。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对我们完全平等相待。我读文件时，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望着我，偶尔要求我作些简短的说明。最后，未经什么修改就通过了。这天晚上对我至关重要——它是对我所走道路的巨大鼓励。

我们离开那里后来到M·U·D总部，费尔南多·费朗和其他人在那里等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费朗当时属于里斯本区委员会，几年后，我们成了兄弟般的朋友。在卡拉萨教授的支持下，学生会很快成了民主运动的尖兵。

从M·U·D总部出来时，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坚信第二天的大会将成为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节日。可是，我们错了！第二天等待我们的是禁止举行大会的通令！

M·A·U·D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在里斯本各院校的支持下，我们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在M·U·D总部占据了几乎所有"大人"的办公室，热情洋溢、信心十足地埋头工作。M·U·D的领导人十分尊重我们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的确是主要的工作。经过20年的强化灌输，青年还是没有和"新政"站在一起，这实在是奇迹！

在科英布拉和波尔图的学生会中也相继成立了支持M·U·D的学生委员会。在佛朗西斯科·泽尼亚主持下的科英布拉学生会，在提高学生的觉悟、认清自己的具体要求方面开展了出色的工作。他们出版了《拉丁之路》，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严格的政治领域内(尽管泽尼亚在选举期间对《里斯本日报》发表了划时代的谈话)，他们不如我们在里斯本组织得好。在波尔图，规模就更小了，建筑系学生若瑟·波列戈和医学系学生若瑟·毕列斯是主要的活动分子。

为了把全国三个主要的学生会协调到一个统一的运动中，我们在科英布拉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大学共和中心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开了两天，议题很多。我在泽尼亚那里过了两夜。科英布拉大部分学生的居住条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阴暗，脏乱。对此，我有极深的印象。

我们很快发现，学生运动的干部实在太少，因为学生毕竟是青年群众中的少数。M·U·D在全国各地的委员会告诉我们，许多劳动青年希望同我们一起工作。所以，我们决定把M·A·U·D易名为"青年民主团结运动"，这样就包括了所有葡萄牙的民主青年，而不管其思想意识、信仰和阶层如何。我们为此召

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葡萄牙青年生活状况的报告（就其整体来说，是至今关于这一问题的最详尽的研究）。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青年M·U·D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是：佛朗西斯科·萨尔卡多·泽尼亚（科英布拉法律系）、奥达维约·罗德里格斯·帕托（工人）。若瑟·波列戈（波尔图大学建筑系）、奥斯卡尔·列伊斯（工人）、马丽亚·费尔南达·席尔瓦（法律系）、儒里奥·波马尔（画家）、马里奥·萨科拉门多（医学系）、路易·格拉西奥（文学系）、安东尼奥·阿布列乌（技术系）、努诺·费德里诺·费格雷多（经济系）和马里奥·苏亚雷斯（文学系）。

即使这样，同其他阶层的青年相比，大学生仍然占有压倒的多数。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运动首先是由大学生发动起来的。劳动青年组织发展很快，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奥达维约·罗德里格斯·帕托。此人才思敏捷、组织能力很强，对事业有崇高的献身精神。他和我年纪差不多，参加过维拉·列阿尔（他的家乡）1944年的罢工、似乎已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的兄弟卡洛斯就是被"毕得"折磨死的。①

同我们接触之后，帕托同意"全脱产"为运动工作（象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尽管名义上是大学生）。我把他安置在我父母家中，这样吃、住都有保证。我们在这段工作中建立起的友谊成了他工作的动力。

1947年，青年M·U·D中央委员们被捕之后，奥达维约·帕托作为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他从青年时就参加了葡共）立即

① 毕得（Policia Internacional de Defesa do Estado）是"国家防御国际警察"的缩写。

转入了地下。1962 年他被捕时，已是葡萄牙共产党书记处书记。在条件极为恶劣的狱中，他虽受到残酷的折磨，但其表现堪称真正的英雄。尽管那时我们已分道扬镳，但他仍然信任我，请我作他的律师。由于他揭露了“毕得”的拷打，国际司法界的观察员也出席了审判。这在刑事法庭(当时由席尔瓦·卡德伊拉主持)的历史上是个重大的日子。

同成年人(军人、神父、教师)领导的 M·P(葡萄牙青年)相反，M·U·D 是青年自发的、独立的运动，一直由青年人领导，是在全国各地有深厚基础的青年团结运动。好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背叛运动的人很少，极少。许多人厌倦了艰苦的斗争或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因之而退出政治斗争)。但仍有不少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抵制法西斯主义，因此监狱和法庭总有事可干……尽管道路不同，我们却都保持了自己独特的工作作风——这也是政治斗争在青年身上留下的烙印。

后来，青年 M·U·D 常常被人指责为共产党的附庸。从我自身的经历看，事情并非如此，尽管它的一些领导人同共产党有联系或是受了它的影响。共产党是青年 M·U·D 的动力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动力。与它同时存在的还有并不比它弱的 M·U·D 领导人的影响。我们开展的政治工作有统一的计划，不受党派的影响。青年 M·U·D 的大部分参加者没有确定的思想立场，只是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在若昂·萨·科斯塔和费尔南多·费雷拉·科斯塔时期，同天主教徒的联系也不少(若昂·萨·科斯塔有一段时间曾是中央委员)。他们两人同阿尔维斯·科列亚神父关系十分密切，而且是葡萄牙天主教革新的支持者和真正的先驱。

当时，同社会党青年的合作倒十分困难。他们是一伙同“社会党联盟”有瓜葛的、派性很强的人，曼奴艾尔·塞托里奥(法律

系)、贾辛托·西蒙斯(医学系)和若瑟·贝塞格罗(文学系)是其核心。这帮人想在M·U·D中央委员会内自成一派,而我们"团结运动"却代表全体民主青年,不管其党派、信仰和意识形态。

1947年3月,青年M·U·D在"工人之声"大厅举行了唯一的一次被批准的大会,公开讨论了这一问题。会议表明了该组织所具有的高度组织水平和政治效率。大厅里坐满了热情的青年。泽尼亚分析了社会党青年的企图,明确宣布青年M·U·D是一个非政党性的运动,代表葡萄牙民主青年。费尔南多·费雷拉·科斯塔也以天主教青年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其他部门——青工、学生、妇女——也纷纷发言,介绍了青年M·U·D多方面的工作。我仅仅主持了这次大会。

遗憾的是在听众中混入了警察和政府的密探。他们肯定察觉到了会议的高效率和成熟程度。这次会议将作为青年M·U·D所达到的高峰而载入史册。一个多月后,发生了警察的野蛮镇压,青年M·U·D的多数委员被投入监狱。几百名男女青年仅仅因为参加这一运动而遭到长期监禁、审讯和无情的迫害。尽管如此,在其后的几年中,青年M·U·D仍然苦苦挣扎,开始了坎坷曲折的历程。斗争需要高度的警惕、艰苦奋斗精神和在指导方针上逐步强硬起来,排除派系干扰。

镇压、艰苦、派性是那些年政治斗争中普遍存在的辩证规律,只有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慢慢懂得。

1947年,我们还召开过一次青年M·U·D代表大会,我向大会作了关于运动总方针的政治报告。道路是漫长的,进展是惊人的。由我起草的近300页的报告对葡萄牙青年各方面的情况都作了全面的论述,在政治和具体要求方面制定了指导路线。在具体策略的选择问题上,报告虽然被通过了,但也受到一些人

的抵制和批评。M·U·D的几位领导事先曾认真研究并讨论过这一报告。共产党内负责青年工作的索埃伊洛·佩雷拉·戈麦斯也看过并同我谈了很久。他在每页的旁边都用工整的字体写下批注，在许多地方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

会议开了好几天。报告经过讨论修改后准备正式发表。在我被捕的前一天，我把它交给了经济系学生豪威尔保管，因为我已估计到自己将被捕。遗憾的是几个月后，当我获释时，听到了令人沮丧的消息：豪威尔由于害怕竟然把它烧了！直到今天，每当想起此事，我还感到很难过！这是我们两年半战斗生活的总结，居然被轻率地销毁了……

M·U·D和青年M·U·D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各区的委员会进行的，因为每个区委中至少有一名青年代表。日常工作是大量的(抄写内部通知、宣言、口号、建议、宣传及组织工作)，我们青年人时间有保证，可以完成这些工作。

M·U·D是在一个月的选举热潮中临时出现的政治运动，总部是临时的，里面一无所有：没有干部，没有工作人员，甚至连起码的办公条件也没有。热情的会员自愿捐献的一点东西多属于政治性的装饰品。当警察的镇压开始、运动进入低潮之后，人们的热情很快就冷下来了。

M·U·D的领导都是大忙人，各自有一摊工作。在选举运动期间，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业务活动。要求他们全脱产显然是办不到的。于是我们青年学生就成了运动的骨干，特别是在经常的实际工作方面。各地的劳动者委员会，特别是里斯本的委员会，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是青年M·U·D在里斯本地区委员会中的第一任代表，当时该委员会由戈迪钮(后来由古斯塔沃·索罗门钮)所领导，后者和安东尼奥·索萨、卡多索·维列纳、阿尼巴尔·毕扎

罗(刚从“塔拉法尔”放回来的共产党员,M·U·D中杰出的群众工作组织者)一起成了里斯本地区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委员会(电车、铁路员工,民用建筑、五金、造船职员)的真正策划者。

除各种劳动者委员会之外,M·U·D在乡镇一级也有委员会。后来根据需要,又自发地成立了其他委员会,如马丽亚·伊莎贝尔·阿波茵·英格列斯博士和作家马丽亚·拉马斯领导的妇女委员会(当时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比较温和的民主妇女运动:“妇女和平协会”和“葡萄牙妇女运动”,后来被警方宣布为非法组织并勒令解散);工艺美术家委员会(在全国美协组织过几次展览);作家委员会;经济学家委员会;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医生委员会;声援政治犯委员会,等等。

1945年11月“大选”(即“充分自由时期”)之后,M·U·D为了表明自己的强大生命力,于1946年1月31日在安东尼奥·若瑟·阿尔梅达总统纪念碑前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特别是波尔图)都举行了纪念共和英雄们的活动。但没有哪里的纪念活动象里斯本的活动那么声势浩大、组织严密,因为它得到了各种劳动者委员会和青年的支持。

作为青年M·U·D的领导人(以及在后来的生涯中),我曾参加过无数次街头和平示威,挨过几次打(从来不严重),只有一次被捕。示威常常被警棍、高压水笼头和催泪瓦斯驱散。我也参与组织过许多次大大小小的街头示威,坦率地说,多以失败告终。在大规模的示威中(如1945年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1958年德尔卡托将军返回里斯本的示威),群众突然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激动的人流汇成十分壮观的场面。

1946年就是这样!我紧张地工作了好几个星期,制定计划,召开十几次准备会。但是当我到达现场时,仍然不能相信自己的

眼睛：米格尔·勃姆巴达大街和通向阿尔梅达纪念碑的所有街道上人山人海，M·U·D所属各委员会的成员（以身穿制服的电车工人为前导）井然有序地排列在那里。向第一共和的伟大创始人敬献花圈之后，人们肃立默哀，那庄严的气氛感动得我潸然泪下！

在《葡萄牙之歌》合唱声中，游行井然有序地开始了。学生同电车工人手挽手走在队伍的前面，目的地是国民议会大厦。人们一边走，一边高呼要求自由的口号。刚走过萨尔达尼亚，野蛮的镇压就阻断了我们的前进。象往常一样，所谓维持秩序的力量倒成了混乱的主要制造者。

这次示威（它深刻的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也标志着政府加紧了对M·U·D的镇压。在欧洲，镇压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进行，必须加以伪装。他们于是采取了步步紧逼、欲擒故纵、时进时退的策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M·U·D中央委员会是在选举运动开始的热潮中成立的，着眼点在选举，因此它不适应领导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力图捍卫自己脆弱合法性的群众运动。

此外，M·U·D的最高领导人利马·阿尔维斯又同几乎所有的朋友发生了冲突。他不同意大多数委员提出的指导方针：大选后，尽管政府实行镇压，口号仍应是“M·U·D是合法组织！工作在继续！”

我记得曾参加过一次讨论运动是否要继续下去的代表大会。我和马丽亚·伊莎贝尔·英格利斯分别以妇女委员会和青年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但没有表决权。会议先后由卡拉萨教授和马塞多（波尔图地区委员会主席）主持。利马·阿尔维斯没有出席，他的几个忠实追随者特奥菲洛·桑托斯、若昂·戈麦斯、马尔多纳托·佛列伊达斯老头儿出席了会议。列利亚地

区甚至没有派代表参加。

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M·U·D继续活动下去的决定，但要适应同政府斗争的新形势(政府既不承认它的存在，也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事实上的容忍掩盖不住它针对运动要害部门进行的卑劣镇压。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要以坚持不懈的、大无畏的精神迫使政府明确表态，象若昂·佛兰戈说的那样，使它要么让步，要么采取暴力……

为此，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是马里奥·阿泽维多·戈麦斯。此人先前是农场主，第一共和时期当过部长，性格倔犟，选举过程中曾向《里斯本日报》发表过一次著名的谈话。在这篇谈话中，他在比较了自己同萨拉查的政治思想之后说："我同内阁总理之间的不同就象自由大街和塔拉法尔集中营那样不可同日而语!"副主席是……卡拉萨教授，他是从原来的中央委员会转过来的。委员有：赫尔德·里贝洛、马丽亚·英格列斯(妇女委员会代表)、曼奴艾尔·门德斯、费尔南多·卡尔桑、安东尼奥·维列拉、曼奴艾尔·莫拉斯、阿尔贝托·迪亚斯、路西安诺·莫乌拉和我(青年委员会代表)。

新的中央委员会是各反对派组织经过长时间谈判的产物，没有包括政党的代表，因为M·U·D仍然是一个非政党性的民众团结运动，代表整个反对派。不过，卡拉萨教授完全有资格代表MUNAF。同样，赫尔德·里贝洛上校代表了(虽然他不是代表)老的共和党人。大家都知道，洛博·维列拉和马约尔·卡尔桑是社会党联盟的成员，而路西安诺·莫乌拉则是共产党。阿尔贝托·迪亚斯是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总劳联"中的老无政府主义者。德麦特里奥·杜阿尔特也参加了委员会，他说自己是社会党的成员，而这个党当时已经完全瓦解，分成了彼此敌对的一些小派别。

中央委员会于1946年6月正式开始工作。在近两年内（1948年3月被宣布为非法），它一直领导着反对派。尽管在思想上和作风上有差异，但委员们团结一致，在政治方面紧密配合。在个人关系方面，真可以说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马里奥·戈麦斯教授的德高望重，卡拉萨政治上的灵活手腕和精明强干以及委员之间的精诚团结、互谅互让、彼此尊重毫无疑问起了很大作用。一个能团结反对派各种势力的政治机构干了那么多工作，而且干得那么出色，那么协调，是少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罕见的！

我们每周都开会，有时还不止一次。我们象“影子内阁”一样，对政府的活动进行无情的批评，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对公共管理的许多方面提出背景研究报告。其中有不少材料在1949年诺顿·马托斯将军竞选时出版的刊物上发表。

经济学家委员会的成员也经常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恩里克·巴洛斯、贾戈伯迪·罗萨、萨·科斯塔、若泽·阿拉康、拉莫斯·科斯塔、努诺·费格雷多都是经济学家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曾起草了所谓的“企业活动调查”（后来以我们的名义发表）。文件揭露了国内不完善的“体制”的弱点和矛盾，指出应遵循的解决办法。在转变战时经济和欧洲重建的关键时刻，为经济的加速发展作出了贡献。萨拉查对所有这些建议充耳不闻。他死拖住“自给自足”的政策不放，甚至荒谬到拒绝“马歇尔计划”的地步。这一严重的错误给后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后果。

经常到卡拉萨教授家（当时已生病）或是到位于阿茹达街口的马丽亚·英格列斯家开会的各区代表有：古斯塔沃·索罗门钮和萨·卡多索（里斯本区）、安东尼奥·马塞多、路易·戈麦斯、奥利维约·佛兰萨和戈里诺·安德拉特（波尔图区）、曼奴艾尔·卡洛斯（法律工作者委员会代表）、马里奥·迪奥尼西奥（作

家、艺术家代表)等。

要制定有效的政策而不启用专门人材，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研究纯政治问题和行政、经济、社会生活的各种方案需要复杂的、多方面的修养和详尽地占有资料，这就要求专业化。而在我国，所有的自由都受到限制，批评和独立判断精神普遍萎缩，这就不可避免地阻碍了政治性的争论。没有争论，没有对话，没有客观的情报，公众就没有真正清醒的认识，国民的觉悟只能是昏昏然，对涉及到切身问题也是漠不关心，淡然处之。

萨拉查上台之后，一片肃杀气氛，只有胡说八道的吹捧才偶尔打破这种沉默。独裁者自认为永远不会错，所以从不征求别人的意见。他认为自己比所有的同胞都高明，所以漫不经心地为他们做出种种决定！葡萄牙四十年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政治——由此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对葡萄牙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根本没有必不可少的政治情报。国民议会和"咨询会议"① 从来都不是自由讨论的讲坛，而是"应声虫们"唯唯诺诺的机构。部长们只知道本部的情况，而内务部则更糟，"毕得"虽然理论上隶属内务部，但却经常直接向萨拉查请示汇报！由于缺乏全局性的政治眼光，部长们经常象纯粹的办事员一样，仅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不感到对国家负责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方面，M·U·D中央委员会经常批评政府的活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委员们必须尽力了解最新情况，而且要冒一定的风险(这是不言自明的)。

---

① 咨询会议(CAMARA CORPORATIVA)：萨拉查时期的政府和议会咨询机构。

1946年8月或9月，葡萄牙政府申请加入联合国。鉴于战争中它暧昧的立场和国内缺乏民主代表性，它本应被排除在这一组织之外。M·U·D中央委员会准备了一份分析此案的文件，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其精神和政治威望与国家尊严相称）才有资格代表国家加入联合国。

文件发表之后，政府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以《晨报》为首的报界群起反扑，抛出了"叛国"之类的大帽子。警察也不甘示弱：文件的所有签名者（M·U·D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均被逮捕、审讯或取保候审。

在短时间内要弄到取保所有被捕者所需的1100康托[1]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但是依靠运动的威望和组织力量以及一些有钱人的捐助，款子还是筹到了。我们认为这一解决办法是正确的，因为它使我们获得了自由，从而也保证了工作的继续。但很快我们就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是我同政治警察的第一次接触。调查者是法利亚·巴埃斯。他与其说是警察，还不如说是个官僚。他漫不经心地提了许多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他把我的回答归档后，以平静的语调告诉我，在审查期间，我将被拘留，除非我也象自己的同伴一样愿意出钱取保。我说好吧，就这样说定了。于是他批准我同自己的律师卡洛斯·奥拉沃接触。他同我的担保人埃杜阿多·拉兰吉尼亚一起到警察那里交了钱。实际上，为我取保凑钱的是共和派工业家阿马德乌·卡登西奥（我父亲的老朋友）。获释前还有一个奇怪的仪式：令人生畏的警察局长阿戈斯迪钮·罗伦索大尉的接见。在这次经过精心研究的演戏一般的会见中，他装腔作

① 康托：是葡萄牙货币名称。

势地问我(一个刚满21岁的大学生),是否受过虐待,是否有逼供现象。我当然回答说没有!

M·U·D发起的反对警察暴力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警察也有所畏惧,只好宣布"暂时关闭塔拉法尔集中营(遗憾的只是暂时……)。

指控M·U·D中央委员会的案子拖了好几年,互相矛盾的审讯没完没了。里斯本最有名的律师和葡萄牙最有声望的人物都卷入了这一案件,最后以赦免告终。几年之后,对1962年的"共和国民主化纲领"一案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有朝一日如果这些案件能公之于众,那将清楚地揭露萨拉查主义惯用的政治手腕。

尽管受到传讯和取保,M·U·D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1946年10月,我们在"工人之声"大厅组织了一次纪念共和国成立的活动。由于老工运领导人拉乌尔·桑托斯的干预,我们才借到会场。拉乌尔的女儿是我在文学系的朋友,也是青年M·U·D的积极分子。这次活动令人难忘!

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主持了大会,所有健在的共和元勋都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海军上将阿丰索·塞格拉、门德斯·卡伯萨达斯、迪托·莫拉斯、苏萨·迪亚斯·席尔瓦工程师(烧炭党的组织者)等等。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人挤满了大厅、舞台和走廊。当然,主要还是熙熙攘攘、热情很高的青年人。主席台的讲话不断被"葡萄牙之歌"打断。青年M·U·D的小伙子们还带头唱起了使人心潮澎湃的洛贝斯·格拉萨的歌:"放声地唱!尽情地歌!我们紧密团结,一定到达大路的尽头!向着太阳歌唱吧!"

当宣布90岁高龄的"1·31"老英雄巴列托讲话时,会场上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位爱国者向共和派青年致意后,我有

幸以青年的名义致答辞，向在座的共和国令人尊敬的前辈们保证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理想和无私奉献精神，面向未来，为社会进步和正义，为劳动大众而奋斗！

后来，M·U·D中央委员会又在“工人之声”召开了一次会议，系统地抨击了国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我们认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会议是在1946年11月30日举行的，会后还出了一本汇集所有发言的小册子（被警察扣下）：即卡拉萨教授关于教育问题的发言（我们当时把它列为绝对优先的问题）；佛朗西斯科·科斯塔博士（以经济学家委员会的名义）关于经济政策的发言；费尔南多·丰塞卡教授关于救济问题的发言；作家费雷拉·卡斯特洛关于检查制度下葡萄牙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发言（由洛博·维列拉代为宣读）；我以青年M·U·D名义发表的题为“青年不同新政站在一起”的关于青年问题的发言。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首先作了政治性发言。我记得他的发言极其精彩，也许是我听到的他最出色的政治演说。遗憾的是会议举行得很仓促，记录不完整，使他的发言显得苍白。最后，会议以欢呼的方式通过了M·U·D中央委员会的动议。这项由马约尔·卡尔桑博士宣读的动议重申了运动开始时提出的各项要求，呼吁政府承认反对派，尊重宪法第8条的规定。

这是选举期之外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

如果当时这一呼吁被接受，那么国家（失去了基本自由，象个弱智儿童一样被监护）将免遭20年的无谓牺牲，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也不会出现如今这种爆炸性的局面：经济、社会福利、住房、教育、移民、国际孤立、殖民地局势……葡萄牙也会逐步发展成多党制的、有着讨论问题自由的文人政权，象所有欧洲民主国家一样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总之，巨大的错误均可避免：新闻自由和真正有权的工会可以纠正滥用职权，制止少数剥削者

的贪得无厌和寄生活动；确保在国家财富的分配上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生活将使他们明白困扰他们的真正问题是什么——这也是加速实施同不发达斗争政策的必要条件；我们也就有可能阻止移民潮（国家劳动力的大出血）和人才外流；从各大学和科技中心逐出的人材也会回国效力，使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自由的、温和的、所有人和睦相处的国家；也就可能避免国家卷入毫无希望的、违反民族利益的殖民战争，象欧洲其他殖民强国一样，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同殖民地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睦相处，就象同我们亲手给他们带来独立的巴西那样；我们也可以间接地、稳步地为邻国西班牙的民主化、使伊比利亚半岛纳入欧洲范畴作出应有的贡献；尤其是我们可以避免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国家的声誉扫地，使葡萄牙在文明世界得到应有的尊敬。

但是，不值得对可能发生而又没有发生的事情进行种种假设。历史对失去的机会不会怜悯，人民将为这些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一个人的固执，一个欧洲最倒行逆施的阶级的短见、愚蠢、自私，一个被贫穷、恐惧和无知弄得麻木不仁的人民的冷漠挫败了理想主义者的努力——他们无力使自己的观点取胜，因为四周充满着敌意。但是在政治上，只有成功才算数啊！

1946 年 11 月 30 日会议之后，迫害又以其惯有的虚伪方式逐步开始了。

本托・卡拉萨和马里奥・戈麦斯教授被辞退。1947 年，葡萄牙社会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当局和反对派之间决定性的较量已势不可免。

由于缺乏合法手段，1946 年 10 月曾发生过一次革命行动——后来被称为"麦阿利亚达暴动"。波尔图的这次暴动由费尔南多・格伊罗卡上尉领导，占据了装甲兵的一个军营。但这次举

事（我父亲起了突出的作用）规模很大，实际上包括了整个中部和北部地区。在1947年4月10日（史称“4·10事件”）准备另一次起事中，一些军官已到了预谋暴动的部队，但却未能实现就流产了。这足以使运动受到牵连。许多军官（其中有几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上将）和几十名非军人被捕。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开始以过时的方式在里斯本、巴列伊洛和利巴特茹地区活动：1947年4月爆发了造船工人罢工，随后在里斯本工业系统的主要部门也出现了激烈的工潮。由于里斯本学生委员会的成员（马里奥·路易沃、卡斯特洛·罗德里格斯、若阿金·罗德里格斯、费尔南多·瓦列恩德、若瑟·贡萨尔维斯，奥兰多·佩雷拉等）以及青年M·U·D中央委员会成员相继被捕，学生运动暂时进入了低潮。当时在里斯本医学院发生的事件（大批警察闯进学校，殴打了十几名学生和教师），也恰恰在1947年4月，起因是学生抗议对我们的逮捕。

那个月内，近30名大学教师被解聘，而这些教师都是大学及葡萄牙学术界的精英。

这些冲突证明了M·U·D中央委员会在一系列文件中提请全国和当局注意的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但这些呼吁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

这次我被关了四个半月——先是在阿尔茹贝和卡西亚斯，后来被转到“伯尼德恩西阿利亚”单独监禁。和M·U·D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不同，青年M·U·D的领导机构没有接受警方提出的取保建议。路易·格拉西奥、波马尔、泽尼亚和我是最后出狱的。为什么，已记不清了。我只知道象其他中央委员一样，我们经过审讯就被释放了。至于其他被捕已超过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学生甚至没有出庭受审……这纯粹是一种恐吓行动！

1947年8月中旬我获释时，我父亲由于4月10日运动的

失败已被捕三个月了。尽管他已70岁高龄，却被严禁与外界接触。对我们家，特别是对我可怜的母亲来说，这是一段极其困难的日子，她需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决心来独自应付这种局面。

尽管如此，我还是以全部身心投入了青年M·U·D(正经历着深刻的改组)和M·U·D(继续为合法地位而奋斗)的活动。

我们准备在1948年1月31日举行一次群众游行，为此需要召集M·U·D各级委员会，以便通过他们发动里斯本的群众。但就在那天凌晨，我们全部在家中被捕并被带到了警察局。我们被集中到纠察队的房间里。过了半天，他们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发落这帮人。于是我们要求他们从附近一家餐馆送午饭来。这一要求被批准了。这样，在便衣警察包围之中，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在"毕得"总部举行了一次亲切的聚餐！

最后，德高望重的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站起来激动地说道："为了向发动'1·31运动'的人们表明我们的忠诚，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表明我们对自由的耿耿忠心呢？"

墙上挂着一个谁也没注意到的话筒，这时从里面立刻传出一阵吼声："警察先生们！快把我们送到阿尔茹贝监狱去吧！"

中央委员会就这样被迫"休了一个月的假"。这段日子过得很平静，大家相处得亲密无间，只是担心律师来通知我们由于被捕而取保无效。我们在那里遇到许多因参加失败的军事暴动而被捕的共和党人，其中就有我父亲和马尔托纳多·佛列伊达斯老人！

三月初，我们恢复了自由。警察通知我们，政府最终决定宣布M·U·D为非法组织……

获释后，我们立即召开了会议，研究的问题自然是：虽然大家都被正式通知了，但是否应该接受M·U·D被宣布为非法

这一事实。会上，意见很不一致。

显然，在独裁制度下任何政治运动的合法或非法只能取决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力量的对比。M·U·D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国际形势和紧张气氛迫使政府不情愿地采取了某种宽容方针，反对派借机得到发展和扩大。政府也害怕采取公开镇压政策，所以尽力限制妥协的幅度。1947年4月是这种脆弱的力量平衡的分界点。葡萄牙社会的紧张局面打破了这种平衡。在已取得的胜利的鼓舞下，反对派投入了一场旨在向当局正面进攻的运动。人民群众的压力日益增长，造船工人罢工，工农纷纷提出经济要求，学生抗议，知识界动荡不安，军事暴动箭在弦上。但是，这些活动的相继失败鼓舞了政府，使它转而采取公开镇压的政策，而国际形势已与从前不同，明显有利于独裁当局。M·U·D被宣布为非法（在此之前已准备对M·U·D和青年M·U·D中央委员会的起诉）是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必然结果。

我们能否顶住"非法"带来的后果呢？当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少数。今天，我从切身经历中看到，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唯一明智的办法。"拼死抵抗"只能导致更快的失败和毁掉已培养的干部。在政治上，善于及时退却象在战斗的紧要时刻善于进攻一样重要！

再说，我们被捕前已开始准备1949年将按法律程序进行的共和国总统选举运动。

我记得是波尔图地区委员会的安东尼奥·马塞多首先提醒我们这种可能性的。波尔图同时还认为诺顿·马托斯将军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因为他是反对派各组织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只有马丽亚·英格列斯、迪托·莫拉斯和我提名马里奥·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因为我们长期和他共事，对他深为信任。但是马托斯将军得到了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的支持，戈麦斯教授是无法和他抗争的。马托斯将军除担任MUNAF主席外，还兼任M·U·D协商委员会的主席。M·U·D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并没有给反对派带来严重后果。工作仍在不断进行，只是换了个合法的外衣而已。

开始共和国总统选举运动后，我们把M·U·D的机构改变成支持马托斯将军竞选活动的各种委员会。但事情并不象我们估计的那么简单。

困难首先来自共和党，被提名的候选人理论上就属于这个党。将军尽管已80岁高龄，但仍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对自己党的立场却不以为然。共和党并不反对诺顿·马托斯这一没有争议的人物，但却反对他参加由当局操纵的、根本不尊重选举法的“选举”。事情的确是这样。

将军并没有被迷惑。我曾听到他以气愤的口吻说：“这是该党在关键的政治斗争时刻第二次给我捣乱！”但他仍然不准备违背共和党的明确意愿而接受竞选……

卡拉萨教授当时尽管重病在身，仍然起了突出的作用。鉴于他在M·U·D和MUNAF中的地位，诺顿·马托斯完全信任他，他适合做和事佬和争取各种必要的支持。教授当时正处于政治声望的高峰，虽然不能走出家门，但却可以利用他的好朋友、可信赖的顾问曼奴艾尔·门德斯去进行各种微妙的工作。

很明显，只有证明共和党领导的意见得不到该党领导成员中的大多数和共和派主要政治家的支持，将军的疑虑才能消除。从各地区委员会收集到的材料分析，M·U·D的人相信事情会是这样的。

在曼奴艾尔·门德斯的建议下，我们打算到全国走一圈，看看是否能够征集到共和派主要人物支持诺顿·马托斯竞选的签名。曼奴艾尔·门德斯、古斯塔沃·索罗门钮、迪托·莫拉斯和

我借了一辆小车出发到全国各地同M·U·D的代表和共和派知名人士联系，解释竞选的目的，M·U·D改组成各种支持马托斯竞选委员会的必要性以及反对派战略的转变。

这是一次疲劳的、目的极其明确的旅行。我们带回了所有共和党“元老”们的签名。这样，老将军才正式同意作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但是，困难不仅仅来自共和党。库尼亚·列阿尔和他的一伙朋友显然也反对，由于诺顿·马托斯在安哥拉高级专员公署时和库尼亚有隙，这两位政治家一向不和。

安东尼奥·塞尔吉奥也顽固地反对诺顿作为候选人，当然这另有原因。他认为反对派不该把一位旧时代的人推出来作为自己的最高代表，不管他的威望有多高，因为这很容易和第一共和纠缠不清。他希望有一位立场温和的、同旧时代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来参加竞选，这样就可以分化对手。他选中的候选人是科斯塔·费雷拉将军。此人曾担任过独裁政府的部长，但对萨拉查已不再抱什么幻想。这一方针虽暂时被否决了，但几年之后又冒了出来，终于导致了肯唐·梅列斯海军上将和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的竞选。

从政府方面讲，共和国总统的“选举”（当局首次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赋于“全国联盟”这个“死婴”式的组织以生命，前殖民部长和葡萄牙青年组织的专员马塞洛·卡埃塔诺出任了该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主张选举萨拉查为共和国总统，以便通过任命一位新的内阁总理来确保独裁者的自然交班。但是萨拉查一向对任何那怕是形式上的变革都拒之千里之外……什么也无法使他放弃最高统率部的权柄！

尽管卡莫纳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在审讯1947年4月10日密谋者时对这位共和国总统表现“不忠”，萨拉查还是愿意

让一位长期以来唯唯诺诺、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的人担任总统。人们说，自从卡莫纳“压下了”乌塞达被杀案（从来没有弄清，因为卡莫纳的一个女儿曾牵连在内）之后，他就一直握在萨拉查的手心里。

实际上，不仅卡莫纳总统，还有他的民事办公室主任贾伊梅·阿迪亚斯、军事办公室主任阿米卡尔·莫达的健康和头脑都已昏馈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但这对萨拉查来说无关紧要，只要有一个稻草人占着共和国总统的位置就行。记得有一次我同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到贝琳宫向总统递交一份建议书（如许多泥牛入海的建议书之一），他的身心状况给我留下了可悲的印象。

1948年6月，卡拉萨教授久病不愈，终于去世。全国对这一无法弥补的损失深感悲痛！他的葬礼成了民主力量的大示威，也许是我至今看到的声势最为浩大的葬礼。

暑假之后，即1948年的10—11月份，支持马托斯竞选的中央委员会才开始正常工作（总部设在候选人在格拉斯的简朴住宅的一楼）。选举期在投票前一个月，即1949年2月正式开始。将军让我担任他的竞选秘书（青年M·U·D的几名干部自愿协助，特别是科技系学生诺瓦伊斯）。我们临时成立了秘书处，以便同各地区委员会联系并处理必要的事务。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可以说是竞选运动的政治指导者，但由于候选人对自己的意见很自信，有时弄得他也左右为难。阿泽维多·戈麦斯起草了竞选的政治纲领《告全国书》。这份文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还是为各政治反对派一致通过了（君主立宪分子，共产党人，老共和党人，社会党人，无党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同反对派有联系的为数不多的天主教徒）。在将军住处的二楼，密切配合他工作的有忠心耿耿的罗德里格·阿布列乌（诺顿在非洲时

的老搭档和亲信)和曼奴艾尔·门德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继承了卡拉萨教授对候选人的立场)。

开始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这些都忠实地记录在选举期间出版的《我竞选的前两个月》一书中。检查机关不允许对我们的活动作任何报导,政治上的准备工作不得不在半地下状态进行。象往常一样,准备冒险的人很少,而一些基本的工作又十分缺乏资金。

为此,将军在最初几次会上就表明应该向反对派中的有钱人发个通知,以便得到必要的资金。怀着"物以类聚"的隐密希望,当时任命了一位非常富有的老共和党人——他忠实的朋友、工业家曼奴艾尔·杜阿尔特——为司库。但是,此人并没有把对事业的忠诚同自己的利益融为一体……选举结束后他曾提出过一个全面的、无可挑剔的收支明细表。至于他个人的捐赠,对不起,却微乎其微!

向富人呼吁捐款彻底失败了。将军对此十分沮丧,因为任何政治运动都要花大笔的钱。于是,我们提出了"为竞选捐献一个盾"的口号。后来,靠那些大批的、无名的普通人的捐款才弄到了必要的资金。

就在这时,我把画家儒利奥·波马尔(青年M·U·D的领导成员)带到将军家里为他画像。波马尔以简炼的笔触很快画出了大家认为十分出色的将军的肖像,这是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流传最广的一幅画像。开始,我们印了几千份,后来又制成明信片在全国广为散发。明信片上印着从《告全国书》中摘的一句响亮的话"我代表不屈不挠的反对派……"。

将军的确是反对派的象征,他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而且一向不承认独裁政权的合法性。他虽屡遭迫害、被捕、流放、被解除高等技术学院教授职务,但却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具有清白的

爱国主义履历。马托斯将军是第一共和的伟人之一，当之无愧的国务活动家。他的所作所为使他有权在祖国的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安哥拉的业绩（其爱国精神现在才被承认），葡萄牙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作为葡萄牙驻伦敦大使所担负的使命以及长期从事反对毕门达·卡斯特洛、希多尼奥·帕埃斯、卡莫纳和萨拉查几届独裁政权的政治经历使他对人、对形势都有深刻的了解，对葡萄牙政治演变具有清醒的、高明的见地。他是一个胸襟旷达，具有亲切的魅力，在情绪好的时候有着象他那种年纪的人少有的幽默和生活情趣的人。他热爱非洲，也洞悉葡萄牙人在黑非洲的历史使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也许是唯一预见到在殖民地问题上将出现乌云和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的人。一开始，他就对独裁政权实行的驼鸟政策，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他对"台上"的政治家们（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的弱点），从萨拉查开始，一个个象审视侏儒一样从上到下地审视他们。

每天同诺顿·马托斯这样的伟人接触，对象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实在是深受教益。他令我赞叹的同时，也对我表现出明显的保留。将军显然把竞选看作是自己漫长政治生涯的终点和对国家的最后一次效忠。他有自己不可动摇的观点和战斗策略，这同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因为我们把这次竞选看作是M·U·D开始的漫长运动中的一个插曲。"选举"之后，这一运动还将经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有前进和后退。所以，我们之间不可能不出现冲突，尤其在选举之后这种冲突更为明显，尽管他对我十分信任和友好。

为了打破竞选准备的沉默状态，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在萨拉查统治下全国都已习惯的"自发游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赞成这一想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一想法最初出自迪托

·莫拉斯，并且得到我的热情支持。将军对此很高兴地表示了赞同。我们买下了国家剧院的一半入场券。当时剧院正在上演拉马达·库尔多的一出平淡无味的剧作，观众很少。马托斯将军在侄女的陪同下在一个包厢里落了座。这位侄女同他住在一起，对他关怀备至，也为我们提供过不少方便。剧场第一次休息时，灯光一亮，大家立刻认出了将军。开始是朋友，后来是全体观众尽情地向他欢呼。他向大家致意时的神情既潇洒又得意。到第二次休息时，剧场里已为"毕得"的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所占领，但并没出什么事。第二天，《晨报》带着酸溜溜的口吻对"那么多反对派人士不谋而合地去看同一场戏"进行了评论，并指责反对派在搞所谓的阴谋。

竞选开始前，还发生过另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即在圣·可拉拉对"4·10事件"参与者(门德斯·卡伯萨达斯海军上将、科列热托尔·马尔丁斯、安东尼奥·马亚和瓦斯科·卡瓦略三位准将、塞尔松·马卡良斯、塔特乌·塞尔瓦仁两位上校、萨斯费尔德·罗德里格少校，几位文人，其中包括我父亲，洛博博士、科列亚·桑托斯和塞列斯迪诺·苏亚雷斯)的审讯。律师团成员有阿尔梅达·布拉加、利马·阿尔维斯、瓦斯科·费尔南德斯、阿德利诺·卡洛斯和军人若泽·莫尼斯、恩里克·加尔旺(两人直到那时还是公开的当权派)。非军人律师感到自己的辩护权受到了限制，愤然退出了法庭。此举虽然轰动一时，但与事丝毫无补。

审讯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兴趣。反对派的重要人物(君主派，共和派，"5·28"持不同政见者)相继出庭作证。而最奇特的是反萨拉查的统一战线居然包括了共和国总统！科列亚·桑托斯在审讯中说，他曾向总统夫人报告过军人准备起事的情况(总统夫人对萨拉查怀有敌意是众所周知的)，而这位夫人却鼓励他说："不要泄气！如果需要，我将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面！"若

瑟·莫列拉的供词也在听众席上引起了轰动。他说在同卡尔莫海军上将(总统的堂弟)的一次谈话中,他曾对共和国总统对萨拉查的真实感情表示怀疑,而将军为了说服他,曾问道:“你见过我堂兄伸出爪子(呜呼!)行法西斯礼吗?”

这次审讯的背景表明了陆军对君主派的、亲德的、萨拉查的国防部长桑托斯·科斯塔怀有的潜在的敌意。桑托斯·科斯塔在军界飞扬跋扈,作为萨拉查的军事代理人,人们对他甚至比对独裁者更为憎恨。这种仇恨(它把各种色彩的君主派和共和派分子聚到了一起)随着失败的“4·10”运动的军事领导人马格斯·戈迪钮将军的去世而更加强烈。那次密谋由来已久,也是费尔南多·格伊罗卡兵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发生于1946年10月10日的兵变后来被称为“麦阿利亚达兵变”,因为当时的一支摩托化部队是在麦阿利亚达投降的。

马托斯将军在审讯中出庭为我父亲作证。当时是我领他到圣·可拉拉法庭去的。开始作证(一篇正面批判当局的檄文)之前,他受到令人感动的欢迎(这是他竞选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当他走进法庭时,律师们象对待国家元首一样都站了起来。接着,被告、旁听和吃惊的法官也站了起来。

反对派政治活动中的最大障碍一直是难以使全体同胞听到自己的声音,缺乏同群众接触的手段。我一直认为萨拉查最可怕的、独一无二的武器是“事先审查”制度,这比政治警察的暴力更可怕。没有审查制度,萨拉查主义连一个月也存在不下去。独裁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从来不敢让国家有一部新闻法,尽管不断有人向他呼吁,而且有些呼吁还来自国民议会。

即使在所谓的“充分自由”时期,新闻检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那枝蓝铅笔多少有点宽容罢了。由于审查,反对派的竞选公报或者推迟发表,或者被扣压……

必须强调指出，马托斯的竞选活动也许是所有竞选活动中准备最充分的。多亏M·U·D各级委员会和它们进行的工作(公职人员的秘密合作可使我们获悉一般是机密的情报)、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以备一声令下就向敌人开火。所以，这是反对派进行的唯一一次无须从零开始的竞选活动，一经发动，就势如破竹，使群众觉得反对派象一股滚滚的洪流，能够摧枯拉朽。这次“发动”是我们最好的武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全国在一段时间里——差不多两三个星期——对“选举”产生了幻想，以为会有结果或可能导致在宪法范围内的“政变”(如萨拉查后来说的那样)。

纯属幻想！它只能欺骗粗心大意的人。政府的镇压机器原封不动的保留着(警察，共和国卫队，保安部队，新闻检查，确保在选举和计算时作弊的机器)。警察——镇压机器的齿轮一直都在有效地运行着！

毫无疑问，葡萄牙人民自发地、迅速地响应了反对派发出的呼吁。多年来，人民只有在本能地感到斗争处于关键的时刻才会有所行动。平时，他们浑浑噩噩，无动于衷。他们的贫穷和艰辛处境常常得不到理解。

在波尔图举行的支持诺顿·马托斯的竞选集会以及反对党候选人到阿连特茹地区(埃武腊和贝雅)旅行期间，游行的群众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葡萄牙人民反对萨拉查的深切感情。成千上万的人步行好几公里到埃武腊和贝雅之间的路旁，排成望不到头的队伍热烈欢迎诺顿·马托斯。当地一位贫穷的妇女把头伸进竞选人乘坐的汽车里(车行得象步行一样慢)喊道：“老头儿！快把我们从萨拉查的罗网中救出来吧！”

这位妇女用形象的语言表达了大多数葡萄牙人共同的感情。这种无法压抑的感情在各地都爆发出来了：把国家从萨拉查

引入的死胡同里解救出来！

马托斯暂时代表了各阶层的愿望：不流血的解放的可能性。这些人包括：立场鲜明的知识分子，商人，工人，自由职业者，青年，总之是城乡普通的、无名的人民。

政府试图用各种办法掩盖这种无法掩盖的举国上下的情绪。它禁止在没有围栅的地方举行游行示威，刁难宣传集会，甚至禁止在一些大厅里装扩音设备，撕毁各种公报，扎破出席反对派集会人的汽车轮胎（我在洛勒就遇到过一次），阻止某些演说家的讲话，等等。泽尼亚、拉莫斯·科斯塔、巴尔马·卡洛斯、阿尔敏托·罗德里格斯、我，还有其他人，在竞选开始三个星期之后仍然被禁止讲话！尽管如此，声势浩大的示威、公众如痴如狂的热情以及出席集会的人数直到最后也没有减低。

在所有我参加的集会中，最不能忘记的是科英布拉青年在“大路剧场”举行的一次集会。剧场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有能站的地方——过厅、走廊、舞台、乐池——都挤满了人。在整个宽敞的剧院里，只有一个地方是空着的，那就是留给政府成员的包厢，里面只有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名叫若瑟·萨·切迪的上尉和一名助手。此人后来成了“毕得”的副局长。与会者的热情是笔墨难以描述的。雷鸣般的“诺顿！诺顿！”的呼声和“泽尼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科英布拉的每个角落。1949 年，泽尼亚仍然是科英布拉学生中的伟大偶像。

泽尼亚、巴尔马·卡洛斯、迪托·莫拉伊斯、拉莫斯·科斯塔和我来自里斯本。我作为候选人的代表主持了这次集会。除了许多学生之外，我记得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费尔南多·洛贝斯博士（科英布拉地区委员会主席）和诗人若阿根·纳莫拉多。当巴尔马·卡洛斯讲话时，有人从走廊里喊道：“108 人的律师万岁！”（此案是刚成立的最高法院经手的重要政治案之一，出

庭的主要是共产党人和 MUNAF 的成员，此外还有科英布拉大学的老教授安塞尔松·卡瓦略和阿尔巴诺·库尼亚律师。1948 年我在阿尔茹贝狱中见到库尼亚律师时，他的双腿因站立 12 天和不许睡觉的折磨已经肿得象水桶一样粗）。

巴尔马·卡洛斯被响彻大厅的雷鸣般的呼声深深感动了，丢开讲稿，发表了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最激烈的演说。他甚至向科英布拉的青年推荐了阿尔瓦洛·库尼亚尔，称他为当代优秀青年们斗争和团结的楷模！

在这次集会上还出现了一件少有的事。按照政府的规定，所有宣传集会都应在午夜前结束。当将近午夜时，考虑到几位报名发言的人还没有发言，我请求当局的代表（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准许延长半小时。他犹豫了一会儿。雷鸣般的口号声停止了，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当局的代表感到了这种沉默的份量，于是站起来说："同意！"我从台上喊道："大家为当局代表鼓掌！"

多年之后当我被关在"毕得"总部时，才从审讯我的萨·切迪副局长口中得知当年的政府代表就是他。他告诉我，当时的掌声曾使他十分不快。

随着竞选运动的不断发展，政府不准备向候选人呼吁的最低保证让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些保证就是反对派应在光明正大的条件下参加竞选。除了象家常便饭一样的检查和政治警察的干扰，还存在着选民统计方面的舞弊现象（这种例子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反对派对选举的监督得不到任何保证，而这是任何公正选举的最起码的要求。"全国联盟"通过警察，按选民登记表（他们有复制件）挨门挨户散发自己的名单。反对派没有选举名单，这样就难以向选民散发，所以选民不知道候选人是谁。这真是一出可耻的丑剧！

候选人开始时曾表明，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他提出的最起码

的条件，他就坚决退出选举。整个选举运动都是在M·U·D提出的这个假设基础上进行的。反对派不参加这种选举丑剧，是为了不让一个声誉扫地的政府在国际上合法化。由于政府毫不让步，对良知和起码的政治诚实的呼吁充耳不闻，合乎逻辑的结果只有一个：放弃选举。

但是在竞选运动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参加选举的势力。群众的表现是如此狂热，以致许多人为这种热情和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争辩说：让人民投票，揭穿当局舞弊的阴谋将比单纯退出竞选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到阿连特茹竞选旅行和波尔图第二次召开大规模群众集会之后，候选人也公开倾向于这种看法。结果，争论在中央委员会和某些地区委员会（如里斯本）变得复杂和尖锐起来，出现了明显分裂的趋势。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更加严重的分裂因素。竞选运动后期，马托斯的部分追随者和他本人开始对竞选的共同纲领进行曲解。前面提到，《告全国书》是由反对派各主要组织一致通过的（共济会、共和党、社会党联盟、共产党、M·U·D、MUNAF、几十名无党派人士、君主派、共和派、天主教徒、持不同政见者）。

但是在竞选运动中，政府却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所谓的"共产党危险"上。据说，"反对派的竞选将为共产主义敞开大门"。开始，政府企图举起"共济会"这个稻草人吓唬选民。他们张贴了许多招贴画，招贴画上印着诺顿·马托斯身穿共济会"龙头"制服和披风的照片！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严重的估计错误。在1949年，共济会已不能吓唬任何人。政府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罗德里格斯·迪列伊托教授在发表于《工人之声》上的著名讲话中曾说道："当权者不是对马托斯当过共济会的'龙头'一事津津乐道吗？但这能说明什么呢？当今的

大人物都曾参加过共济会，只可惜他们没有本事当上‘龙头’而已！比如卡莫纳总统，我就在共济会见过他！”接着，他列出了一大串“大人物”的名单，其中包括经济部长乌利塞斯·科特斯。这些人都曾经是共济会的会员。

反对“共党威胁”的运动甚嚣尘上。欧洲当时正处于严峻的冷战状态下。当局的这种宣传未能打动深受法西斯压迫、处于贫穷、缺乏自由的葡萄牙广大群众。恰恰相反，他们在共产主义中看到了得救的企望。反对派中的保守派这时受到当局的青睐，因为他们反共比反法西斯更坚决。国际气候十分有利于这种分裂，而当局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倾向。我忘不了阿尔敏多·蒙特洛在《新闻日报》上发表的那些无耻的文章，他含沙射影地说“存在着一个受到广泛资助的、反葡萄牙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教会和当局无耻勾结，因此对这场50年代喧嚣一时的所谓“捉鬼运动”负有极大的责任。

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马托斯将军感到了这一危险并试图予以揭穿，尽管这与他作出的许诺相悖。他征求过几位亲密朋友（巴勃扎·马卡良斯教授，我父亲——由于不能行走，指派我为他的代表和阿德里诺·卡洛斯）的意见：即如果他发表一个反共的公开声明（他原准备这样作），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因为好几个地区委员会（如由布列斯特斯·萨尔盖伊洛主持的里斯本地区委员会）和某些温和的反对派军人和文人在这方面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他们说，由于担心共产党的势力增长才没发动拟议中的暴动。

我在这种类似宫廷阴谋中起了某些作用。我提醒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和全体中央委员这样做将产生什么后果。毫无疑问，这意味着运动的分裂。除了表明对敌人的宣传害怕和屈服外，群众很难理解这种莫名其妙的背信弃义行为！在巴勃扎·马

卡良斯教授(他政治上的诚实、清醒和勇气令人钦佩)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说服了候选人，使他认识到这样作除了表明向政府的宗派宣传让步之外，还将犯下分裂反对派的大错。

为了决定这一重大问题(它关系到各地区委员会和大部分支持者是否分裂)，我们召集了一次有全国各地代表参加的大会。大会在奥拉里亚的安东尼奥·阿尔梅达共和中心举行。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大会。诺顿·马托斯(会议自然由他主持)倾向于参加选举，即使我们得不到起码的条件保证。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也赞成这种意见，虽然他知道由他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持相反的观点。一些地区委员会分裂了，瘫痪了。但是那种作为整个竞选运动的基础的政治条件，又迫使我们弃权。这种可能性成了大部分讲话、谈话和公报的主旋律。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到最后时刻才弃权将会铸成大错。最后占上风的竟是这种观点！

当时离选举已没有几天了。诺顿·马托斯躲到了埃斯托利尔，随后又回到他在彭德·利马的家中。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希望发表的文件。在这份十分悲观的文件中，他声明近期拯救祖国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他还预言黑暗的时代将到来，并说由于当局的盲目固执和对民族利益的漠不关心，国家正在走向深渊。

但是，我们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失去了一场战斗，只要我们愿意，战争还会长期进行下去。这种悲观的论调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想法。索罗门钮到北方去，试图说服老将军修改那篇充满悲观论调的声明，加入一些给人希望的词句，因为反对派的斗争还在继续，需要给人民(我们就是以它的名义工作的)以斗争的希望！

选举前的最后两天，我们忙着销毁竞选文件。"毕得"已把我们的总部围了起来，以便等待时机进行干预。当时的情景就象散了的集市一样，令人激动难忘！

萨拉查在竞选结束后发表的讲话中说："他们干尽了坏事，最后却拒绝竞选，拒绝给予他们唯一可给的帮助。"

怒气冲冲的独裁者是不会原谅对手的。狡诈的报复在竞选宣传结束后正等着我们呢！

面对人民的冷漠，虚伪的"大选"是在墓地般死气沉沉的气氛中进行的。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在1949年的2月11日（星期日）。

13日凌晨，"毕得"的人闯进了我的家。由于多次在睡梦中被捕，这次我事先已有防备。我从后门逃出后就拦了一辆出租车跑到朋友巴拉达斯·卡瓦略家去了。出了什么事？上午我才知道：曼奴艾尔·门德斯、巴尔马·卡洛斯、佛朗西斯科·泽尼亚、拉莫斯·科斯塔、若泽·阿拉康、克鲁斯·费雷拉、阿尔敏多·罗德里格斯等人均已被捕。其他竞选中的活跃分子也未能逃脱厄运。

下午第一次开庭审判青年M·U·D案，我作为被告还是从容不迫地前往出席。正如预料的那样，我在入口处被捕了。

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开始了……

·6·

在“冷战”的旗号下

直到1949年，反对派还一直抱有获得政权的希望。他们确信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他们有利并相信在一个全面民主变革的欧洲，半岛上的法西斯主义已成为充满贫困和压迫的孤岛，无法再苟延残喘下去了。1949年之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葡萄牙政府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受到西方世界的宠爱，开始以正式伙伴的面目出现。与此同时，作为战后的现实，出现了冷战——它帮了萨拉查的大忙！

四分五裂、耳目闭塞的葡萄牙民主派感到自己再次被出卖了。造成这极为不利的局面的责任在谁呢？观点不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自然也有分歧。民主人士被迫对此作出选择，而他们却毫无准备。他们生活在陋巷之中，被外部世界遗忘了。他们不被人理解（例如西蒙娜·比维尔在《达官贵人》一书中为葡萄牙民主人士描绘出了一幅颇为不恭的画像）。他们屈从于严厉的独裁统治（全世界对此装聋作哑），忍辱负重，无所作为。他们对面临的问题，拿不出解决办法。怎么办？向何种力量呼吁？寻求谁的帮助？这是个难以回答而又让人普遍感到沮丧的问题。

正是在反对派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我于1949年第四次被捕入狱，已经多次中断的文学课程只好再次中断，而我已经24岁了！当我迈进阿尔茹贝监狱的时候，我还没有体会到履行自己

的义务并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激动心情。相反，我只是为自己的牺牲不被人理解而不安。一切都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我就象掉进深井里的一块石头，仅仅溅起一层薄薄的浪花。

在反对派队伍中滋长了深深的悲观情绪，各种反应不时从狱外传进我们的耳中。人们看到的是全面溃败，多数人感到已是“各自逃命”的时候了。

“大选”一个月之后，伴随着全民奋起的消失，是万马齐喑的沉默、茫然不知所措和惊慌恐惧。象往常一样，那些当时最激进的人现在成了指责别人最起劲的人。警察开始选定目标进行镇压，蓄意分裂反对派组织，而这个组织内部早已矛盾重重。本该给予我们的许多声援此时停止了。这一切使我们饱尝了难以抹去的痛苦！这时就连候选人诺顿·马托斯本人也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

尽管如此，在监狱里渡过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和推心置腹的朋友在一起，我的精神状态极佳。他们是：曼奴艾尔·门德斯、佛朗西斯科·泽尼亚、若泽·阿拉尔干等人。我是在阿尔茹贝结的婚，在押的曼奴艾尔·门德斯充当了证婚人。我的父亲不久前才获释，他在经受了 4 月 10 日灾难和审讯后，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并且怀疑一切。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异常艰难。此外，我母亲开始出现严重疾病的症状，并因此于 1955 年离开了人世。所以前景是非常暗淡的。然而，当我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乐观态度感到惊奇。我对未来当然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此刻，无人可以使我相信，大约 20 年后我又被关进了条件更加恶劣的阿尔茹贝。无人可以使我相信，我的祖国的形势恶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致我没有受到审判就被流放到圣多美岛！

当时审讯我的警察有一个是我过去在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法利亚·桑托斯。12 年后，他竟然成了一名教授，这真是葡萄牙

大学的耻辱！另一个叫费里·戈麦斯，他冷若冰霜，不久就死了！还有一位叫波尔图·杜亚尔特，以后担任了“毕得”的副局长。他们企图向我表明，我的努力以及我对未来的憧憬都是徒劳的。很显然，他们想摧毁我的意志。当时最残暴的酷吏之一费尔南多·戈维亚曾经夸口：“法律管不着‘毕得’的第四层楼”。安东尼奥·玛丽亚·卡尔多佐大街一幢建筑的四层楼是当时的审讯室和刑房。就是在那里，法利亚·桑托斯审讯我直到凌晨。他玩弄着一支手枪，把枪口对准我，令人厌恶地说：“假如我把你象一条狗一样杀死，不会有什么事，也不会伤我一根毫毛。所有的人都会相信我杀死你是出于正当自卫！”

我能怀疑这个事实吗？在希特勒处于顶峰时期曾接受过盖世太保训练的‘毕得’，当时同美国情报局保持着良好的业务联系。他们炫耀地告诉我，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属于最优秀的技术顾问。令人望而生畏的“毕得”头子阿戈斯蒂钮·洛伦索上尉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当上了国际警察组织的首脑吗？毫无疑问，萨拉查政府从西方民主那里获得了“品性良好”的证明，因此它胆敢在世界舆论面前胡作非为。在准备承认佛朗哥之前，萨拉查已经获得了历史学家马克斯·加洛称作的“第二次胜利和赦免”！

如我所谈到的，在1949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派在是否参加投票的问题上曾发生过分裂。然而，这种纯属战术估计原因造成的分裂，却隐藏着一种更深刻的对立。随着竞选运动的发展，这种对立开始全面蔓延，而且日益严重。葡萄牙反对派的分裂主要是由于世界不可调和的两大敌对阵营的分裂造成的。这种分裂曾导致共产党退出了西欧所有的政府，使所谓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的政策成了泡影。

因此中间立场已没有地位，到了作出明确决定的时刻了。那时候，我习惯说，我们尚未到达欧洲阶段。在欧洲，民主力量是可

以分裂的，因为纳粹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战胜。在葡萄牙，我们首先必须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然而已出现两个阵营之间发生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即使象我这样坚信和平的人也无法排除它。这种简单的可能性给前景蒙上了不祥之兆，而恶兆的影响是极难逃脱的。

由于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修养和直到那时为之斗争的目标，我的选择是戏剧性的。我常常在“团结运动”中作政治工作，并继续特别热心于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那时我毫不犹豫地在美国和苏联当中选择后者，因为我确信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故乡”。如果它不是天堂，至少也代表了未来的道路，象我们当时常说的那样，“顺应了历史潮流”。在我看来，对苏联的封锁以及后来的战争（全人类的悲壮史诗）和帝国主义的阴谋，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那么多困难、缺点并出现扩大化错误（我当时并不认为是罪行）。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是在 1948 年。在此之前，大卫·鲁塞特和卡伊斯曾揭露过在苏联有集中营。科埃斯特勒已发表了《零和无限》（我很久之后才谈到），而萨特也出版了《联合》和《黑手》。我一直关注着克拉夫特琴科就《我选择了自由》一书，同《法国文学》杂志进行的著名的论战。但这场论战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就象其他事情一样！我仔细地阅读了《巨大的反苏阴谋》。这本书以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为由替斯大林的强硬政策辩解。

然而，在我意识的深处却产生了难以解答的疑问。为了不影响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我极力压制它。法西斯主义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令人压抑的现实。我被不可抗拒的抉择弄得眼花缭乱，我的愿望是不作选择，至少是推迟作出这种不可避免的选择。我和民主团结运动中一些最亲密的同伴盲目地寻求第三条道路，尽管人们从各方面向我疾呼：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如果

存在，也是帝国主义有意玩弄的把戏。由于对苏联的敬仰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憧憬，我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是过了很久以后，在1951年我第一次访问巴黎和我订阅了由克洛德·布尔代、吉尔·马蒂内、罗歇·斯特凡娜、克洛德·埃斯蒂埃及其他人于一年前(1950年4月)主办的《观察家》杂志时，我才发现了中间道路。这一模式如此符合我的思想和我观察分析国际问题的方式(用于葡萄牙的情况)，以至于皮特拉·桑托斯用他那固有的狡黠口气对我说："当法国《观察家》杂志被警察查禁的时候，你一个星期内不会再有政治见解……。"

在支持诺顿·马托斯竞选运动的各种委员会中，分歧最严重的恰恰是里斯本和波尔图两个大城市的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显然也存在问题，但没有上述地区委员会那么严重。在里斯本，原农业学院的数学教授若瑟·莫尔加多是委员会的强人。他在这个委员会里同普列斯特斯·萨尔格罗司令存在尖锐分歧。在波尔图，维吉尼亚·莫拉、洛邦·维塔尔和路易·戈麦斯教授与安东尼奥·马塞多集团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麻烦。现在看来，正是他们这些人在“大选”后不久开始筹划“团结运动”——全国民主运动的。他们认为这个组织是民主团结运动和诺顿·马托斯竞选运动合乎逻辑的继续。

然而，当时的环境是多变的。法西斯一度因大战结束而陷入困境，现在又重新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客观现实的情况并不因理论上的分歧而改变。事情并不象全国民主运动的创始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样，尽管新运动的基本要求(公众自由、“自由选举”、全国生活全面民主化、取代国社组织等等)与过去运动的要求基本相同，但全国民主运动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由于缺乏传统反对派的支持)被迫采取了明显的左倾方针。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以有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而著称的“民主团结运动”和诺顿·马托斯竞选运动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参加“全国民主运动”，更不用说那些老共和党人和共济会成员了。许多人以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为核心，组成了一个有强烈“大西洋主义”立场的、倾向相反的委员会。他们确信这样可以更有效地阻止萨拉查加入大西洋公约。这是一个在当时公布的一项文件上签名的24人组成的委员会。除了马里奥·阿泽维多·戈麦斯之外，还有卡洛斯、席尔瓦、科斯塔、维列拉等人。

事实并不象警察反复宣传的那样，“全国民主运动是共产党的合法组织”。天下的事从来不会如此简单。从历史的角度看，“全国民主运动”可以说是一个团结运动，主要由共产党的同路人组成。它的领导人多次被捕并受到审讯，在里约廷托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甚至惨遭毒打。他们是在警察迫害民主人士的艰苦条件下挺身而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具有宗派主义的原因，而我对宗派主义又十分敏感。但是，必须向他们表示敬意，由于残酷的迫害，他们大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被捕、受审、流放。但他们始终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他们有：路易·戈麦斯和若泽·莫尔加多教授（被驱逐到巴西）、维吉尼亚·莫拉、洛邦·维塔尔、阿尔贝蒂诺·马塞多、大卫·卡瓦略、阿曼多·巴塞拉尔、利诺·利马、翁伯托·洛佩斯（在贝尼塞监狱里被关了六年）等。

“全国民主运动”成立时，我正在狱中，不可能采取什么立场。当然，我是团结运动的拥护者，因为这个运动可以推动我为之奋斗的事业。但是，我目睹了这个运动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所以我主张谨慎行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保证所有的反对派参加。但是人们没有这种理解，也许还不到实现我的主张的时候。

这样，曼奴艾尔·门德斯和我(此外还有马丽亚·英格列斯和迪托·莫拉伊斯)准备作为将来的一种后备力量留在民主团结运动之外，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反对派内部重开对话穿针引线。我们几个人是在民主团结运动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都希望多数派团结，因为我们曾在多数派团结中相识和成长。我在荒漠中长途跋涉的漫长岁月就这样开始了——下面我将谈到。可以说，这个时期风云变幻，一直延续到1958年翁贝托·德尔加多将军的竞选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充满着相互不理解(互不容忍和毁坏我们自身的价值是这个时代明显的标志!)，人身攻击和明争暗斗。但是它给人以教益，使我顽强地走向未来。

共产党的重要性和她的实际影响在1949年前一直是上升的，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时期。后来，不可避免的恶运来临了。共产主义(具体说就是苏联)的全球战略引起的领导层的突变，迫使党遵从一种严厉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教条式的忠诚路线。面对警察的肆无忌惮的镇压，毫无防卫的干部多次被推入按国际模式组织的荒唐的运动中去，而这些运动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同葡萄牙的直接利益相关联。他们暴露了自己，而且一旦落入警察之手，就得不到任何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必须杜撰出自己的铁托式的叛徒，即我们的拉基克斯、克斯多沃斯、斯兰斯基斯和克列门蒂斯。当然要在小范围内……

一些严肃并完全忠实于反法西斯斗争的人，如费尔南多·毕德拉·桑托斯，在大庭广众之中以“变节分子”和“叛徒”的罪名被剥夺了权力。为了编造同样的罪名，甚至捏造说桑托斯在他的阿马多拉住所内铁托的肖像前举行过多次会议(事实上挂在他家里的照片是他已故的父亲——一名海军老军官的遗像!)另一些人，如安东尼诺·索萨，被指控为替“中央情报局服务”的特务(阿图尔·隆东在《证据》一书中论述了这一案件。这件案子牵

涉到当时工党议员济里阿古斯)。还有一些更严重的案件，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曼奴艾尔·多明戈斯——他被诬陷为路易斯的同伙，而路易斯则被指控为“叛徒”。现在看来对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后来他十分奇怪的死在贝拉斯松树林中！另外还有一些例子。

葡共在战后的几年里确实是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组织，曾发动了劳动者，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广大阶层。但后来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甚至是宗教式的组织，她的许多成员出于良知而纷纷离去。

显然，根本的原因在国内，它可以说明共产党为什么会变化。首先是警察对党的疯狂的镇压活动。阿尔瓦洛·库尼亚尔当时已是无可置疑的领袖并在全国享有崇高威望。他在鲁索同另一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米利唐·里贝洛一起被捕。几个月后，米利唐·里贝洛死在狱中。这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致使共产党难以恢复。我现在还记得“毕得”的一份正式声明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这份声明宣布了两名共产党领导人被捕，并居心叵测地、故弄玄虚地提到查获了大量文件，宣称“毕得”的特工人员正在破译这些文件。当时我被关押在卡西亚斯。这一案件有可能直接危及到我！

上述声明公布两天后，我被叫到了令人憎恶的安东尼奥·马丽亚·卡尔多佐大街的“毕得”总部。在那里我受到了审讯，而当时我的诉讼程序已经结束，等着局长审批结案，以便把案卷移交法院或存档。根据法律教授(当时的司法部长)卡瓦莱罗·费雷拉制定的葡萄牙刑法，警察有六个月的时间可随心所欲地准备起诉文件。在他们准备就绪前，被捕者不知道他们是否将被送交法院！我突然被传讯。在“别动队”的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我反复地想象着他们会在共产党的档案中找到有关我的什么书面材

料。特务们说着粗话，开着玩笑，进进出出，并因抓获阿尔瓦洛·库尼亚尔而洋洋得意。我丝毫不怀疑这些就是他们要做的事！两个月前，诺顿·马托斯竞选运动使我同共产党有过多次接触，这可能成为他们加害于我的确凿证据。

我焦急地等待了一小时又一小时。上午9点钟我被押送到这里，夜里11点钟左右才被送回卡西亚斯监狱，几乎等了一整天！最后，一个特务用平淡的声调命令我回去。检查官先生非常忙，不能审问我！那些天我简直是度日如年……。

在我在押期间，合议庭对民主团结运动中的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审判(我和泽尼亚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在曼奴艾尔·门德斯(辩护人)的陪同下，我们乘"毕得"的一辆小车被带到了"波阿奥拉"。后来我们和从"利莫埃伊罗"转来的普通犯人一起被关进了一栋有两层楼那么高的象鸟笼子似的建筑里。我们长时间地等待着开庭。

对青年民主团结运动中央委员会的审判是对1947年大肆搜捕我们之后的必要补充，其目的显然是在使我们的组织非法化。除了泽尼亚，我们所有的人仅被指控"散布了有倾向性的、可能引起公众恐慌的谣言"。指控提到了我们签署(由我起草)的一个抗议监禁几名学生的文件，这几名学生是我们的同志。尽管查明事实无误，我们的行动只是一种学生们最起码的声援活动，但是，所有的人还是被判了三个月的监禁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就是合议法庭的"正义"。数年后，我们的辩护人阿基利诺·里贝洛教授在他的名著《当狼嗥时》一书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事件的真相(这本书使他受到了起诉)。佛朗西斯科·泽尼亚被指控在担任科英布拉学生会主席期间"有罪"，因而被判了两年徒刑。前面我已经提到过此事。

民主团结运动被宣布非法(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也随之

变为非法）以及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首次被指控（尽管是象征性的），表明政府正在筹划对直到那时尚能容忍的这一准合法运动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我认为，这一现实告诫我们必须采取一种退却的、防御性的、明智的策略，而不要坚持斗争，赤膊上阵，否则势必造成优秀干部被大规模的屠杀。由于盲目斗争的政策导致了我们优秀的战友被杀害和运动陷于孤立的惨重后果。我的立场后来才被接受。而共产党却坚持不惜代价为半合法的运动争取合法地位的政策。尽管全国民主运动几乎失去了所有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同盟者，仍力图发展民主团结运动。而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拒不遵循“成年同志们”的道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仍继续前进！

显然，我既不赞成这一方也不赞成另一方。我认为运动正处于低潮。我坚信原子战不会发生，这是我满怀希望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国际形势解冻时，我们反击的时刻必将到来。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可能减少我们队伍的损失，坚持到那时！象过去一样，“毕得”未能搜集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我有罪。1949 年中我出狱后，民主团结运动坚持要我参加中央委员会。由于我在民主团结运动和诺顿·马托斯竞选委员会中的立场，我参加中央委员会是十分必要的，尤其考虑到全国民主团结运动的力量主要在波尔图，在里斯本却几乎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有份量的人。但是，我拒绝了。马丽亚·英格列斯、曼奴艾尔·门德斯、曼奴艾尔·莫拉伊斯以及民主团结运动和诺顿·马托斯竞选运动的领导人也拒绝了。民主团结运动的立场和共产党非常接近，而我们的立场没有被接受，也不被理解，更谈不上受到尊重。这一时期，我收到许多匿名信（曼奴艾尔·门德斯通过技术鉴定发现，署名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这些信件以人民的名义威胁我要“在运动中继续站在人民一边”。

当看到我的观点在基层引起强烈反应，而领导层则完全持否定态度时，我只好自动脱离了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当时，一代新人正准备承担责任。我既然已经接受了民主团结运动非法的现实（前面我已经解释过），我就不能用自相矛盾的态度维护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继续存在下去。另外，我感到自己继续参加青年运动有些"年纪太大"了，于是就"蹑手蹑脚"、"无声无息"地悄悄离开了。后来某一地下刊物用不同的眼光报导了此事，说什么我由于坚持"取消主义观点"而被驱逐出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

这样，我和共产党之间就有了巨大的分歧。象经常发生的那样，也如人们所说的，"世间万物都有其逻辑"。直到那时，我一直还是一颗"希望之星"，一位战后人们寄予最大期望、具有独特号召力的政治领导人。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满身缺点的"机会主义者"、后来又成了"叛徒"。向我施加种种压力以迫使我投降或回到"正确道路"上。促膝谈心、许诺、恫吓、讹诈、威胁接踵而至。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中的许多人（其中有一些从中学时代开始就是我的好友，我和他们共同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突然不再和我来往，甚至不再理我。实在莫名其妙！"朋友们"转而对我怒目相视。我只要一出现便令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们遵照命令，以"孤立"的方法向我施加压力。当他们认为我不会屈服时，便断定我已不可救药，因而掀起了一个在政治上全面摧毁我的运动。他们没有新招，一切都是老一套：政治上的疏远、唤起普遍的不信任、指责我客观上玩弄敌人的阴谋、开除、在私生活上造谣诽谤、精神摧残。总的来看，应当承认，尽管"运动"给我留下了一些烙印，但我受到的毕竟还不是最坏的待遇……

我的妻子受到了难以置信的株连。1948 年，她因参加在圣塔伦的一个群众俱乐部举办的"新歌集"诗歌朗诵会而被内务部

长坎塞拉·阿布列乌和国民教育部长皮雷斯·利马决定解雇，不得不退出“国家剧院”。作为演员和反对派，当时她的威望很高，曾在“国家剧院”非常成功地演出过加西亚·洛尔加的《贝纳达·阿尔巴一家》，若瑟·雷吉奥的《贝尼尔德或纯洁的母亲》及许多其他当时不太著名的剧目。作为表演家，她常常应邀举办朗诵会，多数情况下是同洛佩斯·格拉萨“音乐爱好者合唱队”同台演出，在当时的群众娱乐俱乐部举办的演出中备受欢迎。“进步人士”都崇拜我的妻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她怎么能继续同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在一起，甚至是患难与共呢？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因其“修正主义思想”而受到抨击，共产党甚至针对他发动了一场系统的诋毁个人声誉的运动……

许多年后，一位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中比我晚一辈的领导人，悄悄地告诉我：“当时，在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的所有会议上，总少不了一项议题：马里奥·苏亚雷斯事件！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要憎恨您”。另一次，一位科学系学生会的领导人到我家邀请我夫人去参加一个朗诵会，碰巧当时我也在家，自然我们作了互相介绍。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因为同意和我握手而受到公开的批判！

这只是千百件事例中的几个例子。这些情况说明在那些岁月中葡萄牙国内排斥异己是很残酷的。过去，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存在逮捕、拷打和集中营。这是确实无疑的！但是，存在着“起诉、指控和精神摧残，其残酷和缺乏人性一点不亚于我们在欧洲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方式是雷同的，只是手段有所变化而已……

这个时期对我来说是艰难的，充满着十分痛苦的考验。我每天都想尽力抹掉它留给我的烙印、然而我不能忘掉！另一方面，它也是一次不可代替的实习，使我认识到不尊重人、没有自由的那种社会主义仅仅是一幅令人憎恶的讽刺画。此外，它使我增强

了对外来的攻击、不公正，甚至是朋友的不公正的伤害（这是最难以忍受的）的抵抗能力。使我懂得，一个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其他方面，只有自己自甘被摧毁时，才能被毁掉！我作了许多努力才从思想偏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偏见使我看不到简单的事实。我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学会了只根据自己的标准作出决定，尽管有时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至少不再简单而有限地反映别人的意志。

尽管我对全国民主运动完全持保留态度，但是，在它遭到镇压的时候，我不能不站在受害者一边，向他们表示声援。开始我没有接受参加全国民主运动的领导（在 1949 年夏给路易·戈麦斯教授的信中解释了理由），但是在中央委员会被监禁的特别困难的时刻，我却同意参加该运动的地区委员会的领导。这是我后来懊悔的一个行动。毫不奇怪，这是受了皮特拉·桑托斯和若热·马塞多的影响。他们两人也属于这个委员会。当时我的政治立场与他们的相似，我们对全国民主运动的批评内容是一致的。然而在中央委员会无法工作期间，所谓的“紧急委员会”取代了它，安东尼奥·阿布列乌是最高领导人。这个“紧急委员会”和我们主张的方针完全相反并极其粗暴地强加于人。争论接踵而来。区委员会成员，如皮特拉·桑托斯或马塞多的政治能力肯定超过我们这些侥幸的“掌权者”。所有的工作都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分歧而受到影响。

1950 年 11 月，在庆祝“和平日”的问题上出现了无可挽回的分裂。曾拟定 11 月 11 日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是一次组织维护和平的大规模活动的极好时机。当时，苏联已经发起了以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为基调的捍卫和平的运动，力图消除意识形态的分歧，动员所有支持裁军和谈判的力量。朝鲜战争于 1950 年 6 月爆发，杜鲁门宣称苏联已于 1949 年 10 月生产了

一颗原子弹。世界处于战争的边缘、准备在所谓的“恐怖平衡”中求生存。世界各地都成立了保卫和平委员会，而美国作为侵略者被置于被告席上。葡萄牙也未逃脱这一规律。由作家马丽亚·拉马斯和安东尼奥·萨拉伊瓦和物理学家曼奴艾尔·瓦拉达列斯组成的葡萄牙委员会遇到了明显的困难，不仅因为在葡萄牙笼罩着警察镇压的沉闷气氛，还因为缺少和群众联系的手段，而难以说服群众参加一场似乎与他们日常的忧虑相距甚远的斗争。缺少面包和自由是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口号，因为人民能亲身感受到。而和平似乎是一种遥远的、与葡萄牙人不沾边的东西，也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和愿望。

为呼吁支持和平的签名和动员人民参加捍卫和平的斗争所作的努力，几乎以全面失败而告终。今天谁还记得当时为此而作的努力呢？谁还记得众多的优秀战士为实现当时的口号作出的牺牲和所担的风险呢？

不管怎么样，全国民主运动在1950年11月11日仍然试图在复兴广场举行一次维护和平的游行。里斯本区委员会力图使“领导们”相信这是一项不明智的计划，它将不会吸引任何人，并注定要失败。但是无济于事。所有的抗议都是徒劳的，命令照常发出！参加这次游行的只有几十人，而且刚刚出现警察干涉的迹象时，人们便四处逃散。这次游行使一些坚定分子锒铛入狱。在被捕的人中有非常年青的学生卡洛斯·英格列斯。

这一天的夜晚，在安东尼奥·若瑟·阿尔梅达大街共和国中心一个最多能容纳二百人的小会议厅里，预定召开一次隆重的会议。我记得会议是由费雷拉·马丁斯将军主持的。他是曾参加过第一次大战的葡萄牙杰出的军事人物，也是通晓葡萄牙辉煌战绩的历史学家。其中一位演说者是著名的“大兵诗人”奥古斯托·卡西米罗上尉。他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和有侠义心肠

的人，是《新天地杂志》的创始人之一，1931 年“马德拉暴动”的坚强而杰出的参加者。还应该提到马丽亚·埃莱娜·曼图阿(参加了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初期的工作)、阿尔维斯·雷多尔(因病而未出席，人们说是“战略病”)、我和其他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人。

但是，当我们快要到达共和国中心时，看到了警察显示力量的罕见的一幕。我是和我的妻子(当时正怀孕)及安东尼诺·索萨一起去的。他们两人执意陪我去是为了不让我演讲。当我们到达时，看到会议厅里已挤满了保安警察和“毕得”的便衣，真正的民主人士最多有五十或一百人。这场面显然预示着一次大规模的镇压，酷似科斯塔·格拉瓦斯著名影片《Z》中的镜头。当我和一些与会者(我记得其中有马丽亚·英格列斯、皮特拉·桑托斯和佛朗西斯科·泽尼亚)交换了看法，提出了在那种条件下，不举行会议的问题。开这个会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有人坚决反对并以好斗的口气说：“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必须按既定方针办”。由于我直接参与了这件事，并且对 11 月 11 日计划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我认为尽管意见不同，还是应该服从。总之，这是我最后一次同意去做一件我认为是错误的事。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别人说我胆怯或从这件事中抓到什么把柄。

会议以民间传统的方法开始：奥古斯托·卡西米罗上尉回忆了战争，结束时用诗一般的语言赞颂了葡萄牙士兵在弗兰德雷的英雄业绩和他们的军人美德。随后马丽亚·埃莱娜·曼图阿用平静的语气作了简单的发言。会议大厅里的气氛十分沉闷，因为所有的人都感到要发生某种事情。大厅里充满着一种不安的气氛，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警察常用嘲弄和威胁的语言打断发言。而民主人士拼命地鼓掌，尽力以此表示对组织者的支持。

我准备了一篇讲演稿。那是一篇热烈捍卫和平的演说。它概述了全世界为结束战争而进行的努力，公开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者”，批评了“大西洋公约”是“战争工具”，毫不犹豫地建议和平和民主阵营“站在东方集团一边”。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立场鲜明、充满激情的讲话，也是“毕得”指控并长期监禁我所求之不得的“证据”。

然而，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救了我。我刚讲了几句，当局的代表就打断了我的话，警告我不能用“颠覆性的字眼谈论和平”。我继续讲了两句，再次被打断。大厅里骚动起来：掌声、口哨声和嘲笑声响成一片。我看到“毕得”分子以包围的阵势朝讲台靠近。我又讲了几句，再次被打断。作为抗议，我声明自己受到压力，因此拒绝继续发言。这时候“毕得”分子一下子涌上讲台。但是，我立即跳下讲台，走上前去和坐在第一排的《新天地杂志》社长卡马拉·雷伊斯老先生拥抱。这是一位非常机智的知识分子，他在紧急时刻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精神。我拥抱他的时候，暗中把我的讲稿塞进了他的大衣口袋里。没有时间再做其它事情了！警察把我推出了会议厅，并在抗议者的一片混乱和我妻子的毫无用处的呼喊声中，对我推推搡搡。我还未明白过来就在拳打脚踢中到了大街上。凶神恶煞般的警察威胁和侮辱我，把我带到停在远处黑暗中的一辆车子里。我第一次（幸好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了“毕得”的检查官——臭名昭著的费尔南多·戈维亚。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实在令人作呕……

但是，作为罪证的讲演稿魔术般地不翼而飞了！我被带到了“毕得”总部。从头到脚被搜查了一遍，什么也没有！“你把它藏在哪里了？”特务们不无惊奇地问道。“肯定有人在混乱中抢走了或者丢了，”我这样回答。那么，我有什么“罪”？如果我在文人政府批准召开的会议上仅仅说了四句话……

凌晨5点钟，他们对我进行了惯常的警告，而后警察局长作了意外的道歉后，就把我放了。我的妻子在我们亲爱的朋友马丽亚·英格列斯的陪同下，在“毕得”局长办公室里等着我。费雷拉·马丁斯将军也在当天晚上向内务部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显然，11月11日的彻底失败也是我们对全国民主运动领导人以及紧急委员会提出尖锐批评的原因。争论不休，相互攻讦，最严重的是没有任何结果。奥尔兰多·拉莫斯自中学时期就是我的老伙伴，后来因被指控为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而在狱中度过了大约6年。更晚些时候，他加入了极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1951年初（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3月份），他“正式”交给我一份《前进报》。这份报纸指控我是“机会主义分子”，并劝说全国民主运动里立场坚定的民主人士“把我从运动的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还不仅仅如此！我的名字和另外一些人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们是：费尔南多·皮特拉·桑托斯、拉莫斯·科斯塔、若热·马塞多和奥古斯托·萨·科斯塔。显然，把这个“集团”同另一个“清一色的民主人士”的“集团”分开了。文章也提到了这一集团的成员如：阿泽维多·戈麦斯、古斯塔沃·索罗梅钮、曼奴艾尔·门德斯以及其他人。更有甚者，文章是在“毕得”严惩极左主义罪行的时期正式披露这份名单的。

这段历史的另一则趣闻是奥尔兰多·拉莫斯，此时给我带来了朋友们的口信。他非常局促不安，但似乎又感到很荣幸。据他们说，我应该继续留在民主团结运动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当然我从那时起就没有同民主团结运动再有过任何接触，它的历史并不光彩。也是从这个时刻起，我同共产党永远断绝了关系。多年以后，大约在1955年或者1956年，在做了自我批评后（或者是承认过去错误后）他们想让我重新与他们密切合作。

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正如他们对我所说，对我的批判并不严厉。关键的是我要承认对皮特拉·桑托斯的批判是“正确”的（目前皮特拉在主管由“欧美”出版社出版的《阅读杂志》）！但是，我当时已经超脱出来了。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他死后一个月，著名的白衣暗杀“阴谋”的医生们便获释了。接踵而来的是清洗贝利亚运动和开始解冻。这些都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对于象我这样经历过上述事件并严肃加以思索的人来说，这些事实不能不在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例如，很久以后，又披露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内幕、匈牙利事件和短命的“布拉格之春”……难道能够忘却这些“经历”，就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吗？不能！这时候，我对共产党的言行已经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并完全丧失了对它的信任……

1951年4月，卡尔莫纳逝世。他是戈麦斯·科斯塔的继承人，在萨拉查的荫庇下，长期执政。对他，人们没有很好地研究过，实际上，他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起码在独裁政权最初的那几年）。总之，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充分利用他的短处和弱点。作为统治者，他的主要政治“品德”是谨小慎微，这也是他得以长期在位的主要原因。

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位和蔼可亲、没有害人之心，从不阻挡任何人晋升之路、一贯与人为善的人，并且以小心谨慎而著称。他是一个应变能力很强的人，曾是自由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同保守的共和党人有密切的联系，最终成为一个凶残的、迷信宗教的独裁政权的国家首脑。他是一个没有信念的人。普利多·瓦伦特教授同卡尔莫纳非常熟悉，因为他是他的病人，教授给我讲述了关于卡尔莫纳的一些趣闻，特别是他同葡萄牙第一夫人卡尔莫纳太太的关系。多年来，卡尔莫纳夫人是一位好妻子，言语不多。他把她从沙维斯带出来后，也改变了她一向生活在其中的

极简朴的环境。卡尔莫纳夫人是个任性的人，喜欢我行我素，但比丈夫有个性。有关她的笑话很多，有些笑话可以敷演出引人入胜的故事。卡尔莫纳全家似乎同克拉维罗·洛佩斯家一样憎恨萨拉查。因此，克拉维罗·洛佩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红脸牛"。卡尔莫纳善于伪装，与他的全部表现相反，他内心里憎恨萨拉查。他多次制造阴谋反对萨拉查，但没有取得成功。在民主团结运动时期，曾同卡尔莫纳会晤过的索罗梅钮对我说，从交谈中得出的是一个可悲的印象：他是一个狡猾的、胆小如鼠而又多愁善感的平庸之辈。

不管怎么样，卡尔莫纳的逝世改变了葡萄牙民间长久以来的习惯，在里斯本，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悲痛场面。当然，宣传和担心害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罗西奥、复兴广场、西亚多和整个闹市区，中产阶级——机关职员，商人、自由职业者，甚至一些劳动者，几乎毫无例外地系着黑领带，面带沉痛的表情。

卡尔莫纳的死在诺顿·马托斯竞选运动两年后导致了一次新的选举。萨拉查一反大多数同党人的意愿，不愿意作总统候选人。正如他后来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要想成为共和国的总统，"不必是圣人、也不必是天才，更不必是英雄"。很显然，假如需要这样的人，那么只有他萨拉查才是唯一的候选人。由于他不是候选人，他可以平静地选择另一位肯定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即佛朗西斯科·伊吉诺·克拉维罗·洛佩斯将军。

面对新的选举，已经分裂和互不信任的反对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全国民主运动，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和极左派推选路易·戈麦斯教授为候选人；另一方面，比较保守的反对派宣布支持独裁政权的前部长、退休海军上将金唐·梅伊雷莱斯。他是当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对 5 月 28 日事件有不同意见。由于缺乏团结气氛，大多数反对派人士（包括我在内）在两极对立

中采取了中间立场。

使反对派找到一位共同候选人的努力完全失败了。诺顿·马托斯竞选时期遗留下的伤痕仍未愈合。

但是，路易·戈麦斯的竞选人资格被国务委员会否决了，认为这位"民众的候选人"没有资格参加竞选。为此，全国民主运动和民主团结运动青年组织掀起了弃权运动。另外，路易·戈麦斯的竞选人资格在里斯本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所有的人都感到（候选人本人也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毫无成效的抗议。

路易·戈麦斯教授是一位造诣很高的科学家，诚实可信和勇于对敌的人。他不具有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天赋。他是一位有群众观点的人，但这是极不相同的两回事！有一次，我在波尔图"安息地"公墓门口看到他被捕，当时他正在参加为阿贝尔·萨拉查的葬礼而举行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尊严！但是，政治却是另一回事。路易·戈麦斯教授本人从未想当候选人。我记得，无论是曼奴艾尔·门德斯还是我，都同教授谈过这个问题。他给我们两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迫于朋友们的压力和出于政治斗士的责任，他才同意了当候选人！任何人也不能说金唐·梅伊雷莱斯海军上将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是一位和蔼持重、安祥和好客的人。由于他在过去独裁政权中的责任，他认为道义上有义务为找到一项结束独裁政权的和平解决办法做出贡献。他的竞选与其说是恪守过去的反对派立场，不如说标志着他同 5 月 28 日政变的"忏悔者们"的公开决裂。在他的顾问班子里，有两位极富战斗性的人在为他的竞选运动定调子。他们是：库尼亚·列阿尔工程师和恩里克·加尔旺上尉。在安东尼奥·塞尔吉奥与阿泽维多·戈麦斯的领导下，反对派在所有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为梅伊雷莱斯获得候选人资格提供了民主的保证。

梅伊雷莱斯海军上将的竞选运动有一种新的涵义。它既没有动员起广大群众，也没有激起象诺顿·马托斯竞选运动时期那样广泛的集体热情。这次竞选绝然不同：它暴露了“当权者阵营”的分裂，重点揭露了政府的经济丑闻，同时也不放过那些政治寡头们。在这方面，这一次比过去历次竞选运动都更富有成效。如果说民主团结运动和诺顿·马托斯的竞选运动证明了政府在政治上的非法性，并且两次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奋起抗争，那么梅伊雷莱斯的竞选运动则使主要的萨拉查分子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以权谋私方面威信扫地。从那以后，由于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尖刻的批评性公报（这些公报又都是针对不可否认的具体事实），所以举国上下失去了对萨拉查当权者们（和他们的最高首脑）的尊敬。人们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了解他们内幕的人这样描述：这是一个毫无原则可言的特权集团，他们垄断了政权机器，以便确保他们的经济权利不被分享并进行肮脏的交易。几年以后，记者劳尔·雷戈以极大的勇气在他的书中揭露了政治和经济这两种权力互相渗透的丑闻！

萨拉查确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看重金钱的人。也确实没人看到（或知道）他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人们只知道他是佩内东多金矿的股东，是“科英布拉出版社”的业主和创始人之一，这个出版社经常出版他的演讲，政府机关成千上万册地购买后广为赠阅。总之，他深居宫中，从未想过要放弃权力，那么要钱有什么用呢？事实是，不管他本人是否感兴趣（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公断），他都无法逃脱鼓励一个“吞食公款集团”的疯狂发展的罪责。这个集团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成一个盘根错结的严密的政治——经济关系网，全面摧残着国家的生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萨拉查在政治上消失之后。

金唐·梅伊雷莱斯只有短短的15天的竞选宣传，并受到特

别限制。然而，即便如此，也足以使当局遭受巨大的损伤。在里斯本，他只在靠近阿雷罗加的“纪念馆”举行过唯一的然而是令人难忘的竞选宣传。在波尔图却连一次也没有举行。由于当局施加压力，甚至不能找到一个有足够胆量的人为举行竞选集会提供一个公共场所。在全国，镇压机器象往常一样完全阻止了竞选宣传品的发行。它给候选人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在1951年7月向全国发表的宣言中，金唐·梅伊雷莱斯解释了他退出竞选的原因（同样的原因曾导致了诺顿·马托斯将军退出竞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不与欺骗为伍”！他的痛苦的结论是：“国家将有另一位被任命的元首，但是我们不会与他合作！”

克拉维罗·洛佩斯“竞选”之后，各反对派进入了一个令人窒息和极可悲的低潮阶段。直至1958年，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的竞选运动开始以后，反对派才真正结束了这个时期。

在全国享有极高声誉的独立派人士，如：安东尼奥·塞尔吉奥、阿泽维多·戈麦斯和贾伊梅·科特桑（从巴西回国定居）以及大城市中主要同自由职业人士有联系的团体力图点燃反政府的“圣火”。但是，反对派作为一种有组织和有行动的力量实际上已经解体了。共产党有一批非法的政治工作人员。面对残酷的镇压，它在相互矛盾的政策之间举棋不定（先是被指责为“左倾宗派主义”，之后又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所以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共产党对政府已不构成任何危险，劳动阶层似乎只是沉浸在黄粱美梦中……

就个人角度来说，1951年至1957年是我收获最大的年代。我静静地进行了理智的反思，回顾了工作情况并整理了思想。解脱了政治上的束缚以后，我对这些年的指导思想翻箱倒柜地进行了思考，对所有问题都重新加以考虑。1951年我从文学系毕

业。毕业前一年，我提出的“关于特奥菲洛·布拉加及共和思想起源”的论文遭到了文学院遗老们(德利奥·桑托斯一伙人)的尖刻批评。1952年至1957年，我就读法律系，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多年来，因为我没有毕业证书，所以不能任教。为了维持生活，我必须找新的出路。“毕得”迫使我攻读法律，间接地给了我一份我原来想干的工作……

我深深地爱上了公共事务，认为尽自己的可能参与公共事务是道义上的职责。为了找到在葡萄牙可行的解决办法，而又不超越国际形势的限制，我开始具体研究我国的问题。我努力想超出理论研究的范围。这种理论就象事先架设好的扶手一样多次保护我去应付各种局面。

我认为萨拉查主义是阻碍进步的最反动的痼疾。然而，它象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堤，一堵坚不可摧的城墙阻挡着所有反对派所进行的努力。为了战胜萨拉查主义，必须完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考虑反对派的战略，找到一种灵活的行动方式。为此，必须考虑政府的内部机制。在我学习文学的年代，“进步人士”鄙视法律，因为法律是“最反动的人才学的专业”。但是法律专业却给了我一些有用的武器。

当时，我在政治上是非常孤立的。所以，我着眼于未来，努力和志向相同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建立一种经常性的会晤、聚会和对话。“共和派抵抗组织”便是在这些努力中诞生的！正如人们所说的，这是对葡萄牙的问题进行集体思考、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并研究如何把可能进行的活动纳入国家生活的最有效方法的开始。这些朋友是：曼奴艾尔·门德斯、费尔南多·皮特拉·桑托斯、古斯塔沃·索罗梅钮、拉莫斯·科斯塔。后来又有：若泽·里贝洛·桑托斯、特奥菲洛·卡瓦略·桑托斯、托雷·阿松桑(时间很短)、若泽·马加良斯·戈迪纽、费尔南多·奥门·菲格

雷多和欧里科·费雷拉。

如果葡萄牙有起码的自由的话，这个持不同观点的集团很可能出版一份对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杂志(或报纸)。且不说那些在自己的生涯中受到影响较少的人，就说曼奴艾尔·门德斯和皮特拉·桑托斯吧！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特殊的才能。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将成为不同风格的政治记者。但是由于法西斯的黑暗政权同我们作对，所以不可挽回地使最优秀的人才变得毫无用武之地。这个组织的活动仅仅是秘密发行一些分析形势的文件，这些文件常用的标题是"共和派抵抗组织"。除此之外，还发行一系列主要是由曼奴艾尔·门德斯写的小册子，标题为"为了一场快乐的运动"。这些小册子以它尖锐的批评，诙谐的语句和高尚的道德观念，足以同埃萨及拉马略·奥尔蒂冈的作品相媲美。在这些小册子中，不能不提到赫鲁晓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揭露斯大林主义的"报告"。早在1956年，曼奴艾尔·门德斯已预言，假如萨拉查立刻死去，马塞洛·卡埃塔诺将在某次全国联盟党代表会上揭露萨拉查主义的错误和罪行。这确实是一篇诙谐幽默的文章，现在仍值得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共和派抵抗组织"只不过是一群联系密切、关系牢靠的朋友而已。他们共同分析国家生活的演变，但采取行动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些人虽然在政治观点上不完全吻合，但是对国家的未来、特别是对共产党行动的批判性分析、对共产党没有能力成为打倒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以及对重新确立一个摆脱僵化模式的左派的急迫性等等问题的看法、观点却是相同的。

由于种种原因，"共和派抵抗组织"在理论上比人们期待的要差，但在实践活动领域内却有重要的影响。

大约在1956年，我接受了阿当·席尔瓦多次发出的邀请，

代表“小组”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当时，“领导委员会”主要是三位在葡萄牙民主派中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马里奥·阿泽维多·戈麦斯、贾伊梅·科特桑和安东尼奥·塞尔吉奥。其他成员还有从1945年开始就制定合法政治斗争路线的人，他们曾是民主团结运动的中坚分子。库尼亚·列阿尔工程师当时还未参加这个“领导委员会”。

这一时期，我与贾伊梅·科特桑、安东尼奥·塞尔吉奥及马里奥·阿泽维多·戈麦斯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有比我们高得多的无可争议的威望和文化修养，得到我们极大的尊敬。多年前，即从民主团结运动和诺顿·马托斯竞选开始，我就结识了阿泽维多·戈麦斯和安东尼奥·塞尔吉奥，我们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我同阿泽维多·戈麦斯在政治上经常看法一致，而当时同安东尼奥·塞尔吉奥曾有些分歧。但是，这丝毫没有降低我对他的钦佩。从1956年到1959年(即3月11日“未遂政变”，他曾对这次暴动坚信不已，因此它的失败在心理上打击了他)，在政治上，我同安东尼奥·塞尔吉奥保持住密切关系。我从他那高尚的公民典范和民主作风中得到莫大的教益。关于在巴西避难多年的科特桑(他在西班牙战争后，先被葡萄牙监禁，随后又逃往巴西)，可以说只是在此时，在日常的交往中，我才真正了解了他。从他们三位那里，我得到了引以为骄傲的友谊。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值得自豪的事，那就是我始终受到他们这几位伟人的完全信任，并在最后的年月里成为他们最亲密的合作者！

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特殊作用限于：评论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决策，明确地向共和国总统陈述意见，这些意见往往是非常受尊重的。我们每次都借助宪法(第8条、第18条)赋予的陈述权，力求避免时时萦绕在我们脑际的警察镇压的干扰。正如后来德尔加多以轻蔑的口气说的那样，它是“一场小小的笔墨官

司”。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在前景暗淡的时刻，这场“笔墨战”却是抵抗运动存在和活动的标志。对这些人能做的最严厉的批评只不过是：这些文件发行量很少（因为没有一家印刷厂敢于印刷，所以只能用复印机印制），仅仅能使极少数人看到，而这些读者并不十分需要它，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懂政治的人。这个缺点不在于文件本身或领导委员会的行动，而在于法西斯的存在。当局的拿手武器是使对手保持沉默，让那些支持法西斯政权，并且深知人民对政治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对我们兴师问罪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领导委员会的文件只起了形势见证者的作用，而没有为有效地改变现状作出任何贡献。

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按年代顺序讲述历史事件。

在1953年和1957年，先后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民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在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国民议会的“选举”没有激发全国民众的兴趣。在这些“选举”中出现了一位有趣的独立派人士平托·巴里加众议员。他过去自称是反对派，后来却大声疾呼国家应“再次萨拉查化”，好象过去萨拉查在国家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希德·桑托斯教授在有关自己的计划问题上就饱尝了被政府完全欺骗的痛苦，深知为改变制度的努力——即使是有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是希德·桑托斯教授取得的令人沮丧的经验。在作为议员的最后一天，他谴责政府在公共卫生保健这个重要领域向他作的许诺缺乏诚意，没有信守这些诺言！他体面地结束了自己的议员任期。

1953年，在里斯本、波尔图和阿维罗选区，公布了反对派的竞选名单。这些名单主要由具有自由倾向和保守倾向的民主人士组成。里斯本名单上的主要人物是库尼亚·列阿尔工程师。由于过去反对派在投票前一刻放弃竞选的政策，多次受到批评，因

此这次力求坚持到底，即使没有获得自1945年10月就一直坚持要求的起码条件。选举结果显然令人失望。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反对派总共只获得全部登记选民投票的十分之一！

1956年，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学运，即抗议1956年12月12日第40900号政令的活动。这项政令借口整顿校园内的活动，进一步限制学生联合会已经很小的自由活动范围。学生联合会长期以来面临着极端困难的生存环境。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佛朗西斯科·莱特·平托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他思想上的"框框"的确比他的科英布拉大学的同窗、前任教育部长们要少。这次"动乱"暴露了葡萄牙大学内潜在的不满和危机。与部长们的意愿相反，它使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政治上觉悟了。经过国民议会讨论的政令下发给协议厅征求意见（1957年8月），但是再没有在国民议会重新讨论。由于学生们的反对，它就这样被官僚体制埋葬了。

1957年的形势比1953年还要糟糕。反对派匆匆抛出的竞选名单未能引起选民们的任何兴趣。所作的宣传仅是最低限度的。由于政府以厚颜无耻和狡猾的手段设置了种种障碍，候选人在最后时刻被迫放弃了竞选。又一次弃权！

这便是50年代到1958年翁贝托·德尔加多将军竞选运动前，国家和反对派的悲惨景况。政府方面表现得十分强硬和自信。萨拉查在取得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宽容后，终于使他的代表在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其它国际组织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这一时期内，奥古斯托·卡斯特罗每天都在《新闻日报》上无耻吹捧萨拉查，说什么他给全世界上了一课！……的确，事实说明他在国外不仅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反而每天都接受突如其来的敬意。这是重要人物频频来访和重要国际会议不断在里斯本召开的时代。玛格丽特公主来访之后，英

国女王、艾森豪威尔将军、苏加诺、海尔·塞拉西、小卡费、库比切克总统、佛朗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舰队也相继访问了葡萄牙。在国内，反对派被剥夺了组织和宣传的手段、特别是由于内部纷争和威望降低，已不能对政府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仅仅证明它仍然存在，没有屈服而已！正如皮尔卡多后来说的那样，它采取了"恰到好处的方式"埋下了"内在的仇恨"，因为不应该忘记，警察总是随时准备偷偷地逮捕最坚强的人，把他们置于不能再制造麻烦的境地。为此，警察拥有一座合法镇压的武器库和强有力的调查手段……。

怎样有效地同"萨拉查主义"进行斗争呢？通过革命道路吗？夹在法西斯的西班牙和已变成了美国内湖的大西洋（最好不要忘记是杜勒斯和麦卡锡的美国内湖）之间的主张革命的党派，接受了共产党的理论，以抑制该党的"狂热"，因为向"帝国主义发动最后攻击"的时机还未成熟。还有另外什么东西能代表"全国人民反法西斯起义"的主张吗？人们只是把这种主张当做将来的、遥远的、完全抽象的事情来谈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壮举发生在1959年！它打破了假革命的盲从主义的传统格局。

对于"亲大西洋派"来说，准合法性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为那些毫无结果的暴动作掩护罢了（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种鼓励），他们从未放弃这种活动。自1926年起，这股潮流尽管屡屡遭到失败，但是实际上从未放下武器。多年来，那些狂热分子、职业革命家和盲动分子们一直在筹划一场实际上毫无准备的、轻率的所谓"暴动"。惨重的牺牲完全破坏了他们的生活和家庭。这是对"建立美好"生活的讽刺（或者说是有益的劝告！）。例如卡洛斯·维列纳（一位可敬的好人），他被监禁和参加失败活动的次数是创纪录的，从而成为反抗运动和人民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象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独裁的“密谋活动”简直成了失望的坟墓。50年代，在持不同政见者大卫·内图、马里奥·佩索阿、莫雷拉·洛佩斯、卡瓦略·席尔瓦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人，海军上将卡伯萨达斯和莫列拉·坎波斯司令是他们的幕后支持者。

从50年代到翁伯托·德尔加多竞选运动，有一位新人脱颖而出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了萨拉查的头号敌人，他就是恩里克·加尔旺上尉。他曾是殖民地的行政长官和检查官、众议员，原国家电台台长、富有才华的作家，在某一段时期又是萨拉查的“宠儿”。

有必要指出，在几乎所有的参加反对派行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背后，人们常常可以发现安东尼奥·塞尔吉奥耐心的争取工作。事实上，塞尔吉奥不仅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文人斗士，还是一个每天都在搞秘密活动的人。由于对1959年3月11事件的巨大失望，他的斗争生涯戏剧性地永远结束了。是他给活跃的反对派介绍了科斯塔·费雷拉和金唐·梅伊雷莱斯（也得到了卡伯萨达斯的帮助），介绍了许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积极地与萨拉查作斗争的保皇党人，如维埃拉·阿尔梅达、佩基多·雷贝洛、阿尔梅达·布拉加、伊波利托·拉波佐、罗朗·普列托，以及一些天主教人士，如阿尔维斯·科雷神父，维埃拉·卢斯和弗朗西斯科·维洛佐博士。是他介绍了恩里克·加尔旺和其后的翁伯托·德尔加多。他得到人们的尊敬是当之无愧的。

在军事法庭审理4月10日事件时，恩里克·加尔旺曾出庭为他尊敬的朋友卡洛斯·塞尔瓦仁上校辩护。我旁听了这次非常出色而令人振奋的辩护，因为这也是一次对我父亲的审判。正如我前面已谈过的那样，这不是一次非常容易的审判。当加尔旺结束辩护时，我听到他说：“我刚刚签署了我自己的判决书。萨拉

查将不会再饶恕我。”这是千真万确的！

除了这次公开地反对政府的行动外，他还做了另外一件更严重的事：他在国民议会作了著名的关于在安哥拉存在“奴隶式劳动”的讲话，他揭露的情况令人震惊。奴隶贩子、殖民主义者和在海外领地获得巨大利益的先生们不会再饶恕他。总之，他象其他人一样，立刻丧失了众议员的地位……

在金唐·梅伊雷莱斯竞选运动期间，恩里克·加尔旺第一次公开地站到了反对派一边。竞选班子当时拟定的某些措辞异常激烈的公报就出自他的手笔。来自政府的恩里克·加尔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过去的朋友们，从骨子里了解他们的腐败和弱点。他揭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因此他们决不会饶恕他……

竞选结束后，恩里克·加尔旺仍不肯罢休。事实上，在竞选期间，他已开始了他的“反叛活动”。当时，人们传说着一件有关加尔旺的著名文件夹事件。文件夹在梅伊雷莱斯的竞选办公室失踪了两天。夹子里刚巧有策划中的暴动计划。后来，当恩里克·加尔旺被捕的时候，“毕得”把文件夹中的部分复印件附在了起诉书中。在法庭上，加尔旺以人们熟知的胆略为自己辩护，他说这纯粹是为了想写一个剧本而进行的虚构……

恩里克·加尔旺的狱中生活和冒险（如几年后，他那令人震惊的越狱之举）为反对派这段暗淡无光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对他的审判也是我一生中所看到过的最不平凡的一幕！加尔旺有很多极为严重的缺点，但是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具有葡萄牙祖先冒险精神的人物。

他被判了多年的徒刑。在里斯本的感化院，他利用监狱的服务，策划了一起“阴谋活动”，拟定了揭露当局丑闻的宣言书。后来，全国都悄悄地评论这份宣言书。但是，他的“冒险”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被发现以后，他和他的助手们被转移到卡西亚斯监

狱，之后又被转到贝尼塞监狱。他在这次向公众讲明真相行动中的主要合作者——感化院的看守长——却经受不住警察的压力，自寻短见了。

与此同时，曾在美国和加拿大任过职的葡萄牙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被任命为萨拉查政府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官。美国的民主生活使他感动不已（就象他后来说的那样），他想到了远方自己那可怜的、正处于世界上“最古老的独裁政权之下”的祖国的命运。他的朋友恩里克·加尔旺的案件特别使他受到伤害。他很快回到里斯本，以一名葡萄牙军官当时少有的勇气到卡西亚斯和贝尼赛监狱看望了恩里克·加尔旺，并通过他和安东尼奥·塞尔吉奥交谈过多次。这位独特的将领就是翁伯托·德尔加多。

下面我们还会谈到他。

·7·

翁伯托·德尔加多现象

独立派候选人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从他的首次波尔图之行胜利归来的时候，里斯本的大街上聚集着30多万拥护他的欢迎群众。当时，有人秘密散发的共产党的《前进报》称他为“可口可乐将军”和“法西斯分子”。

这时，几乎还没有人认识这个在国内生活中初露锋芒的非凡人物。对大多数人来说，翁伯托·德尔加多只不过是一位来自法西斯阵营的葡萄牙现役将军。但是，他接受了反对派（又称独立派）的候选人提名，表现出了反对政府的罕见的勇气。他在古老的“金钥匙咖啡厅”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独裁者萨拉查时说：“假如我当选，我将解除他的职务”。

这短短的一句话使他赢得了举国上下几乎一致的同情。而他的一些不老练的顾问们曾竭力劝阻他这样做，但他仍不顾一切的这样作了！对他的政治前途起决定作用的更重要的两点是：他是将军，能立刻得到军队的支持；另外他是在美国担任过葡萄牙武官后回国的，可以立刻得到美国人的信任。

这两种情况在心理上有巨大的意义。葡萄牙人，有着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的黑暗的过去，失败和暗淡的前途使他们厌倦不堪。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萨拉查的“选举”。恰恰相反！直到当时，所有的“选举”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当一位将级军

官成为候选人，并可能得到军队的支持时，事情将会大不一样。这次竞选的规则极有可能受到尊重。假如美国人如同推测的那样支持这次“行动”，那么竞选规则得到尊重的可能性确实会迅速增加。在战后，不正是西方民主的背叛才挽救了萨拉查吗？在50年代初期，不正是那场目前显然要死灰复燃的冷战决定性地巩固了萨拉查的政权吗？

共产党愤怒的抨击这位将军——“远征军团”的前首领，这样就给了将军一张王牌。这些批评反而促使一般人认为(确切地说是感到)，这次事情可能会是严肃的。因此几乎可以得出结论：很值得干到底。斗争可能将是决定性的。这还是第一次……

我认为，翁伯托·德尔加多的竞选初期成功的原因正在于此。自然，还有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德尔加多第一次向全国亮相所表现出的那种坦诚和勇敢的神态使他当之无愧地得到“无畏将军”的称号。他在竞选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美式现代风格以及几乎是挨家挨户地寻求与选民接触的作法，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热情。这使萨拉查多年后还暴跳如雷，称他是“一个真正的煽动天才”。

有趣的是，政治总参谋部可能是最后理解德尔加多现象的。这一现象完全超出了传统格局。人民很快感到了这一点，并本能地为它欢呼！

我记得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的下午6点钟左右，当德尔加多从波尔图归来时，皮特拉·桑托斯执意要我一起去迎候他。我去了，但我现在应该承认，当时没有很大的热情。我们商定在阿奥古斯大街拱门会面，然后再前往圣阿波洛尼亚车站。在我们等候其他前来欢迎翁伯托的朋友时，我们看到人们突然朝市政厅广场方向涌去。我问道，这是些什么人？简直不能相信(也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没有预先的准备、没有组织计划、没有号

召，成千上万的人真正自发地去迎候翁伯托·德尔加多——这位前几天还不为人们所知的人物。然而这是事实！

后来，我才知道国家电台当天下午已向公众反复播发通告：不准举行示威游行，否则，将受到严厉的镇压。这时政府已知道在波尔图发生的事情。德尔加多的到来掀起了民众不可抑制的狂热浪潮。面对这个浪潮，政府的反应是恐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里斯本发生类似事件。但是，在里斯本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在波尔图发生的事件。国家电台发出的紧急通告反而导致了游行示威……这是战后我看到的最壮观、最浩大、最令人感动的群众游行。

事后有人说：假如能很好地引导这次游行，并且能有明确的目标，那天可能会成为萨拉查主义的末日。但是，没有！它完全是一次自发的示威游行，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到哪里去，甚至不知道如何对付警察的镇压。

当德尔加多在少数朋友的陪同下到达圣阿波洛尼亚的时候，车站里已没有民主人士，基本上被国民警卫队、保安警察和"毕得"分子占据了。拉莫斯·科斯塔是少数几个进入站台的人。他讲述了铁路员工，特别是那些办公室人员如何突然在车站内集合，霎时挤满了站台，"毕得"分子淹没在人海之中。

外面的民众无法靠近车站。他们被挡在远处无法前近，实在无能为力。后来，警察把德尔加多带往与正常路线不同的通道，避开群众，朝"主教井"方向走去。这也许是德尔加多将军在竞选运动中少有的软弱行为之一：按照警察的命令、乘上他们事先准备的一辆汽车。当时阿卡西奥·戈维亚也在场，他已为德尔加多准备了一辆敞篷汽车，打算把这位候选人通过闹市区送到设在自由大街路口、靠近自由剧院的竞选总部。他一直为丧失这次时机感到遗憾。他的遗憾是有道理的。翁伯托·德尔加多莫名其

妙，他并不知道成千上万的群众在等候他。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一直陪着他，在那种一触即发的时刻，这一定给他的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当时同费尔南多·皮特拉·桑托斯和曼奴艾尔·门德斯在一起。还有其他什么人，我不记得了。我们也未能通过海关区，因为实在无法冲破拥挤的人群，挤进圣阿波洛尼亚车站。我们立刻意识到可能发生了某种事故，但是，我们不能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尽管群众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特别的谨慎，但是，等候的时间太长了。人群中传播着种种相互矛盾的谣言，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该干什么而惶惶不安。德尔加多没有来吗？或是到达后被捕了？人们疑虑重重。

等啊，等啊，漫长的等待令人不可忍受。一些失去耐心的人开始呼喊："到总部去！""到总部去！"由于远处涌来的压力，队伍开始转向罗西奥。由于我们原来站在最后，自然变成了游行队伍的前阵。整个奥古斯塔大街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人海。人海秩序井然，一点不乱。他们兴高彩烈地、激动地唱起《葡萄牙之歌》，高呼自由和德尔加多万岁。临街的窗口挤满了人，他们情不自禁地向游行队伍致意。这种惊喜之情象导线一样连结着所有的人。我看到了埃利奥多罗·卡尔德拉（我们亲爱的小卡尔德拉）从他办公室的窗口激动地挥手和欢呼，后来突然昏倒了！当游行的人群快到位于奥古斯塔大街尽头的梅亚斯商店的时候，聚集在罗西奥的警察部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射向商店的橱窗和附近建筑物的窗上。玻璃炸成了碎片。之后，国民警卫队骑着大马向不知所措和手无寸铁的人们冲击。出现了难以形容的混乱场面！人们推搡着向四面八方逃去、有人跌倒了，有的人对天祈祷。警察和示威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结果是许许多多工人受伤，有些人伤势严重。

可以说，翁伯托·德尔加多在里斯本的竞选运动是在民众的热情、广大群众（他们突然被拖进一场政治斗争）的爱国献身精神和政府的暴力（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暴力，因为暴力是恐惧的产物。）下开始的。

这位震动波尔图和里斯本，乃至全国人民心灵的将军和总统候选人是谁呢？如何博得反对派的敬重（1958 年春天，反对派正处于其漫长历史的最低潮），使它重获生机并成为一个第一次使政府处于困境的规模如此巨大的群众运动呢？

我第一次听说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是在他参加竞选很久（一年或两年）之前。我一位朋友的女儿——同德尔加多的女儿是中学同学，在家里问他的父亲，谁是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我的朋友自然询问女儿这种好奇心的理由。女儿回答说："我的朋友说，她父亲从美国回来后将成为我们未来的共和国总统！"

我不知道这是一次偶然的巧合，还是孩童的一种想象。我可以断定的是，我的朋友们和我都很重视这种设想。我们从那以后开始密切注视着德尔加多将军的活动，因为我们认为他当时与我们的立场是对立的……

在我们看来，他的经历并不辉煌。他是空军的高级军官，有着十足的军人气质，升迁的速度是惊人的（他是当时葡萄牙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因此他的坚定的亲政府政治态度是不足为奇的。除了他的某些著作，如那本反对变革的荒谬的小册子《论空想家的悲惨命运》和《远征军军官指南》外，他的"葡萄牙青年"和"远征军团"的经历，都是有力的证明。熟悉他的人，如马丽亚·英格列斯（他的文学系的同窗）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卤莽轻率，有时虚荣得可笑，专横跋扈而又非常自负。他是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他的某些态度是如此令人意外（或者说是反常）以至引起人们一致的保留。也许因此他需要在行动上博得人们的尊

敬。然而，他没有实干精神……在持续动乱，有时方式又激烈的情况下，德尔加多这个人总是持观望态度，再加上他的法西斯政治经历，所以很难使民主人士对他产生好感。

同时，翁伯托·德尔加多也是一个品德高尚、勇敢、有自信心和人情味的人。但是，大多数人当时对他的这些品质很少了解。

在大战期间，他与他的大多数战友相反，是一个虔诚的亲英分子，为盟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之无愧地赢得了英国人授予的一枚勋章。这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面，有助于人们理解他将要迈出的步伐。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德尔加多在战时经历的一次啼笑皆非的偶然事件，因为这件事揭示了他的整个人品。在经过“远征军”的驻地亚速尔群岛时，他象所有人一样，发现军团司令拉米雷斯将军不十分理智。人们记得，当时亚速尔对葡萄牙来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当时，德国人加强了“潜艇战”，以切断来自美国和英属国家向英国提供武器和其他重要原料的供应。可怜的拉米雷斯将军被敌人可能在亚速尔联合登陆的假设弄得晕头转向，草木皆兵，因而超越常理，加强了战备、警戒、夜巡逻、不断发布命令并让部队处于严格的戒备状态。他这种四面楚歌、草木皆兵的神经质也使他的部队处于真正的病态中。一天，天气晴朗。黄昏时，一名哨兵听到可疑的脚步声，并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影子。他喊了一声：“不许动”！由于这个影子继续前进，他便开了枪。这是预定的行动命令！紧接着是密集的射击、全岛警报大作。防御敌人进攻的秘密计划开始实施。参谋部进入了准备好的掩体。对亚速尔的“入侵”开始了！全岛的部队都勇敢地进入阵地。但是，当太阳升起时，残酷的事实是：想象中的敌人原来只不过是一只没有服从最高指挥部命令的母牛！

一阵善意的、自嘲式的开怀大笑传遍了周围的岛屿，笑声评述了那天晚上可笑的战果。显然，军队司令已失去理智，使部队处于近乎疯狂的恐惧状态。因此，需要尽早向里斯本报告。但是，谁有胆量承担这样的责任呢？特别是，这是一个微妙而又无法预料后果的军事问题。大家象往常一样缺乏勇气！众所周知，别人的懦弱和犹豫往往助长自己的怯懦——害怕承担责任……

这个许多人熟知的故事是当时在亚速尔服役的军医卢西亚诺·塞朗·莫拉告诉我的。当时被动员参军的米勒·格拉教授也同样知道这件事。

翁伯托·德尔加多因公务从美国回国，途经亚速尔时偶然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勇敢而毫不犹豫地向里斯本政府揭露了此事。为此，他几乎受到军事委员会的审判。但是，桑托斯·科斯塔部长作了慎重的调查后认为还是不再提此事为好，因为他得出结论，德尔加多这样作是绝对有理由的。

正如我前面谈到的，翁伯托·德尔加多和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的关系是德尔加多还在华盛顿任武官的时候开始的。他们的交谈不是毫无结果的空谈，也没有停留在惯常的对萨拉查政府的批评上，而是立刻进入了非常实际的、直接的方面。总之，德尔加多不是那种仅说说而已的人或仅限于有批评意见而不采取行动的人。正如已经证明了的，他是行动迅速的人。他们多次会面，通常总在爱德华多·费格雷多在里斯本的一套小公寓里。我们这一派里，无论是欧里科·费雷拉还是特奥菲洛·桑托斯都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并把主要情况通报给我们。

另一方面，德尔加多探望当时监禁在贝尼塞监狱里的恩里克·加尔旺以及他对政府的毫无顾忌的批评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对此，萨拉查本人可能已有所闻。萨拉查非常知人善任，但是他并不太了解德尔加多，尽管多年来德尔加多是他亲密的合作

者。他对德尔加多运用了惯常的并多次行之有效的方法：极力收买他！萨拉查的企图已昭然若揭……在开始考虑加宽波尔特拉机场的跑道以供喷气式飞机使用时，萨拉查居然任命德尔加多担任民航总局局长！这是一项肥缺！这难道不是消除德尔加多政治野心的最好安排吗？

尽管德尔加多有某些缺点，但他有经得起考验的基本品德：一个道德完备的人，绝不被物质上的贿赂所诱惑！所以他对萨拉查的姿态无动于衷。尽管他占据了令人忌妒的位置，但他的情操没有变。为了反对派的政治宣传，欧里科·费雷拉曾去民航总局把德尔加多从美国秘密带回来的最先进的自动复印机搬走……

正如人们所知，反对派开始并不是想在政治运动中利用翁伯托·德尔加多，而是想以他为中心发动一场革命的军事政变。他的立场那时已经很明确：他认为政府过去的全部优势已荡然无存，已成为国家进步和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所以必须搬开它！由于这个仅仅靠武力支撑的政府不接受民主竞赛规则，因而必须用它自己的武器即暴力同它进行斗争，因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把它推翻。翁伯托·德尔加多是武装部队的重要成员，正是军队造就了他。他在军界联系很广，而军队那时对令人憎恶的国防部长桑托斯·科斯塔又强烈不满。尽管德尔加多没有足够的威望把陆军和海军拉到自己一边，但是人们指望他的活动能力和决断精神有效地集中军队中广泛而潜在的不满情绪。

同时，随着总统选举日期的临近，反对派开始行动起来。尽管自1949年开始，候选人必须事前由国务委员会（由大多数当权者组成的政府最高机构）宣布有被选举权才能参加选举，但是选举将以直接投票方式进行。

政府同样遇到了困难。克拉维罗·洛佩斯象卡尔莫纳一样，在结束总统任期前同萨拉查发生了冲突。这位有正义感的人缺

少思想，但是对自己的决定很认真。他认为有义务要求尊重他行使职权的尊严。这往往不符合萨拉查个人政府的切身利益和习惯。显然，克拉维罗·洛佩斯将不会再连任，因此在支持政府的派别之间展开了一场旨在扩大各自影响的严酷的斗争。出现了许多可能继任总统的人，如萨拉查的朋友、科英布拉大学的老教授若泽·阿尔贝托·雷伊斯；国民议会的几乎终身议长阿尔比诺·雷伊斯；殖民地事务部长萨尔门托·罗德里格斯海军上将；前内政部长、最高行政法院院长特里戈·内格雷罗斯等人。当时的总统府部长马塞洛·卡埃塔诺也加紧活动以便让萨拉查出马竞选。如果萨拉查能放弃至高无上的"元首"形象，这将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他的"元首"形象与这种解决办法是不能协调的。各派别间的争斗加剧，激烈的对抗在幕后展开。而这一时期，这种对抗主要表现为桑托斯·科斯塔的追随者与马塞洛·卡埃塔诺的追随者之间的斗争。然而，象往常一样，除了萨拉查外，没有任何人真正地心中有数。因为保密到最后一刻的最终决定绝对只能由萨拉查一个人知道，别人是不能染指的。最后，出其不意地选定忠于他的海军部长阿梅里科·托马斯为候选人，因为此人是个毫无朝气的平庸之辈，对他绝对无条件地服从！

反对派方面感到有必要推举一位不仅有能力团结所有反对派（假如有可能！）而且可以分裂对立派的候选人。各种反对派势力之间开始广泛接触，相互摸底，共同商讨候选人，并多次作为试探气球提出候选人名单。

葡萄牙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十分孤立，极力寻找"所有反对派的唯一候选人"。为了达到目的，它准备作出最大的让步。1957年立法"选举"时曾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有许多独立的民主人士，如克鲁斯·费雷拉、曼奴艾尔·塞尔托里奥、曼奴艾尔·卡洛斯、康斯坦蒂诺·费尔南德斯和其他人。

共产党力求通过这个委员会探讨推举候选人的可能性。通过不断的努力，终于确定了库尼亚·列阿尔工程师。在这一选择过程中，若昂·瓦伦特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当时是共产党员，若干年后成为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人民行动阵线"的领导人。许多年后，他因此被里斯本法庭判处多年徒刑。

说明一下如何出现库尼亚·列阿尔这个名字是有趣的。几年前，他还是反对派中真正的"孤立分子"。后来，在全国民主运动时期和在为卡斯特洛·布兰科竞选时期，他受到共产党严厉地批判。共产党在其机关报上指责他是一名"反动分子"和"法西斯的同谋"。

库尼亚·列阿尔工程师忠诚地与独裁政权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是一位令人生畏的雄辩家和思想上的煽动者。他的这种形象是不容置疑的。毫无疑问，他的声望在梅伊雷莱斯竞选后的年代里大大提高了。在保守的反对派里，他可能是唯一的能有效的对抗萨拉查的人物，因为他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经验，政治上训练有素。他在"索纳菲"及"煤气和电力联合公司"等大会上对经济的批评性发言，他的切中时弊的著作《安哥拉钻石公司传奇》和《经济实力的远征》，他同无力与他匹敌的一些当权者的论战(如他同马塞洛·卡埃塔诺进行的关于任命前部长和高级官员到大公司任肥缺的论战。由于论据确凿萨拉查不得不同意在《里斯本日报》上发表，据说这也是向他的此时已过份独立的部长发出的警告!)，这一系列事件都增加了库尼亚·列阿尔的政治份量，给库尼亚·列阿尔的名字增添了光彩。但是，左派仍强烈地反对他。由于他在独裁政权以前和独裁政权建立之后的所作所为(例如：在《新天地杂志》初期，劳尔·普罗恩萨的文章就强调了这些责任)，他在传统的反对派中所造成的对他的戒心还没有全部消除……例如，当出现提名库尼亚·列阿尔竞选的设

想时，他的最顽固的批评者之一曼奴艾尔·门德斯非常愤怒地说："如果这种竞选提名再继续下去，我要向公众散发一本我编辑的普罗恩萨文集，并加上一个醒目的标题《啊，卫兵！》

反对派的其他阶层也对库尼亚·列阿尔的品格持保留态度。所以，共产党充当库尼亚·列阿尔参加竞选的最热心的或者说是坚定的支持者，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原内阁总理无疑是一位精明而又极有经验的政治家。他绝不会同意充当仅仅是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因此，他开始对接受参加竞选提出了种种条件。当证实他的竞选资格没有被一致接受的可能性时，他便以健康为理由婉转地拒绝了。律师克鲁斯·费雷拉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复杂的谈判。因为对取得的结果感到沮丧，他便给报社写信声明，从此再不参加政治活动。

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坚决反对提名库尼亚·列阿尔参加竞选的建议。这在当时起过重要的作用，并使列阿尔政治上忠实的朋友努诺·桑托斯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的论点得到坚决拥护，并渐渐地在人们的脑海中有了市场。他认为，挑选候选人应符合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军人，以便军队在必要时担保进行公正的选举；第二是政府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以便团结那些已醒悟的当政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仍在政府里占据着重要的实力地位。尽管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的推荐一位一贯的反对派民主人士作为候选人的论点在委员会内未获得一致同意，但人们认为，这样的候选人非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里的三个重要人物莫属。由于安东尼奥·赛尔吉奥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人的意见并对被提名不感兴趣，以及阿泽维多·戈麦斯再次自愿在朋友中隐退，所以委员会大多数人(包括我)的呼声都倾向于贾伊梅·科特桑参加竞选。

我们在继续叙述导致提名翁伯托·德尔加多参加竞选的事实之前，有必要简单地就贾伊梅·科特桑这个人物讲两句话。

经过在巴西的长期流亡之后，科特桑于1955年左右回国并在葡萄牙社会中占据了本应属于他的高位。塞尔吉奥、阿泽维多·戈麦斯和卡马拉·雷伊斯（科特桑后来由于《新天地杂志》奇怪的帐目问题同他们三位反目）热烈地欢迎他，甚至公开承认他在政治上的优势。他被誉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其威望在这块圣十字的土地上更加光彩夺目。外国尊崇科特桑为葡萄牙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比他的同胞获得了更多的荣光。他的一大批著作的不幸处境可能是造成他知名度不高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的这批著作当时还没有出版，在葡萄牙还不为人们所知。另外一部分显示其特殊才华的杰作，如《葡萄牙形成中的民主因素》，那时已在全国发行。但是所有关于葡萄牙大发现和海外扩张阶段的那些极其丰富的原始调查材料，当时在我国还鲜为人知。

贾伊梅·科特桑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而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除了是历史学家以外，还是杰出的作家、诗人、剧作家、杂文作家，特别还是一位随时准备投身于公众事务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从“鹰”和“葡萄牙复兴”直至“新天地”和葡萄牙作家协会，他对葡萄牙社会和文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是《新天地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直到逝世一直都是葡萄牙作家协会的主席。自学生时代起，他就是共和党人，积极参加了1907年的罢工，曾任波尔图民主党派议员，是葡萄牙参加第一次大战的鼓吹者。那时候，他是葡萄牙远征军的军医，并在弗兰德雷斯前线受了重伤。回到里斯本后，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并是著名的“图书馆派”的骨干分子。他的共和主义思想很快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由于这个原因，他象所有“新天地派”一样，卷入了与“新的老共和派”的冲突。“新的老共和派”在宗教方面是激进的，在

社会问题上是保守的。它在葡萄牙“军事独裁”前的年月里，尽管历经曲折，但仍很有活力。阿尔瓦洛·卡斯特洛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长，以便建立一个真正革新的政府，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但是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安东尼奥·塞尔吉奥，自己担任了属于该部的“新天地”的代表。马里奥·戈麦斯任农业部长，里贝洛·卡瓦略任国防部长，埃泽基埃尔·坎波斯任经济部长。他们同样也是“新天地”的代表。贾伊梅·科特桑的公正无私和道德上的正直在整个“新天地”派内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威望。他在“新天地”里为葡萄牙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从“独裁政权”一开始，贾伊梅·科特桑便积极地参加了秘密活动。这些活动象持续不断的浪潮撞在坚不可摧的军队这块顽石上，破碎成浪花。他是1927年2月3日在波尔图爆发的叛乱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由于配合失误，暴乱直到当月7日才在里斯本发动。他逃脱了革命失败后警察的追捕，在国内转入地下生活，之后又前往西班牙避难。在那里，他从1931年开始便成为积极反对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鼓励者之一。他是阿萨尼亚、英达列西奥·布里埃托、桑切斯·阿尔博尔诺斯及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许多著名人物的亲密朋友。他同贾伊梅·莫拉斯、努诺·克鲁斯、莫乌托·平托和塞萨尔·阿尔梅达一起，建立了一个积极反对萨拉查主义(菩萨们)的秘密集团。这段历史是葡萄牙现代历史上最壮丽的一章，而新的一代对此毫无所知。西班牙内战把他禁锢在西曼加斯档案馆内。在那里，他继续进行历史研究工作。他渡过了战争的三年，始终站在争取共和政体合法化一边，积极地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也是葡萄牙人民的民主斗争。科特桑告诉我，巴塞罗那于1939年1月陷落以后，当佛朗哥在意大利坦克和德国飞机的掩护下粉碎了共和派所有的抵抗时，科特桑穿越了比利牛斯山脉。这使他象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样艰难地在达拉第的“民主”法

国寻求庇护，尔后被关进了集中营。关于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所遇到的悲惨情景（使人想到了在这年去逝的西班牙伟大的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经受的波折），科特桑在日记中曾有详细记述。这篇日记好象遗失了（他去逝前本想重新追记整理出来）。

当德国人于1940年入侵法国的时候，贾伊梅·科特桑象贝纳迪诺·马萨多主席、塞萨尔·阿尔梅达和其他一些在法国避难者一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回到了葡萄牙。他被捕了，在贝尼塞城堡度过了几个月。后来，由于勒令他到巴西去，才得以出狱。他和另一些避难者，如莫乌拉·平托、贾伊梅·莫拉斯、卡尔内罗·佛兰科、奥利维拉·皮奥、萨尔门托·皮门特尔兄弟等人前往巴西，直到1955年他最终返回葡萄牙。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但仍象青年人一样精神饱满，过着真正令人羡慕的快乐生活。他是巴西外交部授以桂冠的教授。他从流亡地带回的行李中有一部内容极其广泛、具有巨大科学价值的研究专著。他准备对这部著作进行最后润色。由于政治活动与他的生活和写作的深刻意义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他回国后仍是顽强的战士，以同样的热情关心着葡萄牙人民的命运。他上午工作，很早起床，一直工作到午餐。下午和晚上全部致力于政治和民众活动，参加会议或同朋友谈话（对此我终生难忘。）他是各种活动的推动者和主要的协调者，永不疲倦！

一天，我把《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领去采访他。这位见过许多人大物的记者采访后告诉我，在他的记者生涯中，贾伊梅·科特桑是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个。贾伊梅·科特桑是位模范人物，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是不容置疑的学术权威，坚持原则的政治家，“致葡萄牙青年的信”的作者。我们希望他成为反对派唯一的候选人。他将是自由共和的最好的总统！马里奥·卡斯特洛在专为科特桑回国出版的一期《新天地》专刊上写道：“人们很难反

对把他看作自由人民国家的第一任元首的想法”。确实如此！

总之，葡萄牙共和国几乎不是一个共和国(最好把它归类于一个没有真正国王的君主政体的国家之列。实际上，它有一个名符其实的、拥有上帝般权力的绝对君主，那就是萨拉查！)，更不是一个自由国家。因此，政治形势要求我们选择尽可能完美的候选人。他能很好地应付国家面临的困难局势，能指挥我们进行艰苦的竞选活动和分化政府。这顺应潮流的人物就是翁伯托·德尔加多。科特桑早在我们之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现在出现的带有偶然性的情况与候选人提名之前几个月里的情况全然不同。对于所有的政治团体都无一例外！因为翁伯托·德尔加多此时还没有证明，他的经历丝毫不能使人相信他作为反对派首领的非凡素质。

在各派举棋不定和不可避免地抱有敌对情绪的情况下，每派都极力推举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我记得在“共和派抵抗组织”中，曼奴艾尔·门德斯坚持推举两名候选人，即双候选人的想法。根据他的想法，两名候选人之间互有默契，在竞选中处于较好地位的候选人在最后一刻为了有利于另一候选人而弃权。也就是说提出两名候选人，一名象征着反对派的合法性(门德斯认为，这个候选人应该是爱德华多·席尔瓦。他过去是葡萄牙共和党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在波尔图深得人心，受到民众广泛的爱戴。他还是一个忠于民主思想和政治上诚实的人)；另一位要能够促使当权阵营的分裂和对立，并能指出使葡萄牙摆脱萨拉查主义造成的困境的可能的出路。按门德斯的标准，这个人应是翁伯托·德尔加多。

这种想法过分奸诈，不易使人理解和接受。但它表明了这个时代的困惑和犹疑。曼奴艾尔·门德斯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得

到不少同情，但也有人憎恨他。过人的聪明才智使他能以极其深邃的目光观察国家生活的某些问题。他如同艺术大师那样是一个有主见和灵感的人。除此之外，他在政治上尤其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即使在最不适宜的时刻他也从不放弃挖苦别人。他热衷于用特别刻薄的、漫画似的笔调歪曲事实。对他来说，朋友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并轻易地把他们看成他所崇拜的圣人，如本托·卡拉萨、布里托·瓦列恩特、阿基利诺·里贝罗、洛贝斯·格拉萨、凯尔·阿马拉尔及他周围一些亲近的雕塑艺术家。而对于仇敌（或者想象中的仇敌），他都严厉得不肯原谅别人最微小的过失。

当时，曼奴艾尔·门德斯结识了翁伯托·德尔加多，他明显地得到了德尔加多的信任，以至于门德斯的妻子贝尔塔·门德斯风趣地说："我的丈夫就象是马耶公园[①]剧场里上演的活报剧中的厨娘，一心只想着她的'大兵'……"

事实是他们两人之间政治上的和谐逐渐加深（德尔加多亲切地称曼奴艾尔·门德斯为"我的头头！"），在竞选运动中这种政治和谐变成了有决定性意义的合作。德尔加多许多重要讲稿几乎全部是由曼奴艾尔·门德斯起草的。德尔加多只对这些讲稿补充了"一些他认为是必要的内容"。

当里斯本还在讨论可能的候选人而又议而不决的时候，以阿图尔·安德拉德和阿图尔·席尔瓦为首的波尔图集团，通过安东尼奥·塞尔吉奥与德尔加多将军进行了接触，并建议他竞选共和国总统。德尔加多没有放弃他正进行的工作，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作为独立派候选人的提名。这样，所有的运动和反对派政治团体不得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

① 马耶公园（Parque Mayer）：里斯本市中心一个剧院、电影院集中的地方。

共产党和里斯本地区的一部分左派不同意这一解决方案。我再次说明,这一方案当时尚未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一系列戏剧性的会议上,特别是在葡萄牙旧劳工合作社举行的会议上,他们狂热地寻找一位替补候选人,因为库尼亚·列阿尔明确表示放弃竞选。他们首先倾向于曼奴艾尔·卡洛斯。无望之后,又确定阿尔林多·维森特为候选人。维森特是一位直到那时对政治活动极谨慎的律师和画家。在值得回忆的1958年总统"选举"中他是翁伯托·德尔加多和阿梅里科·托马斯之后的第三位候选人。

面对翁伯托·德尔加多的候选人资格已成为既成事实,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找到了一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尽管对德尔加多,特别对其当权的经历持保留态度,仍决定支持他竞选。

这样,翁伯托·德尔加多的竞选在里斯本非常艰难地开始了,因为积极反对法西斯的政治团体明显持观望态度。随着竞选运动的发展和人民热情的高涨,这种态度得到了纠正。但是,毕竟还是妨碍了初期的工作,对整个竞选运动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因翁伯托·德尔加多竞选委员会缺少有经验的干部,初期的竞选活动显得有些混乱。中央委员会主席是维埃伊拉·阿尔梅达教授。他聪明过人又非常和蔼可亲,但总与实际政治中的具体问题有着难以想象的距离。总书记是建筑师阿图尔·安德拉德,他有极强的主动精神,但却住在波尔图。其他一些头面人物是:卡洛斯·维列纳上尉、建筑师卡西阿诺·布兰科、阿尔西娜·巴斯托斯博士、费利克斯·奥尔塔和莫列拉·阿松桑。他们是我记得的经常露面的几位,都是勇敢而善良的人,但是在竞选工作上却完全外行。总之,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竞选运动只是其他决定性活动的一种烟幕,因为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只相信"武装

起义”……

“共和派抵抗组织”带着形形色色的个人“感情”，从一开始就支持翁伯托·德尔加多参加竞选。曼奴艾尔·门德斯和皮特拉·桑托斯尽管从旁协助，但从未参加各级竞选委员会（他们都是将军最亲密的合作者）。另一方面，特奥菲洛·桑托斯和欧里科·费雷拉长期以来也在各方面给了经常的帮助。例如：欧里科同阿尔皮阿尔萨的民主人士埃米尼奥·帕西恩恰预付租金，为他在自由大街租下了竞选总部！

但是必须承认，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我们真正齐心协力，以全付精力投入竞选运动已经为时太晚了。例如，由于受当时我所属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保留态度”的束缚，我自己就无所作为，失掉了许多时间，没有及时给予我能够提供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必须作深刻的自我批评……

在发动群众方面，过去的竞选运动同翁伯托·德尔加多的竞选运动无法相比。它触动了直至那时仍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各个阶层的民众，真正的深入民心，并激起了最广泛的热情和巨大的抗议浪潮，这一浪潮将把葡萄牙国土上的法西斯主义一扫而光。在多年的独裁中，这可能是萨拉查遇到的唯一一次严重的危险。在卡蒙斯中学的那次历史性集会上，德尔加多向政府人员喊道：“滚开！滚开！我们厌恶你们！”他知道自己表达了数百万饱尝镇压和贫困之苦、渴望变革的葡萄牙民众的深刻感情，这种变革至少允许他们享有憧憬未来的“权利”。

毫不夸张地说，德尔加多的竞选运动在全国各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在各个群岛和非洲殖民地都掀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是这场群众运动的局外人，没有任何人对此无动于衷。有些情况是非常奇特的：许

多直到那时还不关心政治的人突然对问题有了认识，并准备投身进去。波尔图大主教采取了明确的立场(这给一直与法西斯主义保持百分之百默契的葡萄牙教会带来了荣光)；具有明显反对派立场的天主教运动的出现，以及许多现役军人对政治的关注(这在革命阵营中必将产生重要的成果)，这一切都是"无畏将军"竞选运动的巨大冲击所产生的间接后果。

显然，这样规模的运动必然有其相应的对手：政府从未如此胆战心惊，并为将来采取了应急措施。1959 年的宪法改革取消了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转而由政府合格"职员"组成的"选举人团"指定总统。宪法的修改表明政府极度虚弱，并再次证明它对德尔加多竞选运动的恐惧。镇压早在竞选运动中和"选举"后不久就开始了，民主人士为短短几天的扬眉吐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结果，翁伯托·德尔加多的竞选导致了他同政府的严重对抗，迫使他表现出巨大的冷静，并表示："既不向选票屈服，也不向子弹屈服"。

虽然南方地区传统上更富有斗争精神并在政治上更有觉悟，例如阿连特茹或利巴特茹的某些地区，但是，北方省份发生的骚乱也许比南方还要严重。所以竞选运动即将结束时，当局禁止翁伯托·德尔加多主持 5 月 28 日在布腊加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桑托斯·科斯塔部长借口要进行一次阅兵式，在大街上部署了军队，命令德尔加多不得进入该市。德尔加多的让步可能被视为软弱，也可以解释为试图避免陷入预谋的挑衅。但是对于群众来说，这暴露了军队炫耀武力和发动干涉的企图。再说也不是最后一次炫耀武力和干预。

另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炫耀武力发生在里斯本卡蒙斯中学举行竞选宣传集会的那个夜晚。翁伯托·德尔加多将以这

次集会结束竞选运动。当时到处笼罩着威胁和挑衅的沉重气氛。警察摆出一副耀武扬威的架势，妄图使那些最勇敢的人也望而生畏。为此，古斯塔沃·索罗门钮、皮特拉·桑托斯和我在现场临时决定：我们的妻子不应该陪同我们，因为担心会发生严重的挑衅行动。所以我们单独前往卡蒙斯中学，而让她们在萨尔达尼亚广场附近的蒙特·卡洛咖啡厅等我们，以便她们与开会的地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尽管在会场的进出口处集结了大批警察，胡喊乱叫并通过扩音器恫吓人们不要聚集在一起，并驱散从会场走出的人群，但是卡蒙斯中学的集会没有发生意外事件。人们感到这个城市已被占领，正处在战争边缘。德尔加多异常激愤，我听到他对一群同党说："我嗅到了危险的气味，我深切感到我面临着危险。但是，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太可怕了！"

这是一位勇敢的、有着大无畏精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在那天夜晚说出这样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不能忘记这些话，更不能忘记他讲这些话时的奇怪语调。总之，我也不能忘记这次非凡的集会。这不仅是因为这位最勇敢的候选人那激动人心的演讲，还因为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那充满崇高的正义感的讲话！我不能忘记这次集会还因为下面的事实：外面警察的压力使会场群情激愤、公众对集会出自内心的支持，以及其他一些演讲。我记得在这个晚上我第一次听大卫·内图讲话。他请求共和党人原谅他过去曾用手中的武器为巩固萨拉查主义效劳卖命。他对此感到懊悔。这一讲话将永垂史册。

与此同时，警察在大街上用暴力制造了一场真正的骚乱。数千名由于会场拥挤不堪未能进入卡蒙斯中学的民主人士被粗暴地驱散和嘲弄。由于气氛不象往常那样平静，当局采取了最粗暴的行动。资产阶级味道很浓的诺瓦斯大街的和平居民对这个夜

晚发生的事情——骑兵横冲直撞、枪声、奔逃和殴打——至今记忆犹新！蒙特·卡洛咖啡厅变成了有组织破坏的舞台，骑着马的警察借口追赶示威者，开着枪冲进了咖啡厅。我们可怜的妻子被迫躲进了陌生人的家里，以逃避警察的暴行。他们是不放过任何人的！

翁伯托·德尔加多在里斯本短短的一个月的竞选宣传以与开始时同样的方式结束了：群众即使冒最大的个人风险也纷纷赶来表明态度；而警察和军队则层层设防，从中阻挠。武装部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手段以表明毫不退让的立场！

象往常一样，支持竞选的干部和候选人自己对参加上述竞选活动应遵循的方针直到最后一刻还犹豫不决。当局在宣传和组织方面强加给反对派的歧视性限制、滥用职权、在竞选期间对民主人士使用暴力、践踏法纪，特别是对投入票箱的选票的监察缺乏有效的保证，这一切更加使人倾向于弃权。在天平的另一端，是选民们参加投票的普遍愿望。尽管他们普遍面临着恐吓，但选民们创造了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和分发选票的奇迹。最重要的是他们立志把竞选实验进行下去，直至产生最后结果……

有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名字的选票很晚才到达竞选总部以供分发。如前所说，这些选票与政府候选人的选票不完全相同。故意制造的这种区别对政府有利，因为许多公职人员害怕投票的时候，被认出是反对派……

第一个从竞选总部拿走选票到利巴特如地区散发的人是特奥菲洛·桑托斯，他为此而被“毕得”逮捕。由于候选人立刻亲自同当局交涉，他只被关了几个小时。在时间如此紧迫而宝贵的时刻，这已足以在所有选举服务站引起普遍的恐慌，大大地延误了选票的散发。我记得几个小时后，当我到竞选总部的时候，有人

需要数千份选票以便当天晚上在一个边远地方散发。但是，因为害怕警察寻衅，对如何运送选票感到为难。我自告奋勇去送这些沉重的包裹。阿图尔·弗雷塔斯执意与我一起去，不让我单独行动。为了确保我们不被警察跟踪，我们叫了两部出租车，直接把这些宝贵的包裹转移到党内同仁的车上。他应该最后把这些东西运走，并在当地散发。这是一个可笑的故事，但是它使人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恐怖环境中工作的，而葡萄牙的“选举”也一惯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从来没有弄明白德尔加多是否真正想把竞选进行到底。那时，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他承受着来自各方不可调和的压力。气氛是如此热烈，以至于很多兵营，如圣玛格丽特空军基地和阿尔费特海军基地也来索取反对派的候选人名单，因为兵营里也存在一股支持翁伯托·德尔加多的巨大潮流。在军官“餐厅”里第一次有人公开谈论反对政府并进行有利于反对派的宣传。

另一方面，军队中司令部一级的重要部门则声言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以确保这次选举不象过去那样弄虚作假。克拉维罗·洛佩斯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时，经过多次权衡后，决定解除萨拉查的职务，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为此，他要求武装部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部队公开声明站在他一边。他害怕人们会认为他做的那件事是出自个人的恩怨……这方面的努力拖延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克拉维罗和德尔加多之间传递信息的人并不总是十分可靠，因此，这些努力的结果并不都尽如人意。在“选举”的前夕，克拉维罗整夜等待着那个应该把他带到圣塔伦军团的人。他将从那里发布解除萨拉查职务的命令！这个军人没有来。另外，曾郑重发过誓的人却向桑托斯·科斯塔告发了这一“阴谋”。象其他类似事件一样，这次失败事件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已经去逝

了，但是这一事件总有一天会载入史册。

这样，通过军事干预迫使当局尊重选举规则的希望终成泡影。尽管我不能绝对断言，但是我一直确信德尔加多得到了同行们在关键时刻进行干涉的正式保证。他在“选举”结束后写给波得辽·莫尼斯将军和另外一些将级军官们的信不可能有其他含意……

但是，众所周知，一切都失败了！害怕承担责任，民众的恐惧和对不远的未来缺乏信心再一次挽救了萨拉查。所以我一贯认为，武装部队在关键时刻从未积极支持过萨拉查，军队常常是由于“疏忽”而支持了他，因为军队由于过份的惰性从未组织任何有效的反抗。

在“选举”之前的一周，翁伯托·德尔加多的活动令人费解。他有意未出席在竞选总部举行的最后决定是否参加选举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由维埃伊拉·阿尔梅达教授主持。后来翁伯托没有征求他的最亲密顾问的意见便达成了“卡西利亚斯协议”。这一协议决定把反对派的两名候选人合二为一，取消阿尔林多·维森特的候选人资格，一致支持德尔加多。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德尔加多的合作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对翁伯托·德尔加多选举战略的这一有争议的步骤感到震惊并保持缄默。

然而，放弃阿尔林多·维森特候选资格以利于翁伯托·德尔加多并不能给他增加数目可观的选票。这不仅仅是因为阿尔林多·维森特实际上没有大量选票，而且因为大部分左派人士远在协议以及德尔加多参加竞选之前就公开为他开展了竞选运动。群众的热情和压力导致了事态的如此发展。总之，这使维吉尼亚·莫拉和路易·戈麦斯（他们仅是许多人中的两个典型人物）早在上述条约之前就声明支持翁伯托·德尔加多竞选。曼奴艾尔·莫拉斯向我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当他给负责维

森特竞选工作的曼奴艾尔·卡洛斯打电话询问竞选运动的总方针时，后者却以感人的热情对他大谈德尔加多的竞选运动……曼奴艾尔·莫拉斯当时居住在罗安达，担任安哥拉支持维森特竞选委员会的主席。

“卡西利亚斯协议”没有给德尔加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给政府提供了“共产主义危险”的令人厌恶的论据。德尔加多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呢？他不是不知道以上的情况，我认为有一个解释：他一开始对军事政变确信不疑，但是他的幻想破灭了，并明白了必须通过选举本身的力量坚持到底，尽管他对将面临的舞弊没有任何幻想，但仍梦想一次总罢工和一场群众运动能迫使政府让步。他认为反对派的团结将很容易使这一愿望得以实现。由于他缺乏政治经验，对自己的份量和对反对派每支势力行动的可能性缺乏了解，导致他犯了错误……

正如政府所说，与预料的完全相反，“选举”最终在“全国良好的秩序中”进行了。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地方都有舞弊活动，这种活动达到了如此程度，真可以称之为“厚颜无耻的和有组织的偷窃”，而反对派力量却没有任何提出强烈抗议的意向。假如不进行组织，这种抗议活动怎么能发生呢？激情和愤怒的群众运动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自发地形成。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任何激烈的抗议活动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强有力的组织手段，以避免一场大屠杀和无谓的牺牲。但人们对此毫无预见……

投票站人群如蚁，投票人数比过去历次“选举”都多，这使所有观察家都认为反对派绝大多数人参加了投票。由于没有监督，不能够在全国证实无数的舞弊行为。尽管如此，人们立刻毫不怀疑地宣布，胜利属于反对派，而候选人翁伯托·德尔加多已稳操胜券。据政府提供的正式数字，反对派候选人的票数占百分之二十五。在那样的竞选环境中，这已是引人注目的了。如果政府有

起码的尊重少数人意见的民主意识的话，那么这个比例的本身就应该证明反对派的存在是合法的。

翁伯托·德尔加多拒绝接受官方统计的结果并义正辞严地断言："他的选票被盗窃了！"为此，候选人的律师费尔南多·阿布兰切斯·费朗准备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列举了已知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舞弊行为。所有这些舞弊应该加以证实。文件最后抨击了这次选举。尽管文章的逻辑结构无懈可击、内容真实可信，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却如泥牛入海，毫无结果……

与过去的选举运动相反，翁伯托·德尔加多竞选结束后，尽管有镇压，但社会各阶层的反法西斯主义情绪仍然很活跃。翁伯托·德尔加多变成了一种象征和一面反抗的旗帜。一切都焕然一新。现在有了一个看得见的中心可以把决心斗争的全国人民凝聚在它的周围。这个民族已懂得自豪地宣布不愿再做奴隶。竞选运动总部已关闭，新闻检查使一切重新归于沉寂。政治警察运用惯常的六个月预防性拘留手段，开始拘捕最著名的反对派干部。然而，希望并未破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德尔加多想创建一个政治组织"全国独立运动"，以便继续在竞选期间开始的工作。这显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也不是他所能胜任的政治工作。

竞选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德尔加多和曼奴艾尔·门德斯一起到阿尔科巴萨去赶集。德尔加多在这座历史小镇附近有一座乡间别墅。小镇的居民主要由农民组成。他们认出了德尔加多后，纷纷向他致意。人们把帽子拿在手中，光着头，自动地给"无畏将军"让开一条路。将军喃喃自语，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他说："朋友们，胜利只有用鲜血，大量的鲜血，血流成河才能赢得！就象在委内瑞拉发生的那样……"

显然，像德尔加多这样的人变得非常令政府讨厌。独裁者们没有容忍这种现象的灵活性。这样，对德尔加多来说只剩下一条出路：即暴力。

然而采取暴力之前，萨拉查想先采取另一种手段：通过间接方式建议德尔加多拿着亲王般的奉禄到加拿大去学习为军队服务的经济课程。德尔加多拒绝了！

随后几个月德尔加多很快交上了恶运。政府首先解除了他的航空总局局长的职务，随后，把他驱逐出现役。以后，又取消了他的空军将军军衔。最后他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被荒唐可笑地称之为"前将军德尔加多！"

他被解除了实际工作，被警察长期包围着。他们向他炫耀武力，挑衅闹事。处在这种条件下，又是在葡萄牙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德尔加多能做些什么使自己适应生活呢？他被监视，他的所有行动每时每刻都受到窥探。人们感到政府在等待着他微小的过失，以便在政治上毁灭他。萨拉查不能容忍德尔加多在人民中享有的威望！一个普遍的感觉是德尔加多随时都可能被捕，这也许是对他最宽厚的处置。更坏的推测是制造意外事故，暗杀他。各方面人士都劝他应有防备，谨慎从事。人们隐隐约约地但又不断地感到存在着对德尔加多的人身暗害和一只无情的黑手。

一天，他临时得到通知说，当天下午在他的住宅附近准备举行一次示威游行（他的住宅位于菲利佩·福格大街一座楼房的第六层）。人们不知道是谁发起的这次示威游行。难道是等待已久的借口吗？过份好心的人往往不知不觉的被人所利用。德尔加多还有些上层的朋友。他掌握了可靠的情报后，毫不犹豫地，甚至没有征求最亲近的合作者的意见，就及时逃进了位于安东尼奥·玛丽亚·卡尔多索大街的巴西使馆。巴西使馆恰好在"毕得"的旁边。

普利多·瓦伦特教授当天晚上在他的位于安东尼奥·奥古斯托·阿吉亚尔大街的家中告诉了我这一消息。我惊呆了。当时，逃进大使馆避难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情。为了什么原因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们等着发生什么事吗？无人能够回答。

人们只是凭直觉知道，在葡萄牙的政治中某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对此没有任何人怀疑。

·8·

充满希望的年代(1958—1960)

与过去竞选运动相反，德尔加多竞选运动的结束并没有扼杀短期内出现政治变革的希望，而是为国家民主化斗争增加了新的推动力，因为它给这一斗争培养了许多社会各阶层的新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萨拉查主义在这一运动中受到了致命的一击。政府指定的继承人马塞洛·卡埃塔诺恰恰选择这一时刻退出政治生活，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直到10年之后萨拉查离去为止，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不满的情绪是那么广泛，政府的公职人员在全国人民的眼中是那样的声名狼藉，对萨拉查主义的政治行动的手段及其效果的怀疑是那么普遍，以致没有人敢于相信这个政权还能残存十年。整个国际形势似乎也是有利的，这更加强了以上的共识。

还记得，从1958年到1962年曾发生了许多令人振奋的事件，世界似乎生活在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春天：1958年10月，红衣主教隆卡里荣任教皇，封号为若奥二十三世。1961年7月，他发出了著名的通谕“母亲和教师”；1960年11月，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起，赫鲁晓夫发展了“和平共处”的学说，特别是自肯尼迪执政起，这个理论在实际上更加切实可行；“共同市场”于1959年1月份开始生效，开辟了(尽管缓慢)通向创建一支欧洲力量与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对抗的道路；

菲德尔·卡斯特罗同样于1959年1月胜利地进入哈瓦那，从而表明通过民族革命的手段有可能推翻法西斯独裁；1961年初，继库比切克·奥利维拉总统的强有力的统治之后，雅尼奥·夸德罗斯在竞选获胜后荣任巴西总统；在西班牙，一群奥巴斯·德伊技术官僚（包括乌拉斯特雷和劳佩斯·罗多）于1957年掌权，并且筹划了1960年到1963年的从稳定到发展的“大转变”。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萨拉查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僵化更加显得不合时宜。它就象博物馆里的古董一样，无法适应当前的需要。因此抛弃萨拉查主义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奇怪的是，在非洲殖民地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1961年初，安哥拉的武装斗争）开始再一次挽救了萨拉查。它给葡萄牙的政治问题增加了新的意义，或者说，使之国际化了。虽然对反对派摆脱困境极为有利，并以决定性的方式把反对派带上了国际舞台，但是也使更换政权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人们不可能再考虑一种简单的政治取代，而必须谋求一种结构上更为深刻的变革。毫无疑问，由于爆发了殖民地战争，葡萄牙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当统治40年的萨拉查主义结束时，在葡萄牙发生的事情要远比政治制度的简单变革有着更广泛的意义：这就是：葡萄牙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何重新适应现代世界……彻底变革的必要性（已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带来了新的、多重的和极端复杂的问题，这有利于改变萨拉查分子与反对派人士之间的界线和直到那时他们彼此所处的地位。

由于正在探索的选择（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的后果）的重要性，许多良好的愿望被搁浅了，或者说变得令人困惑不解。在克服了博特利·莫尼斯流产政变（1961年3月）的感情冲击和排除了短期内发生大灾难的担心之后，殖民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反

倒暂时稳定了萨拉查主义在国内的统治。这无须戳穿假爱国主义的面具(它在那些浑浑噩噩的阶层中还颇有市场)。尽管收效甚微,但政府仍在竭力利用它……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政府说得越多,说服力就越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寻求解决办法的客观困难足以使那些有能力为变革作出贡献的人望而却步……

也许这样可以说明为什么在 1961 年 1 月(贝雅暴动)之后在葡萄牙没有再出现过其他任何一次革命尝试。反对派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一点。

但是,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讲述中断了的有关德尔加多竞选运动的故事……

就眼前效果而言,翁伯托·德尔加多竞选运动最积极的成果之一是引起了天主教的分裂。

事实上,葡萄牙的教会直到那时一直积极地站在萨拉查一边。我们认为,教会是政府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支柱,它向政府提供了理论根据。除此之外,天主教组织还向萨拉查主义输送了支持它的群众,后备军和最有生气的政治领导人。

此外,在“民族主义者”胜利后的西班牙,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那里,教会的政治力量甚至决定性地抵消了军队的影响和“运动”(法兰热)的作用(它们是战时有效的政治组织)。但是,葡萄牙的情况严重得多:唯一政党(全国联盟党)一直是一个人为的组织,缺乏生命力,与纳粹党和一些法西斯党不同,它从来也不——更远远说不上——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另一方面,萨拉查总是鼓动对军队的深刻不信任。这样,在萨拉查主义分子掌权期间,教会享有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政治特权,对其占统治地位的影响从未有过真正的挑战。

关于军队,有必要再说明另一个根本区别:佛朗哥本人一直

是军队的化身，是西班牙军队承认的职业军人。与此相反，萨拉查多年来一直是以文人身份充当国防部长的，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违背军队意愿而强加给军队的局外人。他总是分化军队并且监视军队。萨拉查内心深处蔑视军队，因为他首先是教会的人，是为一种事业（人们要问什么事业？）服务的修士……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萨拉查主义同葡萄牙教会如同近亲乱伦，比佛朗哥主义同西班牙教会的关系还要紧密得多。数十年来，萨拉查主义和教会令人难以容忍的融合为一体，因为葡萄牙教会一直是保守的，换句话说，是萨拉查式的。人们可以发现（尽管极为罕见）也存在着高尚的例外。我们这里讲的只是一般情况……

1958 年，由于德尔加多的竞选运动造成的冲击，波尔图主教唐·安东尼奥·戈麦斯认为有义务给萨拉查写一封信。他在信中首次暗示全国的政治局势是反基督的，务必不要牵连教会。

在竞选运动中，佛朗西斯科·利诺·内图工程师的参加是引人注目，因为他作为民主派人士和天主教人士站在了独立派候选人一边。除了他本人的声望和无可争议的政治价值外，利诺·内图在天主教徒中还享有大共鸣箱的绰号。他的父亲——前天主教中心领导人，在“5 月”28 日”之前的那些年代里，曾是在教会同共和国之间进行调解的主要谋划者之一。在 1958 年竞选运动中，当他走出竞选运动总部的时候，他成了便衣警察分子攻击的目标。有一张他的照片，头被打破，民众用肩扛着他。这张照片是时代的标志，也将是历史的见证！

就在这时，安东尼奥·阿尔萨达·巴蒂斯塔开始在葡萄牙的文化生活中崭露头角。他以坚韧不拔和个人牺牲精神广泛地宣扬“进步天主教”的论点。

德尔加多竞选运动之后，当全国仍处在群情激愤的时候，一

份由五十多位天主教人士(其中六人是神父)签署的文件公开发表了,他们向全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件揭露了“毕得”的暴虐并要求对它的活动进行公正的调查。文章有一个很长的标题《高尚的人类良知不能容忍政府的镇压机构所使用的手段,基督精神坚决谴责它》。他们还给内阁总理写信,以书面形式表明立场。信的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对那位显然靠天主教得以掌权的政治家的尊敬。但上述信件强调了良知问题,以使天主教人士知道确实存在暴力和践踏人类最基本保障的行为(甚至犯罪行为),而这些暴行正是由一个自命为效忠天主教精神的政府的政治警察所为。这封信仅仅是一种善良的呼声,但具有不可否认的政治意义!

在同一时期,阿尔瓦罗·林斯大使由于受到良心的驱使(作为天主教徒,他深感不安),给里斯本红衣主教写了一封信,揭露他从使馆窗户目睹的警察的一次罪行。使馆同警察局有矮墙相隔,一名被捕者从四楼被扔到街上。他呻吟了数小时,直到吊在电线杆上死去……

“我们感觉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一首天主教的抗议歌唱道。这首歌是几年之后,即1969年在圣多明戈斯教堂举行的一次反殖民战争的“守夜”时唱出的。葡萄牙天主教人士首次意识到政府的反基督暴行是在1958年,即德尔加多将军竞选运动开始之后。对葡萄牙法西斯的那段黑暗历史,教会很晚才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实际上,塔拉法尔监狱(以“死亡之营”著称,许多有献身精神的工人积极分子就死在那里)的暴行;“毕得”的前身“情报警察”和“国家警署”的暴行和拷打(共和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共济会会员、天主教徒,乃至神父都毫无例外——如三十年代被捕的德高望重的神父特谢拉·达冯特)早从1929年

(独裁政权建立)起，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就开始了。但是……人民说得好："迟来总比不来好！"

从1958年开始，某些天主教徒对萨拉查主义采取的不妥协立场成了催化剂，对当局的前途产生了严重影响(尽管他们的方式温和谨慎，但政府仍然强烈反对)。事实上，那些在致内阁总理的信上签名的人，不仅未能实现其合法愿望，反而受到"毕得"的指控(而他们对这一组织曾表示过怀疑)！关于这桩"奇案"中的一些反常现象(象许多这类专为压制对手的案件一样，最后被撤销了)有必要读一读萨尔加多·泽尼亚的著作《第五原因——天主教徒和人权》。这部在1969年竞选运动中发表的法学著作非常客观，几乎没有评论。但是发表后几天，就被"毕得"没收了……

关于波尔图主教，萨拉查利用这位高级神职人员出国(或许是间接地暗示他以此种方式来淡化过去的问题)，以阻止他返回国内，迫使他长期流亡达十年之久。教会既没有胆量为这位被迫害的主教说一句伸张正义的话，也没有作出明确支持他的姿态。沉默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反对派不厌其烦地提出此案，拉乌尔·雷戈写了数篇尖锐的文章。这些文章使唐·安东尼奥得以返回祖国。在主教长期流亡中，我本人有幸在罗马、伦敦和萨拉曼卡或准确地说在麦迪纳·坎波多次拜访过他。所有这些会见都表明我在道义上对他的声援，也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然而，时代变了。在富有革新精神而又豁达大度的教皇若奥二十三世的不可抗拒的推动下，教会迎来了第二届教庭会议的革命。葡萄牙教会尽管有其反动传统的巨大影响、有着对法蒂玛① 的崇拜及政治上与反动势力有着明显的共鸣，但它不能完

① 法蒂玛(Fátima)：葡一小镇，据说圣母曾在那里显过圣，现为一宗教圣地。

全置身于总的潮流之外(虽然它想这么做)。对于所有的革新尝试,教会都拒之千里(对贝拉主教唐·塞巴斯蒂安·雷赞德却是一个例外)。但是,"酵母"仍然存在,使群众一点一点地膨涨起来。葡萄牙现代社会的这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将在政治上造成值得重视的后果。就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在翁伯托·德尔加多躲进巴西大使馆之前几个月里,我同他朝夕相处,比在竞选运动期间在一起的时间还多!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德尔加多试图创建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全国独立运动。应他的请求,我让出了我的办公室,以供举行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但是,我拒绝参加这次会议,甚至不愿以纯粹观察员的身份旁听,因为我认为该运动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错误的目标。它究竟是一个囊括所有反对派力量的群众运动呢,还是一个仅仅协调各种不同活动的参谋部呢?它是一个追求政府承认并为取得合法地位而同政府斗争的合法运动呢,还是一个只作为革命活动避风港的组织呢?无论是德尔加多,还是他最亲近的合作者对此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在政治上,德尔加多是孤立的,因此在竞选高潮过去后,他感到有必要寻找一种在组织上能够抗衡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影响的支持力量。

历史是有趣的。这时共产党表示有兴趣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中进行合作。实际上共产党试图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象民主团结运动那样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它在其中得以扮演主要角色,并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利用德尔加多激发起的人民的巨大热忱。但是,认为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和革命"幻想"的德尔加多会接受充当稻草人或简单的民众运动旗手的角色(该组织的创立在政治上只是为了长期进行争取合法生存权力的斗争),无异于认为鹰

会生活在鸡窝里……

当时，德尔加多对共产党的所谓“合法主义”已完全失望了，而对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领导的“纸糊的反对派”也完全持批评态度。这将是一种他永远不可理解的政治斗争方式。除此之外，他不能容忍反对派中的某些大人物所享有的威望，如阿泽维多·戈麦斯、塞尔吉奥或贾伊梅·科特桑等。他轻蔑地称这些人为“胡子”。有一天，我不知道偶然做了什么事，德尔加多赞许地对我说：“遗憾的是，您是那些‘胡子们’可信任的人……”

事实上，全国独立运动从未成为气候，而德尔加多本人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时间和不断犯下的错误使它逐渐消失了。

德尔加多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在某种特定的时刻善于采取行动的人。

我还记得有关组织10月5日示威游行（也在1958年）的事。我同德尔加多密切合作并不自量力的“教”他一些有关在大街上游行示威的方法。这是一次打着各反对派统一行动旗号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反法西斯示威（大选过后，国家仍处于群众动乱的时刻）。

当时下达的命令是让民主派人士到圣若昂高地集合，参加由共和党中央发起的传统的瞻仰共和国英烈的活动（这一思想的忠实倡导者安东尼奥·洛梅利诺也参加了）。德尔加多在那年竞选运动后不久即参加了这次活动，给这次集会增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把一种往往是悲伤的、象征性的瞻仰活动变成了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当时的计划是：群众列队从墓地走下去，直到建在造币厂附近的伟大的人民演说家安东尼奥·若泽·阿尔梅达的塑像前。但是，必须考虑到警察的不可避免的干预！

墓地内群众是那么多，以至于当局不敢打断那些非常简短的演说。但是，出口的大门都被关上了。这意味着我们都被拘禁在这个死人的角落里。最后，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之后，打开了墓地的一扇侧门，让人们一个一个地走出去……

在墓地前的广场上，因遭到众多警察部队的阻拦而未能进入墓地的人群在等候德尔加多出来。当德尔加多出来时，人群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和万岁声。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群身着便服的“毕得”人员在一片“德尔加多万岁”声中走近这位将军，把他扛在肩上，企图带着他溜走，其明显的目的是把将军同墓地内和广场上乱哄哄的示威群众分开。我当时在他身边，看清楚了这套把戏，一边随着他跑，一边用尽全身力气向他喊道：

“将军！将军！请下来！扛着您的这些家伙是‘毕得’的人！”

德尔加多拳打脚踢，破口大骂，好不容易才从他的假拥护者手中挣脱出来。同时，群众冲开了墓地那扇沉重的大门，涌向广场。但是手持古剑的共和国卫队的骑兵驱散了群众，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德尔加多和我相互搀扶着，神情紧张地望着在身边驰来驰去的骑兵。我们独自站在广场上，与所有的人隔绝了。

正如所料，群众随后不久通过各条小路，再次汇集在安东尼奥·若泽·阿尔梅达塑像前。但是，这场骚乱的主角不见了，德尔加多不见了，这使警察的镇压失去了目标。但是，没过多久，翁伯托·德尔加多在贾伊梅·科特桑、阿泽维多·戈麦斯、塞尔吉奥、阿尔林多·维森特和其他领导人的陪同下突然出现在纪念碑一旁的凯尔·阿马拉尔商店的橱窗前。人们欢喜若狂！我们很快聚集在德尔加多和科特桑本应献花的塑像下。被抛在后面的警察无法控制示威者的热情，只好抛出了杀手锏：向我们施放催泪瓦斯。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瓦斯的可怕威力。以前虽然也亲眼见到过，但是从未亲身体验过这种瓦斯。我们痛快的流了一场泪，而可怜的科特桑博士因为没有实战经验，受到的伤害更为严重，感觉很不好。但是，尽管流泪，我仍感到满足，因为我们打破了警察的监视，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

过后不久，我又在多次会议上与翁伯托·德尔加多相遇。这些会议是在阿卡西奥·戈维亚的办公室里召开的，目的是讨论邀请英国工党政治家安奈林·贝文来葡萄牙举办一些讲座的事。

德尔加多的竞选使国际政界对鲜为人知的葡萄牙反对派产生了某种善意的好奇心。全世界重要的新闻机构首次开始让葡萄牙占据一定的位置并开始用某种批评的口气谈论葡萄牙。例如《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些出自本杰明·韦尔斯之手的有重要意义的报道。同样，由于《时代》杂志发表了美国记者萨波里蒂的一篇文章，这份杂志多年一直被禁止在葡萄牙发行。他在文章中暗示，萨拉查同阿塞卡女子爵之间存在着一种或多或少类似柏拉图式的爱情……

为了利用这种好奇心理造成的有利环境，我们通过同英国政界有良好关系的维加·皮雷斯博士，邀请了贝文和自由党领导人乔·格里蒙德到葡萄牙来。他们两人都接受了邀请。在法国，我们向孟戴斯·法朗士发出了相同的邀请，他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了。正如人们所记得的，当时，贝文、内尼和孟戴斯·法朗士都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伟大领导人。让·雅克·施莱贝尔就有关欧洲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组织这三人进行过一次令人难忘的讨论，并以突出的版面刊登在法国《快报》上。

贝文应我们的邀请对葡萄牙的访问将有助于使反对派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合法存在。“大选”过后，政府试图象变魔术那

样取消它的存在！因此对贝文的接待计划必须认真研究，因为我们对这次访问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在这方面负责起草一份计划，并在阿卡西奥·戈维亚办公室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详细的介绍。我记得有很多人参加那次会议，毫无疑问有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科特桑、阿泽维多·戈麦斯、维埃拉·阿尔梅达，还有翁伯托·德尔加多。

我开始逐条介绍这项计划的所有细节。翁伯托·德尔加多以“好！”“接下去，接下去”“同意！”这样一些简短的话表示同意。后来，我提议：“下午 6 点 30 分，贝文在翁伯托·德尔加多的陪同下离开下榻的饭店(预订的饭店是复兴广场附近的皇宫大街饭店)，乘敞篷车通过罗西奥，经西亚多前去向卡蒙斯的塑像献花。这将是他在葡萄牙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即使新闻检查禁止在报纸上公布活动计划，可以肯定，我们也会通过自己的渠道召集很多民主人士。到时候我们将进行一次巨大的示威游行”。德尔加多沉思了片刻，随后问道：

“谁保护我们免受‘毕得’的不法行为或一次罪行呢？”我回答道：“关于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保卫措施。我们中的一些人将走在汽车两边，尽力把它围起来。但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保护。除了冒险没有其它办法。”

“好吧！”德尔加多干巴巴地说。他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道：

“是否可以考虑让我们的一些人向贝文扔西红柿以便让他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是葡萄牙的法西斯？”

我们都惊呆了！我不能忘记塞尔吉奥同科特桑交换的使我吃惊的眼神。此刻，他们与德尔加多之间真有天壤之别！没想到从青云直上的葡萄牙军团的军官、反对派的候选人口中会冒出这样的话……

然而，如通常一样，强硬的萨拉查没有让我们完成这些工

作。最后一刻，当我们已经把飞机票交给了安奈林·贝文和他的夫人珍妮·李并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弄到卡皮托利奥大厅时，贝文被告知，不允许他进入葡萄牙！请注意，贝文这时是“影子内阁”的外交部长，如果工党获胜，他极有可能成为英国女王陛下的首相。

萨拉查在所有葡萄牙报纸转载的一份正式照会中，为这一极不体面的行为辩解。他所借助的理由真是荒唐透顶：不让贝文入境是因为他只讲英文，“而在葡萄牙只有少数人掌握这种莎士比亚的语言！”

这一事件之后，我们拟定了一份强烈的抗议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有关外国人来葡萄牙一事还援引了法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加尼埃的例子。这位夫人刚刚出版了一本国家情报局严加查禁的题为《空缺与萨拉查》的书。这本书收集了这位“伟人”的一些基本思想并附有她同萨拉查的一些合影以及由这些影片所引出的滑稽可笑的评论。萨拉查不喜欢这本书，命令在几天之内在卡西亚斯堡逮捕科特桑、安东尼奥·塞尔吉奥、阿泽维多·戈麦斯和维埃拉·阿尔梅达。德尔加多幸免被捕。对此，我猜想是因为他仍是现役将军，解除他现役军职的程序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或是在需要冒世界舆论指责的情况下，萨拉查还是喜欢保持某种程度的“合法性”面子的。

上述事实告诉人们，在翁伯托·德尔加多竞选运动之后的年月里，出现了政治上异常活跃的气氛。在所有阶层和所有反对派潮流中都出现了新的活力和明显的希望。

各地自发出现的要求各异的群众斗争在这一时期也有相当的发展。“大选”之后，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罢工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人们普遍不满。例如在马托济尼奥斯，渔民们表现出了

特别的战斗精神。6月和7月，他们使每处的工作都处于部分瘫痪状态。也曾出现过呼吁公众拒绝购买报纸的努力，作为对新闻检查的抗议。人们还提出口号，所有的人都应戴上黑色领带，为“大选”成果被“盗窃”致哀。这是人民进行反抗的方法，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更严重的是，1959年5月1日的示威游行导致了同警察极其激烈的冲突，受伤和被捕的人数达到惊人的程度。人民似乎对进行一场斗争已经觉醒，而这一斗争多年来一直处于迷茫状态。

科瓦斯·杜洛地区的医生路易斯·罗塞拉一天对我谈起穷人们对翁伯托·德尔加多的崇拜，他们把他看作是“救世主”或“救星”。由于我表示怀疑，他让我看了一些杜洛地区最贫困的棚舍。那里的居民在无法形容的贫困条件下挣扎。他们的生活条件近似于非洲尚未开化的黑人的生活条件。的确如此！在许多地方我都看到德尔加多的肖像，而且多次是与那些不幸的人所尊敬的圣像放在一起！

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人们对短期内进行变革的期望。人民第一次在竞选热潮过后没有放下武器。当政府发现这种现象时，便竭力使人民的斗争停顿下来。象往常一样，它的主要手段是依靠“毕得”的工作。在这期间，警察虽然不知倦疲地活动，但是干得并不出色！

正是在这期间，两桩引起轰动的事件粉碎了“毕得”百战百胜的“神话”，证明它不过是个“官僚”机构和泥足巨人。它只是通过被捕者的“招供”才能得到一些东西。而这种招供往往是施加暴力才得到的。显然我讲的是两件激动人心的逃跑事件，即恩里克·加尔旺上尉从圣马丽亚医院的出逃和阿尔瓦洛·库尼亚尔与他的一些同狱难友从贝尼塞越狱事件。

恩里克·加尔旺自50年代初被捕就在圣马丽亚医院治疗。

即使在医院里，他也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从未放松过。在狱中，他居然写出了形象生动的萨拉查传，题为“马尼奥拉斯的儿子”。用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圣康巴唐地区，内阁总理的父亲奥里维拉先生以此诨号闻名。这本书已秘密发行。他瞒过警察的监视逃跑了，并带走了所有的东西：手稿、书，甚至还有他饲养的一只麻雀！后来，他逃进了阿根廷大使馆，从而掀起了“逃往”南美国家大使馆的浪潮……

库尼亚尔与同狱难友的逃跑更令人惊讶。贝尼塞是一个旧城堡，濒临大海，类似一个狭长的半岛、像一个伸向大海的陆地长舌。唯一的出路是一条公路，由警察的一个哨所控制着。城堡建于 18 世纪，座落在镇子的一端，由厚厚的大墙围着，共和国卫队日夜在墙外守卫着。被捕者常常被关在城堡里的一所监狱中。狱规是极其严厉的。一般来说只有服刑的犯人才被送到那里。在理论上，这所城堡属于司法部，但是在实际上却听命于“毕得”。律师和犯人的家属都曾揭露过，那里的一切都是企图把犯人们置于绝望和死亡的境地。可以说，它是萨拉查主义监狱和集中营的缩影。1960 年 1 月，阿尔瓦洛·库尼亚尔和他的同志们在复杂的条件下，正是从那里逃跑的。

这两次的打击使“毕得”的威望受到严重动摇。两次中的任何一次都在民众中，甚至不关心政治的人们中，激起了难以形容的狂喜。厚颜无耻的以自己的“功绩”而自豪的“毕得”，是一个人们深恶痛绝的组织。“毕得无所不知”的神话是官方宣传和某些落入其魔爪贪生怕死而全部招供的反对派人士蓄意编造出来的，而它依靠自己的努力从未能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任何一位有最起码法庭经验的律师都清楚地知道这一事实……

几年后，另外两次越狱事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一伙共产党领导人 1961 年 12 月利用大战期间希特勒赠给萨拉查的一辆

装甲车逃出了“毕得”严密控制的卡西亚斯城堡和1969年革命行动统一组织领导人埃米尼奥·帕尔马·伊纳西奥也从波尔图市越狱。埃米尼奥·帕尔马·伊纳西奥肯定是当时全国被看管得最严密的人……

另外，还有一件事同样表明“毕得”的效能和情报工作质量的低下：1962年贝雅动乱时，翁伯托·德尔加多和他的女秘书曾秘密出入葡萄牙。关于这一点，由于它的复杂性和后果我将另外详细讲述。

1959年，确切地说是在这年的3月11日至12日凌晨，为发动一场军事行动和民主运动迈出了第一步。这场运动是人民对国家现状的深刻不满的反应。但是，由于在最后时刻的犹豫不决，未能立刻取得成效，运动也归于失败，但并未因此而失去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突出的重要性，也未能避免许多军人和平民被捕。一年之后，他们在圣克拉拉军事法庭受到审判。这一判决将以不光彩的一页留在葡萄牙的政治诉讼史上。

在对这次流产运动的简要分析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结论是：这是一次革命的尝试，它与我曾多次提到的那些以往的“暴动”毫无共同之处。这既不是由于它的巨大感召力，也不是由于一些处于负责地位的人士参加。

可以说在那些“政治上改变了见解”的老共和党人中，唯一占有重要位置的是卡洛斯·维利埃纳上尉。他在德尔加多竞选运动结束后，直接参与了“3月11日”事变。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他那感人的理想主义和民主派斗士不可动摇的坚定意志使得这次运动成为例外。他与在巴西大使馆避难的德尔加多将军在政治上和感情上的息息相通也是原因之一。这使3月11日运动的年青的组织者们把卡洛斯·维利埃纳摆在了该运动的突出位

置。

其余的参与者彻底断绝了同一贯散布暴动流言的传统密谋份子的关系。他们大部分是在德尔加多竞选运动期间出现的新人，其中很多人来自天主教，有些人则来自法西斯阵营。如果这个运动偶然取胜，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真是难以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判断并不非常武断。

第二个结论是，尽管有很多天主教的重要人物和反对派人士参加，该运动仍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天主教色彩的运动。这次暴动的灵魂是商船队官员曼奴艾尔·塞拉。他是天主教青年前领导人和德尔加多竞选运动的热心参与者。塞拉是一位罗曼蒂克式的非军人革命家。他受到神秘主义的鼓舞，具有非凡的感召力和说服力。由于他为自由事业所作的各种牺牲，他的名字理应载入反法西斯斗争的史册。在军事方面，最高领导权属于当时的帕斯托尔·费尔南德斯少校。他是一位在技术上和人品上有很高威望的人物。这位谋密暴动的组织者酷似生气勃勃的阿尔梅达·桑托斯上尉。桑托斯是"葡萄牙青年军"的前领导人，后来被悲惨地暗杀了。该运动其他突出人物是：隆巴和阿米尔卡·多明戈斯上尉、海军司令瓦斯科·贝尔马尔索·科斯塔·桑托斯和军医官雅安·雅克斯·瓦伦特。文人中知名的有：费尔南多·奥内托（在诉讼中我为他辩护并且成为他的好朋友）、安东尼奥·维拉尔（几年后他在贝雅起义中阵亡）、劳尔·马格斯、贾伊梅·康德、阿曼迪奥（几年后，他参加了劫持葡萄牙航空公司飞机事件）、彼得罗·博加林、科斯塔·桑托斯和另外一些我已记不起名字的人。在这些突出的人物中，还有我的伙伴和亲密的朋友欧里科·费雷拉。他被拘押了数月并就借给别人汽车一事出庭答辩。后来，这辆汽车奇怪地在里斯本一个兵营的停车场找到了。

但是，除了在审判中暴露出来的明显的阴谋外，还有一个盘

根错节的同谋网，甚至涉及到武装部队的最高层。显然，警方已侦察到一部分情况，但是在政治上不宜披露。此外，还有一份百名现役军官签署的誓约。总之，萨拉查总是对军事阴谋使用同样的手段：尽力减少“流血”，想法得到某些参加反叛活动的证据，随后用这些证据玩弄美化自己和政治讹诈的花招……

如前所说：“3 月 11 日”政变图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一些天主教人士的引人注目的参加。行动发起之前，文人“政变者”在里斯本的大教堂集合。佩雷斯·特雷洛·瓦斯康塞洛斯神甫是这个教堂的主持。某些外部标志、某些用于区别敌我的带子和通行口令，如“曼奴艾尔”、“马丽亚”、“伊纳西奥”大概都是天主教的建议……

既然包括共和国国民警卫队以及公安警察在内的各种力量许诺参加政变，在军事技术上确实有把握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的话，那么，“3 月 11 日”政变为什么又失败了呢？就我所知，情况是这样的：它失败的原因与以前运动失败的原因相同，即军事首脑缺乏决断，特别是在最后时刻害怕承担责任，组织方面的严重缺陷主要在于事先准备不足。象往常一样，在拉导火线时出了差错。乌特拉·马萨多老人把此形象地比喻为“扯皮决定”。

了解以下事实会令人惊讶不已：暴动拖延了数周之久，肯定有数十人卷入这一“秘密”之中。尽管如此，直到最后一分钟，“毕得”对此仍毫无所知。这一离奇的现象在贝雅“起义”中重现。这次起义的发动工作进行了整整一个月，只有在大批人员赶往现场后才正式爆发（警方直到那时才发觉）！

正象在“3 月 11 日”事件审理期间揭露出来的情况那样，某些军队的指挥官直至最后一刻仍然举棋不定。一位高级军官发现他的团队里有些事情不正常，而且不寻常地出现了一些陌生的军官，而他仍安然地同这些可疑的军官闲谈直到凌晨。由于没

有迹象表明该行动可能获得胜利(或者有可能爆发),除了一些军营的微不足道的骚乱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劝告这些军官迅速离开部队,否则将有被逮捕的危险。这位如此行事的高级军官,在审判中居然作为原告出庭作证。除了不时打断他的律师们的尖刻讽刺外,他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据说,有些同谋者的地位非常高,甚至牵涉到克拉维罗·洛佩斯元帅。有朝一日,有可能为这段时期写历史时,被审判隐瞒的"3 月 11 日"事件的某些敏感问题必将大白于天下。

在尚未对法庭庭长路易·库尼亚上校说几句表示敬意的话之前,我不应该结束这一问题。他处在困难的境地,但是他的高尚品质和诚实勇敢当之无愧地应受到赞扬。在这次审判中,他得到另一位军事法官,一位最公正无私的军官特谢拉上校的帮助。

路易·库尼亚上校是一位老式军官:果断、属保守的君主派,且具有罕见的尊严。在长达数周的审判中,他了解了所有的技术细节,也进行了一次法律——政治学习。例如,关于"毕得"的酷刑及政治犯所处的可怕境况,他几乎上了完整的一课。不应再无视萨拉查司法机关所使用的肆无忌惮的手段了。我的委托人费尔南多·奥内托象其他犯人一样就"毕得"和犯人们的"待遇"做了广泛的介绍。在一次审判休息时,库尼亚上校对他说:

"奥内托先生,听了您的陈述,我祈求上帝千万别让我成为政治犯而落入'毕得'之手"。

审判长席尔瓦·卡尔德拉是一个给人留下痛苦回忆的人。人们对象他这样堂堂的法官的惊人愚蠢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偶然遇到象路易·库尼亚这样一位军队出身的法官(他能温和而富有人情味的与人相处),是十分欣慰的!由于这段著名的历史,在圣克拉拉法庭判决之后,我们大声疾呼:"葡萄牙还有法官!"但是,仅仅一只燕子,还不是春天……

1959年发生的另一件与三月革命暴动有关的事件使政界义愤填膺，也使全国感到震惊：阿尔梅达·桑托斯上尉被暗杀了。

当卷入那次行动的军人们被“毕得”逮捕并被关押在卡西亚斯和阿尔茹贝监狱等待审判的时候（拖延了数月之久），军人们按其内部规定被关押在特拉法西亚城堡。但是后来又借口安全问题，把他们转移到了埃尔瓦斯监狱。那里条件更差，而且远离他们的家庭。

尽管大批的逮捕造成了低潮，但是，“密谋”并没有停止。涉嫌的军官们继续从外界获得鼓舞人心的消息，因此他们没有失去再次进行革命的希望。受到这些消息的鼓舞，阿尔梅达·桑托斯上尉和军医官雅安·瓦伦特贿赂了一名叫吉尔的上士看守，逃出了埃尔瓦斯监狱。他们的目的是继续处于非法状态，由此更好地推动正在谋划的新行动。阿尔梅达·桑托斯上尉实际上具备了精力和胆量上的条件，也与重要的军界人物有着联系。

但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梦想的那样容易。他们没有地下秘密生活的训练，又受到“毕得”的疯狂追捕，所以必须不断地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变换住所。另外，阿尔梅达·桑托斯在逃跑中得到他的情妇（他的黑色宝贝儿）的帮助。从那时起，她一直陪伴着他。她在他的死亡悲剧中起的作用是鲜为人知的。这个女人叫玛丽亚·若泽或泽济尼亚。他们最后躲藏的一个住地是莫罗河畔的一间小屋。被围困和追捕的人精神紧张，一个行为不端的女人，特别是他们暴燥的性格，是导致罪行的复杂因素。这是一次带有感情色彩的毫无价值的暗杀。

过了一段时间，阿尔梅尔·桑托斯的尸体在金绍沙滩出现。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公众的第一个反应是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是‘毕得’的又一桩罪行”。事情是如此的密切相关，以致推测有时

也极象是真实的。

司法警察逮捕了库尼亚·列阿尔律师，指控他是最后与阿尔梅达·桑托斯交谈过的人：它使用自己的同类——毕得——的伎俩，企图从他口中挖出口供。库尼亚·列阿尔是一名有经验的律师，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无罪。他没有屈服并以值得崇敬的勇气抗拒警察的命令。他曾绝食数日，最终获得了自由，因为已经证实对他的指控绝对是不实之词。老工程师库尼亚·列阿尔当时给萨拉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这封信甚至在报纸上发表了)。

最后，司法警察再一次给了"毕得"一记耳光，终于逮捕了真正的罪犯：雅安·雅克斯·瓦伦特、吉尔上士和泽济尼亚。当广大民众确信"毕得"没有直接责任时，关于这个事件的议论当天就消失了。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有趣的大众心理现象之一，它表明了公众对葡萄牙镇压政权的普遍反感。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翁伯托·德尔加多仍在巴西大使馆避难，因为葡萄牙政府固执地拒绝承认巴西提供的政治避难，所以不给他离开国家的通行证。当时负责巴西在里斯本外交工作的是一位非职业大使(一位出身高贵的文化人士，即有侠义心肠的作家阿尔瓦罗·林斯)。这种情况对于德尔加多来说是很幸运的。阿尔瓦罗·林斯面对向他施加的巨大压力，以最杰出的、毫不动摇的决心表明他是神圣人权的勇敢的捍卫者，也是向他寻求庇护，向他所代表的伟大兄弟国家寻求庇护的那些处境困难的人的捍卫者。在至今仍被禁止在葡萄牙发行的《出使葡萄牙》一书中，阿尔瓦罗·林斯以大量风趣的细节描述了他坚持数月的不平凡的斗争，以及最后如何迫使萨拉查准许翁伯托·德尔加多自由地启程前往巴西。

此后，当阿尔瓦罗·林斯还在葡萄牙期间，当局制造事端，以各种间接方式表明，他实际上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然而对他来说，那些无足轻重的不敬首先是一种崇高的称号。他是一位有纯真信仰的民主人士，精神豁达开朗的天主教徒。在这位非凡的人物的行动中，处处可以感到独裁政权所施加的恐怖。对于他的葡萄牙兄弟来说，他理所当然地感到骄傲，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使命。

我荣幸地参加了一些朋友组成的一个小代表团。当阿尔瓦罗·林斯在阿尔坎塔拉启程回国时，这个代表团交给他一封葡萄牙知识分子的信。信中感谢他为葡萄牙以及为未来的葡——巴关系所做的一切。这封简短的信是由葡萄牙文学界、艺术界和文化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签署的。是不容置疑的！阿尔瓦罗·林斯的确没有期望得到比这更好或更荣耀的奖赏了。它肯定比对外交官们的繁文缛节更有意义（当时缺少应有的外交礼仪显得十分引人注目）。

1960年是共和国五十周年大庆。反对派利用这一时机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示威游行活动。

值得指出的是，当局在历史性纪念活动中非常富有想象力。宣扬过去的光荣史（其意义有时值得怀疑）是政府“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但是在共和国五十周年纪念问题上，政府表现得非常谨慎。事实上，萨拉查分子对“新政”在形式上保留的共和国模式从未表示重视，因为在葡萄牙，自竞选宣传开始，共和与民主就是同义词。

5月28日行动得到了许多保皇党的大力合作。就象贝纳迪诺·马萨多惯于强调的那样，它带来的是所谓的教士——军人的“国家独裁”。但是，无论是最初年月里的军人还是后来的萨拉

查，都不敢恢复君主政体，因为他们不能无视葡萄牙人民非常强烈的共和意识，也不愿意象西班牙人那样一步步地恢复王朝：先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王朝，之后再由独裁者任命一位国王。

这样，在葡萄牙恢复王朝的危险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这不仅仅因为没有君主主义者，(即有能力为君主政体战斗的君主主义者)，也因为那位合法继承人杜亚尔特·努诺·布拉干沙公爵是一位平庸之辈，而且同现政权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他接受政府的俸禄，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在他的那些绝望的党羽中间鼓动起一次复辟行动。

但是，有时也不尽然。这样说需要加引号。众所周知，"新政"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葡萄牙集权主义"，即一种可疑的民族主义的保皇党运动(就象拉乌尔·普罗恩萨表明的那样，因为他是从法国人查理·莫拉斯所写的东西中抄袭来的)。同时，那些主张集权的人，诸如安东尼奥·萨尔迪尼亚、佩克托·雷贝洛、伊波利托·拉波佐、路易斯·布拉加和另外一些人，对第一共和国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他们是"新政"第二代人的真正的"思想导师"和意识形态专家。"新政"的第二代人有马塞洛·卡埃塔诺之流，特奥托尼奥·佩雷拉之流、隆布拉莱斯之流、卡斯特罗·费尔南德斯之流、苏皮科·平托之流以及其他一些人。

例如，马塞洛·卡埃塔诺就是《葡萄牙民族》杂志的撰稿人。这本杂志是集权派的理论刊物。尽管它在30年代主张墨索里尼鼓吹的国社主义，但它在理论上的保皇性质一直保持到50年代"民族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止。萨拉查当时宣称体制问题已经解决，认为共和模式是一件永久性的既成事实。他采取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或者是现实主义的立场在保守派中(包括顽固的法制派)受到了很多批评，并与当时的国防部长桑托斯·科斯塔的

主张格格不入(他后来成了保皇党巨大的希望)。

在这些潮流中,萨拉查总是软硬兼施,尽力避免深深地卷入。在他的周围,总有一些忏悔的保皇党人(同时也有一些具有保守倾向的共和党人)。当对国歌和红绿两色的国旗感到羞愧的保皇分子的共和国(即"新政)需要为"政府"装装门面时,总有人随时跳出来捧场,如萨拉查的私人朋友和医生、1911 年立宪议会共和党众议员比萨伊拉·巴雷托,在独裁政府之前就有了共和党人经历的阿尔比诺·雷伊斯和乌利塞斯·科尔特斯以及萨尔门托·罗德里格斯海军上将等。据说这位将军曾与共济会有联系……

萨拉查谈到自己时说:"说我是共和党人,但是从来没有人在宣传集会上看到过我;说我是保皇党人,但是从来没有人听我亲口承认自己是保皇党人!"这种似是而非的立场肯定能更好地适应在反对民主共和主义的斗争中创立的体制。反对民主共和主义的斗争曾得到保皇党人决定性的支持。但是,"新政"并没有立刻恢复君主制。它总是许诺但又总是拖延下去,因为君主制将会带来最大的政治麻烦。

当集权主义者最终醒悟到萨拉查主义已经把他们带进了一条死胡同(被真挚的幻想所迷惑)时,他们便公开站到反对派一边,成了最坚决、最纯正的保皇主义者。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一种没有任何希望的绝望的行动,因为他们为之效忠的国王与政府沆瀣一气,不想也不知道把自己变成一种可能的选择办法,更不知道把自己变成一面战斗的旗帜。这种立场若要使之有效,显然就要进行冒险,而唐·杜亚尔特并不准备去冒险。在一个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度里,若不冒严峻的风险,反对派的政策就将一事无成……。

关于君主立宪派人士,在唐·曼奴艾尔二世死后,这一派人

就随着岁月迅速消失了。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这位被放逐、被仇恨的家族的后裔杜亚尔特。很多人变成了共和党人，就像伟大的专栏记者罗沙·马尔丁斯那样（他去世时是《共和国报》最著名的撰稿人）。而另一些人则成了可悲的没有国王的保皇党人。

由于没有充足的材料，人们还不十分清楚唐·曼奴艾尔二世继承问题的复杂历史，以及这段历史所引起的各种王朝问题。人们也不清楚创办布拉干沙家族基金会的事（这个基金会是在同唐娜·阿尔梅利亚王后进行艰难的和秘密的谈判后诞生的）。唐娜·阿尔梅利亚受过天主教的熏陶，思想反动，是萨拉查的崇拜者。就是在这时，杜亚尔特才从默默无闻中冒了出来。他是1834年被埃沃拉·蒙特协议逐出葡萄牙的米格尔家族的代表人物。萨拉查废除了这项协议。杜亚尔特是在奥地利受的教育，说一口糟透了的葡萄牙语。但是，就象他不是长子的事实一样，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葡萄牙王位的指定继承人，即以君主立宪派继承人的身份出现。

至此，必须插入唐·曼奴艾尔的同父异母姐妹唐娜·玛丽亚·布拉干沙的一段有趣的故事。梵蒂冈承认她是唐·卡洛斯的女儿。这位夫人最近几年站出来对杜瓦尔特·努诺的权利提出异议，自称是布拉干沙家族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她是那个自由派家族的唯一幸存者。大约在1957年她回到葡萄牙时，克拉维罗·洛佩斯总统出于某种同情接见过她。总统对她的辩解深为感动，并向萨拉查作了介绍。但是，萨拉查评论道：

“什么？又一位皇位继承人？我手头有的已经够我头痛了！”

他拒绝接见她。

尽管她与梵蒂冈和西班牙有相当重要的关系，但是葡萄牙传统的皇亲国戚似乎对唐娜·玛丽亚的企图并不重视。因为她是私生女吗？不应该是这个原因，因为葡萄牙的所有王朝都是以

私生子开始的。所以，私生子女甚至是某种重要性的突出标志。我的解释是，这是基于另一种形式的偏见。玛丽亚曾在西班牙受过教育，在阿丰索十三世的宫廷里生活并受到保护。她第一次是与古巴一位超级富翁结婚。后来在法国和意大利过着一种不安定的生活。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相当有文学韵味地谈到过这一点。她在罗马居住了许多年，与维托尔·曼奴艾尔三世宫廷里的人有很多联系。大战期间同一位意大利骑兵将军结婚。这位意大利将军姓布拉赛，出身贵族。他们有一个女儿，叫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并冠以贝拉公主这一传统的头衔。据葡萄牙传统派人士说，这位布拉干沙女公爵只是到了晚年才想起要求恢复她的权利！

1963年左右，我在巴黎结识了唐娜·玛丽亚·皮亚。是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女作家玛丽亚·拉马斯在流亡期间把我介绍给她的。后来我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在马里奥·鲁伊沃陪同下去嘎纳她居住的"埃及宫"拜访她。女公爵同反对派进行了初步的接触，但她还不认识反对派的人士，也不了解当时的问题。在受到萨拉查冷遇，又受到政府里保皇党粗暴的攻击后，她同情地注视着德尔加多的竞选运动并决定支持他。唐娜·玛丽亚·皮亚同德尔加多将军的关系是非常真诚的，可以写一本书来描写这种和谐美好的关系。玛丽亚·皮亚毫不犹豫地帮助处于流亡困境中的德尔加多将军和他的女秘书阿拉雅里尔·坎波斯，直至他们两人于1965年遇害。

后来，作为律师，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毫无疑问的证明唐娜·玛丽亚是"金枝玉叶"。

我把女公爵介绍给当时还是保皇党人的佛朗西斯科·索萨·塔瓦雷斯和他的夫人(诗人索菲亚·安德雷森)。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两个人对唐娜·玛丽亚·皮亚存有很大的戒心，

只是在我的坚持不懈的要求下，他们才同意见她。但是，唐娜·玛丽亚·皮亚的魅力使他们完全消除了戒备。索萨·塔瓦雷斯甚至终于同意担任布拉干沙女公爵的律师(他精通布拉干沙王朝的所有复杂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远比我有更高的权威)。

1965年2月，唐娜·玛丽亚·皮亚想返回葡萄牙。靠近阿儒达宫的一尊唐·卡洛斯的塑像已经完成，杜亚尔特·努诺和萨拉查出席了揭幕仪式。玛丽亚·皮亚认为这是一种亵渎，所以决定亲自回来向父亲致敬。因此她在邻国西班牙红十字会主席(一位贵族夫人)的陪同下，于2月份一个晴朗的日子，突然出现在索萨·塔瓦雷斯家里。她们显得很惬意，因为他们通过埃尔瓦斯边境还很担心，但是她们欣喜地看到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毕得'的便衣还挺有意思呢，"她们说。

当天，她们在唐·卡洛斯纪念碑前献了一束花，把一份赠品交给葡萄牙红十字会。布拉干沙女公爵在其父亲墓前徘徊了一会儿之后，想乘汽车返回西班牙。

由于官僚主义原因，"毕得"没有发现她们入境，而现在对她们的出境已经警觉起来。这样，当她们抵达卡伊亚时，那位西班牙女士被迫一个人穿过边境回国，而唐娜·玛丽亚·皮亚则被逮捕并被送到卡西亚斯监狱。抵达监狱时已是凌晨，她辱骂捶打那些以暴力押送她的警察。他们没费吹灰之力便把她送进了一间专门关押危险政治犯的小牢房。在那里服刑多年的、我的委托人玛丽亚·儒列塔·甘德拉后来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女公爵穿着她的水貂皮大衣于凌晨进了监狱。她喊叫着，争辩着，说她是国王唐·卡洛斯一世的女儿!

她的忠实的"司机"为她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毕得"犯了一个错误，仍让司机有行动自由。他们把他安置在巴伊沙的一所公寓里(等待对他的女主人的命运作出决定)。天刚刚亮，他已经

敲开了索萨·塔瓦雷斯的门，向他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

全世界的新闻界对这一事件都深感兴趣。《纽约时报》在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位布拉干沙女公爵的照片。“毕得”以其蛮横武断的、毫无结果的行动为唐娜·玛丽亚·皮亚恢复王权作了免费宣传（由于意大利大使的干涉，第二天被迫将她释放了）。这使她的堂弟杜亚尔特·努诺感到嫉妒。

现在应回过头来谈谈共和国五十周年的事。

人民对共和制的感情并没有因为数十年来系统的反对第一共和国的人物及其业绩的宣传而磨灭。相反，政府不断的攻击反而使共和党人在民众中的声望增高，并在青年中激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好奇和兴趣……

正是为了发展和深化这一运动（因为人们认识到必须恢复由于 5 月 28 日事件而中断的进程），反对派才成立了一个统一委员会来推动共和国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其目的是促进研究共和国短短的 16 年中所进行的、被严重丑化了的事业，在各种刊物上并通过组织一次展览会宣扬这一业绩（展览会将在费尔南·博托·马查多共和国中心的小厅里举办，它虽然很简单，但意义重大）。活动的最高潮是我们试图举行一次民众示威游行。这次游行从 10 月 5 日传统的朝圣地——圣若奥高地出发，前往佩洛里尼奥广场的市政厅，因为 1910 年在这里庄严地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

正如所料，当局借口政府是组织庆祝活动的最有资格的机构，极力对庆祝活动制造困难，当局阻止报纸用我们希望的版面报道这一天的活动，特别是通过布置大批警察竭力阻止计划好的群众游行。

虽然发生了种种意外事件（如警察驱散示威者，人们四处奔逃，而后又重新汇集在一起），但是游行还是按计划举行了。游行

队伍（虽然人数已不多），穿过长长的雷斯海军上将大街，最后还是到了市政厅广场。我未能走那么远，因为游行刚刚进入雷斯海军上将大街，我便被警察拦住，当场被捕，这并导致了一些冲突和意外事件。我被押送到阿罗尤斯警察分局。不久，阿卡西奥·戈维亚在很多朋友的陪同下喊叫着来到这里。他显然也被捕了，因为他做了我所做的事。

我记得分局门口有一个小房间，我们被关进那里（里面还挤满了武装警察，他们神经高度紧张，正等待行动的命令）。还有少数人是在冲突时偶然被捕的。他们命令我们坐在一条长凳上，面对一张写字台，写字台的后面坐着警察分局的局长。一名被捕者的癫痫病突然发作，卫兵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控制住。刚刚平静下来时，阿卡西奥·戈维亚进来了，跟着索罗梅纽也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坐在我身边，同我小声交谈。那个愚蠢的分局长呆呆地望着我们，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随后他大吼一声，吼声使整个阿罗尤斯分局都震动了。

“把这个胖子给我赶出去！立刻赶出去！”

在阿卡西奥·戈维亚愤怒的抗议中，警察们这样做了。当那位头头看到他终于出去了的时候，才用手擦了一下脑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随后又注意到索罗梅纽还呆在那里。

“那么，先生，您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马里奥·苏亚雷斯博士的律师”，索罗梅纽不动声色地说。

“律师?！岂有此理！这里没有律师的事！”那个头头喊叫着，也强迫他出去。

几小时之后，我就被转送到“毕得”手中，经过象征性的盘问之后，又被送到了阿尔茹贝。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著名的恶梦般的“小号”。“小号”是一种小牢房，面向走廊，几乎没有光线，宽5

“掌”，长15“掌”[①]，唯一的家具是安在墙上的一块木板，可以抬起来，放下去，是一张临时的床、上面有一条旧褥子和两条棉毯。犯人在上面睡觉，没有床单。这是在60年代初给我的一个温和的警告。对于我来说，60年代将永远铭刻在心。我永远不会忘记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也就是在这期间，在贾伊梅·科特桑的鼓舞和我们的教授马里奥·阿泽维多·戈麦斯（我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的积极参加下，我们开始为“共和国民主化纲领”进行工作。

在所有的竞选运动中，那些向当局献媚的人对我们指责最多的是：反对派是一群各种势力组成的乌合之众，没有能力对组成政府的共同纲领取得一致。他们说：“反对派没有，也不可能有纲领，因为它仅仅是为了反对和破坏政权才偶然联合起来的！”

毫无疑问，“新政”曾无一例外地取缔了全部持民主观点的派别（共和党人、自由派人士、共济会、君主立宪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民主基督党人及形形色色的左派）。毫不奇怪，在反对派内部会有派别、政党和不同甚至是敌对的观点。这远不是软弱的象征，恰恰相反，是强大和有生命力的象征。关键在于他们必须善于采取共同行动，至少是协调的行动以反对他们唯一真正的敌人——法西斯。为此，每一个运动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自主的组织形式，这是取得普遍谅解的最可靠的道路。任何一方都不要有意伤人，也不要有称霸的企图。

“共和国民主化纲领”不是一项所有反对派都要签署的最低纲领。这个纲领谨慎地限定了一些大的框框。在这方面，各种政

---

① 掌（Palmo）：掌尺，宽约4时，长约8时。

治思想派别之间不存在协议或者争论，这也不是已经确定的目标。在当时，这个纲领不想成为、也不可能成为象“全国反法西斯运动”成立时拟定的纲领性公报那样的一个单纯的总则声明。它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已经是一项内容严谨的纲领，确定了中左派的思想体系和连续性政策。这一纲领可能为推翻萨拉查的法西斯主义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其目的是使国内外认识到存在一条欧洲式的思想路线，可以在任何有利的时机掌握政权，填补萨拉查主义造成的“政治真空”，从而驳斥了官方宣传的荒唐论点：即代替萨拉查的唯一选择是“共产主义或者混乱”。

它不是象后来警察宣扬的那样，是一个为军事政变或酝酿中的一场革命服务的政治纲领。它仅仅是一项纯政治性的建议，旨在以高度的责任感宣传存在一项适于全国所有公共管理部门的政治方针。这些方针是由一些有能力执行这项方针的著名人士制定的。因此，尽管引起了严重的误解，但它仍在葡萄牙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了某些新东西。

纲领中的大部分思想是由在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坚强领导下的“共和抵抗”小组提出的。戈麦斯教授在理论上与这个小组完全一致。但是，由于这时曼奴艾尔·门德斯与费尔南多·桑托斯在提名阿基利诺·里贝洛（他由于出版《葡萄牙国王的伟大与渺小》，特别是《当狼嗥时》，而受到政府的强烈抨击）在诺贝尔奖候选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以及贾伊梅·科特桑领导的葡萄牙作家协会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暧昧态度，曼奴艾尔·门德斯退出了这个“小组”，没有参加这个纲领的起草工作。

纲领几乎全部是由若泽·桑托斯、拉莫斯·科斯塔、皮特拉·桑托斯和我组成的一个小组起草的（在阿泽维多·戈麦斯的领导下，我们组成了起草委员会）。但是，纲领根本不代表我们这个明显左倾集团的“思想”，因为它把右派甚至自由和中间共和

党人(阿卡西奥·戈维亚一类人)的思想包括在内了,甚至还扩大到"新天地"集团。当时这个集团由尼克亚斯·斯卡皮纳斯、路易·卡贝萨达斯等人组成。

获得"新天地"派的合作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当时"新天地"派中的很多人对共产党的批评特别敏感。共产党对纲领中确立完全自立的政治方针不满。

在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经常聚会。他们都是有良好愿望的同代人,尽管在有关国家某些问题的最可行的解决办法方面立场不同,但是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力图在不断的对话和接触中建立桥梁,扩大共同点,消除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马里奥·路易沃、尼克亚斯·斯卡皮纳克斯、若奥·戈麦斯、曼奴艾尔·塞托里奥(去避难之前)、利诺·内图、佛朗西斯科·泽尼亚和我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当时在为葡萄牙的政治生活输入新鲜空气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为扩大纲领签署人的影响作出了贡献。

起草"共和国民主化纲领"基础文件的任务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我们必须向官方机构(甚至部委)技术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醉生梦死)进行咨询,因为在葡萄牙,政治和经济信息是"国家机密",所以咨询对了解当前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除此而外,还出现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例如:海外领地(尽管当时尚未进行战争)、对外政策、取缔社团组织、为加速发展而进行的经济改组、土地改革、社会政策等等。

这样,完成第一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从讨论到定稿开了数十次全体会议,每次会议都长达数小时。因此,该纲领所注日期虽是1961年1月31日,而直到5月中旬才在一次"秘密"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于众。所谓"秘密"是因为招待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阿卡西奥·戈维亚的办公室里举行的,但是直到记

者招待会后，“毕得”对此还一无所知！

第二天清晨，我们为其“后果”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阿卡西奥·戈维亚、古斯塔沃·索罗梅纽和我被捕了！随后，根据“毕得”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另外62位在纲领上签名的人也在不同时间内在全国各地相继被捕。当时，我有幸成为这场官司中最引人注目的人。没有正式的罪名，我便被监禁了六个月。其次是阿卡西奥·戈维亚，他被关押了四个半月，其他人被关押的时间各不相同，有的只被关了短短的几个小时……

在长达六个月的起诉审理中，我一直确信这个案件将不会到审判阶段。如果这样，它实际上将是对政权本身的审判！后来，在1961年竞选期间，由于反对派候选人施加的压力，这个纲领终于在各家日报全文发表，并且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即使是这样，我们在若干年内始终戴着保释出狱的帽子。起诉处于自相矛盾的审理阶段，它就象一把悬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最后，当全篇废话的起诉案卷已堆积如山，多达14或15卷时，如同惯例一样，我们终于获得赦免。这些案卷将来会有重要用途的，它是一段历史的宝贵财富！

“共和国民主化纲领”在某些问题上过分谨小慎微，而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在有关海外领地政策的论述上）已完全过时，因为纲领是在安哥拉事件前几个月制定的。这样，它提出的解决办法现在已失去价值。但是，总的来说，它提出了大胆而可行的一整套思想和解决办法。如果这些思想和办法能够得以贯彻和实行，将会深刻地改变国家的面貌，使国家避免许多目前遇到的困难。它是为确定一种完全现实的民主选择而进行的一次认真的尝试。这种尝试涉及到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所有领域，并力图提高国民的觉悟。为了使共和国在进步和现代化方面重新焕发青春，它也许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系统陈述国家重大问题并

提出可行性解决办法的第一部草图。因此，它将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困难时代的里程碑永垂史册。

·9·

巨大的转折

1961年是葡萄牙政治生活中巨大转折的一年。由于政府的僵硬刻板，长期在激烈冲突的变化过程中聚积起来的各种内外矛盾因找不到任何可能的解决办法而激发了突变事件，从各方面给当局造成了极其尖锐的困难。正如人们记得的那样，1961年是这样的一年：恩里克·加尔旺领导了对圣·玛丽亚号游船的袭击(1月)；爆发了安哥拉战争(2—3月)；国防部长博特辽·莫尼斯发动了未遂政变(3月)；政府改组，萨拉查兼任国防部长，阿德里安诺·莫雷拉兼任海外部长(3月)；共和国民主化纲领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纲领签名者的监禁(5—11月)；在选举斗争中反对党第一次提出了海外自决问题(10—11月)；一架葡萄牙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飞行中被埃米尼奥·伊纳西奥胁迫到里斯本上空，并投下了反对选举闹剧的声明(11月)；印度联邦的军队入侵果阿、达曼和第乌，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度州的丢失(12月)；贝雅暴动(年末的夜晚)。

奇妙而又真实的是萨拉查由于以恶魔般的狂怒抓住权力，竟在这些事变中逃过了灭顶之灾。几乎所有这些事变都具有足以在一个舆论国家里推翻任何政府的爆炸力。这本是合乎逻辑的和不足为奇的！但是在葡萄牙却是例外，因为在葡萄牙公众舆论是受压制的，人们无法听到舆论的声音。

此外，面对如此众多复杂的问题——这是到那时为止所执行的政策缺乏预见性以及在许多情况下软弱无能的直接结果——任何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会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变疑惧不安。如果他不自愿放弃权力的话，至少也会同其他政治力量进行讨论，一起找到最好的全国性解决办法。葡萄牙的未来、葡萄牙子孙后代的未来正处于危险关头！对给葡萄牙民族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政府的非洲政策进行公民投票已势在必行。而萨拉查并不这样认为！尽管他个人对祖国的不幸负有最大的罪责，但他却依然故我，躲在非人道的傲慢和自满之中，不接受任何变革的思想，拒绝让步！这样，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他既不征求也不愿听取（更不愿弄清）别人的意见，国家被迫沿着一条最糟糕的、在几十年中将消极地制约着民族总命运的道路走下去……

在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爆发民族主义运动是很容易预见的，其原因是在战后的年代里出现了普遍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以为在其统治下的非洲人民落后，或以为为掩盖帝国的存在（正如多年前傲慢地宣布的那样）而蓄意制定的法律条文可以使葡萄牙不受这一进程的影响是愚蠢的、纯粹虚伪的想法。诺顿·马托斯在 1949 年就提请国人注意：防止海外问题在国家上空笼罩的乌云。在诺顿·马托斯前后，帕伊瓦·科塞罗、安东尼奥·塞尔吉奥和库尼亚·列阿尔等人都不厌其烦地向政府提出了从实行殖民法开始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祥的结果。没有人听他们的劝告！更糟糕的是：竭力防止国民了解真相。当时，对内阁总理来说，海外是个难以捉摸的、遥远的、不值得关心的问题。萨拉查执政那么多年，难道曾想到访问海外、了解海外、直接接触海外问题吗？

从 1951 年起，在没有遇到多大的反对和困难的情况下，正式调整了到那时为止所执行的殖民政策。1958 年，我们终于加

入了联合国——用萨拉查本人的话来说，这只不过是一枚“小钱”！当时人们试图披露由殖民法和帝国主义、墨索里尼式的政策所带来的一些最严重的错误。195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匆匆忙忙地将“殖民地”改为“海外省”，把“帝国”改为多种族的和跨洲的统一国家——这一修正案为时已晚，既没有改变潜在的基本现实，也欺骗不了任何人。政府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在坚持原来的错误——认为海外的问题，不论大小，都是警察可以控制的简单问题，始终可以用在宗主国使用的同样镇压方法平息土著人的合法愿望。事实上，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和整个海外，早在武装斗争真正开始之前就发生过叛乱、罢工、广泛的抗议运动及至真正的起义（如1953年在圣多美爆发的巴特帕起义），这些起义被最大的暴力镇压下去了，而被剥夺了新闻媒介的宗主国居民竟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些动乱是警告信号，预示着政府不改弦更张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可没有人理睬！真正的问题被偷偷地掩盖起来了。象往常一样，沉闷的气氛使葡萄牙公民不可能了解真相。就连反对派的负责人士，直到武装斗争爆发时还不了解曾发生的多次暴力事件。很明显，从这块积蓄着仇恨种子的土地上，只能收获可怕的风暴……。

在“殖民冒险”一章中，我将尽可能详尽地介绍葡萄牙在20世纪下半叶是如何被萨拉查政府的顽固和眼光短浅拖垮的——那时，老的殖民强国已经改弦更张（并非象萨拉查所认为的是由于虚弱，而是由于聪明），并为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获得独立开辟了比较顺利的道路。与此同时，葡萄牙这个经济上已殖民化的殖民强国却自负而愚蠢地顶着“历史之风”。真是莫名其妙！眼下，有必要对战争的第一年，即1961年全国范围的戏剧性事件的背景作一介绍。

大约在 1960 年，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到达巴西。他在致葡萄牙人民的第一封信中写到："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葡萄牙人都渴望着摆脱一个人的统治，这个人不了解感情的价值，认为感情可以通过贿赂去收买，用警察和武器的暴力来维持。我们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们大家要有信心，奋起抵抗，投入行动！"

在同流亡在巴西的葡萄牙人——如奥利维拉·皮奥、萨尔门托·皮门特尔、费尔南多·克罗加、保罗·卡斯特洛，以及后来同已到达阿根廷的恩里克·加尔旺——的接触中，翁伯托·德尔加多试图重新组织具有明显革命性质的民族独立运动(MNI)。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着手实施这一逐渐失去了其全部活力的计划。

对德尔加多将军在巴西和流亡中从事政治——革命活动的历史众说纷纭。我想强调指出，我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的了解并不详细。除了一些直接的见证外，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的书籍，提供了重要而又相互矛盾的材料。对这些书争论很大，如翁伯托·德尔加多本人的"葡萄牙的飓风"。恩里克·加尔旺的"神圣的自由"和"我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以及费尔南多·格伊罗加的"反对假解放者"。

事实上巴西把翁伯托·德尔加多当成真正的英雄予以接待，并被尊崇为无可争议的葡萄牙反对派领袖。那时，巴西的政治气氛非常有利。只要有起码的政治才能，德尔加多就能利用巴西人民同情葡萄牙民主事业的巨大的力量，还有可能利用旅居在巴西的葡萄牙侨民(虽然葡萄牙侨民在传统上是反动的)建立起伟大的解放运动。可惜的是，他一事无成，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互相攻讦的争吵之中：发表声明，公开采取了不协调的态度，大大降低了他的声誉。他是一个不善于避开棘手局面，而且是往往不能恰当地考虑别人感情的人。因此，在巴西居住了一段时间以

后，翁伯托·德尔加多的处境相当孤立，已无力充当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运动要求他充当的鼓动者的角色。

应该指出，在那个复杂的退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有朝一日会大白于天下的阴谋诡计。而德尔加多及其他反对派领导人成了由一批可疑的、利用出现的对立和矛盾为当局服务的人所煽起的有组织的腐蚀运动的牺牲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翁伯托·德尔加多卷入了可悲的冲突之中，没有采取人们在那种困难的时刻希望他采取的态度。

在同西班牙流亡者的接触中，两个反对派运动之间签订了相互帮助的协定。西班牙方面是由流亡政府主席埃雷拉将军签署的。勿庸置疑，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声援行动，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而且西班牙流亡者还在圣保罗的一家“商店”里举行的仪式上介绍翁伯托·德尔加多加入共济会。

但是，作为公开的反对派首领，他在进行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密谋工作。因为他的性格使他乐此不疲。他在两个方面的活动的混乱状态必然产生不幸的结果。

就在那时，出现了“解放伊比利亚革命领导中心”(DRIL)。至少在第一阶段，该中心声称得到德尔加多将军的支持。但是，除了在西班牙搞些活动外——该组织声称自己搞了一些炸弹爆炸和一些小的破坏——他们没有开展任何有效的工作，仅限于发表一些恐吓性的东西，到头来并不实施……而革命的“金科玉律”——如贝纳迪诺·马萨多所说——是“做而不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袭击圣·马丽亚号游轮事件。从理论上讲，袭击是以领导中心的名义干的。“解放伊比利亚革命领导中心”——按照一位意大利记者的讲法——“是本世纪最大的广告企业”。

事件本身引起种种猜测，甚至异乎寻常地激动了全世界。一

小撮亡命徒占领了一条有几百名乘客的游轮，使它偏离正常的航线，让船在“神圣自由”这一浪漫的名义下在大西洋中游弋，使得英国和美国的舰队在它的后面追踪。这确是一件令人瞩目的壮举！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整天守在收音机旁寻找各国的广播，而听到的全是“圣·马丽亚”的名字，几乎没有别的消息！对象萨拉查这样一个终生沉默寡言、在不受别人干扰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编织个人政治阴谋的人来讲，可以想象得出，加尔旺的这一行动给葡萄牙造成的局面是多么让他尴尬，而又无计可施！

但是，组织者的初衷显然不是借“杜尔西内亚行动”达到宣传目的。那么是什么呢？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始终没有弄清。众所周知，袭击事件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为。据认为，行动的主谋是两名西班牙人——西班牙内战中的老战士索托马约尔和戎凯拉，仅仅因为该船是葡萄牙船，加尔旺才成了理论上的首领。

另一方面，正如所预见的那样，不应该仅仅“收回”一条船，而应该“收回”几条船——按照一项大型的、到最后一刻因为缺乏手段没有能实现的计划。这也是在行动期间和行动之后在恩里克·加尔旺和上述西班牙人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原因。

关于圣·玛丽亚号游船的目的地，人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设想。去安哥拉吗？2月4日（请注意！）那里发生了对罗安达监狱的第一次袭击。有人一直企图把两件前后发生差不多的事连在一起。然而我不相信，因为地理上相距非常遥远，而且思想与近期、长期的政治目的都很不相同的人和运动的行动不可能这么同步。或是在马那利群岛登陆，以便把西班牙流亡政府转移到那里去吗？很显然，一小伙“袭击者”没有这样做的军事能力，即使有其他地方的帮助和同谋。那么目的地是巴西吗？在巴西，加尔旺有合法的入境权，又可以得到刚刚担任共和国总统职务的雅

尼奥·夸德罗斯总统的同情。

如果圣·玛丽亚号的最终意图还不清楚的话，那么无疑在政治上却是一次非常有利的行动——它比任何其他行动都更能向世界舆论说明葡萄牙政权的真正警察性质。

波尔图的一班善于思考的看风使舵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着曼奴艾尔·门德斯的面评论这件事。其中一位恶作剧般地问他：

“加尔旺在搞什么鬼？为什么干这种毫无结果的事？”

对此，门德斯象往常一样讥讽地回答说：“他头脑里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驱散了你们的睡意，对，驱散了……”

对广大公众来说，圣·玛丽亚号行动的背后有德尔加多将军的插手，是在“反对派首领”许可下干的。但是实际上，德尔加多只是从半官方的通讯社那里获悉“袭击事件”的，他并不是一个愿把荣誉让给别人的人。这样在德尔加多和加尔旺之间很快出现了可悲的冲突，它把最积极的反对派成员平均分为两个敌对的团伙，并给反对派整体带来了非常不幸的后果！但是这一切却构成了所谓的小故事……

许多年以后，当我在巴西时，觉得应该看望一下恩里克·加尔旺，他因患一种大脑软化病住在一家精神病医院里。我和加尔旺从来没有深交，只和他谈过两次话，而且两次都是在圣·克拉拉法院——第一次是在审判我的父亲时，后来一次是在审判他自己时。另一方面，我对他的思想和政治行动从来没有特别同情过——或者说，我同他的思想几乎一直有分歧。此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家人），都抛弃了他。他不省人事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觉得应该关心他。不论他有什么样的缺点，他毕竟是一个以非凡的胆略战斗过、并且把一切都献给了反对萨拉查主义的人。

于是在他的一个患难之交、典型的奉献者安东尼奥·里巴

斯的陪同下，我去看望了他。他穿着衣服躺在一间极普通的病房里。他没有认出我！我向他谈起他的律师、我的同事和好朋友瓦斯科·费尔南德斯，他竟记不得了！他以冷淡的态度向我要烟抽。在开始抽烟后，又极其悲伤地问我他为什么被监禁。我说他不是被监禁，他在这里是为了治病。他坚持说：那么为什么不让我回葡萄牙？我对他解释说，这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并脱口说道："现在萨拉查已经死了。"从政治上讲，我是说……

加尔旺象被看不见的弹簧推了一下，从床上跳起来，以异样的声调和旧时的有力声音喊道：

"这不是真的！萨拉查不能死，因为我要杀死他！"

这是我对圣·玛丽亚号事件制造者的最后回忆。实在可悲！

与人们普遍揣测的相反，1961 年 3 月由波特辽·莫尼斯发动的所谓政变决不是由安哥拉事件引起的，虽然这次政变与安哥拉事件相继发生。事实是，一种潜伏的、随时可能突然爆发的密谋活动一直在武装部队中存在着。武装部队对当局的不满是非常大的。军官和他们的下属不断要求最高统帅部采取行动。统帅部接受了来自下面的压力，但要利用有利时机并推出克拉维罗·洛佩斯元帅作掩护。他与萨拉查的对抗情绪是尽人皆知的，他还鼓励仍处在准备阶段的密谋活动。

军队的不满突出表现在对国防部长桑托斯·科斯塔的仇恨，武装部队几乎一致地反对他。为了解除潜伏的密谋活动的武装，萨拉查于 1958 年总统"选举"后及时地让儒利奥·莫尼斯接替了桑托斯·科斯塔。从某种意义上讲，莫尼斯应该是武装部队强加于萨拉查的。至少历史是这样以为的……

从此以后，波特辽·莫尼斯的名字就引起了传统的反对派的仇恨。提到他，人们会立刻想到西班牙战争中葡萄牙的"志愿

军”；对 1940 年大罢工的残酷镇压（罢工工人被圈在小广场的斗牛场内）及“工业动员”。马托斯竞选期间“葡萄牙俱乐部电台”播出的下流节目“闲谈”；以及在此之前趾高气扬的“西多尼尉官”。这位著名的波特辽·莫尼斯名叫儒利奥，因为他还有一个名叫若瑟的兄弟（1945 年民主团结运动期间任内政部长）。他现在成为萨拉查（或武装部队）选中的用来消除军队普遍不满的人。当然，桑托斯·科斯塔这个多年来一直作为武装部队的独裁者（副国务秘书、战争部长、国防部长）的去职多少缓和了存在的不满情绪。

然而，虽有上述这些法西斯经历（不仅是他本人的经历，还有他家人的经历），儒利奥·莫尼斯好象在入主国防部之前就参与了秘密的反萨拉查活动，波特辽·莫尼斯的亲密朋友和同谋卡瓦略·席尔瓦也曾这样断言。他多次到我办公室里，以掩饰不住的兴奋故弄玄虚地对我说：“现在好啦！儒利奥已下定了决心！只待最后调兵遣将发动政变了。”

他说的次数太多，以至于听的人都不再为之激动。但是我知道，一些事情确实在准备着——武装部队从上到下都有秘密的言谈、接触和会议！

德尔加多告诉我，当他与儒利奥·莫尼斯及另外两名记不得姓名的军官一起晋升为将军时，他曾对他们说：“我们的军事生涯已经到顶，现在我们要驱逐萨拉查以尽道义和爱国的义务！”其他人都深表赞同甚至还就此达成了口头协议。协议未能履行，但值得赞赏……

另外，波特辽·莫尼斯兄弟在“5.28”之前已加入了库尼亚·列阿尔的党，同他一直有接触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友好关系。特别是若瑟同前内阁总理门德斯·卡贝萨达斯海军上将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儒利奥的一个好

朋友莫列拉·洛佩斯中尉(后晋升为中校)和马里奥·佩索阿、戴维·内图、卡瓦略·席尔瓦等人一样,是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武装部队中不仅有一起,而是有好几起密谋活动。它们常常以不同的人物为核心(将校和尉官),有时互不知晓,而有时又通过同双方都有关系的人保持着短暂的接触。波特辽·莫尼斯未遂的"3·11政变"和贝雅暴动(之所以谈到它们是因为这两次事件具有某种代表性),尽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但却有着奇怪而又明显的联系。原因是大家都在利用同一个不满的背景,有时又是通过同一些人……

波特辽·莫尼斯政变的真相如何呢?要确切弄清当时的情况是很困难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政变的主角还没有说过话。公开发表的"说法"又可能是被故意歪曲了的。另外传出的一些由参与政变的几个兵种的高级指挥部签署的、反映政变概貌的信件又从未被否认过。看来,国防部长是确信武装部队主要指挥官一致同意取代萨拉查政府的。有力的证据是,他曾警告共和国总统要配合行动,不过仅此而已。但是,阿梅里科·托马斯要求有24小时的思考时间,他的要求被慷慨地应允了。在这期间,得到风声的萨拉查撤换了指挥官们,接着进行了政府改组。萨拉查没有被驱逐,波特辽·莫尼斯却被驱逐了……

差不多在这些事情发生两年后,我以律师身份参加了对贝雅叛乱分子的审判,了解了大量的内幕情况。那时,或者说在那以前,我就反复问自己:波特辽·莫尼斯是真的要发动政变呢,还是仅仅这样想过?事实上,如果要达到目的(他了解自己的同志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和胆怯的毛病),就不该把主动权交到总统手上,因为总统对萨拉查的忠诚是不能忽视的……

记得那天晚上我同曼奴艾尔·门德斯在一家名为"避风港"

的小酒馆里共进晚餐。我们随后走访了一些报纸的编辑部，试图嗅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毫无疑问，消息灵通人士都认为萨拉查的末日到了。正如若昂·萨卡斯所说，密谋活动到最后时刻就象一个孕妇，是掩盖不住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怀疑取代独裁者不可能通过如此容易的、几近温和的方式。

后来我们在罗西奥碰到曼奴艾尔、卡塔里诺·杜阿尔特——与密谋活动一直有联系的老共和主义者——他告诉我们，有谣传说政变在最后一刻遇到了困难。什么困难呢？"我不知道，总之那家伙没事！"里斯本城里一片沉静，兵营附近没有任何异常行动，也看不到警察的影子。后来，我们来到费尔南多·费朗的办公室，他有工作到深夜的习惯。他已获悉萨拉查赢了这一局并将于第二天向全国发表安哥拉事件(那时公众还很不了解)和内阁改组的消息。萨拉查将临时兼任国防部长职务，到这时还仅仅担任海外部副国务秘书的阿德里亚诺·莫雷拉将升迁为部长，在过去 24 小时里行动频繁的考尔扎·阿里加将进入政府，任航空副国务秘书。

在费朗的办公室里，我们遇到了焦虑不安的马丽亚·埃米莉亚，她是曼奴艾尔·莫拉斯的妻子，刚带着很小的孩子从罗安达逃回来。她已经知道丈夫被"毕得"逮捕了，并同被指控进行恐怖活动的黑人关在一起。她完全有理由担心丈夫的生命。

我们决定给阿德里亚诺·莫雷拉拍一封电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祝贺这位高贵的部长。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某某，1948年与您在阿尔茹贝监狱一起坐牢的难友刚刚获悉你的难友莫拉斯被投入罗安达的监狱。他们自然为他的生命担心并呼吁立即释放他。如有不测，将唯你是问。"签署这封电报的有：曼奴艾尔·门德斯、阿布兰谢斯——费朗、费尔南多·马约尔·卡尔桑、阿卡西奥·戈维亚、佛朗西斯科、泽尼亚和我。

我们从未得到答复。大约 8 天后，我们有幸能在里斯本拥抱我们可爱的朋友迪托·莫拉斯。当他到来的时候，他真诚地对我们说："诸位救了我的命！"

这样，我们在波特辽·莫尼斯发动未遂政变的不眠之夜没有完全虚度。

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反对派并没有停止活动。经过多年的内部分裂之后，反对派认识到已经到了协调努力、联合力量、成功地同萨拉查主义作斗争的时刻了。国际环境、两个集团之间某种程度的解冻气氛也有利于反对派同共产党——其宗派主义已比以前减少——建立接触。后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胜利推动了革命斗争，它向许多渴望行动的葡萄牙人证明：有可能使真正的、能把葡萄牙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工作推向前进。在移居国外的葡萄牙政治家的活动（特别是德尔加多和加尔旺的活动）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们的活动相距太远，过于分散，使人们感到需要有一个以国内为基地的协调委员会。这样，就诞生了"爱国委员会"或"爱国行动委员会"运动。稍后，当该运动在阿尔及尔站住脚时，又改名为"全国解放爱国阵线"。

法庭根据"毕得"提供的材料，在其"案件"引言中裁定"爱国委员会"的行动纯属共产党的伪装。为此，只要证实（人们知道这种"证实"是如何进行的）某人属于某一爱国委员会，仅仅因为这一简单事实，就可判他长期监禁（二年以上），并对之施行臭名昭著的、可无限期延长的"安全措施"。

警察的说法完全是谎言。"爱国委员会"是 1959 年末、1960 年初（至少是贝雅叛乱之后），即 1963 年"爱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站住脚后才成立的。"爱国委员会"是联合组织，由各个反对法西斯的政治派别（自由共和派、共济会、社会民主派、社会主义

者、共产党人、天主教徒）的代表组成。在这个联合组织中，特别是在其高层，共产党远远不占多数。

由于警察对“爱国委员会”的镇压，运动没有持续多久，特别是在国内。但是，这却是恢复战争最后几年反法西斯情谊、克服旧日的不信任和积怨、可能奠定大规模的解放运动的有效基础的时刻。当时的情况以及人们的某些错误未能奠定这样的基础。

尼基亚斯、斯卡皮纳基斯的案子（据我所知，此案没有进入审判阶段）、阿尔林多·雅森特的案子、安东尼奥·阿雷奥萨·费若的案子以及路易斯·阿马多的案子（泽尼亚、利诺·内图和我的名字被警察大量地提到）说明了葡萄牙这个时期的情况。

正如我所说过的，1961 年 5 月，我因为散发“共和国民主化纲领”而被捕，先后被关在阿尔茹贝监狱和卡西亚斯监狱，几乎一直同阿卡西奥·戈维亚在一起。他是第一次痛苦地尝到坐监狱的滋味。此外，在阿尔茹贝监狱，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当我们在相互隔绝的单间里被囚禁了 8 天以后，被转移到阿尔茹贝监狱最高一层，这一层被称作病房。在这里，我们仍被相互隔开关在小房间里。每间牢房都有一个对着天井的窗子，里面有真正的床，特别是有床单！

若泽·马尔丁斯先生在那里当狱卒。我很早就认识他，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每次进阿尔茹贝监狱，他总是问我：“你父亲好吗？”马尔丁斯是个谦虚的好人——尽可能远的避开政治事物——但是，由于看到这么多人受苦，而且还不得不在如此的不公正面前保持沉默，他终于对警察产生了深深的愤怒。因此，他不失时机地表示对犯人们的同情，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帮犯人们点小忙，虽然这种帮忙差不多只是纯人道性的。

当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单独看到马尔丁斯时，就问他狱中的

难友都是些什么人。他对我说："有许多人我不认识，你的旁边是平托·安德拉特神父，他是一个黑人，整天祈祷。在你的前边是阿卡西奥·戈维亚博士。你要同他们谈话吗？我给你开开门……五分钟以内看守是不会来的！"

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平托·安德拉特神父，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如果我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面前，他肯定会认为这是"毕得"的圈套。而对于阿卡西奥，由于他完全信任我，我为什么不同他谈谈呢？我向他要了钥匙，得意洋洋地亲自打开了门。

阿卡西奥躺在床上，准是在计算着生活，以消遣漫长的寂寞时光——没有书报看，也没有纸写字。当看见我单独打开门，而没有任何看守跟着时，他感到迷惑不解。当我对他说"阿卡西奥，快收拾东西！萨拉查倒台了，我们接管了监狱"时，他更加迷惑不解。

他那副惊呆了的样子使我害怕起来。我不能再跟他开玩笑了，我不是去那里给他添乱的！

可怜的马尔丁斯，几年后不幸被捕。据说一个名叫罗兰多·维尔迪亚尔的人告发了他，此人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后来投靠了警察。马尔丁斯出庭受审——我出席了对他的审判——却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但法庭又宣布对他实行拘留性政治安全措施（虽然他并没有罪）。就这样，他最终还是坐了多年的牢。这是一例法律上的丑闻。佛朗西斯科·泽尼亚就此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最高法院没有受理……

我被关到1961年11月4日——这一天是全国议会会议选举运动结束的一天。因此我未能参加1961年的选举，对选举情况也很不了解。因为那时我蹲在卡西亚斯堡监狱里，而监狱里只许我们看一种日报——当然是《新闻日报》。《新闻日报》上没有任何选举斗争的消息。我知道反对派在一些选区（其中包括里斯

本和波尔图选区）以一个统一的名单参加了竞选，并开展了一场大胆的有生气的竞选运动。11月6日，由反对派候选人签署的、要求政府下台的请愿书递交给了共和国总统。第二天，在投票的最后关头（选举于12日进行），全体反对派候选人却退出竞选，象往常一样，理由是投票缺乏起码的监督保证……

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安哥拉北方的暴动引起的巨大的感情冲突（暴动之后发生了可怕的屠杀）增加了选举运动的困难。里斯本的利诺·内图、瓦雷拉·戈麦斯和波尔图的安东尼奥·马塞多、卡尔·布兰当大胆地提出了殖民战争的问题。反对派的思想毫无疑问有利于土著居民的自决权，而且有利于揭露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政府的立场是绝不妥协的，只是由于担心它的行动引起国际反响而稍稍控制了一点镇压的欲望……

法院释放了费尔南多·费朗、拉莫斯·科斯塔、皮特拉·桑托斯、奥门·菲格雷多和我。我们是“共和国民主化纲领”一案中仍被关押的最后几个人。命令大约在下午6点钟左右传到了卡西亚斯监狱。由于预先得到了律师的通知，我们的家人同拿着释放我们命令的听差一起到了卡西亚斯监狱。通过墙上信号机——这是政治监狱里的一个奇迹，我们马上知道自己就要出狱了。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一点也没有我们出狱的迹象。9点半就寝时，狱官照例开始清点犯人的数目。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只得躺下。离午夜还差五分钟时，灯重新亮了，我们听到了神圣的呼叫：“某某先生，准备离开这个监狱！”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呼叫名字，每隔10分钟叫一个人……对此，费尔南多·费朗象往常一样幽默地说：“怎么？！这个时候？这不是把人赶到大街上的时候啊……”

一大清早我们出了监狱，见到了因长久等待而冻得发僵的可怜的家人。后来才知道，原来“毕得”是怕我们出现在特林达德

剧场，因为那里当时正在进行最后一次选举宣传。

几年后，一件大白于天下的事实使人们又回忆起了那次“选举”。埃米尼奥·伊纳西奥当时劫持了一架飞行中的葡萄牙航空公司的飞机，迫使它飞到里斯本和其他地方的上空，投下了揭露“选举骗局”的传单。

这是革命突击队的一次行动，由帕尔马·伊纳西奥（因1947年破坏辛特拉机场的飞机和第二年从阿尔茹贝监狱勇敢地越狱而出名）指挥的。这次劫持葡萄牙航空公司飞机的大胆行为标志着帕尔马重新开始了革命活动（因为流放到北美洲和巴西而间断了十多年）。他在革命活动中脱颖而出，这一点我们下面还将谈到……

1961年12月是异常热闹的一个月。4日，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从卡西亚斯堡监狱越狱逃走，前面已经提到此事。这是一件引起轰动的事，只有象我这样长期蹲过卡西亚斯监狱并了解其戒备森严的人才能准确地评价此事。逃犯们在一个“苦力”（指同警察当局合作，每天干杂活的犯人）的帮助下，利用希特勒赠给萨拉查的装甲车逃跑。装甲车当然是防弹的……。这辆车停放在卡西亚斯地下的所谓“娱乐场”附近，它曾使阿布兰谢斯——费朗着迷。当我们被捕入狱时，他曾一本正经地建议买下这辆装甲车。

可是，如果不认真地弥补，海外国家保安警察遭到的这类挫折今后还会发生。暴力镇压加强了：12月16日，职业雕刻家，共产党员迪亚斯·科埃辽在阿尔康塔拉大街上被惨酷地杀害了！

年轻时，我就在“青年M·U·D”中认识了迪亚斯·科埃辽，当时他是美术学校的代表。他是一个直率的、坦诚的、有时有些粗鲁的人，具有深深的同情心。我对他一直非常敬佩！由于地

下工作的艰苦生活，他未能发挥其全部艺术才能。至今我还记得迪亚斯·科埃辽的暗喻卡塔里娜·欧费来亚——1954 年 5 月被杀害的女农民——之死的木刻。

迪亚斯·科埃辽遭到了同样悲惨的命运。不幸的国家！

许多年以后，在 1969 年的选举运动中，我遇到了迪亚斯·科埃辽被害时的目击者，一个当时在马格斯·庞巴尔工业学校上学的小伙子。他告诉我，迪亚斯·科埃辽正准备逃走，但是追踪者射出的手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很自然，这件事引起了就在附近的工业学校的极大震惊。一些非常敏感的学生打算查清所发生的事情并为此找到校长，请他干预。校长因为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果然到警察局去了。当他回来时，面带难色地对焦急等待着他的男孩子们说："这是一件复杂的案子，已交海外国家保安警察处理。最好忘掉这件事，以免引起更大的不快！"

这年的 12 月对葡萄牙来说是悲惨的，因为她丢掉了印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丢掉了"葡萄牙的印度州"！

在外交领域和宣传"战线"，葡萄牙政府的所作所为悖乎常情。经过将近 15 年的不妥协、一再硬充好汉，顽固拒绝谈判（"祖国不容讨论"）、多次采取暴力和镇压（有时是血腥的镇压，1954 年以后对甘地所主张的非暴力的消极抵抗运动和不合作主义者的镇压——就象葡萄牙还处在佛朗西斯科·阿尔梅达和阿尔布克尔时代一样）之后，果阿、达曼和第乌在 36 小时之内几乎没有抵抗就被占领了！印度军队的一次简单的"军事散步"就轻易地使葡萄牙人无条件的投降了。

在冲突前夕，当时任国防部长的萨拉查在发给瓦萨洛·席尔瓦总督的电报中写道："我看不到停战的可能性，也看不到葡萄牙人当俘虏的可能性。决不会有投降的战舰。我认为只可能

有战胜的或阵亡的士兵和水兵。"紧接着又写道："战斗至少持续8天，这是政府作为最后手段诉诸国际仲裁所必要的期限"。

应该于1962年1月3日在国民议会上发表的讲话也证明了这封电报(电报的抄件在全国秘密地流传着)。这篇讲话后来由他的老朋友马里奥·菲格雷多宣读，因为萨拉查的嗓子由于丢掉了印度而失音了！内阁总理在讲话中写道，他的政府的目标本来是"组织防卫，以便能按照印度的老传统更好地弘扬我们的战士们的价值"。他还说："想到这可能意味着全面的牺牲，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但是我要求也希望这一牺牲能成为对民族的未来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葡萄牙政府所谋求的是要在印度州执行任务的武装部队至少抵抗8天，而这一目标没能实现！它要求葡萄牙军队在集体大屠杀中作牺牲品，用几百人的死伤来震惊世界！这还不够，如同疯狂的唐·塞巴斯迪昂一样，萨拉查并不在乎葡萄牙人的生命，希望印度出现新的阿尔卡塞尔——吉比尔，以便给他的愚蠢政策增添更大的光荣。幸好他未能如愿！

萨拉查的缺乏政治远见、对别人的现状缺乏深刻的了解、狂妄自大和顽固不化实属罕见。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几千名官兵被俘。

在同一篇讲话中，萨拉查还写道："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设想地面和海上战斗、抵抗、以及防卫是怎样进行的。将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国提出作战情况的报告，并对多少人荣幸地应征去为果阿而战斗或是为果阿而牺牲作出公正判断"。

今天再谈这些话，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难以置信的骗局！萨拉查在事件后15天写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清清楚楚知道几乎没有死人也没有伤人(总共死8人！)，而且也知道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抵抗！

1月5日美国的《时代》杂志写道："两个对手打碎的酒瓶比打死的敌人多。似乎最可信的估计是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总共死伤40人"。法国的《竞赛》杂志刊登了为萨拉查的利益而在这场悲剧中被废黜的可怜的瓦萨洛·席尔瓦将军的巨幅照片，下面附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非暴力的忠实信徒。"全世界的人讥笑葡萄牙、讥笑葡萄牙政府那些墨索里尼式的不理智的胡吹……

人们要问：能不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答案是容易作出的：如果葡萄牙政府及时地听取人们慷慨提出的深谋远虑的劝告的话，显然会有另外一种结局。

果阿——或者更确切地说"印度州"——问题，在1947年英国工党允许印度联邦独立的时候就明显地出现了。或者更确切的说，争取所谓的葡属印度的独立运动早在这之前就出现了。这种解放精神最初表现在1946年，为首者是特里斯唐·库尼亚、卡科德卡和拉马·克里斯乌安。他们因此被递解到宗主国，并被囚禁在贝尼塞监狱数月，随后就长年住在里斯本。通过他们在贝尼塞监狱中的一位难友费尔南多·桑托斯，我认识了他们几个人，并建立了某种亲密的关系。那时，人们还没有谈及果阿加入印度联邦的问题，而仅仅谈到一种和缓的独立。按照这种独立，即将建立的"印度州"将同时与葡萄牙和印度联邦保持联盟关系。

几年前，我结识了一位国民议会的果阿议员弗洛伊拉诺·梅洛博士，他是我的朋友奥尔兰多·拉莫斯家的房客，他大胆地在议会中提出了印度的问题和与我们的传统如此矛盾的帝国主义殖民法在印度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人听他的忠告，而弗洛伊拉诺·梅洛博士却因此失去了他的议员资格。我记得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人……

1954年,潜伏的危机由于印度联邦和葡萄牙之间断绝了关系而变得尖锐起来。一年前,法国(门德斯·弗朗斯政府)按照英国的榜样,同印度联邦讨论了转让法国领地庞迪谢里的问题。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先例!然而,葡萄牙仍表现出绝不妥协的样子。当时的外交部长保罗·库尼亚多次发表了措辞蛮横的声明:“同印度政府交换照会已经太久了。葡萄牙决不会被吸引去参加空洞的、毫无结果的会议”。以此答复了印度提出的谈判建议,拒绝同印度联邦接触。葡萄牙政府对外实行罕见的暴力镇压政策;对内,反对当时已加强的“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和平运动。当时在果阿有数百人被捕!因此,阿瓜达城堡和雷伊斯·马戈斯城堡用作监狱已经不够了,于是把原潘吉姆疯人院也变成了监狱。萨拉查的如意算盘很简单:在一个没有公众舆论——报纸和自由国会——的国家里,各种和平运动早就注定是不会成功的。不论对和平运动的支持和鼓励来自何方,它们只会遭到镇压和扼杀。而由于和平主义哲学在全世界出了名的尼赫鲁却被捆住了手脚,不敢使用有效的暴力手段。

在1954年初,葡萄牙反对派就曾提醒政府注意无视现实、依靠两根可怜的、注定失败的支柱——对内镇压和精神恐吓——政策的危险性。出生在果阿的安东尼奥·塞尔吉奥,在一份划时代的文件中公开表示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认为政府的印度政策是反民主的,是歧视性的。在同一年,路易·戈麦斯和他的全国民主运动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意见。他们在寄给新闻界的一篇短文(当然,新闻检查没有让发表)中提出了果阿问题只能通过谈判、并在尊重果阿人民自决的原则基础上才能解决的观点。这篇简单的短文导致路易·戈麦斯和他的朋友们坐了大约两年的牢!在“入侵”前的几个月,布鲁托·科斯塔和一伙果阿人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解决办法——但

是，象往常一样，得到的回答是最轻蔑的沉默。

然后出现了达德拉和纳加尔·阿维利两块飞地的问题。萨拉查仍顽固坚持其全然不妥协的政策。他认为可以通过法律上的取巧解决一个基本上属于政治上的问题：求助于海牙国际法庭。海牙国际法庭通过 1960 年 4 月 12 日的判决作了表态。官方的宣传用各种声调鼓吹胜利！然而，其中一位参加者至少暗示，结果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么如意。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是一种“胜利”——虽然是完全没有实际效果的胜利。

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机器都在为“葡属印度”服务。正如以后在非洲发生的那样，是困难迫使政府正视某些多年来一直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的。在宣传、外交活动、防卫、发展方面花的钱简直如流水！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最后几年里，果阿堪称是太平盛世！矿业生产发展了；造价几十万康托的英穆冈港口建造起来了；几千名被迫在印度服兵役的宗主国人捐躯了。为了什么呢？一切都在短短的 36 小时中丢掉了。

萨拉查说：“将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国提出作战情况的报告。”他没有履行诺言！除了几滴慰问的眼泪外，他从不允许深入地分析这一问题，澄清责任，也没有处理任何人！葡萄牙士兵和领导他们的瓦萨洛·席尔瓦总督在印度的俘虏营中受辱后，秘密地回到了葡萄牙。一些人要求把他们提交给战争委员会，但却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许多军官按军纪被偷偷免职了。新闻检查的幕布把一切缺陷和罪过统统都掩盖了——不分犯人和无辜者统统装进了同一个口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会对那些军官进行这样处理的。

在法律上，印度联邦的入侵显然应受到谴责。但是，正如意大利记者贾尼诺·卡尔塔所写的“葡萄牙的事业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说道：“如果使用武力应该受到谴责，那么最应

受到谴责的是，在印度宣布独立16年后，萨拉查仍保持着印度洋上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殖民地这样一个顽固的时代错误！”(1961年12月19日《晚邮报》)。

就连这一基本情况萨拉查都一直拒绝了解。因此，他势必失去必要的国际支持(正如他自己在1月3日讲话中所承认的那样)。已经允许印度独立的英国政府，或者根本反对殖民主义的美国政府怎么会支持葡萄牙政府关于果阿、达曼和第乌是葡萄牙不可分割的部分的论点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在整个“葡属印度州”的居民中仅有2.3%的居民会说葡萄牙语、会写葡萄牙文吗？(请看1958年海外统计公报)。如果说梵蒂冈在1953年就已经限制果阿主教区的权限(我们顽固地把果阿主教区称作“东方的罗马”!)取消了果阿主教区对孟买州领地的权力，它怎么可能支持葡萄牙的政治论点呢？难道萨拉查真的不明白梵蒂冈如此及时地作出的这一明显的警告吗？

许多年以后，我在圣多美遇见一位因为印度事件被从葡萄牙航空公司解雇的飞机驾驶员列伊斯，当时他在援助比亚弗拉的航线上工作。他对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并向我证实了当时使里斯本大为开心的“腊肠事件”。由于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一直不相信。但事情却是真的，而且就发生在他身上。

当入侵迫在眉睫的时候，葡属印度的总督曾致电里斯本，请求紧急运送“腊肠”——按照密码，“腊肠”就是防空弹药。列伊斯驾驶着一架葡萄牙航空公司的民航机执行这个任务。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任务——既不了解运送的货物，也不了解此行的目的，只是在飞机起飞后看到起飞时交给他的指示才了解了此行的目的。这是最后一架葡萄牙飞机降落在果阿！当飞机到达果阿时，入侵已经开始，准确地说，果阿机场已遭到轰炸，一块弹片擦伤了他的腿。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机场、港口以及其他通讯中

心都成了印度联邦攻击的首要目标。这样，入侵刚刚几个小时，葡萄牙政府就失去了联络——不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并完全被解除了武装！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当看到载着防卫所如此急需的弹药的飞机来到时，葡萄牙人高兴的情景。然而，当人们开始卸下箱子时，大失所望：里斯本真地给他们运去了腊肠！真正可吃的腊肠……

这个真实的故事表明，驻扎在印度的葡萄牙军队的无准备状态简直到了完全漫不经心的程度！印度事件对政府来说纯粹是一盘输掉的纸牌游戏。

“葡属印度州”就这样完结了（在事实上，因为法律上的故事还在继续），既不壮观也不光彩。而这场使葡萄牙陷入悲哀的滑稽悲剧的主要负责人叫作萨拉查。

然而，就发生的历史事件来讲，1961 年这个多变之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大雨滂沱的除夕之夜，大约凌晨二点钟，一伙准备彻底结束萨拉查主义的革命军人和市民对贝雅兵营发动了袭击。

有人说，印度的不幸引发了贝雅暴动，而这场暴动由于其军事首脑瓦雷拉·戈麦斯上校的无用，被轻易地平息了。这是不正确的！印度的耻辱或许使一些在最后一刻参加的军官心情沉重，比如我的委托人，我在法庭为之辩护的佛朗西斯科·瓦斯康塞洛斯·佩斯塔纳少校。但是，印度的不幸是不会对暴动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原因很简单，导致贝雅暴动的组织工作早在印度事件很久之前就开始了。

贝雅暴动的发起者不是别人，正是曼奴艾尔·塞拉。他从圣·马丽亚医院逃出来后（他由于 3 月 11 日未遂暴动被关在那里），在古巴大使馆避了几个月的难，随后又在警察的眼皮底下

从古巴大使馆逃到了巴西大使馆，最后启程前往巴西，与翁贝托·德尔加多和恩里克·加尔旺汇合。几个月后，他以德尔加多的私人代表身份秘密地回到了葡萄牙，筹备德尔加多回国事宜并组织革命。确实是他从零开始组织了贝雅暴动的整个筹备工作——至少在最初阶段。

围绕着曼奴艾尔·塞拉的革命行动，我禁不住要讲一个有趣的插曲。凡在各个大使馆避难的反法西斯分子都遇到过或大或小的困难。比如费尔南多·奥内托，当他从军事法庭(法官奥古斯托·阿尔梅达·席尔瓦博士的办公室，他正在那里受审)逃出来时，他打算到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大使馆避难，这个国家的大使馆不仅没有向他提供避难所，反而把他交给了海外国家保安警察。结果，这位大使紧接着就被该国政府调走了——后来证明，这是对费尔南多·奥内托正式表示的歉意。

至于曼奴艾尔·塞拉，他的情况则完全相反，这清楚地表明政治是多么的高深莫测。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从事革命的时候，古巴驻里斯本大使是一个可怜的过于肥胖和喜欢享乐的人。在任职期间，他更多地出于顺从而不是真心或政治上的一致，向独裁者巴蒂斯塔作了各种必要的姿态。他常常要听听我的看法……出于痛苦的经历，我对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不惜向专政卑躬曲膝的情况已习以为常。我承认，我一点也不讨厌这位古巴大使。我是通过我的岳父认识这位大使的，那是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的一些时候。

后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向葡萄牙派出一位高级外交官阿马多·布朗科来接替其驻里斯本大使。阿马多·布朗科连续多年担任古巴驻梵蒂冈大使，我在那里拜访过他几次。他的儿子也叫阿马多·布朗科，后来在里斯本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古巴代办。面对被撤换的前景(被迫回古巴，面临决非好玩的严酷情

况），这位巴蒂斯塔时代的老大使惊恐不安。官方曾秘密地向他建议，切断与卡斯特罗的关系，离开大使馆并放弃外交生涯，就连巴蒂斯塔本人也来到了葡萄牙（落难的国王和独裁者们的天堂），过起了金色的流亡生活。但是，他犹豫不决，留恋在古巴的财产，不愿放弃长期的外交生涯。他找到了一种解决内心矛盾的办法。一天他通过我的岳父找到我，请我帮他个"大忙"：为他找一个政治避难所，"越左越好"！

"您知道，这是使菲德尔相信我也曾为葡萄牙反法西斯事业服过务的唯一办法！"

可怜的大使！为了表彰他的杰出工作，佛朗哥曾授予他一枚伊莎贝尔天主教勋章，现在这枚勋章比铅还重地压着他……谈判拖下去了。想要这样快地找到一处真正的、在紧急之时所需要的外交避难所决非易事。

现在我只记得，当时阿马多·布朗科博士得知这项计划后，要亲自听一听反对派对这件悬而未决的避难问题的意见。我和皮特拉·桑托斯一起来到蒂沃利旅馆向他谈了此事——最后决定，新大使递交国书两个小时后让塞拉先生到那里去……

我不知道曼奴艾尔·塞拉在位于帕斯库亚尔·梅洛大街的古巴大使馆躲避了多长时间，总之是有足够的时间让他蓄起了胡子。后来他把胡子刮掉，穿上阿罗约斯教堂的皮奥神父的服装才迷惑了海外国家保安警察桑托斯·科列亚，并逃离了他的严密监视。这个自 1947 年我就认识的桑托斯·科列亚、西班牙战争中的"志愿军"，因为曼奴艾尔·塞拉的逃走在警察局吃了不少苦头。这第二个有趣的故事是当事的警察本人对我讲的，当时我在"毕得"总部的三楼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只要人们善于听，在警察局也是可以听到有趣的故事的……

曼奴艾尔·塞拉作为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的代表来到葡

萄牙。他在大约两个月内，从零做起组织了一次完全由市民参加的密谋活动。他吸引了好几十名诚心诚意要同现政权作战的人，但是大部分人既没有作战的准备也不具备作战的才能。从袭击贝雅兵营开始的暴动将向南方扩展，德尔加多将军应该出现在那里，由他指挥最后阶段的战役。塞拉讲，德尔加多的出现以及通过电台发表的宣言(考虑在暴动的最初几个小时就占领南方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将足以使忠于政府的部队中立，以此打消所有的抵抗念头。鉴于全国的激动状况，当时认为剩下的不过是到里斯本进行一次阅兵而已……

这样描述的计划好象是天真的不合情理的。但是，事实是时机如此有利，以至各种迹象表明又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市民们自发的、热情的参加使组织者忘乎所以……他们过分地相信自己临时应变的能力，并错误地认为没有人再会为政府而战！

我说不准瓦雷拉·戈麦斯从什么时候认真地致力于暴动工作的。在暴动的第一阶段，他就以现役军人的身份自称是暴动的首领。而据我所知，他是在很晚的时候即暴动的组织工作已经开展起来——可能是在12月1日和8日两次尝试之后——才参加的。根据暴动的发展过程，在塞拉和瓦雷拉·戈麦斯之间进行联系——使他们接近并使他们进行一切必要的联络——的人是费尔南多·桑托斯。作为选举运动中的候选人，戈麦斯以高度的战斗性著称。退出选举之后，曾受到纪律处分，而且肯定被解除了职务。

正如前面说明的那样，在这期间，酝酿着好几个密谋活动。因此，当瓦雷拉·戈麦斯决定行动时，班子在短时间内很容易就搭起来了。一旦军人决定参加，参与暴动的文职人员就退居二线，以辅助力量的面貌出现。对贝雅兵营——暴动的中心——的

袭击已没有必要，因为瓦斯康塞洛斯·佩塔纳少校(原第一共和国部长小佩塔纳的儿子——他本身就是密谋者、曾被流放多年)将大门打开就行了……

翁贝托·德尔加多当时在摩洛哥，得不到关于事态发展的具体消息。他心急如焚，弄不清连续几次推迟暴动的原因。此外，通讯也十分落后。热尔马诺·佩德罗负责通讯工作，因为他在直布罗陀有一条可以通过无线电与葡萄牙联系的船。但是，我认为，无线电的系统没能有效地工作。

当热尔马诺·佩德罗参与密谋活动的情况被查到后，海外国家保安警察就把他诱骗到拉利内阿，在西班牙领土上逮捕了他，并把他秘密地押回了葡萄牙。在对贝雅暴动的审判中我担任了他的律师。我很容易地在法庭上证明——甚至可以通过护照——热尔马内·佩德罗是非法进入葡萄牙的，而这种非法状况是由"毕得"在国外绑架他而造成的，这和法国人对阿尔古德上校所做的引起公愤的情况一模一样。此案表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警察是合作的，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据我所知，后来又对一个叫做卡多索的人犯下了同样的非法行为，卡多索是革命行动联盟案件的被告之一，1967 年在布尔戈斯附近被绑架的，由海外国家保安警察押回葡萄牙关了起来，并被剥夺了发言权。

按照德尔加多的脾气，这样长时间地在摩洛哥等待下去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决定用自己的办法——当然是持假护照并稍稍地化了装"合法地"从卡亚入境来到了葡萄牙。他的护照上居然还盖有法律要求的各种印章……他在一位巴西女秘书阿拉雅丽尔·坎波斯的陪同下带着一个装有将军服和一个自动手枪的小箱子来到葡萄牙。

德尔加多在 1961 年最后的一天来到了里斯本，住在自由大

街的一所公寓里。这所公寓正好在里斯本市中心！从这里，他悄悄地给他的几个朋友打了电话，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他要见见曼奴艾尔·塞拉。然而，在那一天，曼奴艾尔·塞拉却很难见到。当他最终找到一个了解密谋内情的人时，密谋活动已进入了最后阶段。已经太晚了！此刻，不论是曼奴艾尔·塞拉还是瓦雷拉·戈麦斯都已在去贝雅的路上……

翁伯托·德尔加多一得知行动的计划（却不了解其细节）和当晚就要在贝雅行动的消息后，立刻要求动身去贝雅。可是，却难于找到带他到那里去的人。经过很大的努力之后，他终于在阿道夫·阿亚拉的陪同下搭上了翁伯托·佩拉吉奥（一个"日理万机"的律师）儿子的车。阿道夫·阿亚拉是一位久经考验、宁折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从这个历史性的夜晚起，就和德尔加多结下了战斗情谊并在后来成为德尔加多生死与共的朋友。

在贝雅，革命的机器已经开动。众所周知，瓦雷拉·戈麦斯在4—5位军官（佩斯塔纳·瓦斯康、塞洛斯少校、奥利维拉上尉、马克斯上尉、布里佐斯·德卡瓦略中尉）和其他人的陪同下进入贝雅兵营。兵营里的军官们接受了这一既成的事实，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兵营司令卡拉佩斯少校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但觉得情况有点异常，因为当市民们翻墙进入兵营时，曼奴艾尔·塞拉的手枪走火了。瓦雷拉·戈麦斯满有把握地冲进卡拉佩斯的房间，象同志之间那样问他是愿意参加暴动还是甘愿被捕。卡拉佩斯朝他开了一枪后就逃走了。

据说那天夜里漆黑一团，下着倾盆大雨。兵营里的枪声（瓦雷拉·戈麦斯受重伤倒下去时还击了几枪）引起守卫的士兵和袭击者之间一场激烈的枪战，而彼此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混战中，不幸两人死亡：戴维和安东尼奥·维拉尔！

瓦雷拉·戈麦斯的无能和卡拉佩斯少校的逃走（他正向贝

雅市共和国卫队那儿去报警)，使参与密谋活动的军官们惊恐万状。为了搭救瓦雷拉·戈麦斯的性命，两名军官不得不离开兵营，紧急把他送往贝雅医院。留下的军官们立即认识到，整个行动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原来计划事成之后把部队拉走，但是，在枪声引起的混乱情况下，这已经极为困难了。每个人，袭击者和军官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黎明的到来……

此刻，卡拉佩斯已动员了贝雅市的共和国卫队和警察并已向里斯本报了警。得到里斯本通知的埃武腊部队立即行动了起来(在埃武腊部队中有一些重要的同谋)，为政府服务。

当翁伯托·德尔加多到达贝雅时，城市已处于战争状态。贝雅兵营已被包围，不可能再到那里。他乘坐的车虽然几次被命令停下来，但他并未被警察认出来而被捕，这实在是个奇迹。

在里斯本，瓦雷拉·戈麦斯的夫人马丽亚·欧热尼亚和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决定到一位社会助理家里过夜。她是他们的朋友，警察不会怀疑她。他们认为那里是不受控制地进行通讯联络的理想地方。然而他们那里知道，这位社会助理同当时的卫生部长马尔丁斯·卡瓦略有着亲密的关系。当她从来人的紧张情绪猜到将要爆发一场反对政府的革命运动时深为震惊，决定用电话通知卫生部长。她这样做似乎并非为了告发密谋活动，而是要保护她可能遇到危险的朋友。然而警察窃听到了这个电话和后来的其他电话，因为那天晚上双方打了好几个电话。这就是贝雅暴动的前前后后。

马尔丁斯·卡瓦略向贝雅派去了一队能干的医生，间接地救了瓦雷拉·戈麦斯的命！命运真是变化莫测……

由于卡拉佩斯少校报警而得知暴动的陆军副国务秘书丰塞卡决定立即出发到贝雅，并在日出时到达那里。忠于政府的埃武腊团队正准备采取行动，而共和国卫队和警察也已包围了兵营。

当这位副国务秘书靠近出事地点时莫名其妙地被政府军击毙了(原因从未弄清，虽然在审判期间人们普遍关注这一点)。

贝雅革命以几人死亡、少数人受伤、几十人被捕、几十人在逃而结束。在全国存在的其他的军事密谋也无声无息了。许多人在失败的时候表现出胆怯，这也是很自然的。沉寂的厚幕掩盖了戏剧性事件和受害者的痛苦和抗议呼喊。这是在萨拉查时代爆发的最后一次军事暴动。古里斯蒂亚诺·鲁德尔在他的“葡萄牙与萨拉查”一书中写道：“就在最近，1967年的秋天，一伙军官再一次地试探美国领导人，想了解推翻内阁总理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他们没有获得绿灯。下一次，谁知道……”

没有“下一次”了。萨拉查躺在埃斯特拉宫的床上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浑身就被涂满了香料！

·10·
一桩罪行的历史

“在战争中我冒了种种风险并丧失了一切：家庭、地位、朋友、金钱。我是一个被打垮的、极度孤独的人！”

1964 年我到布拉格郊区的医院去看望翁伯托·德尔加多时，他以绝望的声调说了这番话。我不能忘记这些话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几分钟后，他又恢复了平常特有的幽默，唤来热心照料他的护士，以急切的微带高兴的语调要求道：“给我拿瓶克里梅亚香槟来，我要祝贺我的这位亲密的朋友的到来！”

那时，德尔加多已经在捷克的一家诊所住了一段时间，接受绞窄性疝气手术。他变老了！自从他 1959 年 1 月到巴西大使馆避难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时间已经流失而且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种印象还由于他异常消瘦、头发脱落得一根不剩而更加深刻。

在这异乎寻常的见面引起的一阵冲动之后，德尔加多开始象以往那样生动地、轻松愉快地谈起来。他已经脱离了危险，正在迅速地康复。据他对我说，他已到了鬼门关。尽管他受到非常好的关心和照料，但仍感到很孤独，这主要是因为语言上的障碍，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给他动手术的医生英语讲得有困难，而护士要费很大劲才能懂得他要干什么。捷克政府待他如上

宾，就好象他是一位国家元首似的。由于担心手术后病情可能突然恶化和流传着他可能再也站不起来的谣言，所以只让将军的少数朋友去看望他，以便让他们亲自看看对将军的护理情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去看望他，以便在我回到里斯本后也能安慰安慰他的家属。

我们知道，1964 年初翁伯托·德尔加多已是几年前在里斯本成立的民族解放爱国委员会的主席。贝雅事件后他曾回过巴西并于 1963 年底从巴西重新回到欧洲领导革命。他参加了在国外（确切地说是在布拉格）召开的爱国阵线第二次会议，接受了统一斗争的纲领并准备去阿尔及尔（本·贝拉总统向葡萄牙的反法西斯分子提供特殊的便利），第一次会议是在罗马郊区召开的，会上曾有人提出邀请德尔加多担任爱国战线主席，尽管那时他还在巴西。

当时，政治流亡的人潮大大地增加了。人们普遍认为，反对当局的合法斗争方式几乎已经用尽，剩下的唯一政治斗争道路就是用激进的方式从国外组织革命。古巴和阿尔及利亚为许多真诚的反法西斯运动做出了成功的榜样。革命委员会应该是发动革命的组织，而从整体上来讲阵线应是统一的左派政治力量。在这个统一的左派政治力量中将聚集起一切真正的革命流派，而共产党有一天终将融于其中。因此，阵线企图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式的或是古巴“7·5 运动”式的组织。

我认为，这种想法不适合葡萄牙的情况（葡萄牙作为欧洲国家，它的政治演变注定要走欧洲的模式），它在不同的反法西斯派别中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并导致短命的、希望成为社会革命党式的“革命行动运动”(MAR)的建立。共产党从来也不赞成这种想法，认为阵线仅仅是一个动员各政治派别的实用的形式，否则，共产党是难于接近这些政治派别的。

翁伯托·德尔加多是一个革命经验论者，对这些理论问题兴趣不大。对他来说，阵线只是在他特别孤立的时刻建立一个从政治上支持他组织革命的机构的工具。由于对斗争方式和要走的道路意见不一，爱国阵线领导人之间很快就开始出现了分歧和困难。随着该组织在国外的发展和活动方式的多样化，阵线在葡萄牙国内的组织逐渐萎缩了。

1964 年夏天，我在巴黎又见到了翁伯托·德尔加多。我同女作家马丽亚·拉马斯一起应邀到住在凡尔赛大街的埃米迪奥·格雷罗教授家吃晚饭，没想到尚未完全康复的翁伯托·德尔加多也来到教授家。现在我还记得，在晚饭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他的腹部有一片血迹。他掩饰说："没有关系"，"手术处还没有完全结疤。"他当时的样子确实变了，体重恢复了，而且很乐观。

在 1964 年的那个夏天，德尔加多与爱国阵线发生了决裂。他刚刚在阿尔及尔度过的几个月令人沮丧。思想意识上的、政治上的以至个人之间的冲突大大地加剧了，论战异常激烈。他公开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多数情况下是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和性格上的问题而引起的。他同共产党的对立已全面暴露出来。果断而无畏的德尔加多希望立即采取行动。他公开主张采取突然的大胆行动，所以不理解（也不允许！）进行慢腾腾的深入的政治工作。

1964 年夏天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三次爱国阵线会议（德尔加多已不愿意出席）上开始出现了分裂，翁伯托·德尔加多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离开了阵线。几天以后，德尔加多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公报，宣布在葡萄牙边境附近召开了"葡萄牙全国解放阵线"成立大会。同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时的初衷一样，这个幽灵似的组织的目的是为了用相似的名称制造混乱并切断爱

国阵线的道路。

在葡萄牙，分裂的危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被歪曲。在国外的许多流亡者的核心中间，也认为这种在巴西已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内部斗争实在是难以理解。对大家来说，这些内部斗争是引起不快、互不信任、最终导致疏远的原因。

我知道将军相当孤立，也了解他发出的在葡萄牙立即暴动的号召没有得到响应，我不禁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乐观呢？他显然在同我不知道的人一起冒险。这是很自然的，我虽然是他经受过考验的朋友（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但是无论如何也不是他的一个无条件的拥护者。在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那次晚餐上，他的情绪特别好，完全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我知道，他正在研究一项所谓的“桔子行动”，即在大陆中国的默许下占领澳门，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可以立即得到许多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的国家承认的临时政府。可是，我从不相信这项“活动”是切实可行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出于明显的原因，不应该对中国如此迎合。当时苏中分歧已成为世界形势的突出问题，而且反映到了葡萄牙国内：葡萄牙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委员会和人民行动阵线(FAP)。但是，正如所知道的那样，假设的“桔子行动”还处于起步阶段，德尔加多的乐观也许另有原因。他虽然一点也没有透露他的短期计划，但那天晚上却断言说，他确信自己不久将战胜萨拉查并回到葡萄牙。

在晚餐进行中间，来了两次电话找他，大约 11 点钟的时候，他离开那里前去赴一个“极其重要的会晤”。告别时，他掷给我一句诺言式的话：

“葡萄牙见！而且比你想象的还要早得多呢。”接着他又说道：“我要嘲弄那些在阿尔及尔的夸夸其谈的政客们……”

后来我才明白，实际上他当时正朝死亡走去！

种种迹象表明，暗杀（或绑架）德尔加多的计划早已由“毕得”或与“毕得”关系密切的什么类似组织制定出来了。彼得·迪利在1970年4月26日的《观察家》上发表的《谁杀害了德尔加多?》的长篇文章中谈到，“OAS”的成员为暗杀德尔加多曾收到22万5千英磅的酬金。这就是被称之为“Befa”的行动，而暗杀戴高乐将军的阴谋则被称为“ALPHA”行动。“德尔加多案”披露出来后，世界报刊曾特别提到让·雅克·苏西尼的名字。法国律师享利·勒克列克——推动调查德尔加多失踪案的“人权联合会”成员之一——，在德尔加多的尸体被发现后不久，曾和一位自称是OAS成员的名叫霍夫曼的人接触过。霍夫曼称：如果有人愿意出钱，他愿意把那次“失败的阴谋”的一切有关情况都讲出来。报界对瑞士人萨穆埃尔·雷曼（卷入暗杀戴高乐将军阴谋的人）的声明也有反应。据此人讲，德尔加多在西班牙失踪前几个月，一伙OAS的人曾找过他，问他能否在德尔加多去巴黎旅行时绑架他?

另外：在暗杀德尔加多前，即1964年夏天，法国警察就预先通知侨居在巴黎并与安哥拉民族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的葡萄牙非洲问题作家卡斯特罗·塞罗梅尼奥，他们已经侦察到一个要从肉体上消灭他和其他四位葡萄牙反法西斯分子（包括费尔南多·皮特拉·桑托斯）的“阴谋”。在法国警察的劝告下，卡斯特罗·塞罗梅纽（由法国警察出资）离开了巴黎，在最后去巴西定居之前，在法国某地躲藏了几个月。谁遥控着这一阴谋呢？法国警察没有让卡斯特罗·塞罗梅尼奥在头脑中留下任何疑问：“毕得”的代理人！

德尔加多和加尔旺的私人朋友、流亡记者维托尔·雷戈在

此之前已得知某种严重危及朋友生命的阴谋正在策划中。他写信把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们二人，并把信的抄件寄给其他反法西斯战士，要他们提防旅居巴黎的一名“假同党”。关于此人，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负有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领导人使命的“两面派”。他说他弄到了这一“罪恶阴谋”的有关文件：他们试图把一名根本不存在的、谎称死在巴黎的美国女人的尸体运走，以便在必要时凭这些假文件把一名葡萄牙反法西斯战士的尸体运回国内！

在政治上，德尔加多几乎一直是个孤家寡人，这是他对反对派中其他政治组织的轻视所造成的。他后来虽然积极参加过几年政治斗争，但既不熟悉反法西斯的政治人物，对每个人的过去也不甚了然，这就使他难分“良莠”。一方面要善于处理政治思想上的分歧——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另一方面要善于分辨真心实意的反法西斯战士和那些毫无原则的纯粹冒险家和专门闹事者。对于多年从事政治斗争的人来说，这种界线是一目了然的，但对那些胸无城府的人来说（如塞尔吉奥所说），却很难识破这一点。因此，德尔加多很容易就成了那些自称是移民和革命者的假朋友们的俘虏，他们装扮成他虔诚的忠实的信徒，唆使他去反对反对派中的其他组织，而以前在反对派中间谁也不认识他们。这些第一次冒出来的可悲角色有：马里奥·卡瓦略和埃内斯托·比索格诺（在罗马）、恩里克·塞尔克拉（在拉巴特）、席尔瓦·马尔丁斯（在巴黎），更不用说那位神秘的埃内斯托·卡斯特罗·索萨（或者叫索萨·卡斯特罗）了。这后者是一个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干罪恶活动的警察的假名。

德尔加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反对派在国外的最高代表。他把自己看成一位魅力非凡的、不可争议的领袖，有权不同他所领导的政治组织成员协商（甚至完全不知道）就可以作出最

后裁决。因此，他养成了在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首都派驻私人代表的坏习惯，而代表的选择则是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与否而定，和个人的履历毫不相干。如果分析一下他的某些代表，可以说他虽然用心良苦，却事与愿违。不过驻巴西代表奥利维拉·皮奥和驻巴黎代表拉莫斯·科斯塔是"光荣的例外"。其他的代表在反对派内几乎不为人知。人们对这些人全然无知，特别是对他们选择艰苦的流亡之路的隐秘动机更是莫测高深。在这些人中，肯定有长期编织罗网的首要分子。这罗网导致了德尔加多后来在巴达霍斯掉进了致命的陷阱。他们在为谁效劳？经过西班牙司法当局的调查（虽有很大保留），今天这个答案对任何人已不再是秘密：他们是为"毕得"和"毕得"独裁者萨拉查效劳的。

在贝雅暴动失败后，德尔加多详尽地透露了他在葡萄牙秘密逗留的情况。他所用过的伪装、在国内的旅行、使用过的假护照、由何处进出国境，甚至展示了海外国家保安警察盖在他的假护照上的印章及他在自由大街上看《新闻日报》的照片。这种取笑警察——如此可怕和著名的海外国家保安警察——的轻率行为是要向萨拉查表明他的警察是多么的无能。

我过去一直在想，现在还在想，制定在西班牙某地绑架德尔加多（在系统诋毁他的浪潮中曾被称为"千面人"①，把他押送回葡萄牙或干脆在西班牙从肉体上消灭的计划的原因也许正在这里。鉴于德尔加多曾秘密潜回国内一次，要使国际舆论和葡萄牙人相信这次偷渡不过是故技重演，仅仅由于"毕得"及时发现而失败的说法并不困难。这样，"毕得"可以一举挽回上次失败的面

① "毕得"在德尔加多潜入国内后，曾通过邮局寄出几千帧离奇的照片。照片上有德尔加多的面孔和一个赤身裸体的猥亵的舞女，下面注明"千面人"。

子，因为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抓住了一位不安分的、对政府造成莫大危险的敌人。

况且，在袭击“圣·玛丽亚号”游船之后，德尔加多已被判为这一“罪行”的精神祸首而处以长期监禁。政府的立场是，如果能绑架德尔加多，那在政治上是最为稳妥的，因为一旦德尔加多处在葡萄牙领土上，法院就可以下令逮捕他——这样做如果从技术上不能避免新的审判，至少不致立即造成轰动，这是政府一直力图避免的。

为了逮捕翁伯托·德尔加多，显然需要把他诱到西班牙（唯一能使“行动”具有可行性的国家），而且离边境越近越好。正如在前一章所谈到的，这类在西班牙非法逮捕并把捉到的人秘密运过边境而邻国警察当局“闭上眼睛”的事情已经多次发生。

把翁伯托·德尔加多诱骗到西班牙的方法是要使他确信存在着一个由对当局不满、准备接受德尔加多领导的陆军和空军人士所策划的军事密谋。这些人士——据说——不能随便到巴黎去（德尔加多曾建议他们去巴黎），因为这很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但是他们却能轻易地越过边境到西班牙作短暂的停留，这样做甚至不需要所在部队的特别许可。这一借口是令人信服的。人们对那些所希望的东西特别容易相信！本章中，翁伯托·德尔加多的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人们都知道，“毕得”曾策划过无数次这种假的密谋活动，以便摸清那些不慎分子的斗争意图，把他们陷入自己的罗网，以便预先粉碎刚刚起步的革命组织。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谈谈卡洛斯·维列纳大尉事件。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他是在克拉维罗·洛佩斯元帅离开共和国总统职位后，因为参与某项政治运动而被捕的。在审讯过程中，“毕得”的副局长若泽·萨谢蒂来到他面前，笑容可掬地问他是否认识他。维列纳大尉说不认识他。“不，

你认识，"萨谢蒂坚持说，"想想是否还记得起来。我穿着上校军服，我们夜里在某某街上共谋准备发动一次革命……现在记起来了吧？"

这个绝对真实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警察使用的方法和某些从事密谋活动的人的自信有时天真到了何种程度！

顺便说一下，早在1961年圣·玛丽亚事件之后，就策划过把加尔旺和德尔加多诱骗到葡萄牙边境的军事阴谋。维托尔·库尼亚·雷戈了解到当时以巴黎为中心的"圈套"并及时地揭露了它。所选择的"会晤"地点就是四年后事件发生的地方：巴达霍斯！

1964年夏天，德尔加多通过其驻罗马的"代表"马里奥·卡瓦略（此人曾用过马里奥·卡瓦略·阿里亚加、马里奥·亚力山大·卡瓦略、马里奥·亚历山大·塔瓦雷斯等不同的名字），加紧了他同一个虚假的革命组织的接触（在此之前，他已同这个据说存在于葡萄牙国内的组织——马里奥·卡瓦略是其在国外的发言人——有过接触）。在德尔加多和该"组织"之间进行联络的是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名叫埃内斯托·卡斯特洛·索萨的神秘人物，因为除了马里奥·卡瓦略外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卡瓦略把他介绍给了德尔加多）。没有一位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同这一组织接触过或是知道它的存在，所以也很难断定是否真有这样一个组织。后来，人们才弄清了曾向德尔加多提及的、确有其人的几名军官，如特罗尼准将，却从来没有与德尔加多联系过。在德尔加多将军遗留下的文件中，有卡瓦略寄给他的不少信件，详细谈到了"秘密活动"的进展情况，提到一些所谓密谋者的名字及来源不明的资金问题，以图让人相信这个"组织"的力量、重要性和实际可行性。从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该组织在全国"挑选的"人员总数为4617人，有待观察的人数"约为500多人"！仅

在圣·康巴唐据说就组织起了不少于843名革命者，在格兰多拉组织起了210人，在卡斯特洛·达伊雷组织起了78人……

令人惊奇的是翁伯托·德尔加多居然相信了如此破绽百出的欺骗并最后落入了陷阱！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德尔加多的孤立处境以及他在同爱国阵线的斗争中需要借助不存在的“葡萄牙阵线”来扩充自己的力量的话，此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感到绝望，可能是绝望使他如此轻易地落入阴谋家的手中！

1964年夏季，德尔加多发表了关于在葡萄牙边境召开会议的公报，但一切都表明从来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他故弄玄虚以便给原来的同盟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犹疑不决的分子的阵营中收罗人材。是谁给他出的计谋呢？弄清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那份公报有多重目的：加剧反对派阵营的分裂、提出在西班牙靠近葡萄牙边境处召开一次会议的想法。请注意：使反对派组织怀疑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如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使翁伯托·德尔加多在机会重新到来时，好再一次到西班牙去。他用这种特有的果敢来表明了自己的无所畏惧，以消除公报发表后在反对派中间产生的讥讽和疑虑。

1965年2月当将军在西班牙失踪的消息传出后，爱国阵线在几次极其不恰当的公报中对此事的严重后果避而不谈，并表示出很大的怀疑。其他人也和爱国阵线一样，散布出种种异想天开的说法。实际上，一些极其严重的不可饶恕的事件已经发生，比如在阿尔及尔逮捕了将军的朋友、葡萄牙反法西斯分子。除了可悲的分裂背景外，毫无疑问还有使人们理所当然地怀疑将军失踪的先例：1964年夏天的假会议。舆论事先已造好了，正如后来安莎通讯社和马德里《ABC报》来源不明确的假消息那样。这些消息竭力使人相信德尔加多从来就没有去过西班牙，因为他在布拉格或东欧某地“当了俘虏”，或是在一家美容外科医院接

受了手术，以便改变容貌使人认不出他来。

在1964年夏天和同年的12月之间，翁伯托·德尔加多逐渐离开了（或是被迫离开了）流亡中的多数反对派和负责人，也离开了共产党，而且不仅是离开了共产党，这一点必须说明。在阿尔及尔，由于德尔加多离开爱国阵线所引起的分裂很快就演变成为极不愉快的公开斗争。这种分裂被政府的代理人利用了，今天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

另外，德尔加多有根据不同对象说不同话的习惯，以使每个派别不了解其他派别正在实施的计划和承担的责任。例如，他在阿尔及尔的一个最忠实的伙伴阿道夫·埃亚拉就不了解马里奥·卡瓦略和埃内斯托·卡斯特洛·索萨的"密谋活动"。同样，德尔加多在这个时期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埃米迪奥·格雷罗教授对所谓的"密谋"也知之甚少。据说他甚至没有出席1964年圣诞节在巴黎召开的重要会议①，而正是在这次会上最后确定了于2月份在西班牙举行会晤的。

参加"葡萄牙阵线"的到底有哪些反对派人士呢？就连在阿尔及尔的那些德尔加多的忠贞不渝的朋友中间也没有人声称自己参加过"葡萄牙阵线"。已经被证实参加过那个幽灵组织的人仅有：马里奥·卡瓦略、恩里克·塞尔克拉（他在将军死后被推荐为将军的"政治继承人"和"葡萄牙阵线"的总书记）和埃内斯托·卡斯特洛·索萨。正如前面所说，存在着一个蓄意架空德尔加多的阴谋，而阿尔及尔的政治分裂又被处心积虑地用来作为

---

① 这引起了埃米迪奥·格雷罗和弗朗西斯科·拉莫斯·科斯塔之间的冲突，因为后者向克雷斯波·马克斯法官证实埃米迪奥·格雷罗出席了巴黎的会议，因为他曾亲口对他说过："如果您，拉莫斯·科斯塔了解这一事件，我们就会陪着将军的。我也会跟您一块去的！"然而，格雷罗却公然否认这一说法。

这一阴谋的烟幕——在这一烟幕下，将军轻易地被诱进了死亡的陷阱。他一直试图保持同葡萄牙国内（尤其是北方）的政治朋友们的联系（使他能了解国内的真实情况并可识破马里奥·卡瓦略及其追随者的所谓革命真相），被警察通过种种巧妙的办法给隔断了。德尔加多在军事学院的同学、竞选中的得力伙伴费尔南多·班德拉·利马医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64年夏天，他在巴黎度假时接到德尔加多从罗马发来的一个通知，要他到罗马去看望他。但在班德拉·利马准备启程的那天凌晨，又接到一个神秘的、难以理解的国际电话，一位身份不明的人自称了解这次会晤并说这次访问在班德拉·利马返回葡萄牙时警察可能会给他制造麻烦。第二天上午，在巴黎旅馆的大厅里，一位不相识的人用葡萄牙语质问这位医生并故意说自己"是海外国家保安警察的官员"，甚至向他出示了身份证。班德拉·利马大夫在贝雅暴动之后曾根据海外国家保安警察的命令被监禁过一段时间，并受到严酷的虐待。很明显，他没有去见德尔加多就回里斯本去了。目的已经达到（正如后来人们所证实的那样）：切断了翁伯托·德尔加多同那些严肃的、信得过的、可能提醒他警惕骗局的人的联系。

尽管如此，在开始西班牙之行前，翁伯托·德尔加多好象已有所怀疑并显得十分犹豫。的确，无数的迹象使人怀疑这是一个陷阱。他在波尔图的朋友们（德尔加多通过卡瓦略邀请他们在约定会晤的前一天在西班牙见面）反对这一主意，认为这简直是"发疯"。一位波尔图的律师在1964年圣诞节同德尔加多谈了话，可能已告诉过他国内没有任何革命的气氛——甚至连关于即将举行"小规模起义"之类的谣传也没有听到过！

埃米迪奥·格雷罗对我讲，他力图劝说德尔加多不要出席巴达霍斯的会晤，德尔加多对他说："也许你有道理，但我还是要

去！”

就连德尔加多的女秘书开始时也拒绝陪同前往，她认为这是一次“危险的行动”。德尔加多坚持要去，并且最终说服了她，还建议她用巴西公民的真正身份陪同他一起去。为此，他不得不在西班牙驻阿尔及尔领事馆申请进入西班牙的入境签证。这样——德尔加多认为——阿拉雅丽尔因有巴西国籍的保护而不致冒任何危险。然而，事实是，这样做却使西班牙警察得知了将军的行动。他以巴西公民、外交官洛伦佐·伊巴内斯的身份前往西班牙，使用的是由意大利医生埃内斯托·比佐格诺为他弄到的假护照。此人是马里奥·卡瓦略的朋友和同伙、一个极其值得怀疑的人物。比佐格诺在战争期间有着通敌者和向德国党卫军告发反法西斯分子的历史。在意大利开始审讯之后不久，他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种种迹象表明，德尔加多的入境是受西班牙警察监视的。西班牙警察从他进入西班牙的第一步起就跟踪着他，起码跟踪到塞维利亚，而且各个边境哨卡都有德尔加多的最新照片。正如国际人权联合会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所证实的那样，德尔加多将军是于1965年2月11日上午从塞乌塔来到阿尔热希拉斯并从那里进入西班牙境内。他从阿尔热希拉斯给恩里克·塞尔克拉寄了一张明信片，随后经过塞维利亚，于12日到达巴达霍斯，他寄出了几张明信片（比如给塞尔克拉和克雷罗），落款日期是13日。这些明信片确切无误地盖有巴达霍斯邮局的邮戳。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以后是长时间的沉默，也是这场罪恶勾当的核心部分。

恩里克·塞尔克拉于2月23日从拉巴特发出了德尔加多将军在西班牙失踪的警报。据塞尔克拉对调查委员会（由意大利

人路易奇·卡瓦利埃里、英国人扬·麦克唐纳和法国人享利·勒克莱尔组成)——的律师们讲,将军曾对他说过,虽然他应该于16日返回,但如果至21日前还不回来的话也不必担心。可是,如果到21日还不回来,就应该通知朋友们,并从23日起提醒报界注意此事,因为那时他肯定是"被杀害了或是被捕了"。事情果真如此!

塞尔克拉是德尔加多悲剧中另一个非常奇怪的人物。无疑是他首次引起世人注意翁伯托·德尔加多失踪的。但是这并不能使他开脱,毫无疑问,如果他不这样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的。埃米迪奥·格雷罗在巴黎也已经收到了德尔加多寄去的一张明信片,虽由德尔加多的妹妹德奥琳达署名,但确是将军的手笔。这张明信片表明他已于13日活着到达了巴达霍斯。从那时起,格雷罗就焦急地等待着将军返回的消息。格雷罗在24日向总部设在巴黎的"保卫葡萄牙自由委员会"发出了警报,同时,也向德尔加多的遗孀和朋友们发出了许多呼吁信件。他还推动人权联合会调查德尔加多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我认为)引发了此案。

另一方面,阿道夫·埃亚拉及其他留在阿尔及尔的德尔加多的政治同仁也完全有理由心神不安。临行前,德尔加多对埃亚拉说,如果他回不来,应离开阿尔及利亚并关闭代表处,以便文件不致于落到爱国阵线手中。这种一去不复返的可悲预测震动了少数几个了解将军西班牙之行的诚挚的反法西斯战友,也震动了埃亚拉本人的心!

发出德尔加多失踪的警报后,恩里克·塞尔克拉的行为显得十分诡谲,各种流言蜚语也不胫而走。他对调查委员会成员讲,德尔加多对他说过,他要到西班牙去,因为他接到了马里奥·卡瓦略从意大利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马

里奥·卡瓦略自己也将于第二天启程前往巴达霍斯参加会晤。这一为其他材料所证明的说法(包括卡瓦略的信件)对卡瓦略来讲是可怕的。因此,后来在意大利的悬而未决的案件中,塞尔克拉在寄给佛朗科法官的一封冗长的、荒谬的信中竭力为卡瓦略辩护,以使他摆脱阴谋诱骗德尔加多去巴达霍斯的罪责。自封为葡萄牙阵线"总书记"的塞尔克拉仍然一口咬定该组织不但存在,而且在国内还有无数分支机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连篇累牍的声明更加助长了"将军是了结恩怨的牺牲品"的论调——而受到新闻检查的葡萄牙报纸在发现将军的尸体后,也正是用这种说法来混淆视听的。在西班牙举行的法庭调查中,他又以自相矛盾、出尔反尔的辩解拒绝作证。最后,他向国际新闻界声称自己有证据证明将军"还活着"并已在葡萄牙被捕。

1969年中,由于尚未弄清的原因,他离开了摩洛哥到达伦敦,企图获取政治难民身份未果。后来,他终于用葡萄牙领事馆提供的一本护照逃到了一个拉美国家。因此,他是一个存心扰乱和破坏调查的家伙,或者从最好的方面设想,至少也是一个因怀有不可告人的怨恨而完全不负责任的撒谎者。

翁伯托·德尔加多就是这样于1965年2月13日下午在巴达霍斯失踪的。就在那一天,他还写信给格雷罗(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说:"我相信交易终将做成。由于我无法知道我能否与何时返回,特寄给您这些友好的话。"后来发生了些什么呢?

首先,应该指出人们所知的大部分情况已由专门任命的、在全西班牙拥有司法裁判权的特别法官若泽·马里亚·克雷斯波·马克斯博士所领导的从事司法调查的机构所证实。当然,考虑到调查的情况,对调查的结果应持批评与保留态度。毫无疑问,人们一直怀疑西班牙当局曾是同谋,而且这种怀疑从未完全消除过!当然,调查是在1965年4月24日星期六下午发现尸体之

后正式开始的。可是——请注意——只是在27日才通过新闻界(埃菲通讯社的电讯稿)公布了这一事件。而26日中午(也就是在发现尸体后两天),巴达霍斯警察局长还当着律师团团长的面对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说,他对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或洛伦佐·伊巴内斯)及其女秘书阿拉雅丽尔·坎波斯经过巴达霍斯的事一无所知。

人们还记得,德尔加多于2月13日匆匆离开了西曼卡斯旅馆,留下了行李箱(箱子中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他的真正身份)和待付的账单。正如人们后来知道的那样,旅馆经理向当地警察报告了此事,并把德尔加多的东西——在这之前不知被什么人盗窃过——交给了警方。后来为德尔加多的财物之事,一名"毕得"的官员还到巴达霍斯检查过(人们推测也是在2月份)。因此,从2月底,西班牙警察就已经知道德尔加多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失踪了。那么为什么西班牙警察一再否认这一事实呢?为什么他们还特别向人权联合会调查委员会否认这一事实呢?

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弄清事件的一个决定性文件),该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写道:"现在我们有证据证明,巴达霍斯的警察局长在和我们开玩笑,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发现了将军和他的女秘书的尸体,而他是知道此事的,因为尸体已于4月24日星期六就在巴达霍斯被找到了。"

而且还不仅如此!就在发现将军和他的女秘书的尸体之前,还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发现了另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人们推测这具尸体与德尔加多事件有关。国际新闻界披露这个人是埃内斯托·索萨·卡斯特洛。什么时候发现这具尸体的呢?可能是在4月初。

可信的《ABC报》在4月29日版上写道:"第三具尸体与此案有关。这是20天或25天前(因此是4月初)在靠近葡萄牙边

境附近(巴达霍斯省境内,位于巴达霍斯和奥利文萨之间的阿尔巴朗庄园中的阿尔巴朗小河中)发现的一具男尸。尸体全身赤裸地泡在阿尔巴朗小河的河水中,起初是被一名吉普赛人或是一名走私犯打捞上来的。最近,由于一再传出翁伯托·德尔加多失踪和他曾在巴达霍斯省会停留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派人到了巴达霍斯并挖出了尸体。受害者并不是被淹死的,而是因头部被击而死,翁伯托·德尔加多也是这样被杀害的。"接着,又写道:"关于葡萄牙流亡领导人在巴达霍斯失踪的传说于今年 3 月底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在这个偏远省会失去了他的行踪。"

因此,毫无疑问,西班牙警察从 2 月份起就知道德尔加多失踪了,而且有各种理由推测德尔加多当时已在西班牙被绑架或是被杀害了。此外——并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西班牙的司法调查中披露出来的某些细节也说明,西班牙警察预先知道有人要绑架或杀害德尔加多,甚至在罪恶发生的前一天就采取了非常奇怪的措施。例如,他们了解到他于 2 月 13 日从葡萄牙越过边境进入西班牙,和 14 日凌晨几个小时(犯罪之后)返回葡萄牙的嫌疑犯使用过的两辆汽车的车盘号和发动机号。当我问克雷斯波·马克斯法官是怎样获得如此宝贵的资料时——正如人们通常所知道的那样,在一般过往边境时是决不会去注意这些情况的——他一字一句地答道:"幸好那天我们在边境上派出了非常细心的官员!"

既然官员们是那么细心,又了解的如此深入,而西班牙当局至 4 月 27 日却仍否认有关德尔加多经过巴达霍斯的一切情况,官方发表的消息至今使人相信德尔加多从来没有进入过西班牙的说法,并通过德尔加多的失踪在公众舆论中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其宣传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

所以,直至尸体出现之时(4 月 27 日),西班牙警察的表现

如果不说是令人怀疑的话，那也完全是令人感到奇怪的。西班牙警察当局的表现使人们对尸体出现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可以看出尸体于4月24日出现的形式是非常奇怪的，有人可能打算——当然啰——让两个无辜的男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这种解释是令人信服的，虽然多少有点巧合。奇怪的是尸体是在调查委员会到达西班牙的当天出现的。直到那时，对所掌握的材料完全保持沉默的西班牙当局——任凭关于德尔加多滞留在布拉格或其他地方的假消息到处流传——在国际人权联合会调查委员会确定无疑地证实德尔加多将军曾经到过巴达霍斯，并于2月13日失踪之后，却一反常态。而且不仅如此，西班牙当局还决定在报告中公布他们所掌握的确切材料：的确是在那时——只有在那时——尸体才出现了！是纯粹的巧合吗？尸体出现的情况以及西班牙自己报界叙述的情况引起了广泛的猜测……

4月28日《ABC报》从巴达霍斯报导说："尸体大约是在星期六(24日)下午7时左右由13岁的若泽·费若·阿尔梅达和15岁的若泽·菲利佩·波拉斯·卡埃罗发现的。象往常一样，当他们穿过比亚努埃巴镇至瓦伦西亚·蒙布埃公路上的一条林荫道时，在距第一个村镇6公里处发现了这些尸体。这条林荫道属于离葡萄牙边境3公里左右的"恩希纳斯·埃斯皮纳尔庄园"。接着又描述道："男孩们看到离那条公路3—4米处有一块被翻动过的土地(黑线是我们加的)，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起初，他们认为所看到的是动物尸体，因此决定继续赶路。但是，当他们走了好一段路后，好奇心又让他们返回到发现尸体的地方。那时才证实是一个人头露在土外面(黑线是我们加的)。他们匆忙把这一毛骨悚然的发现告诉了他们的父母。"

4月29日，《前进报》发表了一则四栏关于这一罪恶的政治

方面的消息，标题是："谴责葡萄牙共产党杀害翁伯托·德尔加多"，副标题是："将军的副官（塞尔克拉）要流亡政治对手负责，这一声明将重新引起葡萄牙反对派之间的斗争。"然而，文章却披露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文章写道："尸体被埋在一条干涸的小河的河床中，坑深大约50厘米。翁伯托·德尔加多穿着衬衫的尸体裹在一条毯子中。尸体上盖着生石灰，土和石头（黑线是我们加的）。"

1965年5月4日的《日期报》对事件描述得更加绘声绘色：

"菲利佩，瞧！"

"怎么了？"

"一具尸体！"

"你说什么？"

若泽·费若指着一片被翻动过的土地，那里露着一个头颅（黑线是我们加的）。

"噢！一头驴……"

他们继续赶路。可是还没走出几米远，若泽又发现了另一片被翻动过的土地（黑线是我们加的）。非常清楚地露出了一具人尸的残骸。

"这的确是一具尸体……"

"另一个也是。"

他们回到了发现第一具尸体的地方，靠近观察才证实这是一具女子的尸体，在枯瘦的嘴中露着一颗金牙。若泽和菲利佩跑着去找他们的父母……

1965年5月8日的《凯旋杂志》以"双重罪恶"为题作了长篇插图报道，在报道中写道："若泽·费若和菲利佩·波拉斯象背诵一篇背过的书一样讲述着他们那天下午的经历（黑线是我们加的）……"

最后——在如此众多的人们可以引用的例子中——1965年5月8日的《插图报》在关于“三具尸体之谜”的报道中，意味深长地写道：“……夜间，这个地方有时是走私分子们碰头的地点，许多走私分子徒步越过边境，并偷偷地带着成袋的咖啡越境返回来。”

“你敢肯定那是一头驴？”若泽对菲利佩说，“我看不象。”

“那么你看象什么？”

“象是一个男子的头。”

他们把弹弓装进口袋并向后退去……是的，是一具枯瘦、可怕的男子尸体的头，暴露在石头中间(黑线是我们加的)！

若泽和菲利佩撒腿就跑，等跑到家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恰好，他们之中一个人的父亲是庄园的忠实看守人。这种事怎么可能会逃过他的眼睛呢(黑线是我们加的)？男孩们同大人们一起回到发现尸体的地方，毫无疑问是一具男子的尸体！必须立即报告治安警察。

通过这些摘录，关于事实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首先，尸体——至少是将军的尸体，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是两具尸体——是部分地裸露在外面的，即“头露在被翻动过的土地外面”，而且至少其中一具尸体上有“生石灰”的痕迹。也就是说，在掩埋尸体时是不打算让人发现的，因此使用了生石灰——以毁掉尸体并防止尸体发出的臭味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不是由于这种原因，那么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要使用生石灰呢？但是，“尸体的头露在被翻动过的土地外面”，这就与不打算让人发现尸体的意图相悖了。一家报纸在报道尸体掩埋的状况时还说这似乎是有意让人发现的！

5月初，我来到通向边境的小道上，看到了发现尸体的地方和阿拉雅丽尔的头发。埋尸体的坑很浅，最深也不过50厘米。这

的确是一片荒野，但并非与世隔绝，平时经常有人路过。人们熟悉的“马洛斯·帕佐斯小道”是走私分子来往的地方，但也有其他人走。所以，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两位偶然的过客、一位男护士和一位牧师曾经路过那里，他们记得2月13日在那个地方曾看到两辆可疑的汽车。这是在审判中出现的一个明确无误的记录。据我看来，这是相当意味深长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尸体在4月24日之前没有被人发现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是尸体并不总是在那个地方，或是后来故意挖开以便让人发现……这些设想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可能的，因为孩子们看到的是“被翻动过的土”——如果土不是在近期被扒动过，那么在掩埋了两个月后肯定是不会看到这种情况的！

正如《插图报》报导的那样，发现尸体的男孩之一的父亲——庄园的看守人——每天都从那里走，竟象该地区的其他居民一样没有发现。尸体埋的那么浅，头又很明显地露在外面，而在两个多月期间（2月13日至4月24日）竟没有被发现，特别是尸体所埋的地方位于路旁和一条人来人往的公路旁几米处，的确不正常！

有些报刊说是动物（比如狗）发现了尸体并把尸体部分地扒出来的，这是肢体不全和其他部分受创伤的原因。可是，根据专家们的调查，好象既不是狗也不是该地区的其他动物伤害了尸体。因此，这仍然是一个谜……

后来，还发现了另一奇怪的细节。在最初的电讯中有一件很有价值的材料：那具男尸戴着一枚刻有H·D·字母的金戒指。然而，如果说将军失踪，难道不应摘掉那么容易弄清身份的戒指吗？

当我以将军的遗孀和子女的律师身份到达巴达霍斯以便弄清尸体的身份时，遇到了重重困难，但是人们都立即向我谈及了

戒指的事。第二天，在向将军的遗孀和儿女隐瞒了几乎所有能证明身份的遗物(包括不能看一看尸体)时，却向他们出示了戒指。奇怪的是，这是一枚粗劣的仿制戒指，他们认出这不是将军的。

这里可以提出许多设想：难道是翁伯托·德尔加多在流亡年间丢失了戒指而又另买了一枚来代替第一枚戒指吗？这种假设是可能的。还是有人有意用此来暗示尸体事实上就是将军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象其他诸多问题一样——只有直接了解案件、自由地讨论在相互矛盾的调查过程中所获得的证据、询问证人并比较各种资料时，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但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允许这样做，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困难！

由于缺乏准确的消息，(只能获得葡萄牙报纸的令人怀疑的消息)我承认只有当4月23日由国际人权联合会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时，我才真正开始担心起德尔加多将军的生命来。通过他们的讲述，我确信将军"在西班牙失踪了"，并且隐约看到对将军设置的陷阱的主要线索。从那时起，事情就急转直下了。

1965年3月和4月对德尔加多的家人来说——特别是德尔加多的遗孀——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磨难。相互矛盾的"传言"每天都有，有时是从非常令人怀疑的来源吹来的，意在把失望变成希望。由于当时没有同德尔加多的家人进行过直接的联系，我只是很迟才了解到对这幕悲剧的反应。对将军失踪后在流亡的反对派人员中迅速漫延的争论也一样……

埃米迪奥·格雷罗的呼吁和书信，马里奥·卡瓦略的虚假解释，爱国阵线3月23日在措辞不当的公报中的冷言冷语及沉默，将军在阿尔及尔的朋友于3月12日发出的急切的呼吁，围绕着档案和代表处进行的斗争和逮捕，恩里克·加尔旺的轻率

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明——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很幸运！这些材料使我进入了“德尔加多事件”，并能深入地、没有任何偏见地研究它，而不受混淆实际情况的激烈争论的影响，仅仅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发现真理！

需要解释一下，我是怎样接受委托而担任德尔加多家人的律师的。这是至今为止在我一生中接受的担子最重、后果最不愉快的职业委托。但是，由于对我的信任及任务内在的困难，这无疑也是最使我感到荣幸的委托！

就在 4 月 27 日突然发现尸体（还没有弄清尸体的身份）的消息的那一天，我召集了社会——民主党里斯本秘书处会议，因为我认为，面对这么严重的政治事件，反对派应该立即采取明确的态度。当时尚没有公开的消息。电讯已经发到各个通讯社，但是葡萄牙报纸只是在 29 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才报导了初步的消息——侧重反对派的分裂和突出塞尔克拉声明的消息，即“将军死在自己的信徒之手”、“共产党的陷阱之中”。

由于缺乏可靠的资料，说服我的朋友们在关于该事件的文件上签名并不是容易的。然而，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使秘书处通过了致内阁总理的文告。27 日晚 9 时，由我亲自将文告送到了内阁总理府秘书处，接着我们向世界报界散发了这篇文告。在这份文件中，我们主要要求：

“允许葡萄牙报刊广泛报道在西班牙进行的正式调查以及联合国承认的国际人权联合会主持的关于德尔加多将军失踪的调查结果”——从而结束全体葡萄牙人只能通过外国广播电台和报纸才能了解消息的荒诞无稽的作法。

“在证实这一可悲消息的真实性之后，竭尽全力把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的尸体迅速地运回葡萄牙，以便让他的家人、朋友和仰慕者能够安葬他——对这样的哀荣他当之无愧。

“葡萄牙政府把关于这一可怕的事件全部确切的消息报告给全国——以便弄清从2月中旬获悉将军失踪之后，国内系统地、急不可待的散布出令人怀疑的、别有用心的传言”。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新闻检查没有让葡萄牙报纸公布这份文件的内容——虽然这份文件写得很有分寸——甚至也没有间接地提及一点文件的内容①。当然，我们提出的措施一项也没有得到满足，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葡萄牙政府对德尔加多事件所采取的一贯态度是：用虚假的、带有倾向性的消息来迷惑公众舆论，用各种办法尽其所能的阻止人们在发现真理方面取得进展，阻止因此而对罪犯进行的惩罚！

第二天，即4月28日，我同拉乌尔·雷戈一起来到马丽亚·伊娃·德尔加多夫人的家，向她介绍了我们在找内阁总理前一刻所作的努力，并希望在此困难时刻给予帮助。马丽亚·伊娃夫人显得神情焦虑、紧张，这也是很自然的。她深信在维拉努埃瓦发现的就是她丈夫的尸体，但又怀着一线希望。

我们一进门，她就对我说，我所需要的帮助是司法上的帮助，而不是政治上的帮助。人们知道，德尔加多的妻子一向害怕政治，她把降到自家头上的一切灾祸都归罪于邪恶的政治。她说：“在我丈夫的朋友中，您不是经常在胜利的时刻到我家来的，而是常常在痛苦的时刻到我家来的。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律师是多么危险，因此，我不敢要求任何人接受我的委托。但是我需要一名律师……”

我只是回答说：“如果您认为我对您有用，请相信，您对我的

---

① 上述文件是由阿卡西奥·戈维亚、阿图尔·库尼亚·列亚尔、卡洛斯·萨·卡尔多佐、卡洛斯·佩雷拉、若泽·莫雷拉·坎波斯、马里奥·苏亚雷斯、努诺·罗德里戈斯·桑托斯和拉乌尔·雷戈签署的。

信任将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就这样，我成了马丽亚·伊娃·德尔加多夫人的律师，后来又成了将军的三名子女的律师。我立即去请我的同事、好朋友、律师团副主席费尔南多·阿布兰谢斯——费朗帮忙，他曾在竞选运动后担任过德尔加多的律师。我们两个人都成了受委托的律师。后来，由于事件的复杂性，我们又指定了一个法律委员会帮助我们①。在回顾总结这么多年坚持不懈的工作之际——其中遇到各种困难及那么多不愉快的波折：阴谋、告发、暗箭、监禁、威胁——我认为在关键时刻我们一直得到德尔加多家人的信任和律师团的支持，为弄清真相而尽到了一切努力。

被委托为律师后，我就急于弄清尸体的身份，以便我们合法地参与案件。怎么进行呢？毋庸置疑，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在里斯本所能收集到的有关证明身份的简单资料转到正在西班牙进行的调查委员会手中：将军的牙齿模型、各种骨骼特征、明显的隔膜偏移手术痕迹、一只脚轻微变型的情况、在从事军事生涯之初被子弹打中的标志等等。通过这些资料，不需要律师和德尔加多的家人去直接检验，就很容易确定在比亚努埃巴所发现的尸体是不是翁伯托·德尔加多。法院也无需正式向里斯本提出查验指纹。

但是，一开始就遇到重重困难！西班牙驻里斯本领事馆甚至不愿认证我们的委托书，这样我们就无法直接同克雷斯波·马克斯法官接触。由于我负责在西班牙大使馆办理此事，所以至今

① 法律委员会由下列律师组成：雷伊梅·阿弗雷舒、安东尼奥·阿尔萨达·巴蒂斯塔、阿尔瓦洛·阿马拉尔·巴拉塔、瓦斯科·加马·费尔南德斯、埃德华多·菲格雷多、阿卡西奥·戈维亚、安东尼奥·马塞多、若泽·马加良斯·戈迪纽、若阿金·皮雷斯·利马和古斯塔沃·索罗梅纽。

还记得与之谈过话的有关官员、甚至大使本人设置的重重障碍以及大使馆参赞阻止我去巴达霍斯的企图。由于没有正式拒绝我入境，所以他们竟然说我还不是“不受欢迎的人……”

虽然发生了这一切，4 月 30 日傍晚，我和阿布兰谢斯——费朗还是乘着他的汽车去了巴达霍斯。然而，当我们到达葡萄牙边境卡亚时，突然得知不允许阿布兰谢斯——费朗出国的不愉快消息，据说：这是“上级的命令”，理由却从来没有说明过！当然我也无法前往，因为我乘坐的车被扣在边境上了。

回到里斯本后，我要求海外国家保安警察允许伊娃·德尔加多夫人出国。由于她还没有正式“遗孀身份”，根据葡萄牙当时的法律，必须得到丈夫的允许才能出国，或是向有关法院申请准许出国。由于时间紧迫，我请求海外国家保安警察为她提供一本只去西班牙的有效护照，我终于办成了。

5 月 3 日，我再一次试图到巴达霍斯去，德尔加多的夫人、儿子和儿媳在我后边相隔几小时的路程。我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由于在西班牙边境，被告知去巴达霍斯警察局，我荣幸地得到了警察的特别护送。“这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警察局长波佐先生对我说。

由于有了法官若泽·马里亚·克雷斯波·马克斯阁下和检查官曼奴艾尔·鲁伊斯·费尔南德斯阁下，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一般地说来，这一地区的司法权属于奥利文萨的法官。但是，由于考虑到事件的重要性，司法部通过上诉法庭庭长任命了上述特别法官。在试着迈出了最初几步之后——明显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愿——不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对我来说都象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我的委托书在西班牙驻里斯本大使馆已经得到确认，但我只不过获得了以个人身份同上述法官进行交谈的机会。在交谈中，他们沉默不语，拒绝向

我提供任何有关案件情况的资料，不让看尸体，甚至连尸体的照片也不让看！他们还拒绝接受我带来的有关证实身份的资料。他们为这样的行为辩护的理由是：只有按规定受到委托的西班牙律师才能参与调查；这个调查在西班牙是秘密的。由于弄不清尸体的身份，德尔加多的遗孀未能获准参与案件，即使通过西班牙律师也不行。我只能做到让他们同意于第二天单独听一听德尔加多的遗孀和儿子的意见——条件是我不能在场。他们二人提供了相当多的能弄清将军身份的资料，而法院却完全持保留态度。经过那次冗长的、令人伤心的作证后，不论是马丽亚·伊娃夫人还是她的儿子德尔加多少校都不相信翁伯托·德尔加多早已死了——虽然没有向他们提供证据，也没有提供有关戒指的情况。

经过这一努力之后，德尔加多的家人返回了葡萄牙，而我决定前往马德里，因为我认识到如果不委托一位西班牙律师，就不可能再向前迈出一步。通过我与巴达霍斯律师团团长的交谈，我得到的印象是：只有一位马德里的律师才有可能越过重重困难的高墙。

在去马德里的路上，我问自己：如果是故意让人发现尸体，就象发现尸体的情况那样，为什么不立即弄清尸体的身份呢？难道为了弄清身份的资料还不够多吗？难道假戒指是证明身份所必需的吗？这是我当时主要担心的问题，因为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就没有任何合法的手段进行干预了。

这一事件引起了世界新闻界的关注。外国记者紧接着我们之后涌入巴达霍斯，自己出资进行调查。正是通过他们我才获悉，马德里的一大批西班牙法学家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文件，请求“委托一个其独立性不容怀疑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进行调查”。文件是由将近四百名最著名的西班牙法学家签署

的，为首的是马德里的律师马里亚诺·罗布莱斯·罗梅罗·罗布莱多。我本人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西班牙国内反对派中的任何人。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反对派律师，调解过多次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事件。因此，当我到达马德里时，我很自信地前去找他。后来，通过同上述文件的其他签名者的交谈（我是通过罗布莱斯认识他们的），我们决定委托一个小组在西班牙处理“德尔加多事件”。这个小组由三位律师：马里亚诺·罗布莱斯、若泽菲娜·阿里拉加和贾伊梅·科尔特佐·维拉斯克斯·杜罗组成。

考虑到所面临的困难和法官的沉默，我对西班牙律师弄清事件的可能性并不抱很大的幻想。尸体仍待弄清身份，而且没有什么能使我相信会很快弄清尸体的身份。我曾认为——现在还认为——一桩政治罪恶，特别是在这桩政治罪恶中牵扯进了主权国家的警察，那么只有当公众舆论能自由表达时，才能通过公众舆论的压力使它暴露出来。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报界还是由受尊敬的国际组织倡导组织起来的调查委员会对澄清这类案件都起着极为突出的作用。

由国际人权联合会组织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刚刚发表——在弄清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我认为，应该鼓励该委员会继续进行调查工作——收集并核实一切可能的证词及一切逐渐出现的、经过独立的法学家评价过的证据资料。这是应该遵循的道路，没有别的选择……

因此，我从马德里出发启程前往巴黎和罗马，以便能面见亨利·勒克莱克和路易吉·卡瓦利埃里律师——上面所提到的调查委员会的两位成员。我还非常想听一听埃米迪奥·格雷罗的意见，他曾自费进行过调查（对此，国际新闻界突出地进行过报道），并且对自称是流亡的葡萄牙人马里奥·卡瓦略和意大利医生埃内斯托·马里亚·比佐格诺提出过怀疑，正象当初抓住了

巴达霍斯陷阱的蛛丝马迹那样。

在去巴黎的飞机上，我阅读了葡萄牙外交部长弗朗哥·诺格拉在伦敦发表的声明，他是7日在伦敦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级会议的（声明发表在5月8日的《泰晤士报》上）。他说："一些国家提出进行公开调查。我们对此不持任何异议。然而，尸体是在西班牙领土上发现的，因此，问题属于西班牙的管辖范围。"（请看1965年5月《里斯本日报》）一到巴黎，我就获悉了8日发表的、刊登在9日报纸上的马德里公报。公报言简意赅地指出："负责调查的法官已弄清楚了葡萄牙公民翁伯托·德尔加多的身份。"又说："由于尸体已经腐烂，因此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清了身份。"（见发表在1965年5月9日《新闻日报》上的电讯）又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很明显，我把两件事放在一起，虽然我不能在它们中间建立起因果关系……

然而，由于辨认出了尸体的身份，情况完全改变了。西班牙律师可以接受委托，代表将军的遗孀和子女协助调查，虽然调查工作仍然是司法上的秘密。德尔加多案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我想强调指出葡萄牙政府的所作所为。表面上，葡萄牙政府对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淡然处之漠不关心，但是它的态度还是透过受到新闻检查控制的报刊表现出来了。葡萄牙报纸转载的几乎全是半官方的通讯社ANI的电讯。从这些电讯中，可以看出葡萄牙政府唯一关心的事是：散布反对派成员之间"算账"的论点，把双重或三重谋杀的责任扣在反对派的头上。浏览一下那个时期的报纸，就可以看到这一主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德尔加多被葡萄牙全国解放阵线中的共产党人所杀害"——《新闻日报》写道；"巴西报纸赞同共产党人杀害了翁伯托·德尔加多的说法"——《世纪报》写道；"德尔加多是由于其运动中出

现的分歧而被杀害”——《新闻日报》又写道。人们惊奇地发现塞尔克拉和卡瓦略的模棱两可的声明与官方的论点是多么相似；把罪恶的责任归于爱国阵线和共产党。加尔旺那些轻浮的、毫无根据的、纯粹为了攻击共产党人的文章也被用来为此目的服务。此外，葡萄牙新闻界巧妙地利用所有的材料向它所希望的方向开火。以 ANI 通讯社从多伦多(加拿大)5 月 8 日发表的消息为例：“德尔加多是在反葡萄牙的恐怖运动的首领们知情和同意下到西班牙去的”。有什么根据发表如此武断的消息呢？该电讯作了解释说：“在同一次会议上，宣读了阿米尔卡·卡布拉尔[①] 的妻子从摩洛哥写给多伦多民主党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可以证明翁伯托·德尔加多进入了西班牙。”然而，消息并没有指出阿米尔卡·卡布拉尔的“妻子”已经与丈夫分居多年，而且与民族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已与恩里克·塞尔克拉同居……这一胡说八道却正中葡萄牙当局的下怀！

然而(请注意)，所有有关事实的消息，包括最细微的消息(如委托律师、最终的工作、发现尸体的细节等等)都逐渐地泄露出来并由国际新闻界突出地作了报道，但是却被新闻检查系统地删掉了，包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律师发表的声明和国际人权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些国际法学界散发的文件，更不必说流亡的反对派团体发表的分析事件政治方面的声明了。反对派团体通过这些声明透露了这一罪恶的蛛丝马迹。

在辨认出尸体的身份以后，西班牙当局的态度(以及西班牙警察自己的态度)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开始一切都很困难，而现在却有了开诚布公和热诚的气氛。西班牙当局所关心的主要是

①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是几内亚与佛得角非洲独立党(PAIGC)的领袖，葡属殖民地的一位最著名的民族运动领导人。

如何使自己摆脱在这些罪恶中的任何责任。为此不得不——毫不犹豫也毫不含糊地——把葡萄牙警察(海外国家保安警察)推到前台。

当我1965年6月在西班牙同事马里亚诺·罗布莱斯陪同下再次到巴达霍斯时,克雷斯波·马克斯法官虽然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但仍未让我知道他已掌握的证据。看来,西班牙官方的方针是为调查提供方便并尽可能加快这一过程,因为对我们提出的一切建议,这位法官都特别乐意接受。在坦率的交谈中,他毫不隐瞒地说,他并不怀疑罪魁祸首是在罗马卧底者帮助下的海外国家保安警察(毕得)。此案中的一些重要的、对"毕得"很不利的材料开始通过世界新闻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尽管案件仍处于保密状态。我一直没弄清是怎么透露出来的!

一位驻马德里的外国大新闻机构的记者当时问我是否曾看到他的报纸发表的一篇关于德尔加多事件的社论,我说已经看到了。那篇社论第一次提出了与后来西班牙法院在判决中几乎相似的看法。他又问道:

"您知道我是如何获得所有这些资料的吗?"

我告诉他说当然不知道。

"很简单,"他以胜利者的微笑答道:"是在外交部获得的,从一个非常接近斯蒂埃拉的人那里……"

克雷斯波·马克斯法官当时采用模拟犯罪的办法进行调查,并让我参加了,虽然纯粹是以私人身份(因没有权力进行调查)参加的。我们带着调查过程中所收集到的资料来到了将军被杀害的地方。请注意,我过去不了解、现在也不知道西班牙进行调查的程序。至今我只能从判决中知道哪些因素是需要了解的。在这番努力即将结束时,一位西班牙警官无意间对我说道:"真奇怪!海外国家保安警察在这件事中的行动方式真象是外行人

所为，到处都留下了痕迹。”

我只是微笑了一下。我认为没必要告诉他之所以这样，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完全不会受到惩罚，他们认为会得到西班牙当局的庇护……

在我1965年8月又一次来到巴达霍斯时——这是尸体出现后的第三次了——克雷斯波·马克思法官通知我，一旦经过专家最后检查，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的遗体就将交还他的家人(阿拉雅丽尔的尸体已被运回巴西)。我们商定移交遗体的确切日期为9月9日。

回到里斯本后，将军的家人决定接受我的建议——把德尔加多的遗体运回葡萄牙，不过要有条件。为此，我和阿布兰谢斯·费朗给内政部长小桑托斯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允许将军的遗体运回葡萄牙。信中要求：“把翁伯托·德尔加多葬在纳萨列附近的家族墓地里，在遗体从边境运往墓地时，能象任何葬礼一样，而不被用作政治投机的借口，不论它来自何方。”信中还提到：

“翁伯托·德尔加多的家人打算使葬礼从简，但是希望能保证葬礼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而不附带任何条件——有关葬礼的时间、行进速度及路线方面——因为任何强加的条件都是对死者的侮辱，更不用说死者是葡萄牙武装部队的将军、曾得到全国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了。”

这份请求书是我于8月22日亲手交给内政部长办公室主任安东尼奥·帕扎纳法官的，因为部长不屑亲自接见我们。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得知了内政部的批示。批示这样写道：“特批准按法律程序运回尸体，但须在内政部长认为合适的时间和条件下进行。”

由于批示含混不清，我于9月4日又携带着新的请求书去

拜见内政部长，以便知道是否能从9月10日(西班牙法官把遗体移交给我们的日子)起把德尔加多的遗体运回葡萄牙。对这一个具体要求，内政部长批示如下："不宜在指定的日期运回。小桑托斯　6/9/65。"

为什么呢？当时正好是休假期，人们都到外地了，运回将军的遗体将不会引起任何骚乱。应该说这一时机最有利于防止出现示威活动——将军的家人也不希望出现示威活动。因此，政府所担心的并不是那种情况，而是另有原因：那就是对将军生前的深仇大恨。正如民谚所说："怨怨相报何时了！""新政"的当权派们拒绝把翁伯托·德尔加多这位"无畏将军"迁葬在祖国的土地上，从而暴露了他们一贯的、宗教法官式的冷酷丑恶形象！

德尔加多家人委托的西班牙律师已开始接触这一案件。尽管本案仍然对外保密，但马里亚诺·罗布莱斯从马德里返回后，却发表了下述口气令人吃惊的声明(1965年8月)：

"第一，不论是特别法官若泽·马丽亚·克雷斯波·马克斯，还是此案的律师曼奴艾尔·费尔南德斯，从一开始就以最大的努力和高效率从事弄清事实真相的工作。"

"第二，从案件的最初一刻起，西班牙警察就根据特别法官的命令给予了最大的合作，提供了最感兴趣的证据。"

"第三，在向英国和德国有关当局提出法律帮助之后，它们尽了很大努力，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第四，与此相反，葡萄牙当局却保持着最大的沉默，至今，对特别法官提出的澄清属于葡萄牙当局的职权范围内的只有它才能弄清楚的问题的要求避而不答。"

除去对西班牙当局所作的夸张赞美外——我认为这纯属是策略上的——葡萄牙是唯一没有与在西班牙进行的调查合作的

国家。为什么呢？难道是怀疑西班牙当局同情共产党吗？如果按葡萄牙官方的说法，杀人犯是共产党人或者是政府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那么事情就更加令人费解了。难道这就是为什么葡萄牙当局拒绝响应调查并提供合作的原因吗？为什么葡萄牙当局拒绝向西班牙法官提供对弄清问题必要的资料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和阿布兰谢斯——费朗于1965年8月20日决定向司法部长递交了如下请愿书：

"在本月17日的信中(影印件附上)，马里亚诺·罗布莱斯博士要求该信的签字人与葡萄牙当局一起进行调查，以便响应本案法官提出的要求，搞到1965年2月13日从葡萄牙进入西班牙并于当天'犯罪后'返回葡萄牙的人的资料。"

"信件的签字人认为，应该向作为最高司法当局的阁下写信，介绍您的西班牙同僚的要求。为此，他们请求阁下接见他们；但是由于未能受到您的接见，所以他们才通过这一方式向您转达马里亚诺·罗布莱斯博士的要求。他们认为马里亚诺·罗布莱斯博士的要求也是他们的要求。请阁下与有关当局一道进行干预，以便回答西班牙法院，因为该法院提出：葡萄牙当局应该为弄清事实真相和维护本国司法尊严提供必要的资料"。

对此，司法部长的一位秘书于8月28日的批文中(签名象天书一样难以辨认)写道：

"葡萄牙当局的确收到了一封请求信，在信中，巴达霍斯的法官请求葡萄牙当局在有关谋杀那位原葡萄牙将军一案中作出某些努力"。

"虽然来信日期是7月18日，但是司法警察秘书处于本月(8月)6日才收到此信。接到这封信后，司法警察立即开始作了必要的努力，以满足信中的要求。这些努力应该在近几天内完成，所以本周就能满足信中提出的要求并把信退给有关当局。"

困难越来越多。稍知内情的人都看得出，面对德尔加多案件，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尴尬日益明显。根据从西班牙组织的调查中所透露出来的情况看，所有善良的人都会认为所谓反对派之间互相“算账”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犯罪和恐惧混在一起通常会导致暴力。海外国家保安警察又开始做对它极其不利的荒谬事了……

这就是——正如我们在给内政部长的请愿书中宣布的——9月9日我和阿布兰谢斯——费朗同西班牙法官商定去巴达霍斯领取将军遗体的事件。原定9日向我们正式移交，但由于遇到重重阻碍，我们同将军的家人只好决定暂时把将军的遗体葬在西班牙。

在1965年5月德尔加多事件发生之初，阿布兰谢斯——费朗曾被禁止离开葡萄牙，他尽了很大努力去了解如此奇怪的、违背宪法的禁令的原因。他被告知那是一场误会，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离开葡萄牙。与此相反，在我于5月、7月和8月出国后——我一直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料理德尔加多事件——当时的海外国家保安警察的稽查佩雷拉·卡瓦略口头通知我，我如果不能逐次获得“毕得”的特别许可就不能再出国了。因此，在起程前往巴达霍斯去之前，我致函政治警察，申请必要的批准（虽然他们的要求完全是非法的！）。当9月9日我打电话询问海外国家保安警察副局长萨切迪时，他说我可以前往。

我们乘坐两辆小汽车，（费朗博士和我自己的汽车）在我们的同事卡塔尼奥·梅内泽斯和皮雷斯·利马及将军的亲密朋友、记者拉乌尔·雷戈的陪同下，朝边境方向驶去。令人惊奇的是，当我们到达边境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大家都被抓了起来！汽车被留在了边境上，而我们，在埃尔瓦斯镇监狱被囚禁了好几个小时后，被用囚车转移到了里斯本。与此同时，还没收了

我携带的关于德尔加多案件的材料。我进行了多次愤怒的抗议，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了我作为律师应享有的特免权。虽然这是遵照领导"行动"的"毕得"稽查处副处长的有关指示进行的，但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只能对警察不利！凌晨，我们到达"毕得"的卡西亚斯特别监狱，分别被关在单独的囚室里，完全无法互通消息。

对我们的监禁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抗议浪潮和我国律师团的强烈反应。世界新闻界认为这是葡萄牙政府有罪和慌乱的间接证据。这里有必要添上一点绝妙的注解。警察方面对监禁我们的正式解释是："为了防止计划在边境举行的反葡萄牙示威！"为此，我们被关了15天左右，而且一直不能互通消息①。在被投入监狱后的某一天，我被带到"毕得"总部。在履行了各种手续后，把在边境从我手中没收的文件归还给了我，而文件却用火漆封着。他们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这是一位缺乏经验的官员的"令人遗憾的错误……"真是笑里藏刀！

1965年10月，开始了一个短暂的、被称为"充分自由"的竞选时间，即"选举"国民议会的议员。民主反对派不准备在新的选举闹剧中进行合作，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即将临近的"选举"与以前选举有什么不同，但是希望利用新闻检查相对放松的机会让公众了解某些基本问题，其中自然包括德尔加多事件。因此，民主反对派决定在五个选区（里斯本、波尔图、维塞乌、累里亚和布腊加）提出候选人，同时还提出政府须预先满足宣传自由和监督选举活动等一些最起码的基本要求。我有幸在里斯本的

① 我们之中唯一没有被关押的是若阿金·皮雷斯·利马博士，因为他是内政部总局长的儿子。

马沙多共和党中心的小会议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告国民书》，这份以全体反对派候选人名义发表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这些要求。由于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反对派候选人愤而退出了竞选，并再次劝告人们弃权。

在那份首先由葡萄牙记者公布的文件中谈到了德尔加多事件，说明了民主反对派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文件的内容如下：

“得到葡萄牙四分之一选民支持的（据官方统计）的无畏将军不幸在西班牙被暗杀一事引起了一切善良人的震惊和愤慨，甚至可以说引起人们良心上普遍的厌恶。就象人们即刻所看到的那样，他们面对的是一桩如同对马特奥蒂和卢蒙巴犯下的那样可憎的预谋的政治罪恶。德尔加多将军不仅是慷慨无私的，而且对全国大部分人来说，在他参加了竞选运动后，已成为不屈不挠的象征，不管国家方面的压力有多大。因此，全国有必要弄清是何人之手杀害了将军以及指挥胆怯的杀人犯的命令来自何方。

“震惊的、一直被歪曲宣传愚弄的国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为澄清事实而进行的广泛调查吗？是在此巨大事件面前政治旗帜纷纷落地吗？没有！

“国人看到的只是对死去的政敌及其战友的诋毁；新闻检查系统的删改客观报导这一不幸事件的通讯社的电稿；对将军竞选运动中最亲密伙伴的监禁①，以及后来对德尔加多的家人委托的葡萄牙本国律师的监禁——他们为履行公务在去西班牙参加调查工作的时候被捕。除此之外——好象还不够——还不准

① 这里指1958年对德尔加多竞选活动的秘书长、建筑师阿图尔·安德拉特、波尔图律师维列纳·安德拉特和民主党人维里亚托·里贝洛的监禁。他们都是翁伯托·德尔加多的私人朋友和政治伙伴。

把遇难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埋葬在葡萄牙土地上，埋葬在他曾那么热爱过的祖国的土地上。就这样，在他死后仍强迫他继续在国外流亡！”①

直到那时，葡萄牙政府对暗杀翁伯托·德尔加多未发表任何正式声明，保持着审慎的沉默。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仅限于鼓励发表为“ANI”通讯社所控制的电讯——而这些电讯都在有意歪曲事实真相。然而，上述文件在全国引起的道义上的反响是巨大的！萨拉查被迫应战，以图装装门面。他在1965年11月5日竞选运动闭幕演说中就是这样作的。他使用的言辞反映了他的人格。非常值得把这些话记录于此：

“我认为告全国书……对政府的或者说是当局的行为进行了苍白无力的批评，对严重的嫌疑犯进行了有失君子风度的评价……例如在主要问题上，特别是在由邻国的司法当局负责的、由于我们司法当局的疏忽而拖延了的关于前将军德尔加多被害的调查工作。

“这位前将军曾同我共事多年。不管私人关系如何（呜呼！），如此长久的共事总会在我们精神上留下印记。他虽然有才华，精力充沛、天性诚实，但那种急躁和反复无常的态度肯定使他的行为带有某种难以预见的、悖乎常情的特点。他热衷某些美洲政治生活的东西——他那踌躇满志和爱出风头的精神易受此毒害，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东西引进葡萄牙。却不知在葡萄牙，上下有序、谦恭礼让的传统及权力的尊严与这些东西格格不入。他作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表现了煽动的天才。对那些疯狂的许诺、勃勃的野心和满腔的仇恨，各地的群众趋之若鹜，这虽使我们担忧，但并未构成真正的危险。在这个风俗恬淡、生

① 请看《1965年的竞选运动——国民感兴趣的文件》小册子。

活宁静的国家里，把冒险引入国家高层机构内的作法必然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保留和猜疑。总之，他是一面被邪恶的思想所利用的借以煽起颠覆运动的旗帜。

“他这样做是缺乏深思熟虑的。他没有多少理由流亡到异国他乡，这与其说出于他自己的愿望还不如说秉承别人的意志。他为反民族行为的精神领袖而沾沾自喜，不惜给国家脸上抹黑。在巴西、布拉格、阿尔及尔，他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核心。直到有一天，他厌倦了这些毫无结果的活动，对种种密谋深感失望，甚至为那些自称是同党的人所背弃，于是决定破釜沉舟——同其他阴谋分子商定‘立即’发动一场革命或者干脆向葡萄牙当局投诚并‘讲出一切’。

“对我们来说，任何革命运动都是行不通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只有死亡才能保证他们沉默。如果西班牙当局能弄清犯罪的情况，甚至最后的细节，我们将会知道他究竟准备向我们讲些什么。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这也是我们对此案极感兴趣的原因并据此迅速地诚实地作出了反应。”

萨拉查的说法——甚至使用的言词——都同两个月前当我被捕时“毕得”的副局长若泽·萨切迪对我的“解释”不谋而合。这是一个牵强附会、厚颜无耻、经不起分析的说法！当然，德尔加多可能是去西班牙“进行仓促的革命”，或者准备在失败的情况下向葡萄牙警察投降并“讲出一切”。萨拉查的科学依据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的情报人员、从同德尔加多有接触的双重间谍那里得到的吗？除了险恶的用心之外，这也是对一个具有高度尊严，一个从来没有违背自己诺言的人进行的诽谤。1962 年 1 月，翁伯托·德尔加多回到国内领导过一次革命——一场真正的革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他却没有因此而向警察投降并“讲出一切”，而恰恰相反：他象入境时一样，又秘密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并且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在萨拉查及其警察("毕得")未能使人相信他们对犯罪的"说法"、甚至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西班牙司法当局却象俗语所说的那样开始"抖掉披风上的雨珠"……

在发生两方或三方勾结犯罪一年之后,西班牙法院对三个积案(前两个是马德里1966年2月11日和28日,第三个为卡塞雷斯的同年3月28日)作出了最后宣判。根据西班牙的调查,事实究竟如何呢?虽然整个犯罪案件仍是司法秘密,但宣判书中已指出"有充分的、合理的迹象"以下述方式再现那次事件:

1964年的最后几天,翁伯托·德尔加多和葡萄牙人埃内斯托·索萨·卡斯特洛及马里奥·卡瓦略(后者旅居在罗马)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商定于1965年2月在巴达霍斯举行会晤,除了上述人员外,还将有"其他葡萄牙朋友"出席。卡瓦略从埃内斯托·马里亚·比佐格诺(一个名声不佳的意大利人)手中弄到了一本假护照。将军将持这本假护照,使用洛伦索·伊巴涅兹的名字进入西班牙。会晤地点是车站、邮电局主楼和主教堂。德尔加多和他的女秘书阿拉雅丽尔·莫雷拉·坎波斯于2月12日到达巴达霍斯后就住进了西曼卡斯旅馆,随后他们去了车站、主教堂和邮电局,但却没有遇到任何人。后来,他们从旅游部门了解到去奥利文萨和比亚努埃巴·弗雷斯诺的最佳道路。

就在12日那天夜里,两对貌似北非人的人也在西曼卡斯旅馆下榻。第一对由一个名叫贝内泽特和另一个姓名不详的人组成;第二对由哈桑·盖伊·艾萨克及另一个也是姓名不详的人组成。人们看见这四个人在餐厅里与德尔加多将军进行过"秘谈",并于第二天早饭后离开了旅馆。哈桑和他的同伙后来住进了巴达霍斯的拉斯·维加斯公寓,直到14日才离去。

13日早晨，德尔加多再次到邮电局和车站，却仍然没有碰到要等的人，于是决定离开巴达霍斯。为此，女秘书在拉·埃斯特耶萨公共汽车公司买了两张去塞维利亚的车票。还是在13日上午，德尔加多还同巴达霍斯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商定了去奥利文萨的旅行，但是没能成行。还是在那天上午，他给埃米迪奥·格雷罗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其内容可能是“虽未能在约定地点相见，仍碰到了什么——也许是弄错了——这使人相信交易可能做成”。

就在13日这天上午，四名旅行者从比亚努埃巴·弗雷斯诺边防站进入了西班牙。根据出示的证件，他们的名字是菲利浦·加西亚·塔瓦雷斯和埃内斯托·卡斯特洛·索萨，在葡萄牙注册的奥佩尔牌EA59——55和雷诺牌GD86——23汽车的车主，陪伴他们的人据说叫罗贝托·乌里塔·巴拉尔和瓦斯德奥·孔丹马尔·米尔普里。前三人使用的是葡萄牙护照，后者使用的是英国护照。这四名旅客是在葡萄牙圣·莱昂纳多边防站的警长(属于海外国家保安警察)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塞梅多的陪同下进入西班牙的。这位警长向西班牙官员介绍说，菲利浦·加西亚·塔瓦雷斯是“驻安哥拉的警长”，同行者是他的“朋友”，还说，四人是去塞维利亚度周末的，不久将从同一个地方返回葡萄牙。

对这四个旅行者所作的调查表明，前三人的证件都是假的，最后一人——瓦斯德奥·孔丹马尔·米尔普里——的护照却与一位旅居泽西(英格兰)的巴基斯坦公民的护照相同，而这位巴基斯坦公民在上述日期中并没有离开过泽西，而且两年前当他在里斯本时，曾向葡萄牙警察(“毕得”)报案说就在警察局的办公室“丢失”了自己的护照，并要求警察把护照归还他。汽车的证件是假的，牌照也是假的。由于西班牙警察不可能在葡萄牙进行

调查，因此要求葡萄牙警察证实汽车和汽车使用人的真正的身份，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点积极的调查结果。此外，还查清了那辆奥佩尔汽车是厂家卖给它驻里斯本的代表的（车架号是1/2　346444；发动机号是17/　6514893）。上述汽车没有走去塞维利亚的最近公路，却绕到了巴达霍斯。不论是汽车还是汽车的使用人都没有到过这个安达卢西亚的省会，也没有在途中的住宅或旅舍过夜，却在第二天（14日）从埃尔·罗萨尔（尤埃尔巴）边防站重新进入了葡萄牙，成为当天通过这个边防站的第二个或第三个人。

就在13日下午的早些时候，一辆汽车在靠近奥利文萨的地方离开了巴达霍斯至比亚努埃巴·弗雷斯诺的公路，隐藏在一座小丘旁。不一会儿，又来了一辆车，从这两辆车上下来了一些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不一会儿就走掉了。但是在那个地方留下了血迹，一些没有射击过的口径为7.65毫米的子弹，一些口径相同的弹壳和一张弄皱了的、空白的第二天（星期天，14日）球赛的葡萄牙足球彩票。判决书认为："在案件中，有充足的迹象可以证实，在上述地点聚集的车辆和人员就是那天早晨使用假证件从比亚努埃巴·弗雷斯诺过境的车辆和人员，其目的是绑架翁伯托·德尔加多。德尔加多是被自己的同党用阴谋诡计骗到那个地方去的，当他进行反抗时被杀害了。"这个日子同洛伦佐·伊巴内斯和他的女秘书从西曼卡斯旅馆离去的时间是吻合的。他们扔下的行李由于他们住旅馆未付账而得到通知的西班牙警察到来之前却被人偷了。西班牙警察为调查失主的下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

"两个月后，在比亚努埃巴·弗雷斯诺市郊的一条通往葡萄牙的崎岖不平的、没有设边防站的、而且一般说来幽静的路上，在靠近邻国2公里或者2公里多一点的地方，发现了一具男尸

和一具女尸。经查死者为翁伯托·德尔加多和阿拉雅丽尔·莫雷拉·坎波斯。看来前者受过致命的打击，而后者可能是被勒死的，死亡的时间已有两个月左右。”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同样的预测，确切的说在2月13日那天，傍晚时有两辆汽车和一些人隐藏在那儿的非常茂密的草丛中。他们做出的姿式足以让两名偶然先后从那里经过的行人——一位牧羊人和一位男护士——离开那个地方，而不致看到具体情况。2月12日和13日，在那条路的路口前（已属于葡萄牙领土），停着一辆吉普，乘车人正在捕鸽子，而在那个时候，邻国是禁止捕鸽子的。”

上述判决认为，巴达霍斯会晤只有巴黎的埃米迪奥·格雷罗、罗马的马里奥·卡瓦略和他的朋友比佐格诺及拉巴特的塞尔克拉知道。知情的还有葡萄牙的“朋友们”，其中有埃内斯托·卡斯特洛·索萨，而他“好象在瓜的亚纳河中淹死了”。种种迹象表明“格雷罗和塞尔克拉曾劝说将军放弃去巴达霍斯的旅行，他们认为此行是危险的，而卡瓦略不仅鼓动将军前往巴达霍斯，而且答应为将军提供帮助。为促使将军去巴达霍斯，他还说什么葡萄牙的朋友们都已经上路了。这并不是真实的。卡瓦略虽然答应前往，但却没有去巴达霍斯，后来又提供假证词。这使人们推测：他曾同将军的敌人合谋，向他们提供了消息，以便诱骗将军——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到绑架将军的地方。为了反抗对他的绑架，将军在这些敌人手中丧失了性命”。

从判决书中还可看出：“比佐格诺——他向将军提供了假护照——由于家境富足而享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在犯罪前后曾两次到里斯本旅行。由于他同著名的秘密军队组织领导人——一个叫让·雅克·苏西尼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使人不得不把这一事实同霍夫曼中尉——属于阿尔及尔事件后被解散的法国军团伞兵第一团——向勒克莱克律师提出的提议联系起来。

他说只要出一个价，他就可以向律师提供所有关于杀害将军的细节，而最终又没有这样作。”

根据这样描述的事实，被判犯有合伙预谋罪的人有：菲利浦·加西亚·塔瓦雷斯、埃内斯托·卡斯特洛·索萨、罗贝托·乌里培·巴拉尔、瓦斯德奥·孔丹马尔·米尔普里、哈桑·盖伊·艾萨克、贝内泽特·埃内斯托·马里亚·比佐格诺和马里奥·卡瓦略。然而，上述名字中只有最后两个名字才与真实的（人们认识的）人一致。

几天以后——1966年2月28日——宣读了新的判决书（是判决摩洛哥公民埃利·塔皮埃罗的）。这位塔皮埃罗是在委内瑞拉注册的DR00——85号林肯牌汽车的车主。阿拉雅丽尔·莫雷拉·坎波斯可能在这辆车中被杀害。对此人们知道些什么呢？

判决书认为，西班牙当局证实，1965年2月22日，塔皮埃罗乘坐自己的汽车从马德里到里斯本旅行，在里斯本用一个维尔吉纳983880的牌照换下了他车上原来的牌照。在返回塞维利亚的路上，他没有从埃米·罗萨尔经过——这是一条最近的路——却于25日下午从比亚努埃巴·弗雷斯诺穿过边境。两个月后，他从发现翁伯托·德尔加多和他的女秘书的尸体的地方经过，汽车出现了故障，使他不得不在瓦伦西亚·蒙贝停下来。他不得不用一辆卡车拖车载着他的汽车，把它存放在帕拉·巴达霍斯停车场。西班牙警察到了那里，找到了那辆车。经过专家检查证明车上的血迹和头发是阿拉雅丽尔的，与死者留在坑里的血迹和头发完全一样。因此得出塔皮埃罗有罪的结论，因为“只有他拥有一辆2月19日起经过马德里海关并于26日送到巴达霍斯停车场的车”。这证实了新闻界的传言，即阿拉雅丽尔是在将军死亡几天后被暗杀的，她也是早就被绑架的。这是一次残酷

的暗杀，以便除掉一个了解全部内情的、可能造成很大麻烦的人！

一个月以后，即1966年3月28日，新的“起诉案”指控海外国家保安警察人员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塞梅多有罪：“有足够的、合理的理由证明海外国家保安警察人员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塞梅多有罪，因为在1965年2月13日，他作为边防站长陪同四名旅客从自己服务的圣·莱昂纳多边防站到达比亚努埃巴·弗雷斯诺。经查验他们的证件，证明其中一人——菲利浦·加西亚·塔瓦雷斯——是安哥拉的警长。他把这四个人的情况向西班牙警官们和海关官员们作了介绍。西班牙警察局和海关检查站作了入境登记并记下了他们旅行用的车辆牌号。然而对他们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不但这四名旅客——他们被指控为谋杀翁伯托·德尔加多和阿拉雅丽尔·坎波斯的合伙杀人犯——的个人证件，而且他们旅行所使用的车辆的证件都是假的”。

因此，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塞梅多被判决为罪行的合谋者，同时裁定对他进行监禁，“不准保释”。然而，由于他在葡萄牙，他既没有被监禁，也没有被要求引渡。由于这是一桩政治案，所以这一点在司法上是有争议的。事实上，葡萄牙政府已声明强迫一名葡萄牙官员到外国的司法机构出庭作证不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况且，从他的名字被认为与罪行有关那一刻起，就已经再也找不到他的下落，他也不再是海外国家保安警察的官员了……

由于警察享有特权，在葡萄牙任何针对塞梅多有罪的指控都将由海外国家保安警察自己来调查——很明显，这样就使这一可能性完全失去了司法意义！

由西班牙司法当局所做的调查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说，我是通过判决书提供的材料才知道进行过这次调查的，这显然是不够的。此案在西班牙一直是司法秘密——这对于政治案有很大的害处，因为公开是抗衡法院保密的唯一有效的武器，而法院总是站在政府一边的。仅从公布的材料看，我觉得西班牙的判决远未彻底解决问题。有许多东西含混不清，而其他问题自然有待进一步澄清。然而，这已足够彻底粉碎萨拉查所谓的反对派之间"互相算账"的理论，并最终裁定葡萄牙警察(海外国家保安警察)为罪魁祸首。

当然，被西班牙司法当局判处有罪的许多同谋犯纯粹是些子虚乌有的人——因为没有弄清他们的真正身份。据推测，西班牙警察当局知道的要比案件中透露出来的材料多得多。其他国家的警察有可能拥有有关本案的具体材料——因为此案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所以他们非常关心它。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传言。我甚至不怀疑完全能够弄清犯罪者的身份和犯罪的具体细节！尽管我们仅有西班牙司法当局提供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代表着一个基础，确切的说，代表着一个可以完成调查的决定性的起点。如果有可能到达审判阶段的话，完全可以弄清本案。可是审判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我想这是由于"国家的原因"。这显示了犯罪的真正政治性质——暴露了所谓友好的、团结一致的政府之间在政治上的利害冲突。在微妙的赌博中它们在幕后进行着激烈的冲突……

在被控有罪的人中间，有一些确是真名实姓，如果他们不是罪恶的具体执行者(这还需要证实)，那么，他们起码与此"阴谋"有关。马里奥·卡瓦略和埃内斯托·比佐格诺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知道的很多东西还没有透露。同样，摩洛哥人和埃利·塔皮埃罗和葡萄牙人、"毕得"警官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塞梅多

也是具体的人，就是说确有其人。他们也远远没有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可靠的线索，仅仅由于葡萄牙当局设置的“沉默墙”而没有被利用，例如有关罪犯们旅行中使用的汽车牌照号码的描述。葡萄牙警察认为这些牌照号码是假的，因为——据说——这些牌照的号码与另外的汽车——一辆小型货车和一辆出租车——的牌号相同。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是有记录的。通过对汽车出产地的调查知道，确有这些车，而且是由葡萄牙的奥佩尔汽车代理行和雷诺汽车代理行卖出的。如果葡萄牙警察对认真调查有起码的兴趣，它显然是有办法找到这些汽车的，同样也有办法找到汽车真正的主人。

人们注意到，如果汽车的牌照是假的，有关证件也是假的，那么所说的车主的证件肯定也是假的。这样复杂的伪造水平使人推测这不可能是用简单的方法就能达到的。它要么牵涉到一个非常专门的伪造网，要么能很容易地使用国家的官僚机器。当然，就算是第一个假设（虽然后者可能更真实）是正确的，也应该指出，具有那么能干的名声，设备又那么完好的葡萄牙警察怎么会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什么也没发现呢？

另一个重要的疑点是巴基斯坦公民瓦斯德奥·孔丹马尔·米尔普里的护照问题。2月13日，一个从葡萄牙进入西班牙边境的罪犯使用了那本护照（西班牙人毫无疑义地肯定了这一点）。当然，确有米尔普里其人，记者和国际人权联合会调查委员会的一名律师在泽西（英国）同他进行了接触。他提出的证词是真实的：在所说的日子里他没有离开过英国，他的护照于两年前在“毕得”那里被盗走。如果不是“毕得”直接参与了这场暗杀，又怎么解释一件如此奇怪的、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呢？

就在事件发生之初，当在报刊上出现米尔普里的名字时，一

位驻里斯本的英国大使馆官员告诉我，英国大使馆保存有一块金属牌儿，这是米尔普里把他的护照送到海外国家保安警察的时候，为取回护照发给他的。然而，由于护照被“盗走”，金属牌儿就成了那次盗窃的证据。

还有那辆2月13日从上午10点到午夜停留在葡萄牙边境一侧（与后来发现尸体的那条“马洛斯·帕索斯”小路相对的），由假捕猎者使用的英吉普也是可靠的线索，如果警察愿意借助此事进行认真调查的话。这辆英吉普属于谁呢？它的使用人的身份又怎样呢？他们在那个地方究竟等待什么呢？在一个象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里这些是很容易调查的。但是很明显，没有进行调查……

关于这一点，西班牙当局传唤了该地区的葡萄牙业主——梅亚达庄园的主人吉列尔梅·吉昂先生。有人说2月12日至13日，有一些海外国家保安警察的人员在那里过夜。他们在那个地方等待什么呢？

人们在那天还注意到在那个地区有过重要的警察部队不寻常的调动。例如在雷于戈斯·蒙萨拉兹，那里停着一辆正在修理的西班牙救护车（在若泽·门德斯·金塔斯修理场）把两名受伤的葡萄牙人送到里斯本后又返回来。“是发生了车祸吗？”——有人向等待在当地咖啡馆中的西班牙人问道。“是被子弹打伤的……”他们答道！

吉列尔梅·吉昂——后来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从来没有在西班牙的司法当局露面。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在巴达霍斯的一场斗牛比赛中看见了他，陪同他的是葡萄牙的一位部长。还有，他同当局那些红人的关系是众所皆知的。有一次（我想是1966年5月），他通过该地的一位律师（他的私人朋友西蒙斯·塞里奥）同我进行了接触。他向我保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与

此事毫无关系。

“如果是这样，”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您为什么不到西班牙的司法当局出面作证呢？”

他从来没有到西班牙的司法当局出面作过证！

但是，在所有的例子中，最明显的还是海外国家保安警察人员圣·莱昂纳多边防站站长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塞梅多的例子。他陪同罪犯们到达比亚努埃巴·弗雷斯诺，并向西班牙警察和海关说他们是他的“朋友”，菲利浦·加西亚·塔瓦雷斯是驻安哥拉的警长。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在第一次作证时——被控合伙犯罪之前——他把如此奇怪的行为解释为他受骗了。理由是他们温文尔雅，风度迷人。那几位旅客的证件和印章虽然是假的，无辜的塞梅多由于过份的好心而受了骗……这是一个拙劣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甚至西班牙官员都听到他同那个菲利浦·加西亚·塔瓦雷斯十分投机、十分亲密的交谈（例如，他曾经问过他夫人的情况，这表示他认识他）。这清楚地证明，与他后来所试图否认的相反，他完全认识那个人。

事实是在初次作证后（尽管还是以警察身份），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塞梅多拒绝去西班牙并拒绝与邻国的司法当局见面，虽然邻国的司法当局多次传唤他。为什么他要拒绝呢？难道因为原告可以直接要求这样做吗？关于这一点葡萄牙人常说“无事不怕鬼敲门”……所以塞梅多有理由害怕！

最奇怪的是，1966 年 4 月 23 日，葡萄牙外交部出面搭救“毕得”人员塞梅多。他们挖掘出 1867 年的一份协约来为塞梅多不去西班牙辩护。在由驻葡萄牙的外国记者当天播发的照会中——尽管葡萄牙报纸被禁止发表——说“把西班牙法官有可能向葡萄牙法院提出的新的问题以书面形式向本人提出似乎更合适”。然而人们要问：如果葡萄牙政府愿意——正如它所说过的

那样——提供“最好的合作以便发现真理”，那么为什么不劝说塞梅多到西班牙法院出庭呢？为什么他们认为书面回答“更为合适”，而所有的人都认为对本人的直接调查对发现犯罪是重要的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把“毕得”的一名人员被控为同谋犯一事向葡萄牙舆论隐瞒呢？特别是为什么不命令调查塞梅多及其他令人极其怀疑的事件并把有关结论公布于众呢？

例如法国当局就没有反对法国警官皮佐尔积极响应西班牙法官的传唤，并在马德里就德尔加多死亡的公开法庭调查中作证。葡萄牙政府如果在对它提出的控告中是无罪的话，那么，就应完全有兴趣照此去做。它非但不这样做，反而对克雷斯波·马克斯法官和德尔加多家人的西班牙律师进行卑劣的影射。为了反对马里亚诺·罗布莱斯律师，甚至威胁要对他进行起诉。葡萄牙驻马德里大使馆甚至还通过新闻界广为散发的照会宣布已委托了马德里大学刑法学教授胡安·罗萨尔·费尔南德斯作律师。时间已经过去了，虽然葡萄牙政府一再扬言，但却从未进行过起诉。谨慎、良言相劝使葡萄牙政府没有更多地干涉此案。常言说：作贼心虚。

根据西班牙的调查结果和亲将军的葡萄牙流放者提供的材料，以及世界人权协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可以肯定，诱骗翁伯托·德尔加多的阴谋是在意大利策划的。为首的是马里奥·卡瓦略和埃内斯托·比佐格诺以及另一个影子般的、身份不明的埃内斯托·索萨。

我们已经看到，西班牙法官指控他们是三重或双重罪的同案犯。然而，当时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在西班牙境内，故其指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另外，在描述将军被诱骗到被处死的地方的情况时，西班牙方面的判决书指出，“他是被自己同党的阴谋所欺骗”，这句话含糊不清。人们不禁要问，根据在西班牙进行的审

理，到底将军的哪些同党参与了这一阴谋？答案非常容易！他们仅仅是：马里奥·卡瓦略、埃内斯托·比佐格诺和埃内斯托·索萨。换言之，他们都是假同党，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负有除掉将军使命的双重特工人员！

为了更好地评价这件事，看看这些人员的政治经历就一目了然了……

埃内斯托·索萨的名字在葡萄牙反对派中是极其陌生的，实际上是一个化名的骗子。

马里奥·卡瓦略认识他，并把他介绍给将军，但从来没有透露过有关他的情况。据说此人在里斯本阿莱克林街有一所住宅。为了弄清情况，我对此进行了一次特别调查，但是一无所获。埃米迪奥·格雷伊罗向西班牙法官说他虽从未见过他，但是此人肯定存在，因为将军本人曾谈到过索萨和卡瓦略一同参加了巴黎会议。他还宣称曾收到过一封由卡洛斯署名的、来自苏黎世的信（已查明是西班牙人）。信中肯定，在瓜迪安纳河发现的死者就是那个活着的时候名叫埃内斯托·卡特斯洛的人。

后来，马里奥·卡瓦略在意大利被传讯时提到《共和国报》的人都知道埃内斯托·卡特斯洛，特别是该报社长卡瓦良·杜阿尔特和总编辑阿图尔·伊内斯。我可以断言这种说法完全是假的。卡瓦略还宣称索萨曾参加了贝雅革命，而这次革命的主要负责人瓦雷莱·戈麦斯上尉断然予以否认。作为律师，我参加了对贝雅暴动罪犯的审判，仔细研究过好几本案卷和大量涉及将军在国外活动的资料。我可以肯定地说，埃内斯托·卡特斯洛和马里奥·卡瓦略的名字从未被提到过。

正如我们看到的，埃内斯托·比佐格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意大利人、党卫军的合作者，曾参与过贩卖毒品和妇女的活动。据说马里奥·卡瓦略曾将他介绍给将军。作为医生，他为将

军做过一些小事，因而获得将军的信任。是他为将军到西班牙旅行弄到了假护照。根据西班牙人的调查，他同美洲国家组织有联系。直到将军带他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大赦会议前，他在反对派中间还完全不为人所知。大赦会议后，受卡瓦略指使，比佐格诺两次赴葡萄牙以便“弄清有关将军的传言”。确切地说，他曾去过《共和国报》，当尸体被发现时，他已在罗马的住所里消失了很长时间。

马里奥·卡瓦略——策划阴谋的主要人物——在反对派负责人中间同样不为人所知。有必要指出，在巴黎还有另一名《共和国报》的记者乘机同将军进行接触，其方式同样令人生疑。

这些无名之辈，能轻易地获得象《共和国报》——反对派的机关报——记者资格，实在令人感到惊讶。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先了解一下《共和国报》：工作条件简陋，缺少资金。作为一个公开性的报纸，标榜为共和派或反对派也欠谨慎。由于困难重重，无力支付稿费，常常被迫刊登一些“同党”——作为合作者——免费提供的稿件。马里奥·卡瓦略就属这一类。他常住罗马，作为一名“普通的共和党人”，经常免费寄送一些报道。应我的要求，《共和国报》社社长卡瓦良·杜阿尔特 1966 年 1 月 24 日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道：

“通过一个友好的同志的介绍(但今天已想不起是谁)，1954年，我们曾为一个名叫马里奥·卡瓦略的先生注册，作为《共和国报》驻罗马的记者。我不知道是否同他谈过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本人并不认识他，也没有和他见过面，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起初，如果马里奥·卡瓦略先生从意大利首都给我们发过消息的话，数量也极少。我们不再把他看作是驻罗马的记者。如果他不要求，我们也不会给他办理什么正式任命的文件。”

他有时自称是博士，有时又自称是教授（化学教授），谁也不知道他的职业、生活方式和具有何种专业职称。他自称是政治流放者，由于政治原因于1947年离开葡萄牙。他在写给德尔加多夫人的信中说："我的资格很老，查阅一下1927——1933年的报纸就可以知道此言不虚。"然而，这些报纸上从未提到过他。那个时期的所有政治家，不管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在被问及有关马里奥·卡瓦略时，都异口同声地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政治家。

他曾被捕过，是否因为政治原因被捕并被关押在政治监狱里呢？他暗示是这样。但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同谁关在一起？这一切从来也没有能够弄清楚。在1933年（他信中提到的时间）和1947年（开始所谓的流亡）期间，他在葡萄牙干什么呢？1945年是所有反对派参加的民主团结运动蓬勃兴起的一年。但是，马里奥·卡瓦略并没有参加该组织。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他于1947年亡命国外呢？当时发生过军事暴动、连续不断的罢工和学潮。没有听说他曾参加过这些运动。如果他是一个流亡者，怎么解释1947年后他又回到了葡萄牙呢？

毫无疑问，从住在罗马的卡瓦略和比佐格诺身上，可以看出置将军于死地的阴谋的蛛丝马迹。事情一开始，我就认为，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可行办法是在意大利重新进行审理。此事如能实现，可以间接鼓舞在西班牙进行的困难重重、进展迟缓的审理。

由于存在着意大利法院的技术权限问题，在意大利进行审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对发生在西班牙境内的由葡萄牙人对另一个葡萄牙人和一个巴西妇女所犯的罪行，很难说意大利法院有权处理这一案件。实际上，居住在罗马的一个葡萄牙人和另一个意大利人已经进行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应

我的要求，意大利著名的刑法学家——朱利亚诺·瓦萨利教授和优秀的青年律师尼古拉·隆巴迪接受了此案并解决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将军的遗孀和子女们的委托书也于1966年2月7日寄给了他们。我必须在意大利审理之前迈出艰难的开头几步。我得到了路伊齐·卡瓦利埃利（人权协会调查委员会成员，一开始就对此事感兴趣）和阿里戈·雷佩托（记者，葡萄牙伟大的朋友，最近刚刚逝世）的坚决支持。

根据意大利律师的建议，将军的遗孀和子女们于1966年2月28日在罗马向共和国最高检查官提出了控诉，其内容是：要求对那些参与了谋杀将军阴谋的意大利人或居住在意大利的人进行调查，正是这项阴谋导致了将军于去年2月在西班牙被害身亡。

同时，西班牙人要求引渡罪犯马里奥·卡瓦略和埃内斯托·比佐格诺的问题也提出来了。而这个问题只有在西班牙开始进行的起诉中才能解决。鉴于意大利宪法第10条和第26条的规定，不允许引渡犯有政治罪的本国人或外国人，所以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困难。意大利刑法第8条又规定："只有部分或全部因政治原因犯罪的罪犯才能被认为是政治犯。"因此，引渡程序有利于一名独立的意大利法官要求在西班牙的法庭调查中澄清事实，而这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达到。

1966年4月6日，西班牙律师马里亚诺·罗贝莱斯也向意大利共和国最高检察官递交了有关马里奥·卡瓦略和埃内斯托·比佐格诺谋杀德尔加多将军和其女秘书以及西班牙对他们在意大利所犯罪行指控的详细报告。而后，同年6月，由朱利亚诺·瓦萨利和尼古拉·隆巴迪组成的律师团向意大利司法部长提出了对马里奥·卡瓦略和埃内斯托·比佐格诺的指控。1966年10月，将军的遗孀和儿子——伊沃·德尔加多少校同意这项指

控并授予律师团全权处理在罗马上诉法院要求引渡卡瓦略和比佐格诺这一悬案。尽管困难重重(随着比佐格诺的死亡,其困难更大),但意大利总算开始了调查,这为进一步弄清事件的真相铺平了道路。

然而,马里奥·卡瓦略在某些人的支持下(尚需调查)以滥用新闻自由为名,对已提及的记者阿里戈·雷佩托提出指控(该记者在社会党的《先锋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一指控澄清了一些重要事实。在意大利进行法庭调查时,卡瓦略为了辩护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口供,被迫提到了某些反法西斯分子的名字,以证实自己所谓的政治身份。然而他打错了算盘:反而证实了他的口供是假的!

在他提到的反法西斯分子中,一些人——象曼奴艾尔·奥利维拉上校(他的名字给弄错了)和记者阿尔瓦洛·坎波斯已经谢世。而活着的人都明确地加以否认。为了表明自己是知名人士和反对派的老战士,他把《共和国报》记者阿图尔·因内斯和曼奴艾尔·阿尔佩德里涅、律师阿尔西纳·巴斯托斯、若阿金·巴斯托斯和若泽·里贝洛及若昂·戈麦斯上尉说成是自己政治上的证明人。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证词。

阿图尔·因内斯在病逝前写道:

1、我从未见过,也从不认识一个叫马里奥·亚历山大·卡瓦略或马里奥·卡瓦略的先生。尽管我最近才知道他曾断断续续作过《共和国报》的记者(我在该报任总编辑长达20年之久);

2、我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人谈到过一个叫埃内斯托·卡特斯洛·索萨或埃内斯托·索萨·卡特斯洛的先生;

3、我不可能也从来没有给他或一个叫马里奥·卡瓦略的先生写过信……同样,我不可能,也不了解在巴达霍斯或任何其他地方举行的任何会议的情况。马里奥·卡瓦略在口供中声称我

曾给他写过信，说什么巴达霍斯会议开得很成功，这纯属谎言。

“最后，我请马里奥·卡瓦略先生出示所谓的我写给他的信或我给他的其他什么文件。”

曼奴艾尔·阿尔佩德里涅(因其反抗精神，深受人们尊敬的反法西斯战士，曾在佛得角的塔拉法尔集中营度过多年)1967年7月5日写道：“大约在1927——1928年，我在里斯本认识了一个叫马里奥·卡瓦略的人。我想他当时正在中学学习。作为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我经常同其他学生举行处理各种问题的政治集会。在这些秘密集会上，我从未见到过马里奥·卡瓦略，而仅仅在咖啡馆中看到他同一些同学在一起，更没有听说他参加过什么重要的政治活动。”

“后来，我全部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或听人谈及他的情况。在过去的40年中，我作为反法西斯战士，曾在《共和国报》任编辑达20年之久。”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马里奥·卡瓦略先生还健在。我是通过报刊和在大家都熟悉的可悲情况下知道这一切的。”

“关于埃内斯托·索萨，我承认从来没听说过，更不知道他是谁。”

阿尔西纳和若阿金·巴斯托斯律师——翁伯托·德尔加多竞选共和国总统时的热情鼓动者和将军的私人朋友——写道：

“无论是马里奥·卡瓦略或马里奥·亚历山大·卡瓦略，还是埃内斯托·索萨或埃内斯托·卡特斯洛，我们都不认识，当然更不会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或任何联系。”

若泽·里贝洛律师1966年10月7日写道：

“在1927—1928年，我认识一个叫马里奥·卡瓦略的人，他自称是教师，住在罗马，生活似乎不太规律。他同青年人在咖啡馆中有过暂短的相会，其中有些人象我一样参加过反法西斯的

政治活动。但是我从来没有见马里奥·卡瓦略参加过任何带有革命色彩的活动。我记得他为了赚钱正忙于一些小买卖。我从来没听说过(至少我没有这种印象),他曾因政治原因或因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被捕过,至少从1931年始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至于戈麦斯上尉,当时因参加贝雅革命正被关押在贝尼塞城堡服刑,因此我未能取得他的证词。但是,他的夫人马丽亚·欧热尼亚·戈麦斯写道:

"我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埃内斯托·索萨·卡特斯洛或埃内斯托·卡特斯洛·索萨先生……我可以肯定,那位先生不仅不认识我丈夫,而且也没有参加1962年1月1日凌晨在贝雅发生的革命行动……至于马里奥·卡瓦略这个人,无论是我还是我丈夫,只是在报刊上看到他的名字同我们不幸的和亲密的朋友翁伯托·德尔加多失踪并被暗杀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面对这些确凿的证词(通过调查所能得到的有关此人的材料)可以充分肯定,无论在葡萄牙,还是在国外,马里奥·卡瓦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什么政治流亡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冒险家!他为何人卖命?他在给已故的德尔加多将军的信中,曾自吹弄到了"资金",那么,"资金"是从何处争取到的?"答案只有一个:直接或间接从"毕得"弄到的!他在葡萄牙同哪些"革命者"有联系?说穿了就是象他和埃内斯托·索萨那样的特工人员或是伪装成反法西斯战士的警察!

他对后来未能去巴达霍斯聚会及1965年2月后半月的所作所为的辩解是含糊不清、自相矛盾和令人怀疑的。在罗马法庭上同埃米迪奥·格雷罗对质时他承认"说了谎"。尽管他不承认,但实际情况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并不在罗马自己的住所。

与他同居的女人(马丽泽)一次遇到马丽亚·布拉干沙的女

儿,“鉴于十多天没有他的音信”,偶然问起她是否有卡瓦略的消息。这事正好发生在他在巴达霍斯那段时间。他究竟在何处?这个秘密只有留待时间去揭开了……

1965年2月21日(将军被害之后),他给将军写了一封信寄往阿尔及尔,以示他的无辜并竭力为自己奇特的行为辩解。

信的一些内容令人困惑:

“如我电报所说,暴风雨尚未完全过去,我身体欠佳。在此我告诉您,我这方面绝不如意。真心希望我的朋友愉快并完成某些事情。由于缺少材料,得到一份高质量的文件是非常困难的。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为了避开意大利机场(检查的很严,经常遇到熟悉的“稽查员”),当我去巴黎时,我决定从最方便的陆路离开,然后在尼斯或巴黎乘飞机去马德里,以便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不知道事情是否重要,但引起了我的警觉,因为当我乘火车去边境时,我碰到一位当地的警察。他非常友好地向我问候,并以‘好奇’为借口问我是否到国外去。我回答说不,我是去热那亚!对这种‘巧合’我感到非常担忧。记得20年前有一次去西班牙时,在罗西奥车站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然而,我继续旅行。当警察进入车厢时,我发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检查去巴黎的证件。我想,这可能因为是节日的缘故。我的护照被他们看了又看,检查了又检查,成了他们手中留下的唯一一本护照。而其他旅客的护照在检查之后立即就发还了。当在文蒂米格利亚停留时,一名官员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走进来,问我这本护照是否是我的?我不能否认,因为拿走我护照的那位警察也在场。他们让我跟他们走。因此,我走下火车随他们到了边防警察局。在那里,他们对我进行了初次审问,让我说出护照是谁给我的,因为这本护照曾‘被盗过’,并被伪造过。经过多次电报联系后,同天下午我被带到热那亚。在那里,我请我的一位朋友以我的名义给您发过一封电报。

我任何事情都不能办，因为这是来自罗马的命令。当天夜里，我象一个杀人犯似地戴着手镣，连推带拖地被带到罗马。真是奇耻大辱！民主、自由何在？在罗马，他们说我是一个刑事犯，并将我交司法部门处理。起诉后又把我交法庭审判。任何人对这种情况都毫无办法，因人们都害怕沾边。他们宣布要交 25 康托(50 万里拉)的取保金。我至少要等待二、三个月。据律师讲，问题要推迟到 6 月份宣布大赦时才能解决。”

“我失去了一切联系，只有现在才开始恢复。我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希望别因我的缺席，一切都不顺利。里斯本和国家的形势非常困难。但是，我们的人确定了会见，我相信一切都会顺利。我并不是取得谈判胜利的关键。现在我找到了阁下的一封来信。这封信的第 2 页上有三处补充。但是其号码与商定在小字典上(另一个版本的小字典，在巴黎 3EL JEFE 549/12 28/13 找不到)的号码不符。同样，字母 JOHMBUFSB 与我这里的也不一样，可能弄错了。尽管这对现在来说无关紧要，但对将来确很重要。”

“现在我收到一张支票。明天我同医生办理此事。同医生的关系远不如以前那样好了。我等候着您们的消息并试图同国内接上关系。在国外所受到的待遇(象最近这次那样)，最好还是在我有生之年，结束这痛苦的生活。”

显而易见，卡瓦略为制造假象而写了这封信。这是为自己开脱的一封信！象人们推测的那样，一些人知道他去巴达霍斯的许诺，所以他必须为自己的缺席制造一个借口。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解释将军失踪时他已返回？然而，这种“解释”(大部分很容易证明是假的)是十分牵强附会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需要仔细调查。

另外，有关意大利警察检查他的护照，“戴着手镣”入狱及后

来起诉的故事不仅离奇，而且也永远不可能证实。为什么一个自称是葡萄牙革命者的人对意大利警察惧怕到这种程度？真是荒唐至极……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将德尔加多诱骗到巴达霍斯去的“阴谋”中，卡瓦略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承认卷入了这一阴谋。他说：“我们的朋友同意了这次会见，我确信一切都会顺利。”这里指的是什么朋友？这点很关键。卡瓦略从来也不敢说明到底哪些朋友参加了“阴谋”。为什么？很简单，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他为了更巧妙地把将军诱入陷阱并将其置于死地而虚构出来的。

然而，他承认“朋友们同意了”这次会见。通过其他途径，我们了解到，尽管多方面劝说将军不要去参加会见，但是，这一莫须有的所谓同意仍然促使将军下决心去巴达霍斯。阿道夫·阿亚拉就此说道：当德尔加多还在阿尔及尔时，他收到他的一封电报，其内容如下：

“真奇怪！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去，然而这位却要我不要缺席。阿亚拉！复印两份拷贝存在保险柜里。”

将军失踪后，这封电报连同将军的其他文件一起被阿尔及利亚当局没收了。总有一天这件事会真相大白。这封电报的作者很可能就是马里奥·卡瓦略或受他指使的某一个人……

在卡瓦略的信中，有句话使他露了马脚：“我不是交易的关键。”如果这封信真是写给德尔加多——而不是为以后留下退路，那就是多此一举，因为德尔加多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一阴谋，应该知道谁是“交易的关键人物”。

当我通过朱利亚诺和隆巴迪律师，以德尔加多家属的名义向国际新闻界宣布打算在意大利重新立案时，马里奥·卡瓦略—恩里克·塞克拉立即做出了反应。塞克拉从拉巴特给我打来

一封电报。

鉴于电报的性质，我只告诉了参与法律调查的同事，特别是费尔南多·费朗和律师团的成员、德尔加多将军的遗孀和子女们。

显然我对此事有所保留，但是葡萄牙政府的官方报纸《晨报》——唯一政党的机关报——在1966年3月12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塞克拉的电报。3月9日国家通讯社从马德里发出一条消息，《晨报》以大字标题刊出了这条消息："众说纷纭，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的一位同事和朋友强烈谴责一位葡萄牙律师。"这篇可能是由塞克拉交给"国家通讯社"的文章，在谈到我时写道："翁伯托·德尔加多领导下的葡萄牙阵线秘书处的法定继承人恩里克·塞克拉在给里斯本的律师马里奥·苏亚雷斯博士——翁伯托·德尔加多家属的代表——发去了一封电报。电报强烈谴责这位葡萄牙律师参与了爱国阵线的活动。根据塞克拉的说法，该阵线可能组织了对翁伯托·德尔加多的谋杀。他宣布自己已给前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的遗孀和子女们写了信，要求另请一位'有权威、称职的'律师来代替马里奥·苏亚雷斯"。

紧接着，电视台和国家电台播放了这篇文章，其他报刊也纷纷转载。《罗安达商报》甚至用了二行标题："塞克拉谴责马里奥·苏亚雷斯参与了维拉努埃瓦的犯罪活动！"

我通过国内外新闻界就此发表了下列声明(新闻检查下令从所有葡萄牙报纸上撤掉)：

"对国家通讯社播发的，电台、电视台和《晨报》、《呼声报》大量报道的恩里克·塞克拉发自拉巴特的电报，我声明如下：

1、电报的邮戳清楚地显示出发报的地址，我不想对其意图进行评论，是非自有公论；

2、作为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的家属(妻子和子女)的律师，我一直进行着严格的、困难重重的职业活动。对我所作所为的评价(我唯一感兴趣的、也是正确的评价)应由律师团(我有幸代表他们)、律师工会(我以属于它感到自豪)和法律委员会(给我们——我尊贵的同事和被委托律师之一的费尔南多·费朗和我本人以很多的关照)来作出；

3、顺便指出，需要出现一封电报，以便葡萄牙新闻界被批准把我的名字作为翁伯托家属的律师予以公布。事实上，遗体被发现的当天(已一年了)我已是家属委托的律师，后来多次去西班牙、一次去意大利处理此案。我至少给两个部呈送过函件。但直到昨天，全国才第一次(非常偶然地)知道翁伯托家属还有一位葡萄牙律师——实际上是两个，一开始就受到由 10 名杰出的律师组成的司法委员会的支持；

4、至于对我所谓参加爱国阵线政治运动所作的用心险恶的谴责，我只想指出，这完全是捏造。作为反对派，我的政治活动——以始终不移、公开和毫不含糊而闻名。当然，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履行律师的职责。”

1966 年 3 月 10 日的这份声明和当时马丽亚·伊娃夫人给我的一封信的拷贝同时散发。由于新闻检查不允许发表(却允许发表塞克拉那封污蔑性的电报)，我被迫给内阁总理发去一封电报，其内容如下：

“我刚获悉，新闻检查委员会扣发了我对国家通讯社关于我作为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家属律师的所作所为消息的批驳。这则消息已在葡萄牙的一些报纸、国家电台、电视台上发表，严重地损坏了我的职业尊严，也破坏了法律赋予的基本申辩权和宪法赋予的保护名誉不受损害的基本权利。为了减少在公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我请求阁下干预属于总理府的新闻检查机构，

以保障法律赋予我的申辩权力。”

两天后，我的申辩发表了(虽然只是一部分)。新闻检查通过种种限制再一次为误导公众舆论和阻止公众了解德尔加多案件立了功。公众一旦知道了德尔加多案件的真情，必然会对政府发动一场不断施加压力的运动，以迫使它重新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

鉴于“毕得”继续禁止我出国，我于1966年4月去意大利的计划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意大利法官朱利奥·佛朗哥通过伊特波尔·伊娃·德尔加多夫人和儿子约我见面。尽管对起诉存有异议——使意大利的审理成了问题——这种尝试仍是有益的，特别是格雷罗和马里奥·卡瓦略的对质。因为通过对质，卡瓦略的谎言就会被彻底揭穿。

同年9月，我又去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同以往一样，我去找克雷斯波·马克斯法官并在卡塞雷斯见到了他。他向我保证，最迟到1966年12月诉讼，审理就将结束。来年(1967年)1—2月份就可进行判决。尽管埃列·塔皮埃罗顽固地否认一切(他对汽车事件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但还是被关押着。如果公开审判，很多问题可以澄清。马克斯法官对我说：

“在听证时，律师们将有完全的自由。我相信，在您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弄清事件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1966年12月，当我获悉克雷斯波·马克斯法官决定释放埃列·塔皮埃罗时，我是多么吃惊呀！这使在西班牙继续进行审理成为泡影，同时也违背了他当时向我们所作的许诺！释放塔皮埃罗——理由竟是缺少指控他的证据——意味着失去了在西班牙唯一在押的被告，或者确切地说唯一存在的罪犯。鉴于西班牙法律规定不能缺席审理，这就意味着审理被迫停止。德尔加多一案只好这样无限期地“等待进一步的证据”！

怎么解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呢？西班牙人无法摆脱这样一个立即传播开来的谣言：即高层人士的影响或所谓的“国家利益”胜于法律条文！实际上，邻国当局在公众舆论面前推卸掉责任之后，已对此案不感兴趣……某些旧的勾结又沉渣泛起，开始起作用。

当然这纯属假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符合逻辑的。在事件开始时，两国警察之间保持着接触，两国当局的合作也很密切。他们对此并不隐讳。1965 年 2 月 20 日，葡萄牙当局正式宣布，“毕得”的调查人员曾去过巴达霍斯辨认丢弃在西曼卡斯旅馆的行李。2 月 24 日，该调查人员到达巴达霍斯，随后又赴马德里，在安全总局的领导下参与调查工作。同年 4 月 27 日，“毕得”的这名调查人员又返回马德里，参与尸体的辨认工作，后来又提供有关指纹和解剖尸体的情况，以辨认将军的尸体。5 月 7 日，“毕得”的办事机构在里斯本接待了西班牙安全总局情报处长的来访，并向他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有关德尔加多和爱国阵线成员们之间分歧的情报。5 月 18 日，“毕得”的另一名特工人员又去马德里处理德尔加多事件。

葡萄牙当局向国际新闻界宣布的这则消息证明，两国警察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合作，尽管为了保护自己，消息中充满着矛盾。自西班牙内战开始，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国政府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刻，双方警察也没有放弃这种联盟。然而，在西班牙当局调查后，由于法官克雷斯波·马克斯对“毕得”的指控，这种关系开始恶化并出现了严重的事件。葡萄牙政府的一些照会中也不断提到这一点……

这期间，我多次赴西班牙。通过接触，我感到，“政府”各单位之间的意见有着非常微妙的差异。较为自由的一些部门，特别是外交部和司法部所辖的一些部门，真诚的希望将事件弄个水落

石出，以便彻底摆脱西班牙在这一罪行中的任何责任，反对阻止调查及所谓意识形态的声援。这一目的达到之后，旧的政治联盟就开始起作用了。我认为克雷斯波·马克斯法官之所以决定释放塔皮埃罗(完全符合他经常向我们律师表露的思想，但缺乏任何法律根据)，原因就在于此。勿庸讳言，他的态度在密切注视此案的司法界引起了深深的失望。

西班牙法院出人意料的决定给在意大利进行的审理带来了困难。在结束调查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根据是没有一个被告在西班牙境内)，一位西班牙法官致函葡萄牙外交部长，指控葡萄牙公民并要求转交给司法部长，以便葡萄牙对罪犯进行起诉。这是一个毫无结果的善良愿望，只不过是为了求得身心上的安慰而已。葡萄牙当局已经充分表明对事件不愿作任何调查。象人们预料的那样，这种姿态如泥牛入海，再无下文。

马里奥·罗布莱斯律师也呼吁国际司法界继续已开始的调查。然而，当主权国闭门自守，阻止正常的法律程序时，国际组织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因此，这一建议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莫须有的罪名下，我被关押了三个月(1967 年 12 月至 1968 年 3 月)。随后，未经审判，仅根据部长会议的决议，就被无限期地流放到靠近赤道的圣多美岛。德尔加多事件表面看来已过去了(报纸的新闻和公众已不再提及了)。罪犯未受到任何惩罚，可以弹冠相庆了。事实上，政治罪是很难确定界线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就有本·巴尔卡、基德尔、卢蒙巴……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上，受到互相矛盾宣传毒化的公众舆论还有别的事情要关心，他们对政治犯罪有种厌倦的趋势，希望忘掉那些使他们良心不安的问题！这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和表面现象相反，德尔加多事件并没有从葡萄牙人的记忆中消失。这是一根扎在所有有识之士良心上的刺——不仅疼痛，而且还不时流血！

1969年10月，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为最后一次竞选在里斯本蒂沃利电影院举行了一次最大的宣传活动。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包厢里、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幕布升起时，舞台上一束金色的灯光照耀着德尔加多的巨幅画像，场面真是令人激动！人们欢喜若狂！大家起立欢呼“无畏将军”。（他是葡萄牙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象征，为祖国的自由慷慨地献出了生命！）突然，从人群中传出怒不可遏的喊声：“杀人犯！杀人犯！‘毕得’滚蛋！打倒‘毕得’杀人犯！”

我至今还认为，“毕得”在10月“大选”后立即更换名称——不幸的是仅仅改换了名称——表明了当局承认这一机构已声名狼藉。这应归功于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成千人发自内心的谴责，这种谴责随后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深深地刻在了觉醒了的葡萄牙人的脑海中。毫无疑问，即使在人们没有勇气表达或是保持缄默时，他们还是有一定觉悟的。换掉“毕得”这一令人憎恶的名称是一个聪明的政治行动。但应该说这还不够！为了净化葡萄牙的风气，还必须伸张正义。事实是在德尔加多事件中正义未能得到伸张，而这也许是在葡萄牙整个历史上最令人痛恶的政治犯罪。

罪犯们继续逍遥法外！1970年1月——将军遇害五周年前夕——德尔加多家属的西班牙律师在给葡萄牙内阁总理马塞洛·卡埃塔诺教授的信中呼吁道：

“在将军遇害将满五周年的时候，葡萄牙仍没有对凶手进行任何起诉。为此，我们给阁下写信，请求您将1966年2月11日起诉书中的无辜者移交给西班牙司法当局，以便葡萄牙人民和

所有爱好和平和人权的人们了解究竟谁是凶犯和同谋。”

总理府办公室主任克扎达·帕斯托尔博士于1970年3月3日复信，内容如下：

“总理阁下收到了诸位1月6日的来信，并立即责令司法部通知有关部门向他报告。”

“司法部于当日向总理府提交了司法警察当局的全部报告，并附有立案调查的全部材料（应巴达霍斯法官1965年6月18日、10月25日、11月4日和1966年2月12日、4月16日来信的要求）。”

“从全部材料中找不出可以指控（如诸位来信中指出的）任何葡萄牙公民的证据。”

“更没有请求引渡任何居住在葡萄牙的公民。对属于司法调查当局的事情，内阁总理没有更多的情况可以奉告。”

其他信件也同上述信件一样。罪犯们仍然逍遥法外。安东尼奥·塞梅多已不再是“毕得”的特工，摇身一变成了安全总局的官员。这样难道就可开脱被西班牙司法当局所证实的他的罪责吗？

五年过去了。翁伯托·德尔加多的遗体仍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德尔加多一案仍悬而未决。但是，所有的葡萄牙人都应对自己的良知、对围绕这一罪行蓄意制造的沉默负责。因为沉默等于第二次谋杀……

·11·
殖民冒险

为了用武力营救被关押在那里的安哥拉政治犯，1961年2月1日，发生了袭击罗安达监狱事件。葡萄牙当局马上作出了反应：数百名土著人被残酷杀害。同年3月15日，在安哥拉北部地区爆发了反对葡萄牙统治的武装斗争，几百名手无寸铁的白人被极其残酷地杀害了，全国上下为之震惊。长期的、残酷的杀戮序幕拉开了。经过35年专制统治毒害、生活在万马齐喑中的葡萄牙被惊醒了，对殖民战争中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居然茫然无知！

白人逃亡，妇女儿童被杀，作物被毁，田园荒芜。面对这一切，自然要立即采取措施。作为内阁总理、政府政策的最高负责人和国防部长的萨拉查在向全国报告安哥拉的情况和政府帮助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时，仅仅用了四个字："迅速、有力。"真是惜字如金！

虽然这句话后来受到新闻界大肆吹捧，但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实在没有什么高明可言。它是贫乏的，绝非那种应该刻之金石、概括一个困难时期的特点和形势的名言绝句。但是，萨拉查绝不妥协的决定还是为时代打上了烙印。在已经开始的斗争新阶段，他顽固坚持从"殖民法"实行以来所奉行的不退让政策，无视现代世界的现实，对葡萄牙统治下的人民要求解放的呼声

充耳不闻。在某些根本问题上无法扭转的这种个人专断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决定着葡萄牙人的集体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葡萄牙殖民地并非萨拉查政权制造出来的。它是自航海大发现之后在民族历史的曲折过程中逐步形成、变化、发展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民族，葡萄牙的历史义务也严格受到欧洲和国际局势的制约。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中叶，葡萄牙对非洲殖民地并没有多大兴趣。在此之前，安哥拉已是一个奴隶劳动力过剩的市场；莫桑比克仅仅是通往印度途中的停留地。

1885年列强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唤醒了葡萄牙，使她认识到非洲殖民地的价值。在唤醒葡萄牙人对非洲的认识方面，几年前创建的地理学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葡萄牙才试图切实占领这块地方：小股部队在重重困难中深入到内地；不顾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帝国梦"。但结果都不太妙，使葡萄牙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如玫瑰色地图和最后通牒）。

要说明20世纪初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存在是多么微不足道，只要看看下列事实就够了：1900年在这两个地方的葡萄牙白人分别为9000人和3000人。当然，从那时起，确实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努力。但这并不足以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变成所期望的有白人居住的殖民地。葡萄牙移民从来不把非洲作为主要目标，而总是走向更有利可图的方向——巴西、北美、加拿大、委内瑞拉，最后是欧洲（法国和德国，现在甚至转向了西班牙）。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

今天，在安哥拉大约有45万白人（比居住在法国的葡萄牙人还少！），其中有7万士兵，而全国却有500万土著居民；在莫桑比克有25万白人，其中4万是士兵，而整个国家大约有750万土著居民。

另方面，葡萄牙对非洲殖民地的所谓“绥靖”也是最近的事情：在安哥拉，经过不少于15次的远征，直到1919年德博斯人才投降（大约5000人）；在莫桑比克，最终征服“恩共共扬纳帝国”是在1897年左右（马吉关逝世）。更不要说几内亚了。她拥有80万土著人，而欧洲居民只有近3000人（不算军人），直到1936年才被“绥靖”！

事实上，无论是自由君主还是民主共和都特别关心非洲殖民地，试图使其发展和逐步自治，以便有朝一日成为“新的巴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涌现出了一代高水平的殖民地管理家——确切地说，是殖民主义者，他们吸收了当代欧洲的统治观。其中有：安东尼奥·埃内斯、莫济尼奥·阿尔布克尼克、帕伊瓦·库赛罗、诺顿·马托斯、阿尔瓦洛·卡斯特洛。当时重新捡起了“海外省”这一名称，但这并不能否认殖民现象的存在，只不过强调了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特点。 9

当第一次大战在欧洲爆发时——工业列强之间的搏斗，使共和国政府及时预见到了由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在殖民地方面可能产生的后果。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把葡萄牙推向了参战的道路。他们站在同盟国一边，以使葡萄牙的殖民地摆脱其他帝国主义的垂涎。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进步的立场（当然还有更激进的立场）。奇怪的是，当时的叛逆者到处宣传并密谋拿起武器反对葡萄牙卷入战争。但是到了30年代，他们却成了墨索里尼式的帝国的拥护者……

与此相反，受博爱和民主思想影响的共和政治家们（尽管也是殖民主义者）却提出另外的模式：即在葡萄牙的统治下，引导人民走向发展、逐步自治以最终走上独立的道路。1922年，当安东尼奥·若泽·阿尔梅达正式访问巴西时，以葡萄牙的名义感谢巴西人民的“独立”。这不仅仅是共和党人的一句恭维话，而是

葡萄牙优秀传统思想的深刻表现。这就是：进步、创新、博爱、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别的人民和种族对话。

然而，(这里不能忽略萨拉查政权在殖民进程中的历史责任)随着独裁专制的到来，共和国的分权政策(针对多种族、逐步自治的海外省，如派遣总督的有益经验)被抛弃了。作为临时殖民事务部长的萨拉查颁布了殖民地法(1930年)。宗主国和海外领地的关系开始成了帝国——葡萄牙殖民帝国同"海外省"的关系。"海外省"重新被称为殖民地，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名副其实：成为专门为庞大的剥削公司提供原材料，供其发横财的殖民地。这些大公司(以少数白人为代表，居住在宗主国，受外国资本支持)掠夺当地资源，把当地人看作为下等人、现代奴隶和廉价的劳动力。在30年代法西斯节节胜利的影响下，萨拉查企图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值得自豪的、高度集中的帝国。他在这个时期，对帝国的宣传集中在对葡萄牙人的民族主义感情的赞美上，宣扬葡萄牙人是上天指定传播基督精神的民族。非常清楚，如有必要，将诉诸武力……官方的帝国——法西斯思想意识同排斥异己的、富有侵略性和专横的天主教联手结成神圣联盟，为庞大的剥削公司的利益服务。

宣传品上有这样的口号："葡萄牙不是一个小国"！上面印着一张地图，标出葡萄牙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领地，以里斯本为这个大帝国的首都。但是，这并不能鼓舞普通的葡萄牙人去争夺海外领土，因为，享有充分自治的、多种族的社会发展目标早已被专制抛弃了。它现在感兴趣的就是保持现状——有组织地剥削以维护同里斯本统治阶层有着亲密关系的既得利益。只要提一提"新政"时期殖民地事务部长们的名字——突出的代表是佛朗西斯科·马萨多(具有巨大权力的大西洋银行行长)，就可以看出庞大的殖民地公司同帝国政府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了！从这个

角度看问题，那些在殖民地辛勤劳作、不属于宗主国领导的大公司的白人无人问津也就不奇怪了。把富饶地区的好土地分配给白人“移民”以使他们定居下来的经验从未进一步推广。地方问题被忽视，也没有作过任何使当地居民迈入文明世界的努力。殖民地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最好是少谈它！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非洲民族主义的觉醒（现在发展成为反殖民运动），形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一些久经考验的人士，如诺顿·马托斯、帕伊瓦·科塞罗、安东尼奥·塞尔吉奥和库尼亚·列阿尔，对“殖民法”和殖民主义观念的批评突然加强了。而对保持由宣传工具制造的为官方意识服务的古老神话（从1945年就被抛弃）还是适应世界新的局势，更好地武装起来以对付联合国内外不断增长的谴责的选择，萨拉查政府匆忙决定对其非洲政策进行修改。请注意，这仅仅是强加给国家的形式上的修改，如同“殖民法”出笼时一样，事先并未征求国民的意见。1951年的宪法修改案取消了“葡萄牙殖民帝国”这一政治一法律实体（人们不禁要问，除了在发明者的头脑中，哪儿存在过这样一个实体？）并重新将殖民地改名为“海外省”。葡萄牙加入联合国的前景（1955年实现）和国际非殖民化运动的强大威力迫使她进行修改。即使是这样，修改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些官方思想家如阿尔明多·蒙特洛和马塞洛·卡埃塔诺，反对政府提出的修改建议。

在整个修改过程中，名称上的变化之快真可称为快刀斩乱麻。昨天还被看作是真理的东西，今天已变成了谎言。多年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说法现在突然成了叛国言论。“葡萄牙殖民帝国”最热情的维护者们现在对使用殖民地这个名词却感到大惊小怪，对那些没有及时附和他们“新观点”的可怜虫们则嗤之以鼻。

人们看到，这些变化主要是给外人看的。1945 年，在所谓的西方民主的压力下，“新政”匆匆披上“组织民主”的外衣，而实际上仍保持独裁政治，并把殖民地称为“海外省”(基本章程却没有改变)。世界又一次被欺骗了！

殖民地人民(或者叫做海外省人民)，形式上虽然和宗主国人民一样(在官方的神话中，安哥拉同米钮省一样，莫桑比克同阿尔加维省一样)，然而，继续被严格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白人(一等葡萄牙人)；同化了的人民(会讲葡萄牙语的混血儿和黑人)，当局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二等葡萄牙人的身份；最后是土著人(绝大多数是黑人)。这种令人愤慨的情况直到 1961 年爆发武装斗争后才最终废除掉。虽然从法律上不再有什么土著人——表面上他们都是葡萄牙公民，但是，他们的社会和生活现实并未改变。因为这种现实建筑在种族、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极大差异上。如果不对现行的政治—管理体制进行彻底的革命，这种差异是不可能改变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 50 年代，萨拉查政府愚蠢地反对果阿人和印度多次提出的关于进行谈判以和平解决小小的“葡萄牙印度州”问题。在处理同非洲殖民地关系时，同样执行了这项不妥协政策，其后果更为悲惨。

当时，印度是葡萄牙统治者们最担忧的问题，因为，在非洲大陆上，土著人民的落后——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领域——是它手中的王牌……同样，本土上的人民大部分生活在农村，都是些愚昧无知和贫穷的“良民”，过着田园式的“幸福”生活，成为披着宗主国外衣的政治体制生存的最好条件和保障。在非洲，当局利用了多少世纪形成的贫穷、愚昧无知、迷信和部落割据。这就是“葡萄牙世外桃源”所以存在的原因。它与正在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年轻的非洲国家的政治动乱形成尖锐

的对比。

然而，葡萄牙殖民地的形势并不象萨拉查的宣传工具所标榜的那样美妙，那样太平。例如，在圣多美—大西洋中的一个小岛，居民都是从邻近非洲国家来的（在6万居民中，白人只有2500名），1953年，在少校戈尔·古洛（桑托斯·戈斯塔部长的朋友和被庇护者）政府的统治下，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件，这就是有名的血腥镇压巴特帕起义！

《非洲现实》在1955年4—6月号上刊登了题为“发生在圣多美的大屠杀”的文章。文章描述了数千名土著居民——佛得角人、安哥拉人和莫桑比克人如何被征集去从事奴隶劳动，如何屠杀那些企图进行反抗的人。葡萄牙新闻界对此自然视而不见。它被禁止对所有这一切罪行作任何报道。

曼奴艾尔·卡洛斯律师由于职业原因曾详细了解过事件的真相。他在给最高法院的上诉中写道：“土著人象牲畜一样被捆在一起押送到监狱。每天又从监狱里押送出来从事劳动，不少人戴着粗大沉重的铁链工作。”众所周知，1953年2月6日，被关押在监狱中的45人中，有30人因窒息而死亡！在被用过的刑具中，就有直到今天人们还经常谈论的“电椅”。使用电椅以取得“口供”，但是，没有一个招供者能活着出来。就其总数而言，死亡和失踪者达千人之多。

被派往圣多美调查这一事件的“毕得”人员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是戈尔·古洛总督的打手捏造出来为他们的暴行辩护的谎言。随后，戈尔·古洛总督被偷偷调回宗主国，并晋升为准将。至于事件本身——至今还感觉到它的性质、深远意义及其后果——如同以往一样，至今仍如石沉大海，罪犯们也逍遥法外。

与此同时，宗主国的另一位准将，受命前往圣多美调查一些农业公司采用的劳动方式，在返回里斯本的途中却同早已拟好

的报告一同失踪了。陪同他去圣多美的混血儿助手也中毒死亡。这两件事情的真相还尚待澄清……

圣多美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反抗的火种。然而，现已成立了流亡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委员会，其著名的领导人是：托马斯·梅德罗斯、瓜达卢佩·塞伊塔。

在安哥拉，其形势也不尽如人意。前面已经谈到了恩里克·加尔旺的讲话。他在担任国会议员时就谴责过安哥拉存在的奴隶劳动。这种情况尽管被官方否认，但对任何人已不再是秘密，特别是对于稍微了解一点非洲现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可怕的劳动条件导致了1961年3月的起义。起义随后漫延到北部广大地区，把农村的一切全毁了。这是一种“克扎雷式的起义”（农民起义）。

然而，1956年在安哥拉北部地区的种植园劳工中间，就曾爆发过多次大罢工，但均遭到残酷的镇压。

1959年，几百名土著人被捕，其中就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创建于1956年，由安哥拉非洲统一斗争党和安哥拉争取独立运动合并）的领导人。在此之前，1954年，霍尔敦·罗伯特曾在金沙萨创建了安哥拉北部人民联盟（1958年改为安哥拉人民联盟）。1955年，安哥拉共产党成立。1960年6月，52名民族主义领导人（加入葡籍的土著人）被捕，其中有阿戈什蒂纽·内图博士（著名的医生和诗人，后来成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袖），平托·安德拉特神父（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平托·安德拉特的兄弟）。

仅仅举出这些例子就可看出不仅在安哥拉北部，而且几乎在所有的地区，由于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黑人的反抗精神越来越高涨。政府的“鸵鸟政策”就是竭力否认现实——好象禁止人们谈论这一问题，事实就不存在一样！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最残

酷的暴力手段！

在莫桑比克，众所周知，向南非和罗得西亚出卖土著劳动力是这一“海外省”的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结果导致了1948年发生在洛伦索马贵斯的一场暴动，但同样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956年，码头工人举行了多次大罢工，结果48名非洲人被杀害。1960年6月16日，发生了穆埃达暴动。

在政治组织方面，1949年成立了民族主义者的秘密组织——莫桑比克中等学校学生核心。1959年，侨居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劳动者创建了“莫桑比克非洲民族联盟”；1961年，在马拉维成立了“争取莫桑比克独立非洲民族联盟”；1962年，三个民族主义组织在达累斯萨拉姆聚会，联合成立了由爱德华·蒙德拉内领导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关于几内亚和佛得角，大家知道，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几内亚佛得角独立运动成立于1954年。随后，在1956年，这一组织改名为几内亚—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由阿米卡尔·卡布拉尔领导。1958年，在几内亚又出现了一个秘密工人运动组织—几内亚全国劳动者联盟；1959年，在达喀尔成立了几内亚—佛得角解放阵线，同年发生了闻名的比吉圭蒂大屠杀。

我们看到，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在50年代发生了广泛的震动政界和社会界的地下运动。这些运动导致了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导致了群众（了解葡萄牙殖民主义真面目的黑人和混血儿和学生）自发的起义和反抗。各派解放力量通过1951年在里斯本成立的“非洲研究中心”和“帝国大学之家”的频繁试探之后，首次提出了一个文化、政治纲要草案。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不仅反葡，而且首先应该反法西斯。斗争是从反对按官方意识形态进行的葡萄牙文化同化的图谋开始的，而且第

一次具有了明确的反压迫、反独裁的指导方针。这是一场维护“黑人价值”、恢复非洲文化遗产(有些在政府的政治压力下正受到威胁)的斗争。

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1961年之后涌现出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有不少就是在葡萄牙的反法西斯战士,如阿戈斯蒂纽·内图,马里奥·安德拉特,马塞里诺·桑托斯,瓦斯科·卡布拉尔,他们本身就是葡萄牙青年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运动的成员。

然而,由于萨拉查主义的不妥协政策以及缺乏短期内政治解决葡萄牙内部问题的明确方针,非洲民族主义运动逐步具有独立性并同宗主国的反法西斯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反对派直到那时尚未明确意识到:萨拉查主义的结束,就是葡萄牙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开始。直到殖民战争的最初几年,反对派对此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态度极其含糊。在此期间,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领导人都缺乏对非洲实际情况的真正了解。

我们知道,在整个5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者在殖民地、在宗主国、在流亡地,都创建了自己的政治组织。然而,他们并没有马上决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萨拉查政府对爆发殖民战争的巨大责任。

1957年末在巴黎召开了“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斗争协商和研讨会”。会议期间,成立了由各个葡属殖民地代表参加的“反对殖民主义者运动”,这就是后来于1961年成立的“葡萄牙殖民地民族组织大会”的胚胎。会议的宣言确定了各解放运动共同的政治思想基本路线,其根本目标是立即争取民族独立,彻底消灭葡萄牙殖民主义。重要的是第一次阐明“我们国家的自由和进步不能仅仅依赖葡萄牙的社会——政治革命”。但又承认:鉴于葡萄

牙殖民主义体制继续存在，葡萄牙人民仍是法西斯专制的牺牲品，积极开展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怎样才能获得梦寐以求的解放？宣言主张通过和平方式铲除葡萄牙殖民主义。鉴于国际非殖民化的力量不断增长，这一道路在当时看来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在 50 年代末，反对殖民主义者运动改组为"争取民族独立革命阵线"。在该组织的章程中，明确了目标：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中，革命阵线将利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和不屈从的反抗形式。在葡萄牙殖民主义使用暴力时，革命阵线将采取报复措施。

众所周知，1960 年是"非洲年"。传统的殖民主义大国四处退却，为新独立国家的诞生开辟了顺利的和平之路。然而，葡萄牙一如既往毫不妥协！同年 12 月，葡属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伦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用的语言已有明显的变化："由于葡萄牙顽固地拒绝承认我们的民族愿望，我们别无它途，只有一种选择。由于葡萄牙进行极其野蛮的镇压并准备进行殖民战争，我们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但是，民族主义组织寻求过和平解决，人民反对葡萄牙的暴虐，但遭到的是屠杀。现在，他们迫切要求制定一项积极自卫的计划。

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唯一能阻止大规模暴力浪潮的选择（人们注意到，记者招待会是 1960 年 12 月举行的，袭击罗安达监狱的行动发生在 1961 年 2 月 4 日）就是葡萄牙政府接受民族主义运动提出的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是什么呢？马里奥·安德拉特说："郑重接受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力；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恢复公民自由，特别是成立政党的自由，撤回所有的葡萄牙武装力量和'毕得'的特

工人员。”

萨拉查政府不仅断然拒绝谈判，而且根本不愿倾听非洲人民的呼声，这是殖民战争的直接根源。它在安哥拉的行为和在印度的行为一样。如果说葡萄牙政府35年来一直拒绝给本国人民以自决权，它怎么可能给安哥拉和果阿人民以自决权呢？葡萄牙殖民地的关键问题正在于此……

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说明。

萨拉查主义后来为捍卫自己的殖民政策所作的种种辩解，总的讲就是企图表明：

1、在非洲实行的政策是一项民族政策——“祖国不容讨论”，就是说无论哪一个政府，即便是民主政府，也同样会执行这一政策；

2、“非洲各省”象米钮省或东帝汶岛一样是葡萄牙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不同种族的葡萄牙人民”之间的接触不具有殖民主义的性质，即一个人民统治和剥削另一个人民；“葡萄牙的热带主义”明显不同于法国、比利时和盎格鲁—萨克逊殖民主义；

3、葡萄牙之所以不同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他地方并能在几个世纪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抵抗住西班牙的中央集权主义，原因就在于她的海外扩张。这种海外扩张赋予葡萄牙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所以，放弃海外省就是背叛葡萄牙的历史使命并使国家面临被西班牙吞并的危险；

4、由于非洲的民族主义(官方称为恐怖主义)是在国际主义的诱惑下人为制造的现象，因此，不存在什么殖民战争，而仅仅是“警察的行动”；

5、最后，由于葡萄牙政府顶住了由苏联和中国所谓“新型帝

国主义”在非洲大陆掀起的反殖民主义浪潮，所以它成了在非洲大陆保卫“自由世界”和“基督教文明”的先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萨拉查主义把国家推上殖民冒险的道路，而上述这些观点则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为殖民战争所作的辩解。当然，这些观点的使用要看不同的对象。这些观点在逻辑方面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由于某些观点迎合了人们的感情，而有一些观点则是利用了葡萄牙人的恐惧和怀疑心理（例如，对西班牙不相信），因此，有必要详细谈一下。

安哥拉武装斗争一开始，萨拉查政府就开动葡萄牙舆论工具，以唤起葡萄牙人民的爱国情感。同时，抛出了“安哥拉是我们的”口号，让招募的新兵随着战歌到处高呼……

为了表明政府奉行的是一项民族政策（就是说不依附于任何经济团体和意识形态的压力），他们从两方面寻找证据：1. 未武装的、白色人种的葡萄牙人正在遭受极其野蛮的袭击。因此，必须立即保护他们。作为民族意志的唯一代言人，政府必须承担起这一刻不容缓的职责；2.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讲坛上，葡萄牙的名字受到了玷污。超级大国容许对葡萄牙进行攻击并煽起不公正的误解，从根本上讲就是希望利用属于我们的那些东西：即来自于发现、占领和神圣的历史使命的各种权利。面对反葡萄牙的这种“国际阴谋”，政府完全是爱国美德的捍卫者。

然而这种辩解对大多数葡萄牙人来说并没有很大的说服力。首先，因为它来自一个从来也不报告自己的政绩、对葡萄牙人民的意见毫无兴趣的政府；其次，党派的利益总是被放在民族利益之上；最后，当时印度问题正处于深入的辩论阶段，所以这些陈词滥调对人们影响不大。自从同“印度联盟”发生分歧以来，虚伪的爱国琴弦已拨出了种种调子，但效果实在令人怀疑……

据说在大选期间，一位“新政”的宣传家去阿连特茹劝说某个区的农民相信官方政策的优越性。当他感到听众的敌对情绪时，就提出了种种具有诱惑力的许诺：“政府将在这里铺设一条沥青道路！”“这个区终于要建一所学校啦！”“已经决定，年底前将通电！”等等，等等……即使这样，听众仍然保持沉默，反应冷漠。因此，他气急败坏地问道：

“怎么了？你们不想获得这些利益吗？你们对新学校、道路等极其有用的东西不感兴趣吗？”

一个被问到的农民回答说：

“不，先生！我们不想要……！”

“为什么？”

“阁下您还不懂！我们不要你们喜欢的任何东西！”

这段插曲清楚地表明了葡萄牙人民对政府的看法以及对当局的宣传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即使政府讲的是事实，人民也不相信……

对安哥拉出现的形势，开始时的反应还不太明显。数千个家庭的成员处在极其危险之中，有些家庭已失去了亲人，财产受损。然而，最普遍的反应是深感震惊。人们对于突然发生的事件感到吃惊。但是，慢慢地人们开始提出问题：难道这场灾难就不能及时阻止吗？政府所宣布的抵抗“到底”的主张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过明确的回答……

在反对派中间，殖民地问题突然成了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带来了适应方面的困难和明显的危机。怎样看待这种形势、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派别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差异。但是，需要强调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反对派赞同政府的观点。即使在白人反对派中（他们住在殖民地，受到的压力更大，多数人的思想已带有“黑斑”），也没有任何人敢于站在政府一边，

足见其威信已彻底扫地……最差的情况是从此保持沉默……

政府仅有一个例外的情况可以聊以自慰：即资深的共和—社会党人拉马达·库尔托。他在国家电台发表了一篇讲话，呼吁人们在国家处于危机时举旗战斗。我记得，这是对“抵抗”号召的唯一积极反应……

在1961年10月—11月的竞选运动期间，即安哥拉开始武装斗争6个月之后，民主反对派毫不含糊地谴责政府在逐步扩大的战争中的责任并呼吁不仅承认安哥拉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自决权，也要承认葡萄牙的自决权。

现在需要说明一点，如果在葡萄牙有一个民主政府，很可能会阻止殖民战争的爆发。事实上，对于用什么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反对派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从限期自决到立即独立，意见十分复杂，但在谴责政府对安哥拉出现的局面负有责任并奉行拒绝谈判政策这一方面却是一致的。在民主制度下，早在武装斗争爆发之前，就会对殖民地问题进行广泛和公开的讨论。非洲的民族主义者，象发生在欧洲其他殖民地国家的情况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合法组织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并通过和平斗争去争取。这就是初期他们向我们所要求的！再说一个民主政府也不会否认自决权力，否则，就等于否定自己。在一个享有舆论自由的国家里，即使政府卷入了殖民战争，内部也会出现作为被压迫人民天然盟友的进步力量。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这些力量被粉碎（陷入专制），或者赢得国民意志，迟早会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没有其他选择！

然而，萨拉查政府一方面宣传在非洲奉行唯一可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又拒绝进行讨论，即使在宗主国内部也不允许。毫无疑问，它从来也不敢肯定这是否代表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从1961年始，反对派就呼吁对非洲的政策举行一次认真的公民投票，这就是：先对公众进行一段时间的宣传——由所有政治力量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辩论并将自己的解决方案公之于众。这就使国家有机会在客观了解每个殖民地的真实情况之后，自己决定走何道路。反对派多次要求有接触战争问题的权力，以便全国人民知道所处的真实境况以认清中期或长期内葡萄牙将面临的抉择。

战争开始时，政府曾考虑过这种公民投票的可能性，但从来也没有决定采纳。萨拉查完全了解，一旦认真实行，这样的公民投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尽管呼吁全国的一致支持，但对此并无信心。因此，他用"自发"支持其政策的活动代替公民投票，试图用"背叛祖国"的稻草人和空洞无物的言辞(仅仅能影响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如"祖国不容讨论")来瓦解对手……

因此，尽管有种种禁令，辩论却逐步展开……保卫受到威胁的白人的生命财产是没有问题的：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都要充当这一角色，问题是政府直到那时所奉行的政策和这种政策对未来所产生的后果。不明真相的群众逐渐认识到殖民地战争的现实：受到威胁的利益、可能的前景、空洞的许诺、可见的谈判和经常在这种战争中出现的卑鄙的交易……

某些谨小慎微的立场在人民的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原陆军副国务秘书科斯塔·戈麦斯上校在对《人民报》发表的声明中断言说：战争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军事方式解决。由克罗维洛·洛佩斯元帅作序的奥门·梅洛博士的著作《葡萄牙—海外—未来》(1962年出版)，同样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在宗主国不太被人所知，但是，贝拉(莫桑比克一城市)的主教D·塞巴斯蒂昂·雷森德所坚持的立场和提出的疑问曾使自己的报纸多次被地方当局查封。然而在这期间，一场坚持不懈的使公众认

清政府发动殖民战争责任的活动，从库尼亚·列阿尔开始，通过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书籍展开了：如《死神的魔爪》、《祖国处在危险之中》、《多行不义必自毙》和《恶梦》等。

从 1961 年 3 月起，社会—民主领导中心也向政府首脑提出了许多建议，使它认识到自己所负有的历史责任：即一个大权在握的、在全国没有代表性的、拒绝对话的政府却决定着集体的命运。社会—民主领导中心坚定地捍卫自决原则，把它看作是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唯一和平途径。

但是，由于新闻检查的限制，这些非常明确的、重要的立场仅为有限的阶层所知道，而且得不到国际舆论界的充分了解。因此，萨拉查的声音就成了葡萄牙唯一可以听到的声音，这使国际上许多人认为，葡萄牙大部分人都赞同萨拉查的殖民政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种局势直到 1965 年的国民议会选举运动中才得以澄清。

民主反对派在 5 个区（里斯本、波尔图、布腊加、累里亚、阿维罗）提出了候选人，并联名向全国发表了宣言。里斯本、波尔图的所有日报都刊载了这一宣言。宣言含蓄地谴责了殖民战争（与此同时，阐述了政府发动殖民战争的责任）；建议在尊重自决的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政府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对民主反对派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击，指责这几名候选人“背叛祖国”，使他们受到极大的威胁。

记得在预定到市政厅广场——位于我办公室旁边——举行反政府示威的那一天，好多朋友劝我先到某个使馆避一避，这说明当时的气氛是如何的紧张。这天夜晚，那些假“爱国主义者”竟然在里斯本反对派候选人之一的阿曼多·席尔瓦律师家旁边投了一枚炸弹！

游行失败了。由于人少，示威不得不推迟一小时举行，尽管

调整了工作时间，商店关了门，而且象以往一样，用卡车接来近郊的贫苦农民并付了他们钱。

当时有一个101人的天主教徒小组，自称最能代表里斯本的政界和知识界，决定参加游行并散发了声援民主反对派的文件。文件明确反对"殖民战争"，宣称捍卫所谓的天主教文明不能同受到教皇明确谴责的殖民主义勾当相混淆。

国内外都清楚地表明，葡萄牙的有识之士——从共产党的极左派到天主教徒，从社会主义者到社会民主主义者，从自由共和党人到无党派人士、工业界人士、知识分子，以至军人，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决谴责政府打着国家的旗号在非洲所奉行的政策。因此，萨拉查的政策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而是独裁政府所奉行的事先不倾听国民意见，仅仅服务于同外国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少数集团利益服务的政策。

殖民战争于1961年爆发了：首先在安哥拉，随后在几内亚(1963年初)和莫桑比克相继爆发了武装斗争(1964年)。在其他殖民地也有一些问题，但还称不上武装斗争。在圣多美和佛得角，由于地理条件，很难开展武装斗争。各殖民地人民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澳门——从1967年事件之后，葡萄牙仅仅在理论上拥有主权。在帝汶岛，印度尼西亚内部的困难推迟了一场可能构成真正危胁的运动。

为了对付斗争的不断需要，葡萄牙政府不得不给予防务以绝对的优先。实际上，战争费用一直在上升，1969年已占到葡萄牙预算的52%！为了确保"殖民地秩序"，义务兵役制服役期增加到4年(最少期限)。军官们被迫连续在海外服役，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严重的威胁！

由于政府严格保密，战争详情显然无法知道。然而，根据可信的统计表明，葡萄牙的武装力量从来不少于15万人：安哥拉

7—8万人；莫桑比克4—6万人；几内亚3万人。其余的军队，尽管数量较少，但却分布在各地以应付不测。

不容否认，直到现在，殖民战争并未取得什么惊人的结果。民族主义者有时宣布取得了成果，但实际上并未取得。葡萄牙军队至少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大城市和经济发展中心还能保卫殖民者的正常生活，甚至可以说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殖民剥削。尽管在各地都驻有军队，殖民地并没有被"绥靖"，民族主义者在广阔的地区和一些重要的居民点都有影响。

在安哥拉，大片地区被正式认为是"不安全的"，民族主义者控制了全国1/3的领土，在10个区内经常有战斗。这10个区又分成5个政治—军事区，其面积为877,100平方公里，居民270万。

安哥拉有三个民族主义运动在进行斗争。由霍尔敦·罗伯特领导的流亡中的安哥拉革命政府继续"安哥拉人民联盟"的事业，从建立在刚果(金萨沙)的基地开展活动；由阿戈什蒂纽·内图领导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则主要从刚果(布拉柴维尔)的东部(虽然它在达累斯萨拉姆设有公开的总部)地区卡宾达和赞比亚(卢萨卡)开展活动；由约纳斯·萨文比(曾是安哥拉人民联盟总书记)领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主要从赞比亚开展活动，1967年，由于对本盖拉铁路进行袭击，被赞比亚正式驱逐。赞比亚利用这条铁路运输铜，把它看作是本国的经济生命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总部现已转移到安哥拉本土。但和"人运"相比，似乎有点衰落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总部自1968年始也转到了国内。

在莫桑比克，真正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1965年，成立了一个名为莫桑比克革命委员会的抗衡组织，但却没有开展任何象样的活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总部设

在达累斯萨拉姆，自称控制了莫桑比克全国 1/5 的面积(主要在德尔加多角省和尼亚萨省的北部)和大约 80 万人口。巴西尔·达维特松说他曾出席了在解放了的领土上举行的第二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15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然而，在爱德华多·蒙德拉内于 1964 年被暗杀以及在同年 4 月同乌里亚·西曼戈决裂之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经历了严重的危机。由于在萨莫拉·马谢尔(负责军事行动)和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负责政治活动)的共同领导下，局面似乎已有所恢复。

几内亚是解放运动取得成绩最大的殖民地。戴维·安德曼说这首先归功于杰出的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几内亚——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在 50 年代中期，他在一个军事小组的基础上组成了有相当规模和力量的政治一军事组织，控制了占全国农村 2/3 的地区和 60 万人口。

在这块殖民地，他们在解放区建立的政治一管理组织也是最健全、最先进的。

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从四个方面得到援助：非洲邻近国家的援助(几内亚一科纳克里援助几一佛非洲独立党；刚果一金萨沙援助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刚果一布拉柴维尔援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援助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其他非洲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利亚、非洲统一组织的援助以及来自苏联、古巴共和国、人民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的援助(如瑞典)。

从 1961 年开始，为了协调在外交、军援和后勤方面的力量，几一佛非洲独立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组成了葡属殖民地民族组织大会(简称 C.O.N.C.P)，其常设秘书处设在阿尔及尔。1965 年在达累斯萨拉姆、1969 年在喀土

穆举行过重要会议。1970 年 6 月，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国际声援大会。这是该组织第一次在一个欧洲国家（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举行的会议。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三位民族主义领导人还受到教皇的接见。

民族主义运动奉行不结盟政策，在接受援助时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看来是正确的。工会、教会、各种色彩的政党、青年运动以及其他国内外组织都对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加强了具体的支持和声援。例如：比利时教会和平、司法委员会在 1969 年 12 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动议，敦促比利时政府和议会：a. 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b. 中止向葡萄牙提供武器（尽管这些武器原则上不准运出欧洲领土，而实际上是无法控制的）；c. 利用自己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促使西方国家对葡萄牙施加压力，以结束其殖民战争；d. 当新的国家独立时，允诺对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种种迹象表明，类似的活动正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展开。显然，这是一场广泛的舆论运动。自 1962 年联合国多次通过谴责葡萄牙的动议以来，发生这种情况是顺理成章的。196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ESCO）决定不再向葡萄牙提供任何援助，“直至这个国家当局放弃其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政策”，同时决定五个非洲统一组织合作，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在被解放的领土上，特别是在农村，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兴办了学校、农业合作社、商店、医院，乃至建立了人民法院。显而易见，“几—佛非洲独立党”、“莫桑比克解族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正坚定地朝着创建一个真正的国家所具有的“革命新秩序”的方向前进。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赞同这一设想，使葡萄牙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在人力方面，葡萄牙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很难估计的。在最

近一次大选运动(1969 年 10 月)期间,里斯本的民主选举中心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不能真正地说明问题。在当时公布的政治纲领(被“毕得”没收,随后又送还)中写道:

“根据官方公报提供的数字(众所周知,比实际低得多),从 1964 年(官方开始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到 1969 年 1 月,在安哥拉,有 950 名军人死亡,2313 名军人伤残;平民伤亡情况为:死亡 682 人,伤残 755 人。在同一时期,根据已经公布的最保守的数字,在几内亚死亡人数大约为 920 名。公报没有公布受伤人员,估计(根据每死亡一人,伤残 2.4 人的比例推算)受伤人数为 2200 名。从 1966 年到 1969 年 6 月,死亡 685 人,依此推算,几内亚伤残人员应为 1950 人。对几内亚和莫桑比克平民伤亡人数官方资料没有提供数据。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不算 1961 年至 1964 年的数字,在葡属殖民地战争中,至少有 8718 名军人伤亡,其中死亡 2555 名,伤 6163 名,这还不包括 1964 年到 1969 年间受伤后在宗主国医院死亡的数字。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的殖民战争中,至少有 3000 多名军人死亡。

残废和逃兵数字也无从知道。阿米卡尔·卡布拉尔认为,这两个数字是很高的。好几名逃兵还接受了国际新闻机构的采访,他们的声明传遍了世界各地。一些声明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从外逃(特别是青年人)人数的不断增加可以看出,导致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是为了逃避服兵役。

为了结束对战争这个题材的简短论述(仅仅客观地),有必要谈谈葡萄牙从何处获得武器这个问题。众所周知,葡萄牙不是一个传统的武器生产国。除在普拉塔生产的 G_3 自动步枪,在国内组装的 AuterD5/160 型飞机和其他一些很难列举的材料外,其他大部分战争器材都要从外国获得。在大西洋联盟范畴内,北

约组织的成员国向葡萄牙提供武器，但前提是这些武器不能在非洲使用。根据巴西尔·戴维特松提供的情况，对葡萄牙的军事援助从1961年一直是“不断的、多种多样的和大量的”。在提供军事援助方面，北约盟国中最突出的是法国和西德。法国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提供了20架大力神运输机，54架云雀直升飞机。西德在所提供的武器不用于非洲的条件下，向葡萄牙提供了40架菲亚特G91型战斗机(1966年)。这些飞机是在意大利同意下，在西德制造的，特别适用于游击战争。这些飞机的发动机是英国的，电子设备是德国的(这是北约成员国支持殖民战争的最好证明!)。美国向葡萄牙空军提供了50架F84C飞机(从1962年开始，在美国军事援助的项目内)，30架塞斯娜T37C飞机(cessna)(葡萄牙仅支付了其中12架的费用)、18架Lockneed P. V2轰炸机，2架海王式轰炸机(Neptuno)和20架B—26轰炸机(1965年至1966年)。

葡萄牙自己使用的凝固汽油弹和磷光炸弹是从不同的欧洲国家进口的。

鉴于葡萄牙已卷入战争，毫无疑问，空军装备对葡萄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还一直从英国、西德，特别是法国获得海军装备。1961年，英国的两艘经过改装的旧战舰交给葡萄牙，用于安哥拉沿海和刚果湾的巡逻。1967年—1969年，法国向葡萄牙武装力量提供了4艘巡逻艇和4艘潜水艇。这些价值100万美元的装备以法国政府提供长期信贷担保的方式支付。1970年，葡萄牙将接收6艘14000吨位的战船(分别在西德的汉堡和西班牙制造)。

面对如此暗淡的前景(葡萄牙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自然出现了两个基本问题：

1. 葡萄牙政府是否有在战争中获胜的希望？或者说，能否通过武力控制住民族主义运动？

2.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葡萄牙坚持这种遭到整个文明世界强烈谴责的努力？

直到如今，政府的任何一名成员或军事首脑都不敢预言，何时和怎样结束这场战争。

不难看出，按政府的观点，国家应该接受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此，萨拉查多次声明，说什么我们需要做好长期一手拿枪、一手扶犁的准备，甚至声称即使"光荣的孤立"，也要无期限地支持下去。

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毫无结局的战争！

众所周知，政府一直在揭露国际社会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援助的"丑闻"。从此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如果没有这些援助，民族主义运动就会很容易被控制住，战争也可能会失败，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殖民地问题会得到解决。

鉴于联合国公开谴责葡萄牙政府的殖民政策的原则立场（这种立场看不出会有任何改变），民族主义者到处都得到支持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与此相反，这正是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内外采取一致立场的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大言不惭地重复"光荣的孤立"时，不得不看到这一残酷的现实！

这种局势还远远没有减弱的趋势，而且在未来的年代里还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在当今世界上，谁还会接受非洲领土不是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外省"或"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观点呢？又有谁会从政治上、道义上接受殖民主义这一事实呢？除南非之外，我们相信再没有任何人！

由于当今许多国际因素延缓这种进程的速度，所以对彻底孤立的局面不能也不应该等闲视之。但是，由此判定非殖民化不

再是不可逆转的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政策的暧昧态度——经常在安理会和联合国不投反对葡萄牙的票（尽管它经常声明反对殖民主义）——不应使人产生幻想，或误入歧途。即使是在尼克松时代，美国的非洲政策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正如国务卿罗杰斯在他的“非洲之行”后所指出的那样（1970 年 2 月）。这种摇摆来自于动荡不定的国际形势和本身经济利益的压力。之所以有这种象刹车掣一样的压力，军界认为是由于美国在亚速尔有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和美国在殖民问题上对葡萄牙的暧昧关系最近还是公开了。然而，亚速尔基地的战略价值近来似乎已减少了许多。

根据官方的神话，葡萄牙并没有卷入战争，而只是为清扫和保卫她的一些“省”，进行了一些“警察行动”。但是由于这些“行动”有可能长期进行下去，且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政府的希望只好放在非洲动荡的加剧和在刚独立的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制造紧张局势上面。非洲的困难越大，对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援助和注意力就会越少。

在这方面，葡萄牙外交一直开展不懈的活动，支持非洲最反动的组织，最大限度地利用因地理位置所产生的困难、部落间的斗争、思想意识和人员间的冲突。这种冒险式的活动（这与葡萄牙的地位不相容，因为她是一个缺少资源的小国）多次将国家置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葡萄牙支持加丹加分裂主义者以及后来“全心全意”从圣多美机场为毕阿夫拉提供援助的事对任何人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关于同加丹加的关系，在冲伯倒台后，世界新闻媒介透露，原来雇佣军的基地就设在葡萄牙领土上。政府立即加以否认，但是“谣言”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萨拉查从来也不掩饰他非常赞赏冲伯。1964 年，他向法国《曙光》报发表谈话时说：“有人认为白

人完全可以由黑人来代替。但，这不是事实。白人是唯一有能力进行规划和组织实施的人。只有一个人领悟到这一点，这个人就是冲伯。如果我说白人的能力远远超过黑人的话，你们请不要把我当作种族主义者，因为这种说法是经验的结果！”

难道这还不能充分表达殖民主义者的真正思想吗？

1963年4月，佛朗哥·诺格拉建议同安哥拉接壤的国家进行谈判，以便同它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这个“省”。所有的国家都拒绝了。另一个建议是向塞内加尔和赞比亚（本格拉铁路对赞比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发出的，也没有受到欢迎。可以说直到现在，唯一对葡萄牙建议给予肯定答复的非洲国家是马拉维——看一下非洲地图，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最近有迹象表明，一些非洲国家开始同南非“调情”，但却不同葡萄牙暗送秋波。这种倾向看来不会走得太远……民族主义运动的分裂一直是使葡萄牙受到鼓舞的因素。1969年，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拉萨罗·卡万达梅在莫桑比克被开除出革命委员会；拉斐尔·巴尔博扎在几内亚被开除出民族主义运动。因此，不能排除，在紧急时刻，葡萄牙政府可能会间接地鼓动某些“傀儡”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对几内亚的平托·布尔运动从来也没有完全弄清。同某些民族主义者的接触，正象前外长佛朗哥·诺格拉所承认的那样，从来也没有间断过。

尽管进行了种种努力，葡萄牙政府试图在非洲问题上编织的神话几乎每天都在被揭穿，于事毫无补益！活生生的事实清楚地表明，战争已经在殖民地的领土上蔓延开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继续升级。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军事解决的办法。

军事胜利的可能被排除了，因为要解决殖民地问题首先依赖于土著人民的意愿，军事方式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只能是

一种暂时的胜利。是什么原因使政府坚持不妥协的政策呢？换句话说，继续保持殖民地对葡萄牙又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殖民主义国家（宗主国）来说，殖民地有着三方面的好处：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可以倾销宗主国商品的市场；是一个原材料供应基地，并从此获得相当可观的外汇；是一个吸收多余人口的中心。

关于前两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给予（确切地说是曾经给予过）宗主国的经济以重要的贡献。

另一方面，宗主国可以剥削殖民地的财富，殖民地对宗主国当然是有益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互惠问题！事实上，整个葡萄牙的"协调发展"至今只是一种幻想，或者说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善良愿望。尽管大谈什么"葡萄牙共同市场"和什么"葡盾区"，但并没有成立资金自由流通和货币兑换体制。如果有朝一日实现这种体制，对宗主国并无什么好处，因为它的外汇顺差将会魔术般地消失！

要谈现代意义的经济一体化必须具备一些基本因素。富有成果的经济一体化要求各个参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等，而葡萄牙和葡属殖民地的情况并非如此。

即使从少数白人的观点看，殖民地的经济利益（我说的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同宗主国的利益也不容易相协调。或者说在从属的基础上相协调。政治统治是宗主国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众所周知，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一些白人阶层中，对宗主国的集权要求出现了不断增长的厌烦和不理解情绪。马塞洛·卡埃塔诺在非洲、特别是在莫桑比克的讲话中谈到了"日益增长的自治"问题，以竭力迎合这种感情。但是，他所讲的自治应该理解为白人统治集团的绝对主权。就是说，政府的政策是在安哥拉，尤其是莫桑比克，限期创建罗得西亚式的国家。这种"解

决办法"对葡萄牙来说，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我们知道，殖民地不能作为人口过剩的"折光镜"。首先，对葡萄牙来说还谈不上真正的人口过剩。真正存在的问题是由于葡萄牙社会—经济体制陈旧过时，大量的移民使国家陷入凋蔽状态。国家是贫穷的，但是我们又被告知说，科学的发展结束了关于贫穷国家的宿命观念！这种贫穷是"新政"奉行的经济政策造成的结果。这种政策是保护统治阶级特权的，并没有为国家的发展服务。由于国家贫穷，葡萄牙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欧洲是最低的。为了寻求较好的生活条件，人们纷纷移居国外，以解决个人和家庭问题。移民主要流向那些需要劳动力和实行高工资政策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而不去非洲)。从1951年到1960年，移民总数达60万之多，其中只有1/5去非洲。随后，移民运动进一步加快了！最近几年，葡萄牙每年移民达16万之多，其中只有8%的人去"海外省"。多么令人啼笑皆非的比例！

由于葡萄牙移民既没有文化又没有技术，所以他们到处都充当着欧洲佣人的角色，从事最卑贱的工作！白人到非洲，同黑人展开了竞争，因为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这种竞争已在安哥拉的许多地方出现，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产生了种族问题，因为种族是他们唯一感到优越的条件)。

在殖民地安置退役军人的政策同样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效。安哥拉总督抱怨说，从1961年到1967年，尽管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只有4800名军人同意在殖民地定居。

卡博拉·巴萨水电站的庞大计划完成之后，预计将有100万白人安置在得到控制的赞比西河流域。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这项工程中还有一道"人的大坝"以便保卫南部非洲的"白人城堡"。然而，在一定时期内，葡萄牙本身没有能力提供这种人力资源，因此必须呼吁其他欧洲贫穷国家的白人移民。这是一项捍卫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计划，它同建立一个多种族的社会毫无关系，它包含着难以控制的爆炸性的胚胎。

作为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基地、"被保护的市场"或"封闭市场"，殖民地对葡萄牙的经济统治集团来说有着特殊的有利条件。但是，任何一种情况都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治—行政统治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大力发展对殖民地的剥削，而这与官方政策所宣传的"理想目标"却背道而驰。

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情况，不妨引证一下棉花生产的例子。由于规定在一些地区必须种植棉花并规定了价格和向宗主国出口的限额以及限制在殖民地生产布匹，葡萄牙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占有了相当的优势。1960年，棉花需要量的87%来自殖民地。葡萄牙的出口在世界占第12位，拥有419家工厂，7万名工人。1963年，棉花的出口值已达到1500万康托，几乎占葡萄牙出口额的1/8。1968年，安哥拉向宗主国出口了价值18万康托的棉花，从宗主国却进口了价值38万康托的棉织品！

因此，宗主国的主要工业之一——纺织工业的发展是在可恶的保护条件下进行的，明显与殖民剥削联系在一起！

来自殖民地的其他产品也给葡萄牙的工业带来了好处。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优点，而恰恰是有害的，因为大家知道靠国家保护的企业，是不能离开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这明显的有害于管理上的创新和正常的竞争所必须的技术现代化。

众所周知，葡盾区之间的支付是通过葡萄牙银行进行的，所有的结算均以埃斯库多(葡盾)计算。因此，殖民地出口产品所获得的黄金和外汇，首先使宗主国受益。向美国出口的安哥拉咖啡，向日本、西德出口的铁矿石，向美国和南非出口的石油，南非为莫桑比克黑人工人在南非矿井工作支付的工资(黄金)、国际铁路和港口设施的收入，所有这一切都是宗主国极其重要的外

汇收入来源。葡萄牙通过这种方式才使自己的收支得以平衡。这也是葡萄牙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葡侨汇回的外汇是保持收支平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69 年，移民汇回国的外汇就达 1100 万康托！

人们不禁要问：所有这些殖民剥削方式——为宗主国的金融和工业集团带来无可否认的利益，在经济上是否可以弥补战争的费用以及继续进行这场强加给国家的战争所付出的经济和人力的牺牲呢？必须坚定地回答：否！

近年来，殖民地的存在一直在阻碍着宗主国的发展，阻止它对传统的经济结构进行必要的和紧急的改革。今天，葡萄牙存在的增长危机已无法掩盖。从 1966 年以来，这种危机日益突出，其根本原因就是殖民政策。战争费用是压在国家身上的可怕重负，危及着国家的未来。为了加快自己的发展及其人民的社会进步，葡萄牙必须同欧洲联合起来。在欧洲一体化的蓝图（对进步需要有现代开放的意识）和继续进行殖民战争坚持过时的殖民剥削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矛盾。近来，甚至是支持政府的集团也逐渐认识到了这种矛盾对国家的危害。战争的继续代表着极少数有高度特权者的胜利，他们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坚决反对进步，竭尽全力保持社会的凝固状态。

更严重的是，同外国资本紧紧连在一起的经济集团正在殖民地和宗主国逐步失去控制权和主动权。投资方面的优先不是根据国家利益，而是按照大的跨国公司的利益——纯利润目标——而决定的。这些跨国公司知道好景不长，所以对殖民地的剥削就更加肆无忌惮。

不能否认，从 1961 年以后，葡萄牙政府就向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不惜饮鸩止渴：为了确保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正在把全国变成大公司的经济殖民地。为此，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在 30

年代提出的严格保护主义的信条——经济民族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对萨拉查来说，只要能继续在台上（不管用什么代价），什么理论都可以用上……

1961年初，西德汉堡的《时代》（1961年3月24日）刊登文章，说：

"最近几个月，惊慌失措的葡萄牙向外国投资者打开了至今还关闭着的大门。这种方针的变化是因为葡萄牙已认识到，在刚刚开始的战争中，如果不及时地得到强有力的盟友，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自己的殖民帝国。面对这种危险的局面，萨拉查彻底改变了其经济政策。萨拉查悄悄地、不事声张地在经济上开始使他的帝国尽可能国际化。为了发展非洲殖民地的工业，萨拉查转向了美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

从那时开始奉行的政策的确完全改变了殖民地的情况。今天，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问题已经国际化了，具有极大的爆炸性，随时可能发生一场不仅反对葡萄牙统治，而且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外国投资受到最大限度的鼓励，享有多种好处：免税10年，对汇往本国的资本、股息和利润给予保证（超出在宗主国进行投资的条件），免除对机械设备及其必要配件的进口税，等等。随着这些规定的实施，外国投资接踵而来。外国投资并非为殖民地的发展而来，也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什么好处。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通过肆无忌惮的殖民剥削，窃取大量的利润。这些公司一直受到在葡萄牙殖民地游荡的南非的幽灵的鼓励……

可以说，今天殖民地的主要经济命脉已掌握在外国企业或是由外国资本控制的葡萄牙企业的手中。要列出这些企业的名单实在太长，而且也无此必要。我们仅提几个有代表性的企业：由法国拉雷（RALLET）和欧洲不动产信贷银行控制的安哥拉农业公司控制着大部分咖啡生产；重要的棉花交易公司之一——

安哥拉棉花公司是和比利时总公司合资经营的。本格拉的铁路受控于英国势力；负责开采坎辛加地区铁矿的洛比托矿产公司是德国克鲁普(Krupp)领导的一个子公司；安哥拉钻石公司，南非的德比尔斯矿业公司占有大部分资本，同时摩根银行、比利时总公司和美国财团也占有股份(葡萄牙的资本仅占 11.5%)；洛比托石油公司的 70%资本属于石油冶炼公司——是比利时石油金融公司的子公司(它在安哥拉石油公司也占有股份)；在莫桑比克拥有石油开采特许权的海湾石油公司和卡宾达海湾石油公司都是美国的公司；莫桑比克煤炭公司则掌握在比利时地矿公司手中；安哥拉锰业公司，属于美国的伯利恒钢铁公司；莫桑比克的糖业公司则是英—美共同投资的。

如果说葡萄牙在非洲进行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外国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是政府奉行殖民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这丝毫不是夸张，而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外国资本的侵入必然带来严重的奴役。南非在资本输出方面充当重要角色这一事实令人十分担忧。最能说明这种倾向的是雄心勃勃的卡博拉·巴萨水坝工程。

人们注意到南非大市场的弱点之一就是缺少自己的能源，没有石油、天然气和大型的水电站。所以它才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资源勘探突然产生了兴趣，各种许诺和协定绝非偶然的巧合……这是建立以里斯本—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利为轴心的"神圣联盟"的精心计划。

卡博拉·巴萨水坝位于太特省北部 150 公里处，无论在农业或是地下矿产方面，都是莫桑比克最富饶的地区之一。水坝总长 300 米，高 170 米。被拦住的赞比西河形成了一个宽 2 公里，长 200 公里的湖泊，150 万公顷富饶的土地可以受益，100 万白人将被吸引到这一地区定居！水库储水量为 6500 万立方米，装

机容量为400万千瓦。然而，鉴于卡博拉·巴萨和约翰内斯堡的距离(1400公里)，电力输送将采取直流输电方式。

这么远距离输电是很容易遭到破坏的。为了防止破坏活动，看来南非必须在莫桑比克领土上驻扎军队。根据已签订的有关“罢工、严重事件、爆炸、洪水以及阻止和破坏水坝建设”的条款，葡萄牙和南非将分别承担在各自国家所造成的损失。

建设工作从1969年10月开始，第一期工程应于1975年竣工；第二期工程将于1977年1月完成；而第三期工程将在1979年竣工。工程总投资将达900万康托。

承建水坝工程的是赞比西水电康采恩，简称“赞科”(ZAMCO)，它受控于在南非的“南非英一美公司”。

今天，葡萄牙政府的殖民政策已完全失去了道义的(从来就没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依据。葡萄牙在非洲越来越失去主动性。因此，极具爆炸性的殖民地问题已纳入了国际范畴。

葡萄牙和罗得西亚、南非联邦之间的“默契联盟”(我之所以称为默契的，是因为直到现在，任何成员都不承认它)是一个“私生子”，与葡萄牙人民的传统和利益以及政府为之辩护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它必然使葡萄牙沦为种族主义南非的超级资本巨人的附庸，导致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变成两个新的罗得西亚。由于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几内亚已很难保住，因为统治集团已无利可图。澳门和帝汶岛完全依世界政治的演变而定。佛得角和圣多美普林西比的情况是：宗主国越是顽固地将它们纳入到官方的非洲政策之中，它们给宗主国制造的困难就越大。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的政策使葡萄牙在非洲处于白狗偷食、黑狗当罪的可怕地位，因为它捍卫的不是葡萄牙人民的利益。“绝不妥协的政策”只能导致灾难。印度的悲剧还将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现！

难道没有其他选择吗？我们还来得及重新考虑萨拉查盲目

的、缺乏预见性的、马塞洛·卡埃塔诺一直奉行的政策吗?

这些问题是未来向民主反对派提出的最大挑战。因为只有民主政府才有能力和权力尽快结束战争,立即同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政治谈判,以便确保停火和使殖民地走向独立。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开放、创新、想象力和坚定精神的复杂的政治问题。对每个殖民地必须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没有奇迹般的解决办法,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请不要忘记葡萄牙人民和被压迫的非洲人民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所以,必须通过兄弟般的对话来解决殖民地问题,承认殖民地有权组成多数黑人的独立政府,而白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受到保护和尊重。除了政治模式之外,真正的难题还是反对不发达的斗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在不发达问题上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所以必须找到把我们——宗主国和殖民地——从多国剥削公司窒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决办法。

民主的葡萄牙不能是帝国主义国家,更不应象今天这样扮演国际帝国主义宪兵的角色。如果能从殖民主义的幻想中摆脱出来,彻底摈弃几十年来在同黑非洲的关系中的那种家长式的思想;葡萄牙还是有条件通过世居在那里的葡萄牙人来保持其在非洲的存在的。

"几内亚—佛得角非洲统一独立党"在几内亚发表的宣言中写道:"我们的斗争并不是反对葡萄牙、葡萄牙人或葡萄牙家庭。我们拿起武器是为了在自己的土地上消灭葡萄牙殖民统治。我们从没有把这一斗争同葡萄牙人民混为一谈。"

阿戈斯蒂钮·内图在《1970年的展望》一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写道:"在两国人民之间(葡萄牙人民和安哥拉人民),战争结束之后的正确关系应该建立在尊重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对葡萄牙民主主义者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殖民战争

是应该祝贺的。那些有勇气为自由而战、希望看到结束殖民战争的民主战士可以被认为是我们的朋友和同盟军，同他们是可以建立和睦关系的。”

葡萄牙政府从这些“敌人”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葡萄牙民主主义者的“背叛”。没有什么了不起！必须有勇气打破政府的清规戒律。民主反对派永远不会把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安哥拉人民、莫桑比克人民和几内亚人民当作敌人。同非洲人民保持着兄弟般友好关系的民主反对派向全世界展现一个与葡萄牙不同的形象——进步的、人道的和宽宏大量的形象。

由于葡萄牙同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关系及其利益受到威胁，葡萄牙的局势也变得极其困难。

而且这种困难与日俱增！首先，必须不使冲突国际化并尽量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通过谈判加以解决，承认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权利。宗主国各派政治力量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采取这一解决办法呢？还来得及这样作吗？

葡萄牙人分为两种：希望尽快变革的葡萄牙人——他们开辟了值得所有葡萄牙人为之效力的希望之路；和那些死抱着“殖民冒险”迷梦不放的葡萄牙人，这些人看不到世界在前进，也看不到非殖民化运动（尽管有迂回曲折）是人类进步的巨大步伐！

·12·
政权在僵化

独裁者萨拉查的晚年步履艰难，毫无建树。

多年停滞不前的葡萄牙社会开始了缓慢的变化，殖民战争加速了经济运转，全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活力，以致开始几年，某些观察家错误地将它与正确的发展路线相混淆。

一方面，60 年代西欧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葡萄牙产生了某些重要变化。处于欧洲各国进步末尾的葡萄牙尽管非常落后，但由于其自身的原因，经济上还是有所增长。尽管在这段时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完全缺乏连续性……

高度工业化国家对劳动力的需要使葡萄牙大量向欧洲移民，造成本国大片土地荒芜并给初加工工业带来严重困难。60 年代末的这种大量的人员外流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土地荒芜，工厂凋敝；在国内备受压抑、前途无望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大量出国，数目惊人。然而，向国外移民也间接地解决了某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尽管这对国家的未来造成了影响——由于劳动力缺乏而导致工资增加，使社会紧张状态得以缓和；出国移民日益增长的汇款成为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葡萄牙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战争的需要迫使兵役期延长，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当中。尽管竭力宣传，以使国人相信战争是由外部强

加于葡萄牙的，但殖民战争仍然不得人心。对于这场苦撑的战争，人民已习以为常，但却使国家生活，至少在葡萄牙本土的生活脱出了常规。多年来作为政府思想支柱的教会同样表现出极大的不安。知识阶层和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已无法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在处于真正贫困灾难中的劳动阶级的猛烈推动下，整个葡萄牙社会开始慢慢动荡起来。从 1964 年开始，战争的后果明显地暴露出来，国家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葡萄牙的人均收入刚刚超过西班牙的一半。在欧洲，这种有识之士强烈感到的形势，不可能不引起震惊。

当然，由于缺乏真正的工会组织，这种政治形势未能被利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对政治漠不关心，态度消极。然而，一有可能他们就尽力去发泄和表现自己，如在“五一”游行时他们聚集起来明确地表示自己深刻的不满。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千百次的小规模斗争表达了这种情绪，但由于遭到政府的镇压没有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反对派政党和运动缺乏通讯工具，又受到残酷迫害，所以无法进行有效的发动工作。

这时期内，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加强政治镇压以避免突发事件，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政权，即使牺牲过去声称的极神圣的理想也在所不惜。

萨拉查政府的后期没有正确严密的政治规划，各级领导左右摇摆，人的选择当然十分为难了。公共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平庸无能、集体责任感和缺乏创造性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

多数葡萄牙人清醒地看到，政府十分虚弱，前途无望，朝不保夕。年迈的独裁者脚穿塑料靴，肩披大衣，喋喋不休地发出令人费解的预言，颐指气使，威胁恫吓。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恍如隔世之人。他几乎与世隔绝，害怕与人民接触。萨拉查从未受到人

民的爱戴，甚至不为人所理解。他在晚年与国民间的鸿沟是如此深刻，在葡萄牙历史上从未有过。

尽管独裁者不得人心(支撑政权的结构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反政府行为却从未找到克敌制胜的实际方式。合法出路被堵死就必然孕育着一场革命。但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葡萄牙人最终不得不对萨拉查忍气吞声！正如我们看到的：重重灾难笼罩全国，由于40年的法西斯统治，群众对政治普遍不关心。由于缺少宣传手段和集体行动，反对派一直未能走出孤立无援的困境(除短暂一段时间外)，尤其是警察的镇压总象幽灵一样无处不在。所有这些都可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令人羞愧的现实。人们专注于一己私利，对公共事务置若罔闻已到了难以医治的程度。他们只会等待。但等待什么呢？毫无疑问，等待象邻国西班牙一样，独裁者有朝一日从政治舞台上自行消失。

一个人能够多年阻止国家的自然进程的确是奇怪的事。萨拉查所代表的集团与其说把自己的利益寄托在他的思想上，还不如说寄托在他这个人身上，而他的所作所为又通过这个集团反馈回来。与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人们很难区别他身上哪些是个人意志，哪些是别人出于种种理由巧妙编造出来的“神”的意志。

这位主宰国家生活那么多年的人物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成为各当权派的核心，在平衡和仲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未得到合法地位的反对派缺乏政治远见；最后是所有的革命努力屡遭失败。

关于这最后一点——有时候，运气起到重要作用——萨拉查在1966年11月5日接见《费加罗报》记者时曾谈到：“是需要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但事情不那么容易；在我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

对他如此自信该如何解释呢？在当今社会里，一旦垄断了国

家机器并强行建立起控制公民生活的警察官僚系统，进行抵抗的一切源泉即被掐断，或者说起码被严重削弱。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处于这种高压之下，必然会进入漫长的黑暗时代。

在葡萄牙，警察官僚统治主要是通过两个残酷镇压的工具——新闻检查和政治警察"毕得"才得以实现的。

通过新闻检查，可以根据统治阶级的旨意封锁所有消息，从而以难以置信的方式阻止自由交流思想。早在19世纪末，安特罗·昆塔尔就诘问："没有思想能活下去吗?!"任何形式的交往，包括报纸、电台、电视、书刊、戏剧、电影等等，都被残酷地置于政府代理人——几乎都是军人——的事先检查之下。思想、艺术、科学、政治或简单的消息能否传播要绝对地取决于这些人，而他们作出裁决时却无需任何证据和法律许可。这种事先的新闻检查的令人窒息的后果在葡萄牙历史上只有宗教裁判的黑暗年代能与之相比！萨拉查曾说过："在政治上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按照这个准则，他强加给国家的是为达到宣传效果而伪造的不顾事实的"真理"。他的金科玉律是：那些在政治上鲜为人知的东西就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以此控制住所有情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对批评和反对派不屑一顾。

从狭义上讲，他的政治警察就是"国中之国"，其阴影笼罩着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干预市民的政治和私人生活。曾多年担任"毕得"铁腕领袖的阿戈斯迪钮·罗莱苏以其能随时可以逮捕除了政府首脑（或许还有共和国总统）之外的任何人而沾沾自喜。这或许有些夸张，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在法律上都完全处于警方的控制之下，只要警方稍有怀疑，无需逮捕令就会将其投入"毕得"的专门监狱关押6个月，与外界隔离，连请个律师都不行！

这种情形不断发生，以致警方认为在国人中存在着一种真

正的恐怖气氛。实际上，政治警察在高兴时有权逮捕任何人，甚至在无休止的审讯中使用酷刑也不受法律约束。更有甚者，他们还渗入到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并将此称为“提供政治情报”，这对那些想得到公职甚至想在某些私人企业谋职的人来说是重要的。另外，除了执行根据“安全措施”判处的有关刑罚外，——若犯人不按照警方的要求，从政治上“悔过自新”，这些刑罚每三年要重判一次。——他们还与“特别法院”(为审判所谓“政治犯”而设)的政治判决相配合，可以保留某些判处无期徒刑的权力。

自军事独裁开始就使用的新闻检查和政治警察，成为萨拉查控制全国的不断得到完善的工具。尽管“毕得”形式上属于内务部，但两者都直属内阁总理，其局长直接与萨拉查联系。在萨拉查执政后期，新闻检查和“毕得”的活动是如此猖獗，以至很难衡量二者中的哪一个对葡萄牙社会的破坏性更大！

1962年，里斯本的学生们借“学生日”之机——这一活动曾以危险的叛乱活动的荒唐借口遭到禁止——举行了罢课并迅速扩展到国内的其他两所大学。罢课以多种形式持续了很长时间，长期受压抑和歧视的青年学生奋起造反了。在大学城内，他们在光天化日下多次举行集会和抗议示威。斗争中产生的兄弟情谊和希望感人至深并传遍了全城。青年们作出了榜样：尽管有警察和新闻检查的暴力，示威抗议还是可能的。他们还把未被当局腐蚀的教师及父母家人也发动了起来。于是，马塞洛·卡埃塔诺辞去了著名的里斯本大学校长之职，以此巧妙地与当权者保持一段距离，尽管他从未公开支持过学生的罢课。

学生危机从此转入了长期的相持阶段。在法国的五月事件和几乎遍及各国的反政府冲突之前很久，葡萄牙学生与萨拉查政权之间的尖锐的斗争就开始了，因为当时国内存在着法西斯主义和殖民战争。他们从未放弃过要求大学完全自主、学生会自

由，并将这些纳入反法西斯总斗争的范围内。当然，在后期，在这种受反殖民战争抗议浪潮和与日俱增的宗派和内讧强烈影响的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的同时，因受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示威活动的影响也出现了学生造反的迹象。政府竭力把学生危机等同世界各地的示威。事实并非如此！葡萄牙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同政府的暴虐和殖民战争的继续有着直接的关系。

1962 年前，曾有过多次反政府的学生示威运动，如独裁开始时的 1927 年和 1930 年的罢课；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青年 M·U·D”和“40900 法案”引起的抗议（该法案试图在 1956－1957 学年将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取缔）。但这些都不能与把青年遭受的虐待暴露无遗的 1962 年大危机相提并论。就是从这一年起，每年都有数百名学生被捕，其中许多人遭到政治警察“毕得”的拷打。

学生们反对政府的暴乱活动与日俱增。试图把青年人纳入意大利“巴里拉斯”式的准军事组织“葡萄牙青年”的企图遭到失败；将殖民战争说成是青年人应当参加的英雄事业的努力也宣告破产。在整个欧洲的大学和文化机构中，逃避战争的葡萄牙青年学生到处可见。这些在异国他乡艰难求学的青年，远比他们在国内的同伴眼界开阔得多。经过多次短暂的迷茫徬徨之后，他们成了葡萄牙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象 18 世纪时那样，在这些最激进的海外学子身上寄托着祖国的希望！

萨拉查政权后期的另一特征是政府与教会的冲突。由于天主教政治思想的演变，教会大部分青年教士（即 50 岁以下的人）和教区组织也开始反对萨拉查政权。

对波尔图大主教的强行流放、1961 年和 1965 年“大选”期间越来越多的天主教知识分子采取的反政府立场（包括 118 人宣言）、民主反对派对“新政”40 周年的批评同“天主教行动组

织”和神学院日益增长的不满汇合成了一股洪流。违背罗马教会反殖民主义声明和若奥二十三世及保罗六世教谕的殖民战争更加速了这种不可逆转的进程。对殖民地众多黑人神父的囚禁和流放、对神职人员的驱逐和发配使人终日惶惶然如坐针毡。

因此可以说萨拉查政权的最后几年，民主反对派力量的壮大是和天主教重要派别的参加分不开的。共同行动社（PRAGMA）被一位信天主教的部长宣布为非法，多次遭到“毕得”的袭击，一些首领被捕并受到最高行政法院的审判。由此可见，政府对天主教反对派的镇压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但只要时机合适，他们就决不手软。如在贝琳和若瑟·费利西达德·阿尔维斯教区，政府就和警方联手迫害英勇的反法西斯神父。

独裁的最后几年，知识界也尝尽了苦头。法西斯对知识界的仇恨是无人不知的。可以说，葡萄牙最有名望的科学家、思想家一贯和当局势不两立并因此遭到无数次的迫害。再没有政府对葡萄牙作家协会的仇视、对它的袭击和破坏直至关闭更令人憎恶的了。当时的借口是文学评委会竟敢把奖授予被关押在塔拉法尔集中营——时至今日还存在——的反殖民主义作家卢安迪努·维埃拉。就因为这一点，该协会遭到骇人听闻的恐吓威胁，最后被宣布为非法，所以评审委员会成员都被投入监狱，而他们个个都是知名的作家！

1965 年举行了全国议会选举。国内气氛更加压抑。几个月前，按照 1959 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经过“间接选举”，再次将海军上将阿梅里科·托马斯的总统任期延长 7 年。这种“间接选举”由清一色的政府公职人员、议会议员、咨议厅成员（自然没有一位反对派代表）及各地区或海外省的代表组成的选举团所包揽。在这种所谓的总统选举中，唯一的不和谐音是流传的一封由众议员佛朗西斯科·佩雷拉·莫拉教授起草的公开信。莫拉教授

在1969年成为里斯本反对派的重要成员。

殖民战争对葡萄牙政府提出的越来越多的需求和它在国外遭到的打击迫使政府在国内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在当局内部，政治生活也死气沉沉，除了偶尔透露出一点消息外，什么也听不到……葡萄牙社会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景象。

鉴于这种情况，大部分民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公开主张在1965年的选举中弃权，因为事实上不存在任何有效政治参预的条件。恐惧和普遍的漠不关心太严重、太明显了！共产党当时正处于无法活动的异常困难的时期。尽管如此，它仍然表示要参加选举。

1964年，出现了反修正主义的派别。该派共产党员佛朗西斯科·马丁斯、若奥·普利多·瓦兰特和路易·德斯皮纳组织了葡共马列和人民行动阵线。这几个人后来被捕，现仍在监狱中。这些革命组织拒绝"选举主义"策略，批判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如社会党人所主张的合法斗争。他们与正统共产党的分界线是：宣扬暴力行动直至武装斗争、无论在国际或国内都反对和平共处。

1965年，共产党除了自身的分裂之外，还处于高压之下，因此无力发动群众。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思想混乱。共产党内一再出现倒戈现象——如党中央委员罗兰多·维迪阿尔和负责学生工作的努诺·阿尔瓦雷斯·佩雷拉，许多党员和同情者被暴露出来，使得在这个领域内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的可能化为乌有。

聚集在以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为首的"民主社会党中心"里的自由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对下一步如何行动也举棋不定。天主教徒中在是否组织基督教民主派秘密运动方面也出现了分裂，同样表现出困惑。其他年轻的团体尚未形成政党，它们更倾向于在有保留的条件下尽情利用这个选举机会。

最后，民主反对派达成了一项协议：在五个地区——里斯本、波尔图、累里亚、维塞乌和布腊加提出统一的候选人名单。天主教运动的代表几经反复在最后一刻放弃了与其他反对党一起提出候选人的初衷。这些代表中的部分人加入到了短命的“民主行动基督教运动”，该运动在同年5月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主义和民族政治》的告全国同胞书。

布腊加的民主反对派在最后时刻认识到了本地区特殊的有利条件，决定发动一场有自己特色的运动。其他地区的候选人集体签署了《告全国宣言书》，详细分析了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问题。文章结尾的口气就象是对政府的最后通牒。

文中这样写道：

“为了不使选举流于形式，签名者的最低要求是：各种形式的、广泛的宣传自由；能够在既无新闻检查也无企业经济限制的条件下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进行竞选宣传；在各类大厅和公共场所举行必要的竞选宣传集会；由候选人代表监督投票，以便检查和清点投票人名单。不允许新闻检查部门按照政府的政治利益任意删改候选人的公告；政府不应强迫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漠然置之。

“这就要求政治宪法、政府和国家的最权威的代表——共和国总统作出选择：或者政府毫不迟疑地对候选人保证最低的礼遇，或者相反：所有候选人放弃原则，参加按照政府党的利益炮制的竞选运动。这只能象过去历次竞选运动一样导致一场新的选举闹剧。与其如此，不如候选人不参加竞选。这将表明，已不存在通过宪法合法地改革葡萄牙公共生活的任何可能性！”

就国际环境而言，政府希望民主反对派参加选举。但政府显然不会作出实质性让步。让反对派取得局部胜利，这样政府的独断独行就会受到挑战，从而加速“自由化”进程，这正是政府竭力

避免的。

政府被迫全文发表了上述“宣言”。同时在葡萄牙本土和所属殖民地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假爱国主义运动，反对宣言中的自决主张。所有的候选人都被扣上“叛国”的帽子，处境险恶。这种投机举动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但却使天主教人士改变了他们的保留态度。他们散发了一份有许多名门望族人士签名的文件，支持反对派的观点。

文中写道：“尽管官方宣传称反对派候选人的宣言书为国民所唾弃，但它却未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善良的葡萄牙人已经接受了这个宣言并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建设性的宣言。宣言超越政见，蕴含着一种道德鉴戒。如果在我国发生了一场勇气战，那么反对派是这场较量的胜利者。当候选人怀着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要求的危急感签署这个宣言时，认为反对派是在捍卫基督价值和权利中诞生的，而这种价值和权利正在被声称信奉天主教义的政权系统地践踏和侵犯。这是个莫大的丑闻，葡萄牙所有的天主教徒有朝一日会恍然大悟：40年来，基督圣名成了虚假的民族主义和与基督观念格格不入的专制行为的挡箭牌；这是个丑闻，因为许多天主教徒抛弃了苦难和受害的十字架上的基督，而去为那些压迫和迫害他们的人效劳；这是个丑闻，因为在维护“生存和尊严生活的权利”、“自由请愿和传播思想的权利”、“了解公共事件真相的权利”、“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和“积极参与公众生活的权利”的斗争中，只能听到极少数天主教徒的声音。这是丑闻，因为教皇若奥二十三世在“地上和平”通谕中庄严地谈到前面提到的权利，倡导在“真理、正义、博爱和自由中共存”。这些年来，这一倡议一直得到非教徒的响应，教会在捍卫这些基本价值中始终不渝地发表教义声明和提出规劝。在当前的政治时刻，这一劝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重新提出。尽管宣

言书并未宣扬基督原则，但字里行间蕴含着这些原则。这个文件的签署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坚信：沉默意味着丑行将继续下去。

“签名者怀着为祖国作出有益贡献的信念发出了告全国宣言书，他们甚至得到了那些抱着良好愿望而支持政府政策的人的理解。他们不是打着一种特殊的政治选择的招牌这样做，而是以一种意识原则和信仰所要求的道德选择的名义这样做。他们做了天主教徒应该做的事。”

这份勇敢而明确的宣言犹如火上加油！极端亲政府派不仅提高了对“民主背叛者”的攻击和威胁的调门儿，也提高了对天主教兄弟的攻击和威胁的调门儿。反对派候选人对这种恫吓运动作出了严肃回答，向共和国总统表明，他们主张殖民地自决，揭露政府政策的虚伪性和不合时宜。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任何一项最低要求都未得到满足，他们在选举前三天退出了竞选。1965 年的竞选运动在发表了一些文件后宣告结束。但是这些文件在全国引起的政治和道义冲击并非无用。它第一次无可辩驳地抨击了殖民战争，同时提出了民主反对派解决国家问题的蓝图。

布腊加市的反对党候选人仍坚持了一段时间，试图奋斗到最后时刻。但这次竞选期只有短短的 20 天！竞选活动结束前，重重的困难迫使他们也放弃了竞选。这是从一开始就预料到的。

1965 年竞选期间，我积极参加了反对派政策的制订工作。我是里斯本的候选人，宣读了我们向选民提交的集体宣言。这一情况引起了政府对我的注意，它显然不会再饶恕我。不久我就成了政府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我刚刚以德尔加多家族律师的

身份从监狱出来，而诬陷这位将军的罪行已逐渐成为人们的中心政治话题。萨拉查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政府显然已坐在被告席上，理屈词穷，无从辩解！

1965 年末，马里奥·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在一次意外车祸中猝然丧生。这样在贾伊梅·科特桑去世和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瘫痪之后，这位在反对派中深受尊敬的精神人物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是 1945 年以来一直同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合法斗争的最优秀分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内出现了深刻的政策分歧。自由共和派与社会党人决裂，一些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自由共和派。由于库尼亚·列阿尔在他的书中对自决问题作了新的论述，所以关于海外问题才可能找到共同纲领(尽管是脆弱的)。但除了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外，在解决某些国内问题的方式，尤其是行动方式和行动时机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所有这些分歧已经表面化，并且由于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的去世而更加尖锐。

我已说过，我是代表一个同情社会党人立场的集团进入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当时我们认为，由于缺少合法的行动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政府承认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的掩护。这种掩护是我们可能参加合法政治斗争所需要的。历史的发展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在 1955 年到 1965 年，反对派的大部分创举恰恰是由我们做出的，这绝非偶然。当然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不时无缘无故地被投入条件恶劣的监狱。例如一次数年徒刑的判决往往伴随着种种安全措施和剥夺政治权利，这已成为家常便饭。

实用主义在政治上总是付出昂贵的代价。为了能够更好地活动，我们试图采取一种有节制的政治伪装策略。广大的青年阶

层开始(特别是1962年教育界危机后)对我们产生误解。许多人暴露出没有能力区别什么是我们策略上的让步,什么是我们的基本立场。许许多多的与政府沆瀣一气的天主教徒反对我们的策略。他们貌似比我们更左,而多数情况下只停留在口头上。此时他们掀起了一场反对所谓的社会民主的运动。该运动无视社会党人的思想立场,蓄意把所谓的社会民主与之相混淆,把社会民主与自由共和派,即温和反对派(或者右翼反对派)相类比。这个运动后来并未彻底解体。

阿泽维多·戈麦斯教授去世后,当务之急是分清各种立场。单纯的反法西斯口号已远远不够。在戈麦斯葬礼的讲话中,特别是库尼亚·列阿尔工程师、安东尼奥·马塞多博士和我发表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内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不同的风格。自那时起,组成独立运动的社会党人认识到,独立自由地走自己道路的时刻已经到来。

随后几个月发生的所有无益的争论都是些在历史上不值一提的琐事。以我而言,总是力图与那些政治上与我有分歧的人保持伙伴和友谊关系。具体的例子是同库尼亚·列阿尔的关系,这段时期内我与他有许多分歧,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聪明才智的高度评价和对其毫不气馁的斗争精神的钦佩。

必须指出,这段时期内葡萄牙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伟大辉煌的业绩。葡萄牙社会党成立于19世纪中叶,其奠基者不乏博学多识和德高望重的人,如安特罗·昆塔尔和若瑟·丰塔纳(奇怪的是他们都莫名其妙的自杀了),但是该党从未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党。它在里斯本以外的民众中从未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也许是因为这段时期内葡萄牙的工人阶级从数量上还微不足道。之后,在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社会党采取了一种摇摆不定的立场,对政权的影响也无足轻重。共和国诞生后,在宫廷里

发现的文件证明，君主制头目与社会党上层人物，如阿泽多·可奈库之间存在着谅解。

共和党就其根本目标而言，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上激进的和反教权的政党。它坚决反对君主制，因此得以成为这个时期受到人民拥护的大党。

第一共和时期(1910—1926)，社会党的影响还很小，始终没有惊人之举。其最著名的领导人，如拉马达·库尔托和阿曼西奥·阿尔波姆也只是凭藉与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的联盟与支持才当选为议员。从根本上来说，充其量也只是法国式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此外，20 世纪初期，迅速壮大的工人阶级深受劳工总联合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

1926 年军事独裁政权解散政党之后，社会党也不可避免地慢慢走下坡路。它从来不懂得适应秘密斗争。在最初的反法西斯战士中肯定有社会主义者，但葡萄牙社会党党员却很少。这与邻国西班牙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在西班牙，社会党是所有左派组织中一支最重要，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人民力量。

在 30、40 直至 50 年代，旨在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秘密组织的多次尝试都没有大的建树，从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群众性政党。如短命的 1932—1934 年间的社会主义—共和联盟、1942—1944 年间的社会主义行动和理论小组、1944—1950 年间的社会主义者联盟、1947 年的劳工党、1950—1954 年间的社会主义阵线和 1955—1964 年间的社会主义和共和抵抗运动。法西斯主义迫使所有反对派政党和团体转入地下(唯有总是俯首帖耳的“君主事业”例外)，新的政治组织难以形成。这些新的政治组织只有建立十分严密的组织并培养一批善于从事非法活动的干部，才可能存在和巩固。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它从事地下斗争的能力是尽人皆知的。

但是，具有明确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天地》杂志播下的火种和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的合作化思想的传播，促使民主社会主义异军突起。显而易见，在葡萄牙，在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尤其是利巴特茹的一些地区）中、在青年中、在知识界和小资产阶级中（自由职业者、公职人员和中层干部）有着社会党可占领的广大政治地盘。但是，这个党必须站在左派一边，它既区别于共产党，又区别于自由共和党和民主天主教派。

1965年前后，尽管流亡国外的侨民多次尝试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式的政党——葡萄牙社会主义行动，但当时国内没有自由成立政党的条件，它只能处于地下。最乐观的可能是：促使基层群众投身于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但与政党组织模式不同的运动，顺应潮流，力争合法化。由于法西斯的疯狂镇压，该运动不得不进行长期曲折的斗争，还必须采取某种不确定的立场，因为它处于地下和合法两者之间。这个运动在思想意识方面应该充分开放，以便既能容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如许多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又能容纳法国统一社会党式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甚至那些对斯大林主义已有觉悟转而支持民主多元政体的前共产主义者。应该承认，人们对此做出了努力，但由于萨拉查政权处处作梗，而未能获得彻底成功。萨拉查主义从未允许这一重大问题完全为世人所知。因此，种种蓄意宣传和险恶用心导致的含混局面继续存在，各种活动也难以进行下去。在葡萄牙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一试验不可能圆满实现。

必须指出，没有工人阶级的广泛参加，就不可能在全国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在葡萄牙目前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广泛参加是极为困难的。多年来的事实是，共产党是唯一有效的秘密组织，在工人阶级中进行了正常的工作。尽管由于警察的镇压，工作中难免有缺点，但它获得了无以伦比的荣誉，赢得了地

位，建立起难以改变的工作秩序和影响。

萨拉查政府后期，工人阶级表现出少有的保留。当然这种保留有其原因。镇压，特别是在工会组织方面遇到的困难，是这种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官方工会已死气沉沉，受到政府严密的控制，难以进行任何有效的工作。另一方面，建立秘密工会也很难成功，它只会使工人阶级遭到日益残酷的镇压。

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个困难是，从来不可能建立起天主教人士与非天主教人士之间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各方固有的成见阻碍了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里，没有这种基本的团结，社会主义运动只能付之东流。

自 1966 年起，我们的目标是：把所有的非共产党左派团结在一个广泛而又十分公开和温和的运动里。在这个运动中，国内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尤其是天主教人士和非天主教人士能够和平相处。应当说明，这个运动从未有过任何反共行为。相反，而是努力与共产党对话，与其平等相待。由于它在全国的不可否认的影响，它参加葡萄牙的结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共产党必须象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那样，做出严肃的保证：无论现在和将来真正尊重民主规则。

如同能够动员国家保守派舆论的天主教民主党和自由共和党的存在一样，一个强大的民主社会主义集团的自主存在是使葡萄牙形势解冻、加速民主进程的必要条件之一。

应当指出，1965 年底，这种对葡萄牙政治现实的认识已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有可能取得某种成功。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和具有天主教思想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在出版《时代与模式》杂志的尝试中已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这一在葡萄牙从未有过的尝试，初期在左派中受到强烈抨击，最后却颇富成果。由此而产生的观点交流和个人关系预示着取得重大发展的

可能性。但如同以往一样，警察的镇压和无休止的新闻检查导致了方针的改变（为了继续生存，这种改变是必要的），道路因此变得更加曲折和艰难，既有前进，也有倒退，最后对于那些没有政治实践、一味追求思想纯洁的人很少有吸引力。在法西斯主义淫威下，这种纯洁性只对或者放弃行动、或者决意终身坐牢的人才是可能的……

尝试不会自然消失，它迟早会沿着更加明确的道路继续下去。在法国五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在葡萄牙出现了各种左派小团体，迫使人们再次考虑左派力量的整顿问题。必须深化意识形态的争论，并在实践中找到其内在联系，这对达到推翻法西斯和摧毁其社会基础的共同目标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简要的介绍（尽管只是概括性的）对于说明我在萨拉查晚年的政治活动是必要的。我当时行动的唯一实用目标是：力求反对萨拉查主义的斗争富有成效。

这段时期内，我时常由于德尔加多案件而被迫出国。我从此开始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其他民主政治派别接触，这大大扩大了我的视野。

我常想，萨拉查主义得以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是：西班牙战争及其结局，以及后来的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民主力量在国际上的孤立形势。民主反对派甚至在不久前还处于政治上的封闭状态，与欧洲的一切接触被隔断，国外对它一无所知。除了萨拉查政府所宣扬的虚假形象外，外部欧洲有谁真正知道发生在葡萄牙的事情呢（如战争后期民主团结运动或诺顿·马托斯伟大的群众斗争时期的情况）？在国际舆论界，实际上没有任何人！

殖民战争的爆发掀起了一个对葡萄牙广泛关注的运动。这一运动随后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而进一步扩大。这样，葡萄牙最终也加入了一个政治和经济上不发达的欧洲，西班牙、希腊和土

耳其同属这个欧洲。另一个富有的工业化欧洲不可能对葡萄牙的命运漠不关心。

但事实是，葡萄牙反对派同欧洲民主和进步势力之间在政治上的唯一联系通常是通过共产党或亲共的渠道。这种形势荒诞不经：萨拉查最宝贵的论点是使世界相信，政府的唯一选择是要么共产主义，要么动乱。这一论点使萨拉查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支持。民主反对派之间缺乏接触和联系的局面又间接地证实了这种论点。欧洲不知道存在着替代萨拉查政权的民主道路。听信政府宣传的西方国家的使馆和情报机构低估了非共产党反对派势力的影响，而突出共产党的重要性。这正是萨拉查所希望的！

自 50 年代中期开始，西班牙的自由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人士组成的负责的反对派已声名显赫，并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得到公认的领导人，甚至拥有某些宣传工具(尽管很有限)。与西班牙的情况相反，在葡萄牙，与欧洲执政党属于同一政治派别的力量——不论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民主党还是自由保守党——都鲜为人知。

所以，尽管比西班牙落后，但似乎已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刻。必须使人们认识到，葡萄牙也存在着民主的选择。这在“共和国民主化纲领”(1961 年)中已做了明确的描述。

这样的创举不可能是几个人的事业，而只能是集体努力的结晶。但这项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而从未具体实践。除担心警察搜捕外，许多反对派负责人的封闭的乡土观念和家丑不可外扬的错误意识阻碍了这一事业的实现。一个类似于共济会这样的组织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国际承认，如 1910 年共和革命前那样，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共济会主要人物的年迈和过于谨小慎微使得这些潜力成了泡影。到萨拉查晚年，所有负责人似乎都在等

待形势恶化，或由他人去火中取栗……

在个人，即天主教人士的努力方面，我不能不提及安东尼奥·阿尔萨达·巴蒂斯塔的活动，特别是他创办《时代与模式》及《议会》杂志的文化活动。他进行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获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另外，利诺·内托和佛朗西斯科·索萨·塔瓦雷斯（后者主要通过“全国文化中心”的活动）以及“天主教行动”的许多领导人，为实现虔诚的天主教阶层的反对派思想，即为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相同的阶层建立有益的联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天主教工人中心”也与具有天主教思想的中央工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一些主要干部是在比利时培养的。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努力开展与欧洲各国不同倾向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接触和互相沟通工作。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葡萄牙的社会主义道路应当是符合本国条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必去抄袭别国模式，不管它是哪种形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关注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不学习这些经验。

葡萄牙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如曼努艾尔·蒂托·莫拉伊斯和佛朗西斯科·拉莫斯·科斯塔，在流亡期间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爱国主义精神开辟了政治和工会领域健康交流的道路。我在他们的帮助下结识了许多欧洲著名的社会主义人物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所处的意识形态领域。不幸的是，葡萄牙政府由于其宗派偏见和过于短视，从来不敢承认这一点。

由于警察的镇压，我的处境越来越糟。对此，我以“铤而走险”之策泰然处之。我在葡萄牙公开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堂堂正正地与欧洲社会主义派别来往。这样，我给顽固不化的政府制造了一些困难。我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国内注意的中心，因此给政府造成的困难也随之增加。由此我受到来自各种思想流派的

左右攻击。后来，我的律师身份使我不断介入政治诉讼，也加剧了这一形势。这段时期内，政治诉讼是唯一能公开批评政府的场所。在国外，我开始成为议论的焦点。一些外国政府和政党以及外交代表和主要国际新闻机构的记者不再把我视为等闲之辈。

奇怪的是，政府已感到它不能再用惯常的暴力对我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有一段时期，政府在对我使用何种镇压手段方面表现出犹豫不决，我是德尔加多家族的律师，对我的囚禁自1965年起激起了国际法律界和新闻界的广泛抗议。由于对我的指控证据不足，律师协会多次被迫进行干预。事情很清楚：诬陷负责调查德尔加多案件的律师不是不言而喻地把自己置于被告席上吗？

另外，一旦我的社会主义身份得到国际承认，对我的迫害就更为困难了：这不仅仅因为我同社会党执政的一些欧洲国家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使政府陷于困境，而且也意味着政府公开承认，在葡萄牙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左派政治力量和人士也在积极反对政府。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我的行动有被人效法的危险。正因此，这种行为能继续下去本身就成了对萨拉查政府极权政治的不可容忍的挑战。这就意味着"铤而走险"使我每时每刻都处于警方的报复之下。

社会国际派遣它的秘书长艾伯特·卡锡到葡萄牙与葡萄牙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从而打破了我们与外界几十年的隔绝。他离开前，我们组织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当卡锡已飞往伦敦时，葡萄牙政府才得知此事。这是我们同欧洲和欧洲以外的社会党一系列富有成果的接触的开端。

自那以后，相互接触成倍增加。我先后受到意大利联盟政府外长皮埃特罗·内尼和副总统德·马提诺正式接见。我会晤了一些英国工党部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应社会民主党的

邀请，我访问了斯堪的那维亚。在瑞典，我受到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塔吉·埃兰德和当时的教育部长奥拉夫·帕尔马的接见，并与前者发表了一个会谈公报。在丹麦，我拜会了外交部长。在随后的访问中，我又陆续会晤了各种倾向的社会党领导人，如阿兰·萨瓦里、弗朗索斯·米特朗、米歇尔·罗卡尔、丹尼尔·马耶、鲁道夫·洛佩斯、恩里克·铁尔诺·加尔万等，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战友关系。由于同样的目的，我应邀访问了古巴和南斯拉夫，有幸就近研究他们的社会主义经验。

这些完全正常的活动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值一提，却被葡萄牙政府视为大逆不道。只有那些生活在萨拉查当政年代的人才能理解这些活动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自 1965 年起，警方对我的监视变得令人窒息。我的电话、信件、与外界的一切接触和外出活动都不间断地、粗暴地受到控制。虽然我有护照，但如果没有“毕得”的特别批准，我不能出国。“毕得”多次拒绝我的出国申请。即使获得批准，我也必须说明进出口岸和日期。“毕得”的便衣经常明目张胆地监视我，日夜在我的办公室和住宅门前晃来晃去。美国驻里斯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迫于外交部的压力，被其大使禁止到我的寓所拜访我，只好装作与我在坎波格朗德公园巧遇。他与我见面时胆战心惊，唯恐被发现。我和他开玩笑说：“老兄，您怎么如此胆小，好象您是安道尔驻此地的代表，生怕得罪葡萄牙政府这个庞然大物！”

事态的发展竟然到了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夏日的一天，我邀请了丹麦和瑞典的外交官到我辛德拉的乡间别墅共进午餐。“毕得”包围了花园并用摄象机将部分午餐镜头拍摄了下来。“毕得”对我住宅的监视是如此令人生畏，以致许多外交官在接受纯属礼节性的与我共进晚宴的邀请时都小心地把汽车停放在远远的地方。

警方步步进逼，我清醒地预感到政府在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妄图把我一劳永逸地置于死地。我的所有朋友对此也有预感。他们多次劝我到外国使馆避难，并告诉我可能遭受突如其来的袭击。幸运的是最后相安无事。

1967 年底，由于发生了所谓的性丑闻和“玫瑰芭蕾”事件，政府终于找到了迫害我的借口。葡萄牙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与这一桃色事件有关。据传说和报道，萨拉查政府的三位部长也有牵连。

我第一次听说此事是在我的朋友索非亚·梅洛·布雷内尔和佛朗西斯科·索萨·塔瓦雷斯的家里。我们的同事若阿金·皮雷斯·利马刚从巴黎回来。他当时非常热衷于把反对派的政治活动扩展到天主教人士中。他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淫荡趣闻。他曾以律师身份涉足此案。坦率地说，我已回忆不起此案当时搁置在司法警察那里，还是已转交博阿奥拉法院。但我记得，皮雷斯·利马向我们透露了司法警察将不惜一切代价查明此案的坚定决心。据他说，警方的决心甚至得到前司法部长安图内斯·瓦雷拉的鼓励。由于所牵连的人物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地位，他担心在最后时刻会有人施加压力，平息事态。

法国杂志《非洲青年》刊登了一篇文章，披露了此事。皮雷斯认为，从此将难以掩盖这一大丑闻。它肯定将成为近几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我记得，尽管他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但面对他的职业热情，我和索萨·塔瓦雷斯都告诫他要小心行事。

几天后，在博阿奥拉的一个法庭上，我偶然看到了一份材料。当时在场的法官、律师和司法人员贪婪地传阅和评论着案卷。里斯本政界和外交界对此事早已沸沸扬扬，窃窃私语。这件逸事已满城风雨，并被说成是关系到萨拉查可能继承人的权力之争的重要事件。这就是其重要政治意义所在。记得，前司法部

长安图内斯·瓦雷拉当时被认为是继承人之一。就是他指示司法警方把此事彻底查清的。据说，其他亲萨拉查的几位部长将会因此受到直接牵连。

这时，一位对“萨拉查葡萄牙玫瑰芭蕾”感兴趣的英国《星期日电讯》的记者找上门来。他在电话中与我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后，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未带任何介绍信，只是让我看了一下他的英国记者证。他对我说，《非洲青年》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说他几天前到达葡萄牙，除与新闻和外交界的人士有过接触外，还想在科英布拉会见安图内斯·瓦雷拉教授，但只是见到了他的一位助手。当然我对他所感兴趣的或者他尚未知道的事一无所知。关于他最感兴趣的法院尚未定论的诉状，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帮助他看到诉状内容。我建议他去找皮雷斯·利马律师。他至少参加了一次此案的诉讼，可以向他说明如何了解到具体的东西。在这方面，皮雷斯·利马是最好的人选。除了人所共知的一些传闻外，他会知道得更多……

听了我的建议后，这位记者就在我的办公室给皮雷斯·利马父亲家里挂了电话，当时皮雷斯住在那里。皮雷斯·利马的父亲与儿子同名，在内政部任职。当时他担任政治和民事局总局长。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事实上，这位记者从未同皮雷斯·利马律师说过话，而只与他的父亲进行了交谈。他的父亲对这位英国人把他父子俩相混淆有意不加澄清。他拒绝向记者透露任何此案的细节，称这是出于“爱国！”但是，在他摸清记者的意图后，有意洗刷他儿子在传播此事中的责任，以避免当局的迫害，但这却导致我后来被捕。我从“毕得”对我的审讯中作出了这样的推断。

《星期日电讯》的这位记者一回到伦敦就发表了一篇有关此

案的文章。此文依据《非洲青年》散布的流言，加上他在里斯本的道听途说，没有超出葡萄牙首都社会、新闻和外交界的传闻。次日下午，在报纸刚刚到里斯本时，我在办公室内被全副武装的“毕得”逮捕。尽管他们没有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象通常那样说明任何理由，但我很快从对我的审讯中得知，我被指控“在国外散布败坏葡萄牙声誉的假新闻”。然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尽管他们一开始就对我进行威胁，但我泰然自若。

“这回可是你先生诋毁总理阁下的声誉，是严重的诽谤！”“毕得”的副局长萨切迪怒目而视地对我说。

我当然拒绝对我的指控。几天后（过了好久我才知道），《星期日电讯》记者公开辟谣。他写道，我绝对不是他的“消息的提供者”。这无疑是事实！

但我还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被关押了三个月，与外界不通音信。有两个半月，我始终被关在“毕得”的卡西亚斯监狱的单人牢房里，与世隔绝。家人每周只能探望一次，在看守监视下隔着厚厚的玻璃与亲人会面一刻钟。在这里我度过了寒气袭人的1967年的圣诞节和除夕。既看不到书，也看不到报。只是在第一个月月底，由于律师协会主席的干预，才准许给我送来《民事法典》和两期司法部的官方小册子！在最后15天，我被转移到一个关押着大约20个普通犯人的房间。犯人都睡双层床，卫生间就在室内，旁边是饭桌，全屋只有一个安着两根铁条的窗户。在这里，我们每天有一小时的人们戏称为“娱乐”的放风时间。放风的地点是这座地下监狱顶层只有牢房那么大的围墙高筑的天井内。不需多说，在这儿只能看到一点点天光或在暴雨大作时淋淋雨水，因为每年的这个季节经常是烟雨茫茫。对于为什么把我与普通犯关在同一牢房内，他们向律师协会主席的解释是：他们不敢冒险把我同待审的政治犯关在一起，因为就我的法律常识，我

会指导犯人提出对警方不利的指控。

但是，正如所料，我的被捕使桃色丑闻扩大为国际性事件。这间接地证实了政府想隐瞒严重的情节！有人说，“毕得”介入了肮脏的继承交易，并想要把这一“丑闻”公诸于世。即便不是如此，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各国记者蜂拥而来，道貌岸然的萨拉查竭力掩护他的几位部长。而这些部长已堕落为花花公子，并犯下奸污不满12岁少女的罪行。各种耸人听闻的照片出现在欧洲数家有影响的杂志上，如在里斯本竞相争阅的《明星》周刊！被派往里斯本的《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塔德·肖尔茨和罗杰·斯通滞留在边界，不能入境。

我虽被隔绝在牢房中，但这一巨大运动的反响通过“毕得”的审讯和萨切迪的斥责传到我耳内，当然难免有些走样。而他们对我的调查却一无所获。“这是一个挤不出液汁的柠檬！”“毕得”副局长在阅读我的答辩时深为遗憾。警方试图寻求其它办法。一个半月后，他们逮捕了我的同事佛朗西斯科·索萨·塔瓦雷斯和记者乌尔巴诺·塔瓦雷斯·罗德里格斯。这是他们的一个绝望之举。他们妄图以此搜集到能把我们提交法院的证据。至于我，他们已难以提出问题，因为我只用几句话就否定了所有的质问。他们决定对我“洗脑”，连续几小时对我审讯，询问我自1942年以来政治活动的详情。他们所谈到的大部分事实事先都拟好了罪名，尽管许多假设最后得到了澄清。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继续用一连串的有关很久以前的人和事的提问折磨我，其中大部分我已记不清了。正是这些逼供——我被迫象观看一幕幕模糊不清的电影似地回顾了我过去整个政治生涯——使我后来在没有任何书面材料和笔记的情况下，一气呵成了这本书！

三个月后，我在狱中的处境仍未改善，于是我让妻子通知我的律师，要求人身保护权。尽管我的律师曾做了不懈努力，但一

直未能见到我。在葡萄牙法律中，人身保护权是特殊的保护措施，律师们在使用它时往往左右为难，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处罚。这一法律程序迫使最高法院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对逮捕我的合法性做出判决。

我的律师若泽·马加良斯·戈迪钮在 1968 年 2 月 29 日提出了人身保护权，我于 3 月 1 日获释（另外两名被告索萨·塔瓦雷斯和乌尔巴·罗德里格斯也一起获释）。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最高法院正式通知"毕得"查证逮捕我的合法性时，"毕得"却回答说，没有必要，因我已获释。为什么？因为在前一天，即 2 月 29 日，它已下令恢复我的自由，"只是偶有疏忽，才推迟到 3 月 1 日下午执行这一命令"，副局长萨切迪向我严肃地解释说。但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调查者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我的获释与人身保护权没有丝毫关系，因为在做出这项决定时并不知道人身保护权（上诉书）已送交最高法院（天晓得！）。多么天真幼稚！但司法当局却经常干出这种蠢事……

要求人身保护权的上诉书和我还在狱中时向最高行政法院递交的申诉书是葡萄牙律师界感到荣耀的司法文件。这些文件向世人证明，葡萄牙独裁国家的司法机构是如何把纯洁的审判机构披上合法的外衣去弄虚作假。作者若泽·马加良斯·戈迪纽把这些文件公布于众，并在葡萄牙司法界广为散发，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尽管我恢复了自由，但我的苦难并未因此结束。"毕得"再次暴露自己是无能之辈，它无法提出一份能够把我判处它所渴望的重刑的起诉书。但它并未善罢甘休……报复没有拖很久！

由于在阴森森的牢房中过了三个月的寒冬，我想去晒晒太阳。我决定同夫人一起到马德拉岛消遣数日。但是，当我的行李已装入机舱，正准备登机时，"毕得"在人头攒动的机场通知我不

能离开。为什么?!没有向我说明理由。马德拉不是葡萄牙的领土吗?基于曾多次阻止我出国的禁令,我问道。没有任何答复!我就此事向内政部长提出质疑,同样杳无音信。

于是我决定不去马德拉,而乘汽车去阿尔加维。在路上,我夫人发现一辆小卧车紧跟着我们。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因此我对此毫不介意。我记得另一次也是在阿尔维加,曾在我逗留的名叫"三兄弟"的荒滩上设有监视站。但后来几天的监视如此明目张胆,以至竟然在最无戒备的游客眼前晃晃悠悠,令人不快。尾随我们的已不再是一辆车,而是两辆,它们之间用无线电联络。车内共有六男一女,简直是个小分队。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

在一个游人稀少的旅游区,他们时刻跟踪我们。但我受到我下榻的饭店的经理们的保护。我夫人告诫我,他们在策划谋害我的严重阴谋,可能制造一场惊人的车祸。德尔加多被害事件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际。我们决定回里斯本,并事先电话告诉家中正在发生的事。尽管一支卫队时刻紧紧相随,我们还是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

第二天下午,我再次在我的办公室内被捕。和往常一样,他们不做任何解释,也没有出示逮捕令。更可气的是,他们向我说,我没有被捕。那么这是干什么?"毕得"的副局长萨切迪吱吱吾吾地告诉我,根据部长委员会今天下午的决定,明天要把我流放到地处非洲海岸赤道上的圣多美岛,我将在那无限期地居住下去。这是为什么?就是这样无理可讲!没有事先的起诉罪证书或可能的上诉。政府一个单方面行为即可裁定。

"可是,有什么合法理由?"我问道。

萨切迪副局长对这句话不屑一顾,冷笑着说:"我早对你说过,同警察开不得玩笑!"接着象对一个大势已去的犯人一样,恶

狠狠地问我："你认为萨切迪是笨蛋吗？我会把您送到法院，尽力组织有外国观察家旁听的壮观场面，并从那里把您释放吗？不！萨切迪不是笨蛋。您已无计可施了。马里奥·苏亚雷斯先生作为反对派已彻底完蛋了。我们可以任意处置你！"

第二天，他们把我押进葡萄牙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我还是昨日的穿戴，没做任何准备，只提着家人在我临走时交给我的一只小衣箱。在"毕得"监察员阿比利奥·皮雷斯的监视下，我被送往圣多美。我留下了家庭、朋友、工作、事业。我从飞机里眺望灯火辉煌的机场大楼，阳台上站满挥动着手帕的人群，那是我的朋友、同事，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他们不期而遇，向我表示最后的声援。突然间，好象出了什么事。我在机舱里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我清楚地看到一场骚乱在扩大。这是"毕得"和防暴警察粗暴地驱赶所有的在场的人，其中有我的女儿和夫人。他们就连那些过境旅客和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件的人也不放过！这就是 1968 年 3 月的这个悲惨之夜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当我到达圣多美时，外国电台——主要是布拉柴维尔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葡语广播已报道了我被流放和抵达圣多美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在以一种好奇而又担忧的复杂心情等待着我。

圣多美是一个沉睡多年的赤道小岛，风景秀丽，植物茂盛，但气候闷热。黑人居民不过 6 万，几乎全是被从非洲各地强行迁移来的，许多人已在岛上居住了数代。他们讲着类似旧时葡语的一种方言，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无足轻重。最多只有 3000 人的白人是真正的主人，他们时刻思念里斯本，一旦走运捞足，随时准备返回葡萄牙。这两个并存的团体互不信任，而且相互不信任的气氛近年来日见加深。除了黑人完全屈从于白人的雇佣关

系外，两个团体之间没有任何交往。

岛上的财富主要是农业。这里种植可可、少量咖啡以及椰子。几乎所有传统企业的财产都由宗主国在当地的代理人经营管理。农场主是岛上的实际主人。直到不久前，他们还绝对地控制着中央政府的代表。这些政府代表沉醉在当地获得的既得利益之中。否则，正如曾发生的那样，他们将被强行押送回国！

30年代初，圣多美被独裁政府用来隔离那些离经叛道的政治反对者。索萨·迪亚斯将军和佛雷利亚上校在一次叛乱失败后曾被流放到这里，后来从这里逃走。以后，这个地方就失去了价值，特别在西班牙战争开始，在佛得角建起塔拉法尔集中营之后。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反对派掀起了激烈地反对塔拉法尔集中营的运动，集中营被关闭。犯人们由此都被关押在宗主国本土的监狱中，直到殖民战争爆发，塔拉法尔集中营重新开放，但重新启用的集中营只用来关押非洲民族主义分子。所以，可以想象，当我作为政治流放犯抵达圣多美时引起的巨大反响。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好象是一只稀有动物，被人们好奇地观赏着。但是所有的人都又恐惧地躲避它的目光。我一点儿也没有夸张！这种令人不快的印象在小小的机场上由于如下的事实而更加突出：我身着一套葡萄牙冬季穿的深色厚衣服，而当时所有出现在机场的当地人却穿着白色短袖上衣，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整个岛上的居民每周在机场聚集一次，等候罗安达的飞机。这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正常通道。

我刚抵达圣多美，他们就通知我，我没有被捕而是来此地定居。这意味着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但我必须自己养活自己。我住进了这个小城当时仅有的两家公寓中的一家。店名颇为气派："圣·热罗尼莫饭店"。

当地的“毕得”头头诺格拉·布朗哥是个口蜜腹剑的小人。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自认为是圣多美岛上的一个临近退休的人，因此希望一切相安无事。多年前他就成了岛上的一个农场主，用不义之财从事投资活动。高级警察的头衔也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他同时用铁腕经营着有利可图的警卫队。其实他是一个蠢才，是一只老掉牙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温顺的狼。但事与愿违。比阿佛拉战争迫使他不得不加强警戒，因为圣多美机场是向分裂分子提供军援的主要入口。跑道上停靠着来自各地——从南非到瑞典——的飞机。小岛上，雇佣军、基督教传教士和记者来去匆匆。为国际关注的我的到来成了这位“毕得”头头的心病，他诚惶诚恐，不得安宁。他从做一般警察时就以揣摸他人心意度日。在一项关系到政府首脑的事件中，他对自己的责任忧心重重。他在我周围制造了一种怀疑气氛，布满间谍，令人无法忍受，荒唐可笑之极。岛上的人对此都有感受。

“没有人比我更希望先生您尽早离开这里。”一天他对我说。“我完全知道，您在这儿呆的时间越长，我对岛上的居民越不好交待！”

这倒是真的。由于担心我会跑掉，他派了十几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在这样一个人人相识的地方，这种作法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位路过这里的葡萄牙商人不慎邀请我坐车短途兜风——这个小岛总共只有50公里长的柏油路——当晚就被迫离开圣多美。从那以后，我被限制在市内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没有警方的允许不能离开。

由于白天赤日炎炎，人们寸步难行，因此我买了一辆旧大众牌卧车，想以车代步。这可吓坏了警方！我的看守们开出他们的私车。一辆临时安排的流动警车由于急于尾随我而发生了一次严重车祸。在这样一个没出过什么大事的地方，人们可以推断以

上事件会引起什么样的议论！

但是，对这位愚蠢的“毕得”头头来说，每时每刻对我盯梢还远远不够。我在岛上赢得威望的可能性使他大为不安。他极力防止我用颠覆思想感染当地居民。于是他使出建立真正的卫生圈孤立我的绝招。那些只与我说过一句话的人也要被“毕得”叫去，询问他们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同我谈话。从悄悄劝阻人们回避我，直到公开威胁。我的中学同窗、市府秘书被迫停止与我讲话，否则就用头班飞机把他送回宗主国（多么可怕！）。那些刚刚开始听我讲授哲学的孩子们也被迫放弃听课。由于这些措施，恐怖在岛上逐渐蔓延，我几乎被完全隔离了。但是，坦率地说，曾有四、五个大胆的居民——不会再多——从未中断与我交往。

我的所有信件都被粗暴地拆阅。大部分信件甚至明目张胆地被偷去。我已说过，这里与宗主国的唯一联系是每个星期四的班机，信件的分发是在当天下午。但我的信件却荒唐地只在星期五，甚至到星期六才交给我。我向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书面或口头抗议如石沉大海，从无回音。在我与周围现实之间设立了一条无法超越的鸿沟！

有必要提一下的是：这种状况使得该岛的总督席尔瓦·塞巴斯蒂昂中校也感到不快。他是一位有自由倾向的人，他的整个行政生涯是在非洲形成的，他说他对宗主国的政策不能理解。他对自己所致力的提高该岛价值的事业充满信心，深深感到我的流亡是他政府中的一个正在扩大的污点。另一方面，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恰恰在他正领导一项非常艰苦的行动，即支援比阿佛拉行动的时刻，让全世界都由于我的流放而关注圣多美。基于这一观点——但他不理解萨拉查的心理，向我保证：“我们俩在这个岛上的共处不会超过三个月！”

在我抵达圣多美不久，他就被召往里斯本，并受到萨拉查的

接见。萨拉查指令他不能再插手我的事。我的事只由“毕得”过问。这使总督大为恼火。事实上，自那以后，我的处境明显恶化。从理论上说，我从一开始就可以在岛上从事我的律师职业。事实是：当我到圣多美时，这里只有三名律师——一位由于纪律原因已被停止职业活动；另一位兼任官方的公证人职务(这限制了他的许多活动)；第三个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职业生涯已到尽头。如此看来，我有着可以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这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确实如此，我来到这儿15天后，就接到了出任此地主要企业阿瓜—伊泽律师的聘书。这个企业是属于宗主国库福贸易中心的财产。邀请是由企业主管阿尔梅达·巴雷罗斯工程师以老板若热·梅洛先生的名义转交给我的。但由于在此之前，我曾在涉及到该家族财产的案件中担任过若热·梅洛一个姐姐的律师，我觉得在接受邀请之前，应与我的前委托人马丽亚·克里斯蒂娜·梅洛协商，因为她仍然是该企业的股东之一。但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通过正常的邮政渠道与她协商此事。这封信如同我的其他所有信件一样被“毕得”拆封、拍照并交给了亲自插手库福案件的萨拉查本人。这项邀请纯属私人性质，并出于企业的兴趣。但这位独裁者耿耿于怀，认为是针对他的行为。就在我的前雇主复函同意我为她的企业的律师的同时，那位曾向我转交邀请书的主管也接到了若热·梅洛先生的直接指示：由于惧怕政府报复，他收回已发出的聘请。

如警方不四处张扬，这件事并没什么重大意义。后果随即出现：当不仅在圣多美，而且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大企业由于官方压力而拒绝雇佣我时，那么谁还敢与我合作呢？

但事情并未就此罢休。在里斯本发行的一家名为《现在》周刊，根据被“毕得”无耻拆封的那封私人信，在头版以“廉洁者

们!"的通栏标题,十分醒目地报道了一条消息:文章把我描绘成库福在圣多美的主管,收入丰厚,为资本主义效劳,过着富翁的生活……谣言不翼而飞,四处流传,任何辟谣都无济于事。我对这张报纸和此文的作者提出了起诉。但这些人只是在许多年之后,在萨拉查被取代而我正在流亡期间才得到了审判!

尽管宪法明文规定保障通信自由,但我的信件再次被拆封:当路德·金去世时,我写给美国驻里斯本使馆的吊唁信被拆阅。我被召 到当地"毕得"总部,他们厚颜无耻地通知我,此信不能发出,因为"我被禁止在岛上从事政治活动"。尽管我对此深为震惊,我还是表示了抗议:"先生没有考虑到您刚刚向我说的话的严重性吗?"

"毕得"监察员的嘴角上露出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我接着说:"这说明你们侵犯了我的通信权,违反了宪法的明文规定!"

他冷冰冰地回答我:"不用担心,我负责。"由于我的严守法规痼疾,我显得天真幼稚。我在圣多美期间,我波尔图的朋友安东尼奥·马塞多每周都给我寄一封挂号信,但有许多信我没有收到,他向最高邮政当局交了一份强硬声明。在他多次催促之后才向他做出了正式答复:是邮局的"毕得"小组不许把信送交。事实如此,那些制订法律的人自己就不尊重法律,无视国家的法规。这件事酿成了巨大丑闻,以致在萨拉查下台后提交给 1969 年在阿维罗举行的共和党大会。

尽管有各种压力,有一天我终于参加了一次诉讼,为被控行窃的一位海关穷职员辩护。案件虽不大,但判决的方式在该市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对我的委托人的指控的证据仅仅建立在被告自己的认罪上,而他是由于警方的酷刑才承认的。犯人遵从我的劝告,在审判时详细陈述了他受到的虐待,推翻了供词。这一事

件在圣多美社会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过去审判只是一种请求法官宽大的形式，圣多美社会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次审判拖了数月，成了这块没有什么盛大节日的土地上人们关注的中心。法庭的大厅和建筑挤满了不知从哪儿来的土著人。他们一片寂静，洗耳恭听每句话。"毕得"监察员认为，事态已含有政治色彩。我不能确切的知道是否施加了压力，但事实是：印度血统的法官似乎神色惶遽。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责任。强烈的反应和不适时宜的评论引起了多次事件。我的辩护持续了大约两小时，谨慎地分析了控告提出的证据。所有的人都认为被告将无罪获释，或最多被象征性地判刑。

法官用了 8 天的时间才做出判决。经过如此漫长的审理，我的当事人被判处了 13 年徒刑。这是当地最高的刑罚！我的当事人的妻子——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普通妇女——泪流满面，在大厅中哭叫：

"这不是对我丈夫的判决！谁都明白这是对博士的判决，因为他们害怕博士成为圣多美穷人的律师！"

实际上，这项后来被罗安达法院驳回的判决是一个警告。我曾在最高法院和军事法庭参加过无数次特殊审判。在这些地方，我曾赢得在我看来基本上是不公正的、甚至公开偏袒的判决。但是，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还从未有过如此的耻辱！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在圣多美从事我的职业的任何兴趣。我想我还是找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比如教师。当地中学缺少具有必要专业水平的教职员工。但封锁是全面的！所有的路都被无情地堵死了！

我的夫人也到这里定居，以便在流放中陪伴我。她也努力争取被雇任教。她具有一切必要的合法资格，而且也有空缺。当她提出申请时，我被召去见总督。他要求我收回申请，因为由于上

级的决定，他不得不拒绝给她位置。这纯粹是政治歧视。更糟的是：由于她是我的夫人的简单事实！

“政府要做什么？要饿死我吗？”我气得喘不过气。

“请申请一份生活补助，政府会给你们的。”他答道。

我从未提出申请。我认为，只要我有一线活路，我就不向政府乞求任何施舍。这个政府在一项违反宪法的法令掩护下，通过一项非法决定，滥用职权，将我流放。为此，我已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起诉，反对政府的决定。尽管我知道我这样做无济于事，但我认为我做得对，我要始终忠于自己！

当我正在当地的理发馆(有意思的是它也是当地唯一的书店)时，听到了国家广播电台用中声调播发的一份新闻公告。公告宣布，总理做了一次脑溢血手术。我惊愕得难以呼吸。

“什么？脑溢血！”我自言自语。

“已脱离危险！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有人在我旁边说，似乎想平息消息带来的后果。

突然，我刚刚听到的消息的后果，象闪电一样在我脑际一闪而过。这已确信无疑！一个 80 岁的人得了脑溢血……在几个月内我将启程回里斯本。我曾准备在圣多美住上许多年呢！

这是我的幻想吗？人们立刻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就连那些“毕得”分子也变得有了人性，通情达理了……

是的，9 月的那个快乐的早晨，葡萄牙的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13·
交替时刻

1966年5月，政府庆祝它的40周年。萨拉查以77岁高龄首次乘飞机赶去布腊加，参加“5·28”军事首领戈麦斯·达·科斯塔塑像揭幕式。那次暴动胜利后，独裁政权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并把他流放到亚速尔群岛。后来他成了元帅……

萨拉查想用一种不寻常的富有伤感的幽默结束他的讲话。我从电视上观看了他的讲话实况。他的讲话结束语在从无条件支持他的党徒中挑选出来的公众中所引起的短暂惊愕，我至今记忆犹新。下面就是他的讲话：

“在这个美好的五月的日子里，在这座古城布腊加，在曾随从历代国王陛下征战过的大主教的这座宫殿内，在庆祝‘5·28’40周年之际，我们为我们久已渴望的戈麦斯·达·科斯塔纪念碑揭幕，以此使他开创国民革命的行动永垂史册，并颂扬使他的行动成为现实的武装部队。这也是一个结束我惨淡执政38年的美好时刻。”

讲到这里，萨拉查戛然而止，向这个小小的大厅抛去冷森森的一瞥。在其“统治”的晚期，电视台播放了隐藏在他那双近视镜后面的充满仇恨的目光。他的那些在场的忠实信徒们大惊失色，反应迥然不同，既有低声细语的反对，也有稀稀拉拉不知趣的掌声！几秒钟的混乱之后，萨拉查要求安静，继续讲下去：

“我不容许自己有这种表现和想法，因为在当前世界的混乱形势下，这样做将意味着改变我们一贯遵循的保卫祖国完整的政策，损害战斗在海外的成千上万无名英雄在那里所取得的大好形势。那么，我们最好在这里缅怀他们，从这里向他们致敬。”

华丽的词句突然中断！它将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萨拉查曾小心翼翼掩饰的令人恐怖的狂妄再次暴露出来：由于“那些在海外战斗的数以万计的无名英雄们”的驱使，他将执政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政府执政几乎 40 年之际，他继续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使者，装扮成一个肩负着任何人不能替代的神圣使命的人……继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

在他的独裁者生涯之初，他曾在为安东尼奥·费罗的文章所作的序言中，故作谦虚地介绍了他的人生哲理，大谈其实行暴政和拼命抓权的道理。他直言不讳地做了比喻：“因为一个女人既会冷酷无情，也会对孩子心痛得大哭！”

这种原始的解释最能说明问题。萨拉查精于此道。正如许多专断独裁的统治者一样有其貌似简单但极为有效的绝招。只要他认为对他有利，他会不动声色地无情地使用它。

但是，当在 1966 年萨拉查向他的乱作一团的党徒们表示了他可能隐退的念头时，他完全清楚，继承权问题已公开化了，而且成了亲近政府的阶层和广大负责的舆论界之间秘密集会和忧虑的原因。

可以说，问题的严重化始于 1958 年危机（德尔加多竞选资格），当时政府的不得人心已完全暴露出来。萨拉查已解除了竟敢表现出某种独立倾向的克拉维罗·洛佩斯总统的职务，并挑选当时的海军部长阿梅里科·托马斯接任共和国总统。这时，他的未来的或许已安排好的接班人——当时的总统府部长马塞洛·卡埃塔诺认为，政府的候选人应当是萨拉查本人。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由他挑选总理，这就意味着必须由他向全国指定他的接班人……

萨拉查不这样想。直至最后，他也从未透露过哪位是他指定的继承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他的狂妄骄横的追随者们自相争斗——这无疑使他感到快慰。分化是为了个个击破。除此之外，共和国总统之职所固有的义务迫使他必须经常在公众中抛头露面。这与萨拉查那深居简出和神秘交织的性格格格不入。但是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在他 1966 年 11 月 15 日接见《费加罗报》记者时已做过暗示。假如他升任总统，那么在他逝世后，国家将会出现一个选举动荡时期。这将立即考验他所创建的机构的稳固性。萨拉查从未对这些机构抱有多大的幻想，他知道这些机构只不过是些名不副实的摆设。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所蓄意制造的这个"政治真空"。为此，基于其实用主义，他极力避免一次突然的选举对抗给政府造成的危险形势。他曾严肃地把选举对抗称之为"制宪政变"，即可能从内部通过合法途径根本改变制度。

萨拉查知道，只要任命一位他所信任的共和国总统，一旦到了那个"现实时刻"，这位总统即可推举由他事先指定的总理继承他。那么，一切都将在没有选举和政治动乱的情况下完成，犹如在一个独裁君主制国家那样。

1965 年 2 月，当萨拉查主持他的唯一政党"全国联盟"新执行委员会就职仪式时，意味深长地说："不管事件如何演变，人们不能怀疑，在今后 7 年内，由于自然或政治法则，人们无法逃避复杂的选择，也不能逃避对现政权的谨慎评价。国家元首的双手将解决最大的困难，最重大的决定将取决于他的良知。"

他的讲话神秘莫测——这是他的风格。但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继承的程序已安排就绪。显然，萨拉查不是那种随意把挑选其接班人这样复杂的政治抉择交由象共和国总统这样热情不高

的人去决定。可以肯定，他在有生之年已确定了自己的接班人。为避免内部斗争，他把这个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一直保守到最后。当关键时刻最终到来的时候，犹疑不决只是由于一些特殊的（未曾意料到的）情况，即萨拉查病了，尽管他已不能履行公务，但他还是活了数月。其他一切均按预定的程序进行——征求了诸如国务委员会这样一些完全失灵的机构意见，但不允许人民意愿的任何表达。真象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马塞洛·卡埃塔诺上台看来已很清楚，他表面上由共和国总统安排，实际上是由萨拉查直接指定的！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选中马塞洛·卡埃塔诺？调查所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在萨拉查生前最后几年提及的几个接班人当中，任命马塞洛·卡埃塔诺并不出人意料，而且似乎合乎逻辑，甚至是必然的。

实际上，在当政者中，没有任何人象他那样有如此漫长而丰富的经历，这使他对葡萄牙行政事务中的根本问题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没有人象他那样能代表这个制度！

他是个具有传统思想的天主教徒，主张君主政体者，是正统的君主派杂志《呼声》和《葡萄牙》的撰稿人，是反动的、天主教的、拥护君主制的和苛刻的《新秩序》杂志的创始人，是民主和议会制的顽固批评者，是“强大国家”的鼓吹者。在思想意识方面，他拥护和力行军事独裁。从萨拉查上台的第一天起，马塞洛·卡埃塔诺就象一位虔诚的门徒，以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关注着这位起步维艰的独裁者！让我们听听他的自白：“5·28时，我还很年轻，但我已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我的觉悟是在此之后随着不断参加萨拉查的实践活动而成熟起来的。尽管总居于次要地位，但我有幸自1929年起就能与他合作。”

事实是，他在结束了法律学业之后，作为萨拉查的财政部的

法律顾问出现在我们面前。后来他成为"行政法典"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这部法典武断而集中地改变了所有地方和地区的行政结构。这次合作使马塞洛·卡埃塔诺赢得了他的第一枚勋章——基督勋章！

与其行动上的导师萨拉查一样，他在政治上是个经验主义者。他的政治思想在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下，在30年代得以形成。当时，他是墨索里尼模式的"新国社制"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人们对他访问意大利并不感到奇怪。从那时起，他便与青年时代树立的"葡萄牙反自由政体主义"理想慢慢地拉开了距离。

1940年－1944年间，他是"葡萄牙青年"的委员。他那时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派头：棕色的制服、绿色的衬衫、高高的军靴，手举法西斯礼。他在"葡萄牙青年"的经历还奠定了这个青年军国主义组织的理论基础，造就了大批崇拜民族主义和独裁神秘学说的领导干部。这个青年组织是意大利巴里拉分子和纳粹青年的可耻的孪生兄弟。"领导者使命"就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实际上，当时培养的一些领导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始终追随他，成了他的一支政治后备力量。现任部长席尔瓦·库尼亚（海外部长）和巴尔塔扎·雷贝洛·索萨（社会救济部长）就是这块种子田的最好产物！他们并不是出类拔萃者…….

1944年－1947年，他是殖民地部长。我说得很清楚：殖民地——在当时，后来人们称之为的"海外省"还被骄傲地称为"殖民地"。整体主义的大骗局时代还未到来！马塞洛·卡埃塔诺那时是这一事业的热情鼓动者之一。他妄想自己的这一事业永垂史册。"殖民地法"赋予这一事业"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响亮名字。

作为政府唯一政党（1947年）——"全国联盟"执委会主席，他站在政府一边发动了一场反对诺顿·马托斯的运动，并力图把在"葡萄牙青年"试验过的培养政治干部的方法推广到全党。

他没有说服萨拉查，因此未取得大的成果。萨拉查在1966年曾说出这样一些令人恐惧的话：

“我惭愧地承认，多年来有两件萦怀的事未能实现：使政府相信它们需要获得对其行动的政治支持，而这种支持只能来自“全国联盟”；使“全国联盟”相信政治教育不能由于家庭影响而放弃，而应当进行坚持不懈的系统的理论教育。”

1951年在科英布拉举行的“全国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马塞洛·卡埃塔诺决定彻底与君主派分手。他毫不含糊地说：“我年轻时代受的教育，我所崇尚的国家君主制传统、我与该传统现在的代表们的亲密友谊，所有这一切都驱使我（对君主制）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倘若理智和某种政治本能不让我离开它的话。”这种违背理智的共和信仰引起了人们狂热的评论。

1950年，他当选为协议厅主席，成为新国家中的第四号人物。1952年又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终身成员。他的辉煌的生涯使他在1955年荣升为总理府部长，他第一次成为萨拉查最亲近的合作者。从那时开始，无人否认卡埃塔诺是独裁者可能的继承人之一。在所有的可能继承人中，他的处境最好……

这时，桑托斯·科斯塔将军正任国防部长。他是萨拉查多年来在武装部队中最亲密的代表，是萨拉查的老牌合作者。然而，（与马塞洛·卡埃塔诺一样）受过君主制教育的桑托斯·科斯塔仍坚持把政府变为君主制。他是萨拉查指定的另一位继承人……不久，他与卡埃塔诺之间的对峙完全公开化，成为人们揣测和议论的焦点。政府内出现了两位对立的准领袖的追随者，他们不仅对国家未来的模式——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有分歧，而且对葡萄牙与战后民主世界的关系方面将奉行的总方针也有分歧。桑托斯·科斯塔是老朽而又顽固的亲德派，并逐渐变成了一个强硬分子。与此同时，马塞洛·卡埃塔诺具有较开放和灵活的头

脑，以欲建立较“自由”的体制的面貌出现。萨拉查如往常一样仲裁两者之间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广大公众中尚未明朗化，在政府内却十分敏感。在德尔加多运动之后的内阁改组中，萨拉查一如既往，果断地铲除了两个对立的党派。

马塞洛·卡埃塔诺从1958年开始了漫长的“穿越荒漠”时期。他返回私人生活，恢复了里斯本法律学院行政法教授的位置，作为“政府的后备力量”韬光养晦。

1962年，在高等院校危机期间，我们知道他是里斯本大学“杰出”的校长。我们还知道，那时他以健康为由辞职，其实是与科英布拉大学的人、当时的国家教育部长洛佩斯·阿尔梅达勾心斗角。科英布拉大学和里斯本大学两位教授互不相让，争夺国家最高职位。他们之间的冲突似乎颇为幼稚可笑，但却是了解这段继承历史的一条界尺。

马塞洛·卡埃塔诺懂得从他的1962年的辞职姿态中捞取最大的好处。这位能干的，但却与学生们保持距离，而且个性倔强的教授，从那时起开始塑造“自由派”的形象。这种形象与1962年前他作为教授和知名人物留给人们的形象迥然不同。

政府内的问题日趋尖锐，因此引起了更大的忧虑。由于萨拉查的顽固不化，殖民战争阻碍了国家的任何发展。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日见衰败。马塞洛·卡埃塔诺对此缄默不语——自有他的众多党徒们对官方政策提出异议。他从其脱离政坛中获取不可否认的政治利益。

在1962年，在接近政权的人士中流传着一份马塞洛·卡埃塔诺的“秘密”意见书（他从来没有否认是他的杰作！），该意见书是交给海外部长的，内容是莫桑比克总督关于对“海外省”政府体制进行可能变革的建议。这位“殖民帝国委员会”前委员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位未来的总理在这份文件中所主张的指导路

线是什么呢？

开头是这样的："目前提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方案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保证葡萄牙外交改善其国际处境，尤其是在友好国家中；2、不损害国家利益，特别是不损害居住在非洲的葡萄牙人的生命和财产；3、高效率的行政管理。"

根据马塞洛·卡埃塔诺1962年2月的设想，"为找到一项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解决办法而试图进行的宪法修改，是基于把我们目前称之为统一的国家改为联邦国家。"

他这样解释他的设想："葡萄牙国家（或他所给予的别的名称）包括州和海外省。三个联邦国家：葡萄牙、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为了原则，还可加上印度）。几内亚、圣多美、澳门和帝汶称为省。佛得角称为附属岛屿。"

在1962年的国际形势下——那时人们注视着戴高乐导致法国前殖民地独立所进行的艰苦试验——马塞洛·卡埃塔诺把他当时宣扬的这个深刻的宪法修正案称之为"唯一值得的赌注"！并以如下的方式为他的看法辩解：

"因为：1、这是两个大省在政府自治道路上的重要步骤；2、允许殖民者以始终如一的责任感最大限度参与行政管理；3、向国际社会表明我们变革的愿望；4、调和各省要求自决的愿望和外部迫使我们给予这些省份自治的压力，同我们继续保持这些省份在葡萄牙管辖下并用一切手段支持这些省份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5、允许在联邦宪法内加强这些省份的财政自主，以便我们只经过联邦委员会批准就可获得外国贷款。

人所共知，这个新殖民主义的设想从未公开地讨论过，也从未得到上层人士的垂青。萨拉查对此持否定态度，这就注定它只作为一种纯历史的好奇被束之高阁。尽管是一份"秘密"文件，但还是按照所有独裁统治的共同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秘密传播。假

若此文的作者是一名反对派人士，那么他起码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送上法庭。依照当时政治法院的法律，这种文件的出笼客观上就是“颠覆行为”，未经官方准许就将其扩散应属于“地下活动”。但是，此事由马塞洛·卡埃塔诺所为——政府一向有两种天平和两种尺码——只好默而不语。当时机到来时，这份文件又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中。到1970年开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时，许多人，特别是新闻、外交界又纷纷重新提到这份文件，以说明政府首脑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一切蛛丝马迹都会被随意夸大，并渲染成未来的道路！

但是，1970年政府提交给全国议会讨论的宪法修正案——包括统一国家内“海外省”的自治，已同1962年的文件大相径庭。为什么？是与会者的力量对比当时不允许他走得太远，还是这位政府首脑的思想自那时起有了明显的倒退？

但是，这不仅仅由于马塞洛·卡埃塔诺在政府内占据的显要公职——他是萨拉查可能接班人中最受宠的一位。作为一位老独裁者，卡埃塔诺由于与教会上层有着密切关系而深得教会信赖。正如他最近出版的书所表明的，他与萨拉查不同，是一位关注着天主教思想改革的人，与西班牙奥普斯·戴派的头目们，尤其是洛佩斯·罗多友谊深厚。他的这种摇摆于葡萄牙教会旧传统和自第二次梵蒂冈教务会议上吹出的革新之风中间的骑墙立场，尤其使他适宜担当国家领导的最高职责。这个极力维护教会最近几十年来取得的重要利益的人，在对所谓进步天主教界“清查”行动中也是个急先锋。进步天主教界曾使官方教会大伤脑筋。

另一方面，作为国家一些最重要的私有企业的受尊重的法律顾问、保险公司和其它几家公司的董事、前国家海外银行的董

事和政府派驻安哥拉银行的前代表，马塞洛·卡埃塔诺在这些年中，已拥有了一笔雄厚的资本，这笔资本足以使他成为经济权力部门宠爱的候选人，被推上政治顶峰。在政府严格控制经济的形势下，在竞相争取国家支持的工商巨头之间做出决定性的、非常准确的裁决，需要他的决策能力。工商巨头们需要他的知识和权威。选择他的人不能不考虑财界的压力。他们不希望出现继承危机，暴露他们心里的偏爱。

不管是由萨拉查指定也好，由共和国总统确认也好，还是纯属阿梅里科·托马斯海军上将的"灵感"，事实是选择马塞洛·卡埃塔诺为总理是政府的正确抉择。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继承萨拉查的最佳人选。

早在17年前的1951年11月23日，在科英布拉举行的全国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马塞洛·卡埃塔诺就说过：

"尽管它使我们十分不快，但它是不可避免的：萨拉查不是永生的。总理为新国家奠定了基础；他在以后的一篇篇铭刻人心的演讲中描绘了他的蓝图；经过20年的沧桑风雨，他把蓝图变为现实……萨拉查不仅是新国家的一位总理，也是一位领袖，一位导师。

"由此，新国家的一切指令都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是所有问题的仲裁者，一切解决办法的权威……

"因此，我们习惯把萨拉查看成新国家权威的化身，看成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公断我们的分歧和引导我们前进的领袖。那么他的继承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将如何解决呢？"

对于这样一个在那时（1951年）已困扰着政府领导人的问题，马塞洛·卡埃塔诺胸有成竹地回答：

"萨拉查之后的新国家会继续下去，因为他的学说和他的著作永垂不朽。这些学说和著作奠定了一个制度的牢固基础并已

造就了整整一代人。在上帝旨意要求另一个人占据他的位置的那一天——上帝不会允许这一天很快到来，我坚信只要葡萄牙民族主义者在关键时刻能够遵循做人的三个政治美德：团结、冷静和理智，那么新国家将会安然地沿着既定方向前进。”

问题已得到研究和预测，而且国家也有“理智”。在当时那种严厉的新闻检查和政治警察的高压之下，在群众的一切联络渠道都被封锁的形势下，国家怎么会失去“理智”呢？有一个人，他早在1951年就毛遂自荐，把自己说成是在独裁者死亡的困难时刻的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个人就是马塞洛·卡埃塔诺！只是……他必须等待漫长的17年！但是他，保持了高度的“理智”。

此时有必要说明，按照宪法规定，总理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共和国总统（宪法第81条）。政府只取决于国家元首的信任而不需要全国议会的任何表决。所以总理由共和国总统自由任命或解职。尽管部长们由总理提名（宪法第107、108条），但也由共和国总统任命或解职。

因此，根据1959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第72条新规定，由一个人数有限的选举人团选出国家元首。这种选举方式最终剥夺了政府的一切政治合法性，因为它使政府完全失去了真正选举中所表现出的人民意愿的影响。政府在理论上从属于共和国总统。实践中，共和国总统独立于人民的意愿。为什么？因为他首先必须由唯一的党（其首脑必须是总理）来挑选，此后再由政府支持者组成的一个选举人团（他们都是或几乎都是前面提到的唯一的政党的党员）把他推上总统宝座。正如我过去曾断言的，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宪法循环论把戏。是一种封闭的制度，它既不保障任何合法的出路，也不保障任何取代政府的道德途径！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意愿无法表达。

因此，当萨拉查病重时，解除这位老独裁者职务和任命新的总理便成了共和国总统的特权，两项行动都由他一人独揽。没有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因为在宪法中对此未做明确规定。所谓的主权机构（全国议会、协议厅）也被打入冷宫。国家元首的犹豫不决是因为萨拉查长时间生死不定的病情。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将按照严格的老君主制“老王崩新王继”的方式自动取代他。正如“备受折磨”的国家元首说的，他在“情谊和感恩同理智和义务对他提出的要求之间难做决断”。

那么是否象某些亲政府的评论家后来宣扬的那样，这意味着萨拉查创立的制度行之有效呢？不！只能说，面对葡萄牙的“政治真空”，我们通常称之为葡萄牙舆论的富有活力的民族力量，不拥有发表意见，更谈不上参与的合法手段。一切都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可以肯定，所有的政权，即使以个人权力为主要基础，都是力量平衡的结果。葡萄牙自然也不例外。概括地说，直接支持政府的势力主要有三种。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力量直接参与萨拉查继承人的选择。

首先是那些大亨集团。我在前一章把他们称为“政治经济伯爵团”。这个阶层在萨拉查独裁政权的庇护下发展起来，如今控制着政权的主要杠杆和经济界的一些要害部门。但是与人们想象的相反，这个阶层并不一贯完全代表所谓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巨头。这些人常常自相矛盾，如具有外国思想的农业主和资财雄厚的工业资本家的情况，其中一些人已有了欧洲企业家的新精神。这些经济巨头们向政府施加压力（有时同政府发生冲突），在激烈的竞争中时合时离。他们利用“男爵们”为自己服务——这点很清楚！——但也不得不应付他们的要求。因此，尽管他们从不同含意上也是政权的受益者，但与“爵士们”不能同日而语。

爵士阶层的真正代表几乎全是新生的，通过早有的政治生涯获取了经济权力。他们自认为是政府的天然卫士，因为政府的继续是他们特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把镇压力量（“毕得”等）的代表人物和某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划入这个集团。

支持政府的第二股力量必然在军内。但是，作为整体，武装力量对政府的支持只是出于自然习惯。即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做任何损害政府的事。他们能登上高位，全仰仗政府的提拔。但是，近年来由于殖民战争，在武装力量内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可以说，武装部队作为军事团体，通过战争，在全国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威望，同时他们过去闻所未闻的迅速晋升的可能性也展现在他们面前。尽管如此，在军队广大阶层，依然存在着对政府的潜在不满情绪。然而由于中层干部的频繁调动，这种不满情绪很难达到极限。

确实，殖民战争除了使军人们声望大震外，还使他们得到了重要的特权和可观的物质利益。但与此同时，在短期和长期内都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厌战情绪。

还要看到，在萨拉查时代，武装部队从未步调一致过。与西班牙相反，葡萄牙的独裁者是位文人，对军队总是抱有很大的戒备。他满腹狐疑地注视着每一位高级军官威望的提高……随着殖民战争的发展，这种不信任达到了病态程度。所以，在武装部队中很少人拥有真正的政治份量或享有全国威望。萨拉查总是在军内制造对立，并总是把那些平庸之人或软弱之徒安置在高位。

因此，在发生继承危机的时刻，武装部队没有条件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共和国总统，甚至提不出独立而一致的思想。但是，战争的继续和由于替代萨拉查而出现的政治不稳定时期，为他们开辟了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决定因素的

道路。

最后，必须提到作为政府主要支持力量的天主教会，或更确切地说，天主教主教团。虽然一些教会组织，特别是较年轻的神职人员施加压力，要求改变教会与政府之间所保持的令人反感的联姻状况，但毫无疑问，官方教会，或称主教团，总是在最关键时刻支持政府，尽管近来它极力戴上中立的面具。

如果官方教会能在解决萨拉查继承问题的时刻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当然人们很难证实此事是否曾发生！那么它肯定支持马塞洛·卡埃塔诺。

不管如何，即使在最直接支持政府和在政府保护下受益最多的势力中，选择继承人这样的政治问题也还未提到日程上。各种势力都已习惯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唯命是从的传统，因此只限于悄悄地施加某种压力。"全国联盟"——其执委会主席此时是国家海外银行董事和前部长卡斯特罗·费尔南德斯——没有任何发表意见的机会。它是一个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影响的瘫痪组织。若进行投票选举，该组织可能会反对马塞洛·卡埃塔诺——正如人们所推断的那样，他上台后立即撤换它的领导干部。主张广泛"自由化"的梅洛·卡斯特罗取代了卡斯特罗·费尔南德斯。由于唯一政党的组织名称改变，梅洛·卡斯特罗在1969年"大选"后也被免职。

在萨拉查因血管障碍而必须重新进行手术和任命其继承人的日子里，共和国总统没有因为挑选继承人为难，而是为罢免奄奄一息的独裁者瞻前顾后。尽管他知道国家机器已停止运转，但因出于根深蒂固的敬畏，他没有下决心将萨拉查免职。美国医生豪斯顿·梅里特来到葡萄牙，观察病情，确认了葡萄牙医生的诊断。他来葡萄牙主要是为了消除共和国总统的重重顾虑。在这个历史关头，一部漫长的屈从历史象沉重的铅块一样压着他！

在那些观望的日子里，葡萄牙政府完全停止活动，围着病人的病榻转。医生们的公报荒诞矛盾，外科小组的客观声明被亲信们的乐观妄想所歪曲。盟国的外长都知道，假定的接班人是马塞洛·卡埃塔诺。外国的主要新闻机构公开发起支持他的运动。《金融时报》甚至称他为“百分之百的欧洲人”！为什么？因为对知情者来说，肯定无疑的是，游戏正临近结束，唯一要做的事是缓和继承问题带来的感情冲击波。为此，最好的办法是镇静精神——在一派祥和气氛中，为继承人塑造一种稳重的自由派形象。晦气的日子将成为过去！随着老独裁者的取代，国家将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可亲、快乐和宽容的时代。那时，所有的幻想都可在葡萄牙人的激情中涌现出来……

在政府的党徒中是否有人对这个选择不快？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人们谈到的其他候选人中——前司法部长安图内斯·瓦雷拉、前殖民部长阿德里亚诺·莫雷拉、现任外长佛朗哥·诺格拉、前航空部副国务秘书考尔萨·阿里阿卡将军，没有一个人拥有能引起共和国总统重视的特别政治份量或全国影响。如果马塞洛·卡埃塔诺那时未被选中，他现在也不会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唯一可以向总统施加影响的组织是武装部队，而它此时又拿不出一项协调一致的意见。

就这样，萨拉查的预见得到证实：独裁者死去，独裁者上台。犹如一场全然无视葡萄牙国民的魔术！

在圣多美，我通过收听不同电台的一些零星报道，尽可能地关注着事态的演变。这些天，如果有令我感慨惊讶的事，那就是人民的无动于衷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消极态度。我认为这才是真正令人茫然的现象！

我收听了“自由之声”从阿尔及尔播出的激动人心的呼吁。

这一呼吁是由诗人曼努艾尔·阿莱格雷以高昂的激情在全国爱国阵线电台宣读的：

“敲起战斗的钟声！点燃蔓延全国的战火！

人民涌向大街小巷，欢呼暴君的消亡！”

在葡萄牙，人们用沉默和冷淡回答阿尔及尔发出的呼吁。从遥远的圣多美看到，国外革命者的言辞（及其激情）同国内老百姓沉默消极的反差使人担忧悲伤！

我不否认，我从内心支持阿尔及尔的号召。真心希望突然爆发一场不可阻挡的人民群众的欢呼浪潮：人民终于摆脱了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可憎的独裁统治！我希望人民的热情席卷城镇和乡村，就象战争结束时人民自发地欢欣雀跃，全国处处一派喜悦气氛！

但并非如此。来自宗主国的反响出奇的沉静，完全无动于衷！没人做出反应！没有人有所表示！普通百姓对发生在萨拉查身上的事漠不关心，似乎一切都与己无关，只表现出了一种病态的、表面的和短暂的好奇。最后马丽亚·热苏斯·卡埃塔诺·弗莱雷夫人——人们总算知道了这位多年来被称为马丽亚夫人的全名！——一直是萨拉查的合法妻子呢，还是象人们猜测的那样，如过去乡间老神父们有姘妇一样，只是一位贤慧的情人呢？还有其他一些公众好奇的热门话题：病情的进展、偏瘫的扩散、独裁者面神经麻痹、他与护士们（刺激人心）的关系，等等……

难道没有强烈的反映吗？欢乐或者痛苦、爱或者恨，难道不应该从这么多年受压抑的人心底迸发出来吗？没有！据我所知，即使是我的那些最关心政治的朋友们也在安然地度假，等待着这位“老朽”的死亡……

还是诗人阿丰索·洛佩斯·维埃拉说得对：萨拉查剥夺了国家的生气与活力！直至最后，他仍使国家完全昏迷不醒，无力反抗。

我承认，对葡萄牙形势的现实主义分析不会得出与客观事实相反的结论。发动一场群众运动的客观条件不可能一气呵成，尤其是在警察制度下。

反对派缺乏通讯工具而且力量分散——相反，政府垄断了所有的宣传手段，导致了群众的全然冷漠。处于政府强大宣传攻势下（尤其是电视）的城乡百姓，没有做好积极反应的准备，也没有这个条件。漠不关心本身就是一种反应方式，尽管是消极的！

另外，反对派运动——无一例外——没有任何一项在萨拉查逝世时能付诸实施的预先的计划。因此，在这些决定性的日子里，提不出能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的鲜明口号。从国外用葡语播音支持反法西斯运动的电台——“自由之声”和“自由葡萄牙电台”只有少数人能听到，而且前者的播出时间太晚，劳动者无法接收……

人们可以说出多种原因来解释反对党在获悉萨拉查突然（?）患病的消息时为何完全束手无策。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反对派政治力量没有一个推翻政府的战略。反对党各派长期以来以不可否认的顽强不屈、自我牺牲、有时甚至是英雄主义进行反抗。但没有，也从未有过一项夺取政权的周密计划。他们只限于对一时一地的情况做出反应，似乎他们的政治目标就是永远甘居反对党地位！

那些主张进行“武装斗争”（比如三十年来共产党一直鼓吹的“全国反法西斯起义”）的革命组织从未系统地确定这种斗争的条件，也没有规定为破除法西斯秩序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样，

"武装斗争"就象一片飘忽不定的云雾披上了新神话一般的诱人艳服，脱离了实际。他们主张分散的暴力活动，希望以此创造一种革命气氛，但是又不懂得如何创造这种气氛。至于其规模和结果，所有的人都不清楚。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经过多年的假革命的高谈阔论之后，这个革命组织依然踏步不前，大大落伍。这如同多少年来军事暴动那样，仅仅是老牌共和党人的梦想。

大约在1967年，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联合革命行动团"。它决心开展一系列的反政府行动。其第一次行动旨在为未来的革命筹措资金，袭击了葡萄牙银行菲格拉达福兹办事处。我作为其主犯埃米尼奥·帕尔马·伊纳西奥的律师参加了此案的审理，可以断言这是一次经过周密准备，并使用了不同寻常手段进行的袭击。这家银行的全部资金——将近三万康托——都被这个袭击小组洗劫一空。这个小组的头目就是这位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千锤百炼的传奇人物帕尔马·伊纳西奥。

然而，结果如何呢？他的第二次大行动没有成功。他在这次行动中曾封锁和控制了库维利扬城达数小时之久，试图在这个重要的纺织中心进行一系列的行动。由于所乘的汽车发生故障，他被迫停在一条公路上。共和国国民警卫队认出了他。经过一阵周旋后，他最终还是被捕了。

他在押期间(直到1969年历尽艰险逃出波尔图"毕得"总部)，他领导的运动一直处于解体状态，无法再进行同样的行动。这个组织在保护这笔钱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有损声誉的冲突。

替换独裁者之时，埃米尼奥·帕尔马尚被关押。这对政府大为有利……另一方面，其他主张革命行动的政治力量，如各种马列主义团体和小股格瓦拉和托洛斯基派别，没有任何行动。侈谈发动全国规模群众运动的(正统)共产党在这段时间表明它没有

能力做任何有意义的动员。事实是，其他的一些政治派别，如社会党人也没有更多的作为。缺乏总体战略和一个受到国家内地各派拥护的统一指挥，使本来有可能的行动落空。当然必须承认，在警察严密控制着葡萄牙社会各阶层的条件下进行这些运动是极为困难的……通讯工具被政府垄断，因此一切行动都必须通过私人接触，一一相告，临时准备。

在"准合法"活动方面，共和派、社会党人和天主教阶层或许比其他阶层行动更方便一些，但他们同样完全没有行动和设想。除了惯常的缓慢而无关紧要的签名运动外，没有任何作为……虽然发生了继承危机，但举国上下照常安然度假。

反对派仅有的政治干部如散兵游勇，对形势准备不足(这种形势本来是可预见的)，惊慌失措，不知道准确无误地做出反应。而政府在10天中完全陷入瘫痪！这对一个大胆的意愿该是多么有利。

没有人去做！

许多人开始冷静地做出自己的估计。独裁者消失之后，政权肯定会发生变化。如果国家的政治风向肯定要变，那么在这前途未卜的时刻为什么要白白冒险呢？史籍断言，一位独裁者不能替代另一位独裁者！再次重复相同的个人权力的形势是不可想象的。疲惫、恐惧和屡遭失败而形成的反对派顺从主义告诫人们要等待观望。四面八方响起一个声音：慎重！慎重！慎重！如第二次大战结束时那样，再次失去了时机。政府已有足够的时间死灰复燃……

9月26日晚，共和国总统向全国宣读了简短的公告，宣布解除萨拉查的职务(尽管保留他的总理的一切荣誉)，任命马塞洛·卡埃塔诺教授接替萨拉查。

次日下午，新总理在圣·本托宫发表了一次简短的演说，这

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口头杰作。的确，他用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他的行动要点，为他的行动在全国开了一个他并不打算兑现的充满希望的空头支票。与此同时，他还让听众意识到：一切都将依然如故。他宣布："我们不应放松后方的警惕！"他还说："将毫不留情地维持公共秩序。"他的党徒们理解这句话，因为他们知道"公共秩序"有着非常特别的含意……

尽管他赋予"变革"某种谨慎的印记，但他标榜"继承先志"。他具有迅速表明与前任迥然不同的不可否认的才能。而这种不同对他十分有利："国家长期以来习惯于由一位天才人物领导。从今往后，国家必须适应另外一些人的政府。"

成千上万的葡萄牙人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故弄玄虚和尖酸刻薄的讽刺。卡埃塔诺越分析"天才人物"留下的事业，就越加谨慎地强调他面临的"巨大工程"。但谁能断定这就是他的隐而不露的意图呢？

这篇讲话的语言和特有的风格都不同于萨拉查的夸夸其谈：它更为明确和有新意。总的来说，讲话颇受欢迎，可谓一鸣惊人。尽管有绝然不同的解释，但讲话言简意赅，包括了几乎所有阶层都心悦诚服的内容。"徒弟的最大危险是只会模仿师傅。"卡埃塔诺显然不愿冒这个风险！恰恰相反，他不过份担心过去与萨拉查共同承担的责任，决然与这位大势已去的老独裁者保持距离。这会刺激那些顽固不化的萨拉查分子吗？肯定会！但是他在推行这项政策时表现出的机敏使他获益匪浅……

另一方面，他必须使支持政府的老兵们有安全感，他们此时茫然悲观、忧心忡忡、不知所措。他必须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开放"从策略上讲是必不可少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此他提出了明确的警告："一个能宽容所有有良好愿望的葡萄牙人的政府的最真诚的愿望，不能同思想上的优柔寡断和软弱

无能混为一谈！”由此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的本质相同，只是治国的风格有所变化。事情虽小，但对于千千万万习惯了萨拉查严厉统治的葡萄牙人来说，是对国内舆论的第一次重要让步。

尽管如此，萨拉查依然活着，与死亡做着顽强的斗争。更为糟糕的是，他依然以总理自居，因为共和国总统从来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他已解除他的职务。正如《曙光》在一次著名的采访记中所透露的，部长们必须定期装模作样地去向这位老独裁者请示汇报！在这个时期，悲剧和怪诞事件屡见不鲜……

马塞洛荣升总理的条件至少从表面上使他成了引人注目的人。他的晋升取决于共和国总统的一念之差。或者取决于萨拉查身体康复的“奇迹”——许多人相信或佯装相信这个“奇迹”。直到卡埃塔诺通过电视告诉人们，他已是一具僵尸时，神话才告结束。之后，葡萄牙政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等级——“超级人士”——老式的萨拉查主义怀旧者。其力量不断膨胀，以致成了一把万能钥匙。他们指手划脚，发号施令。

“呀！要不是这些超级人士……”人们胸有成竹地感叹说。

卡埃塔诺机智果断地在漩涡中拼搏。他玩弄花招，左右逢源，时而故作姿态，取悦于左派，时而向右派暗送秋波。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他以在葡萄牙从未有过的方式，毫无保留地使用电视这个无与伦比的武器，但又从不忽视那些组织严密的小型“群众集会”。他就象笑话中可爱的赛车手，打出了左转弯的信号，但在最后一分钟，又坚决地转向右方。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全国的普遍批评。于是有头脑的人开始产生疑问，执意要弄清卡埃塔诺主义的本质：什么是这种尝试的界限、方向和深刻意义？这种实验尽管使用了更现代化的方法和开创了一

种更加现代化的行动风格，但似乎仍在继续萨拉查主义。

1968 年 10 月，当马塞洛·卡埃塔诺第一次到南方旅行时，人民以少有的热情迎接了他。一位记者对此深为感动，询问一位普通老妪的看法。

“您对总理先生有何看法呢？”

他得到如下体现人民智慧的回答：

“这个萨拉查好象比另一个萨拉查更富有同情心……”

这句后来在全国广为评论和流传的话，表达了葡萄牙人民在 1968 年这美好一年的岁尾的真实感情。这是转变的一年吗？毫无疑问，由于当时严重的形势所迫，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尽管人们知道，政府的专制结构依然未受触动，但新开创的作风使人感到愉快。然而实际上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深切愿望。

·14·
一次沮丧的经历

马塞洛·卡埃塔诺在他主持的第一次部长会议上就提出了我返回葡萄牙本土的问题。自然，新总理当时还没有条件直接否决萨拉查(他还活在人世)的决定，而公开宣布对我的流放是可怕的暴力。但他意识到这一事件在国内、国际政界和司法界所引起的对政府的强烈批评性舆论，因而设法间接地解决这一问题。他把直至那时的“无限期”流放定为一年，并从我入狱时(1967年12月)算起。

应当说明，在萨拉查下台前，我曾通过我的律师若泽·马加良斯·戈迪钮求助最高行政法院审议部长委员会做出的流放我的决定(实际上只是萨拉查的决定)。这种申诉显然只是一种理论行为，因为不可能设想由总理任命的最高行政法院会同意做出一项不利于政府的决定。但是重要的是做出最大的努力，尽可能使有关人士知道自己应负的责任。

为了达到目的，当时我曾请求马塞洛·卡埃塔诺发表法律见解。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曾是我的行政法教授。我自学生时代起，就与他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于是，我从圣多美给他写了封信。我从邮局接到了否定的但却是寓意深刻、完全礼貌的答复。他在信中说，他的看法不会对我有利，因为从狭义的司法角度看，有关流放我的法令并不违反宪法，政府的行为也未脱离

其权限。他还说，这是个纯属司法技术问题，具体到此事（他并不知道），他对政府对我采取的行动深感遗憾，并祝愿我尽快回到家庭的怀抱，从事自己的职业活动。而对这样的答复，我不能再说什么了。但我在感谢信中仍指出，如果法律的正确解释就是这样，这将开创可怕的、可能对推行这些法律的当权者不幸的先例。因为尽管有着相反的表面现象，但政府毕竟不是永恒的。我的话不幸言中了！就在我写出此信后不久，萨拉查就不再是葡萄牙的大权独揽的独裁者了……

马塞洛·卡埃塔诺刚一担任总理职务，律师协会主席佩德罗·皮塔博士——他孜孜不倦地维护同事们被践踏的权利——要求马塞洛接见他，以便当面通知他，律师协会将举行一次全体大会，专门讨论我的问题。他们指望这次会议对我表示一致的支持和声援，并抗议政府的措施。马塞洛·卡埃塔诺在接见佩德罗·皮塔时，没等他开口就向他宣布了部长委员会前一天做出的让我回国的决定。此事发生在1968年10月初……

我在前一章已描述过，我在圣多美处于隔离状态，得不到任何消息，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因此我不能想象所发生的事，也不知道我的事情在全国引起的反响。我从佩德罗·皮塔的一封电报中，粗略地得知部长委员会的决定。从此，我与总督恢复了接触。总督当然更乐于此道，他多次召见我，并在一种彬彬有礼的气氛中向我透露了政府有关我的问题的意图。

对我的问题的解决有意避而不谈问题的实质。问题的要害是弄清政府是否有权在没有对一个公民做预先审判并仅仅由于这位公民在政治上激怒了政府，就把他无限期的流放。由此看来，这是一项含糊不清的决议。即使如此，政府的决定被普遍认为是政治新首脑“自由化”愿望的第一个具体姿态。这位新首脑似乎准备对反对派创造一种友好气氛。国际新闻界报道了这一

姿态，并赋予它同样的意义。葡萄牙的报纸尽管一向受到检查，也有倾向性地转载了国际上的这类评论。因此这是一种预谋好的政治行动，有人企图从中在国内外谋取某种心理效应。所以，尽管我受益很大，但我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个人的恩惠，而看作是对一种非正义的基本的、迟缓的修正。

许多习惯于葡萄牙思维方式的人，对我从未就结束我的流放一事向马塞洛·卡埃塔诺表示谢意感到诧异。这种看法是如此强烈，以致使我承认卡埃塔诺本人可能也会对此吃惊。但我认为，我做得对。正义不需要酬谢谁，即使它可能带来高官厚禄：请记住这一点！

由于圣多美总督的关照，最后，我提前一个月返回葡萄牙本土。此事在舆论界引起的反响，使得政府担心我的回归会引起支持或反对的示威游行，因此我被迫取道罗安达。总督安排我提前返回的建议被欣然接受。他提出的理由是，让我参加我父亲的诞辰纪念(1968 年 11 月 17 日他将满 90 岁)。总督在绝密的情况下安排了我的启程，直到计划好的出发日期 11 月 9 日，“毕得”还一无所知。

正如前面所说，罗安达—圣多美—罗安达班机每周一次：每周四抵港和离港。他让我在一个星期一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在罗安达搭乘他的官方专机——一架双引擎小飞机。我在无人知晓——包括我的家人——的情况下，回到了里斯本。我凌晨回到家，用我的钥匙打开家门(我总随身带着它)。我叫醒了孩子们。全家惊喜若狂！

离开里斯本和脱离政治几乎一年，我回国后看到的新政府带来的气氛是宽容和充满希望(温和)的。萨拉查依然象植物人一样地存在着，但已只不过是一具木乃伊！新总理在内阁中保留

着政府的原班人马，只有少数例外(值得一提的几位重要部长是：国务部长、国防部长和情报秘书)。他试图争取时间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什么？据说为了致力于一项改革政策，一项唯一能使国家走向光明的政策。这是这个时期人们普遍的看法。人们认为马塞洛·卡埃塔诺之所以没有在他承诺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快，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人们还评论共和国总统在领导国家事务中突然扩大的影响。

但是，在缓和萨拉查晚期国家所面临的紧张气氛方面，卡埃塔诺已经有所建树。他放松了新闻检查，答应尽快颁布一项新闻法(据称，早在他任总统府部长时就已拟成此法，萨拉查从不让宣布)，呼吁"一切善良的葡萄牙人合作"。这些姿态被解释为意在"宽松"国民生活。当葡萄牙在接近它的欧洲时间表时，这符合葡萄牙的资本主义需要。

然而，这样做的目标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旨在使葡萄牙渐渐加入西方民主世界的真诚努力呢，还是相反，是一种旨在创造一种较好的气氛，从而解除反对派武装并为政府招揽新的更广泛的支持的纯广告宣传"行动"呢？基于这种分析，我于1968年12月初，即我回国一个月后，受《里斯本日报》之邀写了一篇文章，但新闻检查完全删掉了："比言辞(言辞显然有其价值，但容易引起不同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制度变革，把所宣传的良好意图具体化。至于这些变革，我们必须承认尚未迈出任何重要步子。制度变革应确保全体公民能积极而正常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不依赖政府的恩典。我们不能满足于政府的诺言和简单的让步。这些诺言和让步可能是适时并有效的，但丝毫不会触及现行的反民主的制度！"

我的这种立场使记者提出了当时萦绕在所有人脑海中的一个新问题：

“您不认为现在还没有时间做这些事吗?”

我回答:“我希望您能清楚,我是个理解政府‘巨大’困难的人。从任何角度看,政府接受的遗产都没有一点喜人之处。我知道,不能要求所有的事一蹴而就。需要克服种种阻力,存在着害怕丧失自身利益和制造各种困难的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威胁,存在着专制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难以克服的恶习旧俗。我对此一清二楚!但真理是,自由化不是宽宏大量的让步,不是政府的恩赐,而是举国上下的一个强烈要求,一种生存的需要。一种极权政治不仅在今日的欧洲没有前途,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灾难性的,将把国家推向死路。因此,为了唤醒国家沉睡的力量,为了建立一种信任和热情的气氛,迫在眉睫的是触及面临的问题,为人们指明能激发他们自觉投入的前景,而这一前景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没有这些,则将一事无成!没有这些,现政府不久将面临过去历届政府所面临的孤立和敌视。而且必将是前几届政府的简单重复,只是成员不同而已。”

新闻检查不允许发表这次采访。这对我是个不祥之兆。已经很清楚,马塞洛·卡埃塔诺政府与萨拉查的几届政府一样,不允许在国家生活中存在真正而有组织的反对派,并继续对那些试图独立、平等地讨论国家重大问题的人反应过敏。因此,独角戏将继续演下去!

但是,新政府进行了一些谨慎的革新,渴望自由的人们欣喜若狂。警方和新闻检查的压力有所减轻,一项新的工会法对政府控制的“垂直工会”领导层进行了某些变革。根据宪法规定,1969年是国民议会大选年,新的议会将拥有“制宪权”。政府对这次选举非常审慎,立即开始竞选宣传,更换了唯一政党的领导,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全国联盟”新的县委会,任命了一些新的文职县

长。政府垄断的强大的宣传工具广泛地报道了这些活动。电视转播了唯一政党的领导干部交权的场面，试图塑造这个衰老而失去人心的政治组织的年轻化形象。这个组织是如此不得人心，以致经过几个月的令人失望的努力之后，不得不更换名称……

若泽·吉列尔梅·梅洛·卡斯特罗接任"全国联盟"领导。他曾是政府较自由的一派的领导人之一，并因此在萨拉査晚年失宠。当马塞洛·卡埃塔诺政府施政后，梅洛·卡斯特罗给新总理发去了一封电报，要求恢复基本的政治自由。他自称是新闻、集会和工会自由的捍卫者，主张建立政党和政治团体，以便能平等地参加真正的自由选举。这份电报被人们广为传阅，尤其是在天主教界。因此任命梅洛·卡斯特罗为"全国联盟"领导人被认为是另一个意味深长的阴谋。为了与老党保持距离，他立即把党改名为"新联盟"。

面对着官方宣传造成的1968年底开始席卷全国的"选举"狂热，处境不利的反对派显然应该迅速组织起来。但是怎样组织呢？最容易和合乎逻辑的方法是把各种意识形态派别组成多元体。直到那时，反对派在思想上尚未定型，总是以一个神秘怪诞的实体出现。它有时进行公开活动，但不久又在数月之内魔术般地从舞台上消失，茫然不知去向。这些人不做积极确定自己立场的工作，而仅仅安心充当反对派。

在这段反对派生活的黑暗时期，共产党是一个罕见的顽强拼搏而又坚如磐石的组织。尽管有起有伏，这个党由于有一批竭尽全力鼓动同情者和反法西斯者的中坚分子和工作人员，一直坚持活动。他们进行着无利可图和代价昂贵的工作，并经常受到法院"古典式"的折磨。自1964年起，在地下斗争领域出现了一些坚持较为正规活动的其他组织，如葡萄牙社会主义行动、马列主义者委员会和革命组织——革命团结和行动联盟(LUAR)。

在准合法领域，社会民主中心逐渐陷入了几乎是完全孤立的状态，他们只是不时地向公共权力机构递交一些政治请愿书。由于新闻检查，能看到这些请愿书的不过寥寥数百人。

所以，已经到了考验政府所宣扬的自由化意向的时候了。各反对党应当自主地组织起来，"争取合法化"，以便集体赢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合法存在的权利。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思想上十分明确的自主力量的组织，不仅与反对派的团结是协调一致的，而且，还是使这种团结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条件之一。因此，对于那些崇尚民主多元政体和政党存在必要性的人，没有比这更为迫切的任务了。

因此，在1968年12月，我发起举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份《告全国书》，来自全国各地区的约四百人签字。这份措词温和的文件被新闻检查武断地删除了。文中宣告：

"为了建立政治对话——葡萄牙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根本的是保障组成国家整体的政治力量的组织和行动的自由，保障公民的起码安全，制止政治警察和新闻检查的武断行为，立即结束服务于唯一政党的政权的垄断。"

从这一原则出发，签名者声明："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决心积极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因此要求下列起码的条件："一项保障宪法规定的任何形式的言论自由的新闻法"；"实行大赦，不仅释放狱中的犯人，而且呼吁政治流亡者回国，他们之中许多人是民族的精英"；"取消对政治犯实行永久监禁的令人憎恶的安全措施"；"颁布一项满足最低要求的、反对派自1945年起就矢志不渝地为之斗争的选举法，并应从进行一次公正而有监督的人口统计做起。"

这是国家前途茫茫的时刻：老独裁者继承问题引起的政治

危机；日趋严重、造成巨大伤亡而又无军事解决办法的三条战线的战争；由于同盟国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立场不断增长的敌对情绪造成的国际孤立；经济停滞不前，政府也承认，由于国民收入的 50%用于国防开支，不借助巨额的外国贷款，就不可能坚持再生产投资政策；令人焦急的经济和文化的不发达状态，葡萄牙百姓的生活指数属欧洲最低水平；物价令人头晕目眩地增长；居民大量的移居他国已经造成劳动力的严重危机；大城市居民的淡漠、缺乏参与意识和混乱；社团式的国家机器等等。面对如此黑暗的局面，谁也不能给国家提出现成的解决方案。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压抑后，谁能摸准这个国家脉搏的的跳动呢？

应当进行艰苦的斗争去改变事物的发展方向。即将到来的立法选举是一次机会，可以促进一次全国性的广泛而认真的讨论。这次选举除了是对新政府政治诚实性的一次考验外，还能提高人民的觉悟。这就是在宣言中写了如下一段的原因。

“签名者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认为，定于 1969 年 11 月进行的大选对国家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根据宪法规定，即将选出的国民议会拥有制宪权。因此，这次选举不能再象过去历次选举那样，是一次新的选举闹剧，只是保障对那些听命于政府的人的任命。因此，签名者认为，急不可待的是各种政治力量在自由的条件下组织起来，并在没有警察或新闻检查的干扰下，能够尽快地向全国提出他们的纲领。”

这一文件代表了反对派中重要一派的严肃而负责的意见，并未向政府妥协让步，相反，向政府提出了某些最起码的条件，不满足这些条件，就不能使人相信它一再宣扬的“自由化”意图。除此之外，文件还是对政府意图的一次考验，它不仅仅对社会党人签名者，而且对反对党所有其他派别都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社会主义者看来，丝毫不会伤害和激怒其他政治派

别(其实,他们也应当宣传自己的主张,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更不会损害反对派的必不可少的行动上的团结。社会主义者一向努力促进团结,消除分歧。

但是,那些把竞争意识和狭隘的党派精神看得高于反对派整体利益的某些派别不欢迎这个文件。签名者确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并写道:"毫无疑问,签名者不同意'专制社会主义',而且认为专制社会主义在当前并不对葡萄牙构成危险。他们毫不含糊地、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这是他们的思想意识立场决定的,并不是为了接受政府的任何良民证书(他们不需要这个)。作为民主主义者和多元政体捍卫者,断然拒绝相反的解释。"

"专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引起了一些阶层的反感。他们自以为是,从不尊重他人。他们把这一用语作为发动一场大规模反对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借口,指责社会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背着其他政治团体与法西斯主义做"优先合法化"交易。他们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呢?人们只要看一下那份文件的内容就很清楚,毫无根据!文件字里行间无可挑剔,没有任何把柄导致他们发动这样一场只会在整体上分裂和削弱反对派的运动。这一运动在反对派中引起了混乱和对立。除了共同敌人外,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而共同敌人早就施展阴谋瓦解反对派。这一运动还成了后来许多分裂活动的基础。另外,社会主义者一向认为,共产党的胜利之一恰恰是他们被迫从事的地下斗争带给他们的英勇牺牲的美名;作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也一贯主张所有政党都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社会主义者怎么可能一味追求"优先合法化",把自己作为同流合污者遗臭万年呢?不。社会主义者不论当政还是在野,都没有建立唯一政党的任何企图!

我们最了解自己。

当社会主义者声明他们是"非专制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

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的时候，他就确定一种不能放弃的权利，一种基于他们根本的思想意识选择的权利。另外，根据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际经验，社会主义者确定了一条自己的道路，鄙弃象捷克悲剧那样的破坏自由的事件。另一方面，当共产主义者宣称他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批评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捍卫社会主义道路（根据人民民主的模式）的时候，他们也确定了产生于他们的理论立场的权利。但是，在法西斯主义的形势下，这并不是居统治地位的分歧，尽管是非常重要的分歧。当务之急是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统治——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基督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共和党人都平等地投入这一斗争。在协调共同的努力时，都必须根据共同斗争的客观需要行事，但也无需放弃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不这样，那将是什么样的“团结”呢？

共产党人是“专制主义者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接受这种定义，甚至可能认为是诽谤性的。很好！但这并非是我谈论的问题。社会主义者断然宣称自己是非专制主义者，这完全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尽管这种说法被认为不合时宜，难道就应该把社会主义者说成是“优先合法化”的党徒、或卡埃塔诺主义的间接合作者吗？为什么会有谁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必定站在共同敌人一边这样的奇怪想法呢？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立场，表明他们的领导者不接受尊重不同观点的多元化团结，令人遗憾地把团结和绝对统一混为一谈，主张各种派别同唱一个调、共念一本经……

在反对社会主义者——或者象指控者说的反对“社会民主”运动中，我首当其冲。由于我的流放引起的反响，我成了一些左派人士（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攻击的优先目标，并且成了反对派一切失败和不幸的主要“替罪羊”之一。这场运动持续了很久，与

极右派当时向我发起的疯狂攻击在客观上协调一致……

是谁发起的这场运动？卡萨尔·里贝洛在国民议会一次又一次地攻击我。他由于受到新闻检查的保护而不受惩罚。这可以理解，也无损我一根毫毛。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多年来共同战斗的同志竟然也热衷于散布无中生有、可耻下流的谣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欲置人于死地的狂怒（就连为我编造的所谓我与政府合作的谣言也未能消除这种狂怒），只有一种解释：与个人没有丝毫关系，它是出于千方百计破坏用民主取代卡埃塔诺主义的政治需要。用民主取代卡埃塔诺主义不是乌托邦或纯粹抗议性的，而是可以实现的，并将在国内外受到欢迎。以上政治需要，在一定时候，由于一些与我本人无关的理由，却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正是这种情感，引起了如此之多又如此疯狂的反应。反对党的一些政治派别出于各自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原因，串通一气，不惜代价地诋毁我。此时此刻，我成了令人讨厌的、必须打倒的人。

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攻击，除了一些细微末节的诽谤和司空见惯的流言外，主要集中在互有联系的两项指控上："右倾机会主义"，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影射为"与政府狼狈为奸"；为了争取社会主义派"优先合法化"，玩弄"分裂反对党"的阴谋。事实和时间已比所有的语言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些指控的虚伪性。这两个指控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和愚蠢的，因为它没有客观地评价事实，更没有尊重我的反法西斯历史。1969年，掌权的不是社会民主，而是法西斯。毫无疑问，某些所谓的"进步"势力此时对此似乎还不理解，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理论最时髦：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是过时的概念，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

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希望"优先合法化"呢？为了成为"御用反对党"吗？为了把"唯一抵抗者"的政治上有利的地位拱手交给新

生的天主教团体和共产党人吗?这是共产党人的幻想,他们声称是"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反法西斯运动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而且对扮演这些"唯一"的角色颇为得意。对于多年来法西斯主义的真正合作者——某些天主教人士,只要他们顺从地合作,共产党人随时准备向他们颁发真正的反法西斯主义证书。但是,对于那些昔日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战友——有着可与他们中的最优秀分子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政治历史,对于那些甚至不惜个人风险在法庭和狱中保护过他们的人,他们却恬不知耻地指责这些人是"合作主义者",影射他们同政府做"优先合法化"的交易!这是这些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法,是反对派阵线陷入分裂的最重要原因。他们把今日的"朋友"捧上天,虽然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朋友"及其真正企图,而把昔日的同盟者、战友甚至同志踩在脚下,不惜对他们进行卑鄙的指责。有趣的是:制造这种气氛的共产党人往往成为第一个受害者。但是,这已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痼疾了……

1969年1月31日在波尔图大剧场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对于我的攻击首次公开化。我从圣多美返回后两个月,第一次公开露面和讲话。宽敞的大厅挤满了民主人士,走廊的重要位置散落着几群人,总共不过几十人。这些人向大厅抛撒要求"团结"的传单,高喊"路易·路易斯·戈麦斯!路易·路易斯·戈麦斯!团结!团结!"故意打断讲演者。之后,他们做贼心虚地声称这次"自发示威"的作案者是"悲观厌世者"。这是无稽之谈!厌世者不会喊这样的口号。这伙人的背景欺骗不了任何人……

当这伙受人挑唆的年轻人用他们炮制的诸如"机会主义者"、"合作主义者"、甚至"法西斯分子"一类精品向我表示爱抚时,内政部长拉巴索特正在里斯本收听警察录制的我的讲话的实况录音,他的第一个反映是命令当晚逮捕我。但是,他的一位

顾问的政治理智比党派的激情显然更高一筹，允许“左派”运动继续蔓延——政府从中渔利。那么，我在波尔图的演说到底说了些什么？它为什么使得极左极右两个对立的听众都如此不快呢？那就回忆一下吧：

“当前，我国如同1891年一样，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无人不知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海外各方面的悲惨形势。这种形势是政府顽固的自给自足和教条的闭关自守政策以及政府领导人的思想僵化造成的。目前的最高负责当局知道，政府和全国人民完全貌合神离。人民断然投票反对政府（一家外国杂志这样说），国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迁居他国。形势惊人，前所未有。

“所以才谈论对话，并突然在国家的政治术语中使用了含糊的语句：宽松和自由化。显然，自由化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一种解决困扰我们问题的出路的开篇，但其条件是真诚地把国家生活引向真正的民主化。别无他路！比如用种种借口煽动对现实漠不关心的同盟者的支持，或者玩弄政治伎俩，确保原来的专制结构的继续和存在。仅仅靠这些安全阀无济于事！远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并将使国家本来就已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

“只有真正的对话才是出路！但对话应该有条件，这是民主人士不能放弃的要求：保障各个政治力量的言论和组织自由。特别要保障我国人民摆脱对警察和对经济报复的恐惧，保障人民最终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必须释放狱中的犯人，让被开除的学生和被解聘的教师返回校园，让政治流亡者结束流亡返回家园！没有自由，对话将是一场真正的滑稽戏或权宜之计（或一个圈套）。这欺骗不了任何人！”

我这样结束了演讲：“我们再过几个月将面临一次选举，它

对集体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政府已开始了它的竞选运动，任命了新的文职县长，宣布了'政治春天'（不幸的是并不存在）。除了花言巧语外，令人痛心的是一切如故。我们大家和我们子孙的未来将取决于这次选举，其意义远远超过我们大家的想象。但是，选举只有是严肃的，即自由的，才会有某种价值！如果选举是严肃的，各种派别组成的多元体反对党将会制订一个共同的纲领。反对派团结一致，集中选票，将赢得这次选举！但是，任何人不要指望我们成为一场选举闹剧的合谋者，或指望我们吹捧欺骗人民意愿的谎言。我们不会进行秘密交易。我们不会用我们民主主义者所唾弃的卑躬屈膝为代价去购买国民议会的入场券！"

"如果选举是严肃的，国家将会踏上政治健康的新生之路，欧洲大门将为之打开，并将获得世界的尊重。如果选举如同过去一样，那么全国将用沉默回答官方操纵的蛊惑宣传！这是同样可怕的沉默，因为它常常是不祥的预兆。40年来都是这样。"

不幸的是，国家面临的是第二种情况。社会主义者忠于他们自由地向国家承担的诺言。没有为获得议会席位进行交易，并拒绝在这方面向他们提出的所有建议，不向政府让步。政治上排斥异己（已有长久的历史）依然继续。所有其他民主派别——共和党人、自由党人、共产党人、左派人士、天主教人士——均属被排斥之列。只有一些过去曾在反对派战斗过（秘密地）一段时间的天主教人士，不顾人民的意愿，以讲实效为由，通过与政府的谈判，在议会中取得了席位。尽管他们坚持标榜他们是"独立派人士"并在最近自称为"议会少数派议员"（？），但是他们接受了"全国联盟"的标签，并以此实践在政府内用各种方式改变政府的政策。但是，直到现在，战果并不辉煌。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这一政策没有达到目的，甚至政治声誉和一贯立场被毫无意义地抛弃，那么这还算什么效益呢（其愿望可能是很好的）？

莫桑比克的民主人士最精明老练。尽管他们被多次请求加入“全国联盟”的共同名单(但不许他们提出与政府党同样数目的议员候选人!),但他们均予拒绝,坚持提出反对党名单。某些未来的所谓“自由派”部长拼命玩弄的阴谋失败后,后果是出乎预料的:反对派名单被宣布为“非法”,理由是莫桑比克候选人没有证明他们是葡萄牙公民(!)。另外,莫桑比克最著名的反对派候选人之一阿尔梅达·桑托斯律师遭到了异乎寻常的攻击:经过官方新闻检查的报纸转载了一封伪造的信件。信中宣称,莫桑比克自由阵线领导感谢那位律师向民族主义组织提供的服务……

1969年的头几个月,马塞洛·卡埃塔诺政府继续积极地准备“选举”,改组“全国联盟”的一些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目的是——几乎总是落空——拉拢“独立派人士”和那些陶醉于效益之中的昔日反对派人士。“原则”不再是当务之急。但是,政府随心所欲地进行人口统计。

反对党的要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党派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未向准备参加选举的反对派任何派别和团体提供任何组织保证。反对派更没有可能做任何宣传,因为所有试图使用的手段,即使是记者招待会和带有含蓄批评的文章,都被新闻检查系统地砍除。另一方面,若瑟·马卡良斯·戈迪钮律师要求的新的选举法未予颁布。他对现行选举法的“虚伪性”和不完善深恶痛绝。人口统计按老模式进行,没有任何反对派代表参加。

为了改变这种形势,也为了消除在人们头脑中开始出现的在选举中弃权的想法,一些县的反对党人组织了选举委员会,但很快被政府宣布为非法。更有甚者:内政部长拉巴索特为了压制某些地区参加选举的热情,于选举前的两个月,即1969年8月,

用安全措施这一怪物向反对派发出威胁。他向共和国总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呈文，对所有反对派进行最凶恶的恫吓。

在里斯本，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恢复"选举促进委员会"的想法。多年前，这个在安东尼奥·塞尔吉奥领导下的委员会，在萨拉查统治的极其困难条件下，曾从事过教育公民的卓越工作。通过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所建立的接触，成立了一个由各种人士——教授、律师、学生、知识分子——组成的统一"临时委员会"，并在黄金路我原先的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在曾试图公开发表、但被政府扣压的文件中正式通知政府，要求对选举的组织、特别是对人口统计采取各项保障措施。然而，政府不仅不满足这些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合情合理的要求，而且还把"选举促进委员会"视为非法，其严酷性比萨拉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此，政府在其炮制的选举方面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选举"不会是，已不可能是严肃的。人口普查按照政府党的利益进行，不给反对派参与的任何可能性。尽管选民人数上升（由120万上升为180万），但未达到宗主国（大陆和岛屿）居民的20%，这还没有包括那些分散在国外的应当有却没有选举权的千千万万葡萄牙人在内！成千上万被怀疑同情自由派的选民被有计划地没收了选民证。这还没有谈到殖民地的情况，那里实际上只有白人有选举权。殖民地选民占全体居民的百分比是如此可笑，以致成了"国家机密"，从未公布！

政府的唯一政党同反对派（其存在从未得到合法承认）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如此令人愤慨，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描述的词句。唯一的党，之所以是唯一的，因为它在葡萄牙垄断了政治组织。通过政府（它与之已混合为一体）垄断着所有的新闻机构：直接垄断电视台和电台；以间接但十分有效的方式，即通过新闻检

查和它所拥有的所有经济加压手段，垄断报纸和其他宣传工具。

几乎所有的葡萄牙报纸如今都在大财团手中。在政府的唆使下，通过大量贷款、银行收买控制了这些报纸。在竞选初期，政府宣布，国家电视台和电台不能被（人们理解不能被反对派）用来做竞选宣传。但各党派候选人可以平等地使用私人电台。所以，我去一家主要的商业电台，每天购买一段时间做一次竞选宣传（当然，必须经过官方检查），管理委员会主席非常礼貌地告诉我，不能满足我的愿望，因为早在几个月前所有的播音时间都已出售给了播放广告的几家公司。我对他说，这不要紧，我事先已与一家公司协商好，他们答应每天让给我一小时。此人面色苍白，坦白地对我说：

"您这是逼我摊牌了。我不能同意您这样做。政府在发布关于在商业电台宣传自由这份公告前通知我，如果我向反对派提供时间，我将失去我努力许久以求获得的短波许可证的希望。您要明白，这关系到上万康托的收入！请您不要连累我……"

在整个选举前期——有一年的时间——"全国联盟"可以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它利用所有可以影响公众的宣传工具为其服务，而反对派则被禁止组成不同派别的多元体。即使是建立早期组织的企图，如"选举委员会"（开始于大约"选举"前的三个月，请注意！），直到竞选期（不到一个月）前的20天也被视为非法。除此而外，还有新闻检查和从未放松镇压的政治警察的破坏作用。新闻检查根据政府的需要，准许发表一些断章取义的消息，禁止发表另一些消息，限制对被删改的消息加以说明。对警察和对经济报复的恐惧气氛在扩展，这是法西斯40年统治的结果。马塞洛·卡埃塔诺政府没有做出丝毫努力，去消除这种气氛。然而，他热衷于宣扬"选举"，似乎"选举"是严肃的。他还试图以此使政府及其政策合法化！这真是地地道道的骗局！

鉴于这种情况，持各种观点的"自由派"开始公开宣扬放弃竞选。当然，这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态度，但是，在政治上作用却不大。在一个所有宣传手段都受到控制的国度里，拒绝利用某些可以用来传播自己思想的手段(尽管很有限的)，就是宣判反对派彻底的无所作为，弃权几乎意味着政治上的暂时死亡。

因此，那些较有组织的反对派——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天主教人士——一致认为，尽管不应有什么幻想，但却应该参加竞选。参加竞选是为了揭露选举中的舞弊行为，特别是"为了动员群众并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不指望"赢得选举"，而是在政治上唤醒并动员一个沉睡的国家。

社会党在 1969 年 5 月散发的一份宣言中，重申了他们的立场。这份文件的发表在"选举"前四个月，仍然受到新闻检查的阻挠。他们的立场是：

"我们正处在立法选举前几个月的紧张准备阶段。政府似乎不考虑其它事情，某些决定、演讲、旅行和政治任命只有放在紧锣密鼓的竞选运动中，人们才会明白它们的真实意图。而为唯一政党效劳的权力垄断仍然是绝对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未来的竞选不再象过去那样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政府通过内务部认定'督促投票委员会'的爱国活动为非法。即使在萨拉查时代也未发生过类似事件。禁止竞选委员会在某些地区进行活动，因为这些委员会显示了反对派的力量。选民登记工作拖拖拉拉，而且注定要归于失败。事实上，人们全然不知道这项工作是由什么人和怎样进行的。在一个被认为是缺乏政治气氛，没有公民意识教育和四十多年来没有进行过一次严肃选举的国度里，要使选民登记获得成功，显然要以事实来使人们相信：政治气候已经改变，选民登记工作或许有些实际用途。否则，就不可能搞好选民登记。很多人仍有理由心怀疑惧，

害怕填写表格这一简单的要求会成为"毕得"更新档案的间接方式。当权者现在不需要，过去也从不需要这项工作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①

再有：

"许多民主派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即刻就宣扬干脆放弃选举，因为确信葡萄牙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事实的确如此！

"宣言签署人虽然承认这一系列理由，但是并没有与他们的志同道合者一样按这种方式进行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弃权是一种很容易采取的态度，尽管在原则上讲这种态度合乎逻辑，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建设性的态度。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民主派人士不能也不应该放弃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而应利用一切机会来这样做。"文件最后写道：

"宣言签名者全都是社会民主派，他们呼吁反对派的同仁在所有的不同阶层组成竞选委员会，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如何，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广泛的协调的民主阵线。

"在理论问题上，如果反对派把彼此的分歧抛在一边，就可能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广泛的爱国联盟找到共同立场，而这代表着坚实的、相互谅解的基础。"

1969 年 5 月社会党散发的这份文件与同年 6 月 15 日在圣彼得·穆埃尔举行的大会上由各反对派通过的共同纲领的观点大致相同。这次大会是由瓦斯科·费尔南德斯(全国宣言的签署人之一)主持召开的。反对派以联合竞选为基础，要达成一致是比较容易的。这一立场是：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抛弃国社主义；加速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公平分享国民收入；在保护劳工阶级的基础上确立进步的社会改革计划；在承认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全

① 引自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政治文集》第 229 页。

国讨论有关海外领地问题；同联合国进行真诚的合作，采取对东方集团开放和保卫和平的政策等等。比较困难的是在竞选委员会内保持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必要的协调机制。

圣彼得·穆埃尔大会是如何召开的？它又是用什么办法来确定与会代表的呢？在各个地区，不同倾向的民主派人士自发地组成了竞选委员会，并推出参加各地区代表大会的代表，有时是通过投票来挑选代表的（请注意，并不总是通过投票）。大会在累里亚地区召开，因为它不仅是全国的中心地区，而且因为那里的竞选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好。

经过基层和上层的多次讨论，有关竞选委员会的组成仍有问题，即：是给基层挑选自己代表的权力呢，还是由上层讨论决定，或者由不同的集团或团体的政治参谋部来商讨决定？对此议论很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姑且不谈）。由于经常处理不当，随之也产生了许多蓄意制造的混乱。

显然，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派都不会反对基层最大限度地参与选择自己代表的过程。遵循“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由官僚机构作出决定，因为他们说自己代表群众。社会党维护党派“非集中化论”，并认为各种派别，即便是少数，也应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出于这种理由，它也将这样作。

但是，在葡萄牙选举前的三、四个月中，问题并不在此。问题不是理论而是实践，简单说来，就是挑选“竞选委员会”，并通过他们来确定议员候选人的问题。

如果葡萄牙象任何民主国家那样也有政党或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话，问题本可以通过有关政党的协议得到解决。但是除了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葡萄牙社会行动和社会民主中心（后两个组织是政治团体而非政党）之外，葡萄牙当时根本不存

在有组织的政党，有的只是众多的、分散的天主教徒和青年。这些年轻人好斗、充满热情，围绕着有声望和活动能力或大或小的人（这些人并无明显的党派倾向）形成一些小集团。加之各地区的特殊情况十分突出，困难显然是很大的。如何找到一个平衡各种不同派别的方法呢？在所有党派都处于非法地位的情况下，要衡量它们在政治上的比重和重要性是不可能的。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吗？谁来召开？什么人参加呢？在警察镇压的威胁下，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召开大会来讨论这些基本问题。某些地区（如事实证明的那样）使用这种方法也许会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但就其本身而言，和民主毫不相干。基层之所以觉得这样作使它们的意见得到更多更好的表达，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召开了几次一小撮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吗？当然不是。因为在这样的会上，听到的只是蛊惑人心的高谈阔论，而不能有效地积极参与（除少数例外）或者是一些有辱博士称号的博士们谴责另一些“博士”，以及“博士们”之间的交易。因此，里斯本“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就“民主竞选委员会”的“原则理论”而发表的“向民主派人士的申明”未得到应有的反应。而申明中所表达的立场是正确的也是严肃的。“目无领导的基层主义”“天真的自发论”和“空想革命”当时搅合在一起，以致在选举之后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如明智的当事人索托马约尔·卡尔迪亚承认的那样。

这里有必要谈谈由政府专门机构所散布的所谓反对派的“分裂”和“分歧”。许多“极端分子”虽然无意识地参与了这些活动（有些是出于善意），但其过激和宗派性的态度却为反动派壮了声威。例如，人们还记得《世界生活杂志》那次旨在突出反对派“不同政见”的运动吧？结果是几乎所有为该杂志工作的独立记者都被“清洗”。一次针对我本人的活动又是为谁服务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只需看看它为谁所利用就明白了……。

但是，除了里斯本、波尔图和布腊加三个地区外，反对派在全国仍然达成了谅解，并拟定了由不同派别人士组成的统一的名单。而在上述三个政治生活频繁的地区，却出现了两个反对派选举名单：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CEUD）和民主竞选委员会（CDE或CED）的名单。民众根本无法理解和区别这两个缩写代表什么。答案很简单：它们是反对派中两个有分歧的团体；一方是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另一方是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民主竞选委员会）。但是，鉴于在葡萄牙所有的政治团体都不得不在隐蔽状态下生活，它们从来没有能使公众清楚地了解它们。由于纲领是联合提出的，所以惊人地相似，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仅仅是凭感觉，或者是凭友谊或时机，决定站在这一方或另一方，有时甚至发生在两份选民名单上签字的事情（两份名单都是反对派的）。

而在全国其他地区事态的发展却又不同，仅仅提出了“民主竞选委员会”的名单。这样，尽管在省一级的“民主竞选委员会”名单上，社会党人的比例占大多数，但所有的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共产党人、自由的共和党人和没有确定思想立场的反法西斯人士都共同参加了竞选。把全国范围内的“民主竞选委员会”的名单同里斯本或布腊加的“民主竞选委员会”的名单，或波尔图“反对派民主委员会”的名单等同看待是错误的，即使这种混同一再发生。这三个地区提出的名单有其非常特殊的地方，彼此之间差别也很大，把他们混同一谈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一个精心编织的圈套。政府为了削弱“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它的主要对手），怀着险恶的用心使用甚至是滥用它的简称。民众缺乏信息，很容易上当受骗。看起来这好象是个无足轻重的术语问题，而实际上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特别是里斯本地区委员会！

上述三个地区里反对派分裂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由于各持己见，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显然都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现就我所知谈一下：如果当时有更多的时间，本来是可以弄清彼此一致的和有分歧的观点，找到共同的立场，象广大的民主派人士所希望的那样，提出一个各界反对派的名单。政府施加的压力迫使反对派在最后一刻未能达成一致，特别是在里斯本。这种压力使反对派不得不仓促应付来自外部的重重困难。这里还要说一下某些“争论者”毫不退让的态度，他们同里斯本的“民主竞选委员会”结成一伙，把自己本来微不足道的反法西斯历史吹得天花乱坠。

在消息闭塞的公众眼中，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扮演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因为在全国到处使用的民主竞选委员会的缩写造成了混乱，使人们以为它代表着“整个反对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里斯本民主竞选委员会与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就该问题交换的信件所充分表明的那样。直到最后，里斯本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仍不知疲倦地提出妥协方案，而这一方案代表了渴望团结的民主派大众的态度。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认为，团结必须建立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对分歧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它是共处的正常现实”。团结也应该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这包括在相互尊重的条件下进行的辩论”。否则，按民主竞选委员会领导人对民主团结的理解，必然导致象唯一政党——全国联盟——那样的所谓团结。在全国联盟里，是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否则就是分裂主义。这就是分歧的根本原因，至少在里斯本是这样。由于同样的原因，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被当作“异教”对待，它的所有和解的建议均被拒绝。最后，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和民主竞选委员会只好服从团结委员会的裁决，为里斯本找到了组成唯一名单的方法（民主竞选委员会挑选 6 名，民主团结竞选委

员会挑选5名，独立人士1名，由上述委员会提出)。尽管对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不利，它仍然接受了这一裁决。民主竞选委员会于是决定按既定政策走下去，象波尔图的“反对派民主委员会”和布腊加的民主竞选委员会那样，提交了文人政府的名单。人们还记得，当时政府确定10月26日举行“选举”，10月初开始竞选宣传运动。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目的是在正式提交候选人名单之前，即在组织工作的关键时刻，利用人们到各处休假来为组织工作制造困难。

众所周知，1969年6月15日在圣彼得·穆埃尔召开了会议。尽管当时存在很多困难，尤其是在波尔图及北部的某些地区，但仍然形成了共同的立场。在当时，团结起来(尽管很困难)还是有可能的。政府的“苏格兰蒸气浴”战略① 在反对派中造成了犹豫动摇。论战在7、8、9三个月逐步升级。在许多临时召开的乱哄哄的会议上通过的旨在孤立社会党的所有动议事实上收效甚微。反动派惯于在反对派各阶层人士之间玩弄制造分歧的把戏。政府机器凭借对新闻报导的限制，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有利可图的赌博中。时而以直接的方式，通过戴着“极端革命者”面具的挑拨分子，但更经常的是以间接方式，通过其控制的新闻报刊散布流言蜚语。新闻检查有时允许公布某些消息，透露内幕，仅仅是因为它知道这将会激起反对派间的对立，为旨在团结的协商制造困难。例如：1969年6月我参加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11届大会和在会上的发言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尽管发言激烈地批评了当局，但是出人意料地得以在葡萄牙报纸上发表。另一个例子是：在《世纪》报上的一条莫名奇妙的消息，它“无意间”提到全国联盟领导人梅洛·卡斯特洛“已在社会运

① 作者拟在《里斯本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后被新闻检查取消。

动中找到一名代理”。是谁？目的是什么？具体处理什么事情？对所有这些却只字不提。谣言代替了确切的消息，在到处流传……新闻检查对此“疏忽”了，既不澄清也不解释。这对于各反对派之间的不信任和分歧来说恰恰是火上浇油。

但是，在反对派处于分裂的那三个地区里，并未产生政府所期望的结果。尽管在竞选之前就有个人的和政治上的倾轧，但是“互为对手”的反对派并未冲突起来，而且还在某些方面进行了补救工作。政府拥有认定反对派的某些候选人“不宜竞选”的特殊权力，所以当里斯本民主竞选委员会的一名候选人费尔米诺·马尔丁斯被否决时，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决定，只要上述候选人未被替换，就不开始自己的宣传工作。他们以明确的方式为选举运动制定了方针，即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里斯本民主竞选委员会在开始竞选宣传 工作后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亲自出席并在讲话中强调了会议主席佩雷拉·莫拉发表的宣言。马里奥·卡尔迪亚、戈劳利亚·马雷罗斯以及君主式的领袖恩里克·路阿斯也出席了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的首次记者招待会。

在竞选运动中有些工作是共同做的，如竞选手册的印制工作（很迟缓且昂贵）。我们只找到了几个大厅用于开宣传大会，所以两派候选人只好分着使用。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派人布置了里斯本的瓦斯科·桑塔纳剧场，大厅上方悬挂着“社会主义和自由”的横幅。民主竞选委员会也在这个剧场召开宣传大会，又如《里斯本日报》组织了圆桌会议，各方候选人还以共同点为基础发表了宣言。在所有的地方，基层团结得象兄弟一般，投入了一场有共同的目的，针对一个共同对手的战斗！

考虑到这一切，某些民主派人士认为反对派有两份候选人名单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这不是一次“严肃的竞选”，所以选

票的分散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反对派阵营的分裂，或者说反对派未能适时地克服分歧（他们认为分歧是自然的），其结果是不能很好地动员群众，并产生一种普遍的极有破坏性的影响，因为民众的团结是个具有巨大能量的放大器。弃权票比例高无疑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就是缺乏团结。里斯本 51.9%弃权，整个葡萄牙本土 42.5%弃权①。

要把全国在竞选运动中发生的反常事件以及反对派和政府——全国联盟所提名单的不公平情况一一罗列出来，也许要写一本厚厚的书才行。

一个常设的组织机构（全国联盟），在选举前一年就由政府指挥更换了干部，它拥有政府提供的一切便利，并且不断得到间接的帮助（公众的钱财）。而与之抗衡的反对派，在组织上毫无准备，而且还要面对警察的不断镇压，在新闻方面，还受到严厉的、超级的检查。面对这种令人愤慨的不平等，反对派不得不在竞选活动开始前两个月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而他们对选民的情况并不了解。只是到了最后一刻，即选举日的前一周才完成了选民表的艰难的印制任务。而正确的作法应当是由官方选民登记部门提前向参加竞选的各个派别提供选民名单。

另一方面，根据极为奇特的现行选举法，选票应由竞选人自己负责印制，而在很多地区又无法弄到统一规格的纸张，这使人很容易从外表区别反对派和唯一政党的选票，这对选民具有恐吓的效果。除此之外，选举法还规定，选票不能在选举会议上交给选民，这无疑为向选民分发选票制造了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对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省份来说是这样。

这些规定给反对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由于不了解情

① 见《1969 年 10 月的竞选》一书。

况，缺少必要的手段和时间，以及无法克服的组织缺陷，反对派候选人不可能同选民进行深入的接触。许多选民甚至未能得到反对派的选票，所以无法投他们中意的候选人的票。然而，全国联盟的选票却通过邮局（而邮局蓄意拖延反对派的邮件），或者由便衣警察挨门挨户地提前送到选民手中。一切都取决于当地的民政长官，而他们又是由内务部长任命的。选民登记的不完备（上面已经谈过），也说明了为什么葡萄牙选民大部分是由公务员、军人、警察、神职人员和有地位的人士组成的，而几乎没有劳工阶层、小商贩和被认为是最能代表国家生命力的那部分人。在选民登记册上没有知名人士、业主、商人、作家、手工业工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已居住了很长时间）的名字，由于他们众所周知的反法西斯立场，因此被禁止投票。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女记者曼努埃拉·阿泽维多（著名作家，在《新闻日报》工作多年）。尽管她具备一切合法的条件，但却被认为是没有选举权的公民。她想把自己的例子公布于众，但新闻检查的直接干预阻止了她。

另一点使反对派处于明显不平等地位的是，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对选举法实行监督，因为监察人员必须证明自己是在相应的选区里进行过登记的选民。鉴于全国到处都笼罩着恐惧的气氛，这一表面上看起来无关宏旨的情况实际上阻碍了在小居民点实施监督工作，因为在那里警察的各种压力和经济报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请注意，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里斯本弃权率竟高达 51.9%，而在广大的农村，有的地方投票率却达 90%以上。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在大城市才有监督。

在全国，随着反对派竞选活动的发展，警察的压力也在加强，并带有明显的恐吓性质，以打消民众的热情。里斯本民主竞选委员会总部受到袭击，袭击者如果不是警察本身，也是明显受到警察保护的人员。在两个反对派竞选宣传大会的出口，“毕

得”的便衣组成了人墙，极力对听众进行恫吓并制造混乱。在里斯本“瓦斯科·桑塔纳剧场”举行的一次民主团结竞选会议的出口，作家、贝雅地区反对派的候选人乌尔巴诺·罗得里格斯遭受了便衣警察的殴打。我的妻子是桑塔伦市民主竞选委员会的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被传到“毕得”，长时间盘问她有关她在桑塔伦市所作的竞选演说意味着什么。直到我决定致电内阁总理表示抗议并呼吁他亲自干预时，对她的罪恶恐吓才算停止。

警察曾当着葡萄牙和外国记者的面中断了记者招待会。由于招待会主持人若泽·戈迪纽的镇定，招待会才得以进行下去，他拒绝向蛮横的警察屈服。然而新闻检查删去了有关招待会报导的大部分内容，只有少数阅读外国报纸的人才看到全部讲话。

里斯本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发布的第二号竞选公报载有几份纲领性文件，在印刷厂门前全数36000份都被警察没收，再未归还。里斯本民主竞选委员会的文件也同样被没收了，只是在佩雷拉·莫拉和林德累·辛德拉二位教授要求卡埃塔诺干预时干预，数天之后才被发还。

要找到适当的会场（如：学校的体育馆、体育场、健身房和其他正式厅堂）有很多困难，因为公共集会场所均被禁止向我们开放。而在宣传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也被新闻检查有系统地删剪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对群众的鼓动作用。这样，反对派的宣传大会只得在各处偶尔找到的厅堂内召开。这些厅堂的面积一般很小，不能引起公众的反响。而新闻检查又蓄意破坏报纸的有关报导。

警察没收了很多在这期间出版的有关竞选活动的书，严重地阻碍了作者的言论自由，例如：里斯本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候选人弗朗西斯科·泽尼亚和杜阿尔特·维塔尔的著作《法制与警察》（尽管这是一份提交给1969年5月召开的阿维罗地区共

和党大会的报告）；里斯本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的候选人拉乌尔·雷高的《政治日记》；若泽·戈迪纽的《讲清楚》和《政治文集》等。为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印制宣传材料的印刷厂得到通知说，如果它继续印刷《文人政府近期无望》一文，它有可能被封闭，而且机器被没收。

志愿分发反对派竞选宣传材料的青年们，特别是张贴标语的人不断与警察发生冲突，因为所有宣传材料必须事先得到当地民政长官的批准。标语及其他的宣传材料常常被毁坏，分发材料的人被逮捕，并在警察局受到拷打。在不足一个月的竞选运动中，我方就警察的暴行不断提出抗议。

新闻检查利用种种限制造成了沉默的黑幕。为了冲破这一黑幕，我向全国联盟领导人梅洛·卡斯特洛提出在电视上面对面地辩论。并建议，如果他同意，把辩论扩大到里斯本民主竞选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和另一名独立保皇党代表之间。我为此寄给他的信[1] 被新闻检查删得体无完肤。于是我直接向梅洛·卡斯特洛发出呼吁：

"昨天，我向报界发出了一封给阁下的公开信，建议在电视上举行一次面对面的辩论。使我惊骇的是信全被新闻检查砍掉了，因此我猜想即使是阁下也收不到这封信。

"几天前，在里斯本日报组织的圆桌会议上（受到邀请的全国联盟代表未出席），新闻检查甚至随心所欲地篡改我的讲话。新闻检查还砍掉了寄给《里斯本日报》的《有关的评论》一文。我寄给新闻旅游国务秘书先生的申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里斯本地区的众议员候选人，请问阁下：这是什么样的竞选？我们偏离阁下和内阁总理最初所宣布

① 这封公开信已经收入《1969年的竞选》一书。

的意图有多么远啊!"

这一呼吁的积极成果是,公开信终于在日报上发表了。但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面对面的辩论没有被批准。全国联盟和遵循萨拉查主义的卡埃塔诺政府—这一传统已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再一次表明他们对对话是十分敏感的。

在政府给民主派候选人设置的重重障碍之中有必要提到各公共服务部门制造的困难,特别是邮局和电话局。当然,有关这方面的申诉从来没有回音。如同我已经提到过的,邮局蓄意拖延我们通知边远地区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参加集会的信件,邮局总是在预定开会日期的第二天才投递。为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的竞选活动安装一部电话这样简单的事也变得极为困难,需要复杂的交涉和施展各种手段。电话装上之后,通话意外中断是经常的,要和里斯本以外的地区通话就更加困难。我们必须把这一十分重要的不利条件作为竞选运动中的一个常数来考虑!

除了这些具体的困难之外,有必要谈到在整个竞选运动过程中,选民普遍受到恫吓。运动开始之前,武装部队参谋长在电视讲话中阴森森地警告全国,如果他认为必要,军队将干预这一政治进程。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讲话,使人联想起在由萨拉查组织的竞选运动中,桑托斯·科塔将军讲话的腔调。竞选运动一开始,政府首脑就 把国家置于三种虚假的抉择面前,即:如果投票使民主反对派获胜,将会天下大乱,经济失调并"丢失海外领地"。这一幽灵一直盘旋在选民的头上。政府方面的很多较有份量的讲话也是同一个调子,如内政部长和武装部队的一些代表人物。马塞洛·卡埃塔诺在最后一次电话讲话(竞选运动已结束)中振振有辞地说:"选民们不要搞错了!你们将以自己的选票来决定和平或者迟早发生内战。"

反对派如果获胜,谁将挑起内战呢?在讹诈和恫吓方面还能

走多远呢？

面对这一切，人们不禁要问：反对派参加这么令人厌恶的“竞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一问题使很多正直的民主派人士得出结论并宣布：反对派参加竞选仅仅有利于“政府玩弄的把戏”，以便在外国人面前获得它从未获得过的合法性。

这一问题的答案自然来自参加竞选所获得的结果。正象一开始所说的，反对派参加竞选不是为了取胜，根据葡萄牙的政治环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反对派的竞选运动不是象其他任何严肃的选举那样，是为了“赢得选票”，而是为了揭露竞选之中的舞弊，并尽快使民众在政治上觉醒。在这方面，竞选运动有其明显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反对派虽没有赢得选举，但赢得了竞选运动！政府被迫全线撤退，它的许多蛊惑人心的东西被批得体无完肤，面子扫地。

反对派尽管受到各种阻力，但仍有效地澄清了许多政治问题。多年以来(自 1968 年提名翁伯托·德尔加多为候选人)，广大人民群众第一次获得积极参加政治竞选的机会，给他们以巨大的推动和力量。反对派或迟或早将从中得到收获。

反对派利用竞选运动带来的好处后，不是可以象某些民主派人士想的那样，在最后一刻退出竞选吗？

一旦竞选运动开始，在投票箱前弃权(象萨拉查时代屡次发生的那样)总是令人沮丧的。在萨拉查式的所有竞选丑剧中，唯一达到加强民众斗争精神的是翁伯托·德尔加多参加的那次竞选运动。它是少数几次进行到底的竞选运动。民众从中得到的是明显被人抢劫的感觉。这种从痛苦的经历产生的感觉是如此普遍而深切，以至官方的任何宣传都毫无效果！民主只有通过实践和充满挫折和成功的活动才能取得。而弃权行动除了导致深深的沮丧之外，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在“选举”前夕，一位记者问我：“此次不放弃选举对吗?”并说：“这一立场不是同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对竞选运动所做的批评相抵触吗?”我回答说：“这仅是表面现象，就象我们经常说的那样，反对派参加竞选运动的根本意图是揭露与抗议，尽管我们知道从选民登记到宣传及组织条件不公平，在散发名单、实施监督和选票计数上缺少切实的保障。这是一次竞选丑剧，必须把这种揭露进行到底，直至得出最后的结果。”

“基于选举是丑剧，仅仅为政府的合法化服务，一部分反对派赞成放弃竞选，对于这种立场您是怎样考虑的?”

我想针对选举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事实表明这一切都是在欺骗和腐蚀民众的意志。但是在政治上，弃权没有好处。这是一种没有实际效果的原则态度。民主反对派进行的运动给这个富饶的国家以冲击，意识形态上广泛的耕种必将产生成果。鉴于竞争的条件，反对派无法赢得竞选是很明显的，但它却赢得了竞选运动!我要说的是：在国人面前它验证了自己处理和解决那些困扰全国的问题的能力及它高度的责任感。不可否认，葡萄牙人民渴望一种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经济上的变革，并要求这种变革朝着民主方向发展。不到20天的受到新闻检查严格控制的竞选运动，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难道那些报社的领导人现在还没有感到有义务向政府呼吁制定一部新闻法吗?尽管选民的觉悟不高，但仍可以说“合法”的陈词滥调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对谁合法?对国内舆论吗?显然不是。因为竞选运动比默默地弃权更能使国内舆论清醒。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界吗?谁不知道他们仅仅相信那些对他们有用的事情呢?下星期日的选举是对马塞洛·卡埃塔诺政府的一次考验，一次对当局实行自由化能力或可能性的否定性的考验。政府的胜利越是轰轰烈烈，就越糟糕……当然胜利是带引号的!

事实上，在1969年的“竞选”中，马塞洛·卡埃塔诺获得了百分之百的“胜利”，就象过去40年在萨拉查独裁时代一再发生的那样。反对派未能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一个席位。所有130名众议员都是从唯一政党的名单中选出来的。这次“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在所有公正的观察家眼中，变得十分可疑。当局中的某些“自由派人士”原本就喜欢政府在某些方面“战胜反对派”。这大概是保持体面的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但是强硬的独裁制度连这种把戏都不能容忍。使这些胆小如鼠的人聊以自慰的是一切都同美好的萨拉查旧时代一样。马塞洛·卡埃塔诺在1949年诺顿·马托斯竞选时是全国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在1958年翁伯托·德尔加多竞选时又是内阁部长，对这一点是太清楚了！

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反政府情绪在短短的竞选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1969年短短的竞选没有获得任何有切实意义的结果，因为它们仅仅代表了从萨拉查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老一套，所有反对派都有正当的理由对此进行谴责……。

所有公正的观察家都认为，葡萄牙人民已对专制政权感到厌恶。经过45年的痛苦之后，人民不明白国家的状况和人民的生活为什么仍是那么悲惨(对此就连那些专制政权的宣传家也承认)。那么牺牲自由到底为了什么？人民不愿继续受到“监护”，好象他们是先天没有能力自由生活的人。是什么原因使葡萄牙人民不能享受西欧那种标准的民主呢？在这方面，旅游和移民是使人民觉悟的两个常见的和极其重要的因素。葡萄牙虽然免受战争之苦，但是从一场可怕的破坏性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民主社会却得到惊人的发展，为萨拉查主义的老论点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具有高度腐蚀性的例子。面对欧洲发生的事情，谁还敢宣称民主、多党体制和自由工会制是人民不幸的最大缘由呢？

另一方面，被迫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悲惨生活之中的广大葡萄牙民众开始感到愤怒。“传统”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越来越变得难以忍受。电视台不顾新闻检查的反对还是把在葡萄牙不可能有的繁荣景象向各地播放了，为强调这一不可抗拒的事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移民增长的原因。移民迫使人们向阻止进步的传统结构和自己的思想习惯提出质疑。在葡萄牙，劳工阶级的生活条件为什么如此悲惨和屈辱？葡萄牙人为什么不能象西欧一样享受政治自由？这些问题再也无法瞒过广大民众的眼睛，并直接把葡萄牙制度的价值置于争论之中。一个制度只有能用自己获得的结果来加以衡量。这些结果是看得见的，而且基本上是消极的。花言巧语的演说和宣传都不可能掩盖这一明显事实。

在竞选运动期间，尽管有各种限制，但事实到处在说话。多年来，这些事实被埋在心灵的深处。这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权者和他们强加于国家的政策要为国家的衰败处境负责。朝令夕改，昨天还热情维护并从中取得个人利益的政策，今天就会受到自己的谴责。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无耻而且缺乏责任感。试问谁还能信任这些人呢？谁相信这些旧时代的人物能够使国家沿着必要的改革道路前进呢？

在“竞选”期间，局势越困难，当局就越是被迫采取顽固的防守态度。唯一政党的主角们，从其最高头目算起，感到有必要同讨厌的萨拉查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抹去那些明显的特征。不再提“新政”，而开始谈论“社会国家”；改变唯一政党的名字（不再叫“全国联盟”，而改称“全国人民行动党”）；为了使人们忘记“毕得”，把它称为“安全总局”；所有这些还能有其他的含意吗？在1969年的“竞选”中，当政的人们第一次没有象在以前的选举中那样组成“方阵”，集体捍卫萨拉查主义。不少人违心地试图用隔

板把自己与过去隔开，好象他们对此没有很大的责任！能向人民承认这一体制已经破产了吗？

严格的讲，全国联盟的宣传家们1969年的战术是“改头换面”，把自己打扮成制定新政策的新人（呜呼！）。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属于旧时代的，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把他们看作是萨拉查主义政策——暴力、专横和腐败——的代表。是否有必要提一提坦雷罗、卡萨尔·里贝洛、弗朗哥·诺格拉的典型事例呢？在政府方面，正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万金油式的公职人员或对自己的作用都没有把握的技术官员，给竞选运动定了调子，为竞选运动制定了糟糕的政策。

“全国联盟”能为葡萄牙的政策指出新方向吗？即使某些领导人有能力勾画出这种新政策（无法得到批准），唯一政党中传统的反动派也不会让它得到执行。因此，政府的竞选运动只有两个单调的题目可谈：马塞洛·卡埃塔诺——开明的新“救世主”的神话，好象立法选举的主要问题是内阁总理而不是130位待选的议员；另一个题目是批评所谓的“放弃海外领地”（诋毁反对派捍卫的立场），以煽起有利于政府的民族“沙文主义”（在政治上所知甚少的民众当中，总是非常容易唤起这种“沙文主义”的）。事实上，这两个题目只是被用于掩盖国家遇到的巨大困难和领导阶层的犹豫不决（它因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经瘫痪）的幌子而已。

全国联盟一直拒绝同反对派进行直接对话。它没有能力提出一项严谨的、连贯性的政策来反驳反对派击中要害的批评。“当权者”深深地陷入分裂，其领导人的无能已得到证实。政府由于缺乏论据，只能用谩骂、含沙射影和威胁来代替。

反对派候选人提出的批评基本针对三个方面：1. 为公众重获自由而奋斗（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有权组织合法政党的自由、

集会自由、反恐吓和向贫穷开战的自由以及组织工会的自由)；2.为创造加速国家经济发展和尽快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的条件而奋斗(除了其他事情以外，这迁涉到摧毁国社体系，维护劳工阶级利益的计划经济，公平分配国家收入和农业改革)；3.为结束海外战争并立即开始非殖民化进程的政治解决而奋斗。除了这些之外，还批评政府在教育、社会保险、救济、就业、司法、住房、公共管理、地区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政策。提出问题的范围和种类是我们重点关心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对现存的问题提出批评，也力图提出可能实现的解决办法。反对派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感使它采取了清醒的措施，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就使全国联盟的宣传人员晕头转向。

"新政"的要人们在过去的40年中是否捍卫了独裁政治呢？根本没有！他们力图把所有失败的责任都推卸到萨拉查身上。以前他们否认这种失败，而面对国家所处的悲惨局势现在不得不承认这种失败。他们的唯一论点就是用所谓爱国主义的讹诈和一贯的威胁，把即使是萨拉查殖民政策的温和的批评者说成是"祖国的叛徒"。政府就是以这种方法试图利用部分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感情。

面对这一讹诈，一些民主派人士认为反对派(几乎是毫无分歧地宣布自己为反殖民主义者)陷进了政府为他们设置的陷阱：把争论从政府难以找到论据的内政方面转移到危险的殖民政策方面。因为不少民主派选民在这一问题上或是因为害怕或是缺乏信息，或是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而采取了中立的立场。

我不认为他们的论点有什么道理。恰恰相反！我认为，1969年竞选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打破了"海外政策不容讨论"的禁区。问题已以各种方式摆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这代表了一个不可

逆转的、对未来极为重要的胜利。在葡萄牙，这是一场人民殖民战争吗？我相信不是。仅仅就这一点，政府尽管用强制手段以欺骗民众，但是，从不敢冒险就其殖民政策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即便这样，全国的有识之士也应该利用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来进行必要的宣传工作。一项负责的政策的声誉就在于此，而不是跟着暂时的多数后面跑。在政治上，诚实的试金石就是向人民说真话，即使这一事实眼前还不得人心或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总之，就是对基本的意识形态的选择保持忠诚。

从这一意义上讲，1969 年的竞选运动将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反对派履行了它的义务：正面揭露了马塞洛·卡埃塔诺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他只不过是坚定不移地忠实地追随了萨拉查的政策），并试图找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这一长期冲突的办法。这一政策牺牲了全国最好的青年，并阻碍着国家的民主变革的进程。从近期看，反对派这样作也许有助于政府的计划，而把自己的侧翼暴露在迫害、威胁和各种各样的恐吓行动之下。政府肆无忌惮地利用很多葡萄牙人善良的愿望，把反对派人士说成是“放弃政策”的追随者，甚至是“祖国的叛徒”。未来将告诉人们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勇气、胆识和清白究竟在哪一方。未来将告诉人们是谁在无可救药地连累祖国的前途，一点一点地把她出卖给国际债权人，否定了在与其他民族人民的接触中的宽仁传统和进取传统。而这正是葡萄牙最好的遗产！

由多种意识形态组成的反对派能采取坚定的、一致的立场标志着葡萄牙政治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也为葡萄牙给世界一个新的形象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为未来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意识上的播种。仅仅为了这一点，不论其直接和间接效果如何，参加竞选运动都是值得的。

在竞选运动前夕，政府把社会党国际的一个代表团驱逐出葡萄牙领土。代表团是由该组织的总书记汉斯·雅尼切克率领的，有英国、意大利、瑞士和爱尔兰社会党的代表。采取这一罕见措施的借口是社会党代表团的访问是外国势力对葡萄牙内部事务粗暴的和不可容忍的干涉。而据刊登在经过新闻检查的报纸上的官方评论说，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是"应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候选人之邀来葡萄牙监督即将举行的选举的"。

这一借口是虚假的。国际代表来葡萄牙不是应任何人的邀请，而是他们自己的主动行动。选举发生在老独裁者下台之后，政府又一再保证将与以前萨拉查式的选举闹剧不同，这将是一次自由竞选。因此很自然，欧洲负责任的舆论界（政党运动和工会）想要证实一下这是否是事实。在现今世界，国际相互依存和国际声援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这种关注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显然这种关注不是什么横加干涉，而恰恰相反，是使被关注者感到荣幸的事情。这种情况意谓着欧洲的社会党人很快 相信了卡埃塔诺的声明和许诺是真诚的。

再有，这是葡萄牙社会党第一次以社会党的名义参加竞选，并以"自由社会主义"的口号领导整个竞选运动。欧洲社会党高级领导同志作为观察员或葡萄牙问题研究人员的访问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政府应当是无关的。众所周知，政府从未对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提出过任何异议。

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政府利用这一借口攻击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向国外求救。对于任何一个稍有政治常识和知道葡萄牙政府常常从国际反动势力那里得到声援的人来说，这一荒唐的借口不仅没有任何严肃的基础，甚至于是可笑的。如果政府以为得到了对付反对派的"王牌"，那对政府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马塞洛·卡埃塔诺在竞选运动结束的演说中（反对派无法就

该演说进行答辩)提到了上述问题，暗示说里斯本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的候选人，特别是我，在同外国人磋商反对葡萄牙的阴谋。又是在所谓爱国问题上进行讹诈！那篇演说是卑鄙无耻的中伤，是没有水平的庸俗政治家玩弄的花招。一般说来，一位内阁总理不应该把自己降到这种地步。

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的候选人立刻作出反应，联名打电报提出抗议并澄清事实。但是，竞选活动结束两天之后，真相才得以恢复。政府在一份公报中仅仅提到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抗议电的部分内容。政治上影响已经产生，大家明白对此再也无法挽救了。

正如所料，这轮选举之后，沉默的厚幕又重重地降落在葡萄牙社会上。卡埃塔诺就象过去的萨拉查一样，以各种调门庆祝他的“胜利”。他想说服谁呢？有觉悟的人谁会相信呢？这就是所有独裁者的悲剧：随着对手被消灭，个人权力的巩固，他们就更加孤立，更加成为自己创建的体制的囚徒。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吹捧和谄媚的合唱……

独裁制度的逻辑是无情的，暴力对他们来说是必须的和固有的。“选举”之后三个月，镇压就开始了。社会党员是首批牺牲品；里斯本民主团结竞选委员会的候选人佛朗西斯科·泽尼亚和贾伊梅·加马被捕后受到起诉，而拉乌尔·雷戈则被软禁在家里，只有那些根本不明白竞选程序的人才对暴力“偏爱的目标”感到吃惊！

卡埃塔诺分子“自由化”的实验以竞选骗局结束。对政府胜利的喧闹的回答，象往常一样，是全国的沉默。反对派候选人在最后文件中对竞选活动的意义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新闻检查下的报纸已经根本不可能刊登了。反对派竞选总部被关闭。在合

法范围内进行抵抗的设想迅速被警察野蛮的干涉所打破。

就漫长黑暗的萨拉查旧时代而言，反对派可以说不输不赢：如果不是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话，也仍然是被堵住嘴，被认为是非法的存在。这个国家失去的已经足够多了，而现在又一次失去了机会！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得不到解决，而顽固的萨拉查主义一点一点地恢复了他们的权力，要到何时为止呢？

奇怪的是，马塞洛·卡埃塔诺的竞选“胜利”反而削弱了他政治活动的能力。如果不是从形式上，那么至少在本质上，他注定要重复萨拉查那一套。他的政策还能是什么别的吗？不过，这样作的好处是帮助全国大部分人驱散了对自由化的幻想。“政治之春”的蛊惑宣传没能开花而走上了歧途。

·15·
抉择时刻

“……我们沿着改革的方向前进，而且保证扯满风帆航行得更好。”

马塞洛·卡埃塔诺在1970年2月就任“全国人民行动党”主席的演说中是这样讲的。尽管这些话出人意料，但考虑到葡萄牙的现状，我们仍可把出自这位元老口中的话作为他为自己政策辩解的一次重要尝试。

当卡埃塔诺宣称自己有条件“更好地沿着改革方向前进”时，他指的是什么呢？他的话是很明白的，即通常所说的“社会民主”。据他所说，“在葡萄牙，这不是那些反对社会颠覆的人所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它的出现，对工人来讲，也不可能具有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国家曾有过的那种优点。”为什么呢？卡埃塔诺的解释似乎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在葡萄牙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资本主义”，“因为国社制国家正有效地运行着并且有能力实行社会党准备在自己的国家实行的那一套。”

这样，至少表面上，我们有了一个信仰改革的马塞洛·卡埃塔诺！用国社制这块老盾牌武装起来的卡埃塔诺现在突然要求进行紧急的改革了，其原因是很清楚的，因为他想赶在反对派前面，特别是反对派中他的头号敌人“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面。意味深长的是此事发生在横行40年的顽固的萨拉查主义即将完结

的时刻，而马塞洛·卡埃塔诺这40年中一直是“大官”。

卡埃塔诺一上台，就觉得有必要在葡萄牙的政治市场上穿得摩登一些，以便给人以美好的幻觉，即他有能力使自己代表的体制焕发青春。西班牙前情报部长弗拉加·伊利巴尔内也是这么作的。他在准备继承佛朗哥时，也发誓说自己信仰社会民主，当然这纯属形式。尽管两国的国情迥异，两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内心动机却是一样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卡埃塔诺很清楚国家所处的悲惨境地，这是40年的独裁体制造成的直接后果。他不会不知道葡萄牙绝大多数人特别渴望自由、经济进步和社会主义。他知道人们渴望过欧洲式的生活，渴望能够享有欧洲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水准，特别是代表着国家最有活力的青年！所以要宣扬新的改革风格(口头上的)！

在我们提到过的那篇演说里，卡埃塔诺承认“有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厌恶社会革命，但却以同情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的立场”。从中人们可以看出宣扬新风格的奥妙。从根本上讲，这部分人是国家的精英，也是卡埃塔诺十分需要的中层干部。他向他们发出呼吁并把自己说成是最适合捍卫“社会化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正象他匆匆表明的那样。呜呼，国将不国！只有通过采取彻底的改革才能挽救她。卡埃塔诺痛心疾首，手拍胸脯宣布同意！他问道：我已经掌权，谁能比我更好地实施改革，而又不发生严重磨擦呢？让我们看看他的政治建议的实质吧！对于很多人来说，建议里包括有诱人的许诺，即进行缓和的、无痛苦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这样一项以各种方式暗示的计划感动了国内许多人，尤其某些“进步的”天主教势力，至少是在短时间内……

由于未能履行诺言，最初的热情消失了，幻想的最后几点火星不可避免地熄灭了，随之而来的是反思。于是，人们开始提出

问题:即使马塞洛·卡埃塔诺真想进行改革,他是否有条件执行一项改革政策呢?他能得到支持、力量和有兴趣、有思想、有献身精神的人材吗?

《义不容辞》是一本收集了马塞洛·卡埃塔诺70年代公开演讲的书,他在首页写到:"政府赢得了选举并且赢得漂亮,其结果首先是确认改革政策和摒弃革命路线,其次是确认了我最初向全国提出的建议,即在连续性范围内的革新。"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指导思想,而维护一项能够动员渴望葡萄牙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力量来为现政权服务的改良政策。但是,我们想要知道,在未来三年里将要执行的那项改革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反复使用的"连续性范围内的革新"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只有悲天悯人的许愿、空洞的诺言和夸夸其谈。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言行不一的情况开始变得明显起来。但是,说到底,真正有力量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而不是计划。

至今为止,马塞洛·卡埃塔诺未能充分表现出他独立于拥戴他上台的那些力量,他是变革中的偶然产物。由于葡萄牙的局势十分复杂,政权内部的不同利益之间有着生死搏斗,内阁总理的行动路线在各种压力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下,不能不表现出巨大的起伏性。这也是他 的政策总是令人难以捉摸的根本原因!

卡埃塔诺没有证明他已经完全控制了把他拥上台的那些势力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与萨拉查不同,他还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仲裁者,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争端之上或之外。他似乎在对不同的政策(如果不是相反的话)进行试验,以便找到一个十分困难的平衡。为了稳固其政权,不得不接受必要的妥协。

为了安抚那些不安分的极端派同党,在1970年11月向国

民议会的报告中，这位内阁总理不得不就其宣扬的改革政策进行解释。他这么做是什么意图？看看他的讲话吧！

“在接管政府时，我就宣布在必要的改革面前我将毫不犹豫，我也是这样作的，改革那些需要改革的，改变那些需要改变的。在我认为必要的时候，采取我认为适合于国家的路线，但不是摧毁一切或进行天翻地覆的变革。我听到人们反复地问：目前采取的方针是按照连续性还是按照革新精神来确定的？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问题。国家生活要求有连续性，并且只有在连续性中才可能创造性地引入革新。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看。在连续性和革新之间无法进行选择，而只能是在连续性中确立革新的目标，即：我们继续是我们自己，但又不让自己僵化、衰老和落伍。”

引述内容的最后一部分是再明白不过了。这样根据卡埃塔诺表明的思想，重要的是“我们继续是我们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既不使自己僵化，又要保持现行体制的老样子。看，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他的“必要的改革”计划！因为将用“必要的手段”改革那些尚不完善的，请注意“尚不完善”这个词。人们不禁要问：说到底，那些“手段”能够解决全国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吗？这些问题是：自由发展、生活水平、现代化、海外领地和移民。国家的形势迫切需要改革。自上而下地改换某些磨损的齿轮零件，难道可以不改革那些陈旧的结构吗？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体制的问题吗？

这里有必要提一个更深远的问题：难道在经过卡埃塔诺“改革过”的政府里任职的官僚政客们或是为了和别的议员划清界线自称少数派的旧全国联盟的新议员们，竟会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这样一个改头换面的萨拉查主义纲领上吗？卡埃塔诺在继承独裁者的宝座时，曾宣称有必要实行一项改革政策，以应付

总理府中等待他处理的“堆积如山的工作”。为此,他得到了“信用卡”。难道国家期望于他的就是这样一个纲领吗？显然不是！面对最后幻想的不可避免的破灭,人们普遍感到沮丧和失望。一叶知秋。随着可悲的“政治秋天”的到来,幻想象枯叶一样纷纷飘下……

在任期的第三年,卡埃塔诺上台时的革新潜力似乎已经耗尽,国人普遍认为“自由化”政策在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实际上,这是有目共睹的。萨拉查政策的主线条全都令人沮丧地原封未动。变化是微小的,而且几乎总是表面上的。

在政治上,尽管他象萨拉查一样宣布不想当独裁者,但仍然是个人集权制。真正的民众参政的所有方式都被排除在国家生活之外。人民仅仅被召去为那些有组织的示威游行装装门面。只有一个头脑,而他的头脑借助共和国总统的“光”来为所有的人决策。但并不总是如此……人们注意到,在所有领域内都严重缺乏自由,警察的暴力行为和所谓司法警察的蛮横行为有时比萨拉查时代更加露骨。

在经济方面,国家正在慢慢地衰败。没有劳力,没有刺激。大部分人生活在真正的贫穷之中。因此人们背井离乡移居到欧洲各地,与此同时,财富却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他们拥有国家给予的特权,变成一群大小不等的鲨鱼。他们未受到丝毫触动！他们我行我素,完全不受限制地继续兴旺发达。如此迷人的“社会化国家”及卡埃塔诺“自由侧翼”的迷梦在一个没有真正的工会活动的国度里,只不过是黑色幽默式的讽刺。这里的保险、救济、劳动条件、教育和法律均处于令人悲哀的状态中……

在殖民地方面,继续执行着(或许不那么自信)与萨拉查时代相同的自杀性的、反对殖民地人民的、反对进步的、反对世界良知的政策。青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几代青年被牺牲了,国家

的资源也渐渐耗尽。有什么结果呢?没有人能够清醒地回答。人们显然在一项没有前途的政策下一天天混日子 。"坚持住"仍然是惯用的口号。国家陷入了一场没有尽头,没有希望的战争中,在国际范围内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因此,只有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南非联邦和庞大的国际资本主义。

卡埃塔诺在位三年的总结是:由于左右摇摆的政策,他总是进一步,停一停,再退一步,又停一停。事情就是这样令人压抑。至于一开始使某些人抱有的那种希望甚至变成了巨大的失望。他的"自由派"党徒们现在面临着抉择:要么沉默,要么转向反对派一边。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一个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弄清实验是否已经完全结束(象我猜测的那样!)或者是象人们不愿承认的那样,葡萄牙社会长期停滞有其自身的原因,它阻碍任何变化。在这两种假设中是哪一种呢?在某些负责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真理的时刻就要来临的感觉:卡埃塔诺使国家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时间将不会很久了。殖民地局势的演变尽管是表面上的,但在中期和短期内却是致命性矛盾的发生器。另一方面,欧洲在葡萄牙缺席的情况下,正在进行自我建设。考虑到英国将要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前景,情况就更加严重了。西班牙自己也在活动……看来重大抉择的时刻就要到了!

在葡萄牙,一直阻碍任何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是那场持续了漫长的11个年头的殖民战争。殖民地的局势和葡萄牙政权内部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基本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一个开放的民主政权是不会让一场象葡萄牙进行的殖民战争持续这么多年的;2.除非一方或另一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大可能),要解决这场战争就必须通过葡萄牙内部政治上的变化。

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是如此敏感。假使没有这场战争的话,许多人会有进行体制改革的愿望,而这场战争使人们的这种愿

望落空。从1961年起，萨拉查政权就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不惜任何代价保持殖民地上。可以说，这种指导方针牺牲了一切：生命、财产和几代人的前途！同时也把国家置于一种难以自拔的灾难性的解决办法面前。问题已不仅仅是用另外一个尊重人权、自由、特别是准备推动经济进步并为社会服务的政府来取代一个不民主的政府。问题还要更广泛一些：通过对其组成部件的彻底改变，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国家。

马塞洛·卡埃塔诺掌权一段时间后，就一再声称，内阁总理认识到必须为殖民地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怎么找到解决办法呢？谁也不敢说。但是，有人暗示，卡埃塔诺象在右派支持下上台的戴高乐一样，是唯一有条件实施左派宣扬的政策的人，即：通过同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政治谈判来结束殖民地战争。有人说只有他才能办到，因为他掌握着政权，有足够的权威和力量那么做。但是，必须给他充分的时间。卡埃塔诺首先需要摆脱极端派和某些势力对他的压力，尤其是对共和国总统的依赖。这就必须等待更换总统，因为按照宪法，他的任期到1972年才结束。

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从内阁总理的言行中绝对得不出这样的解释。恰恰相反，卡埃塔诺从不错过一次机会来表示他完全忠于萨拉查主义的殖民政策。但是，准备变革的传言并未因此而停止流传和扩散。他的某些党徒和顾问也许鼓励了这种传言。毫无疑问，慢慢陷入战争泥潭中的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对促使人们接受这种解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任何人都明白，象葡萄牙这样的局势不能永远持续下去，除非继续执行使国家完全从属于南非联邦立场的政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会把国家引向什么样的深渊呢？

在经受10年最沉重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牺牲之后，没有人能够预言战争会在近期内结束。在军事方面，或是国际支援方

面，会有云消雾散的希望吗？似乎没有！一方面，不论是在安哥拉还是在莫桑比克，军事行动都在不断升级。专家们要求越来越多的人和物力以继续战争，人们是否已经考虑到在非洲这个地区将会出现越南战争那样的结局呢？另一方面，在国际组织里，葡萄牙的政策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强烈，而且受到联合国的重视。最近在北约发生的辩论，葡萄牙退出（或者说是间接被驱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白人神父撤出莫桑比克（这反映出梵蒂冈越来越冷漠的立场），所有这些都表明局势并不是向着有利于葡萄牙政府观点的方向在演变。对于葡萄牙政府来说，最好的设想是：面对这一可怕的僵局，应该悬崖勒马！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普遍认为需要找到出路似乎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越来越无可争议的似乎是：如果想在宗主国认真地实行任何改革政策并取得成功，其必要的条件是先解决殖民地问题。没有这一点什么也做不到！所有的专家异口同声地这么说。

在各个部任职的、尤其是在经济部门任职的官僚们完全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之所以不公开讲，而私下里却毫不费力地予以承认，是因为这仍是一个禁区。在摆脱殖民战争之前，国家不可能有任何进步，也不可能缩短它同其余欧洲国家的可悲的差距，更不可能摆脱政治和社会的僵化状态（它是最近几十年的特征）。那么官僚们还期待着什么呢？难道权力欲已超过了理智吗？还是他们对卡埃塔诺解决问题仍抱有希望呢？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也是卡埃塔诺政策的朦胧不清之所在。内阁总理力图使最近的大选成为对他的殖民地政策的一次间接公民投票。什么政策？自然是萨拉查的政策。因为他所遵循的方向一直没有任何正式的改变，对此，马塞洛·卡埃塔诺是非常清楚的。一上台，他就声称要“冷静地，从头到尾地重新审查这一问题，以便看看是否还有比现行政策更好的解决办法”。得

出的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坚定地”执行既定的政策！否则不就否认了自己在《义不容辞》中的话了吗？

但是，《义不容辞》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是继续萨拉查的那种一体化政策吗？执政者内部的怀疑和分歧出现了……

事实上，为确保继续执行萨拉查的殖民地政策，马塞洛·卡埃塔诺尽管讲了冠冕堂皇的话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他仍然逐步把一些同义词引入到传统的词汇里，对于缺乏政治经验的人来说，这是一些令人困惑的莫名奇妙的词汇。这么做的用心是什么呢？显然，在术语上偷梁换柱不是偶然的。请看戴高乐的例子：他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转为“勇敢者的和平”、“相互依存的独立”，归结到“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而这时，独立已成为事实！这不是很明白吗？

马塞洛·卡埃塔诺对萨拉查的殖民地政策一贯忠贞不贰，现在却强调自治权了，这是在“万神节”中抛出的一个神奇的字眼，也是“自决权”的苍白的同义词。自治、分阶段自治、广泛自治、自治领地，直至名誉上的“国家”（向国民议会提交的宪法修正案中使用的词）。虽然天高皇帝远，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象米钮和阿尔加维一样，只不过是葡萄牙的“海外省”而已……

在就职两周年时，卡埃塔诺发表了题为“葡萄牙是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就是葡萄牙”的演说。这篇演说在用词上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原来用于为萨拉查殖民政策辩护的“神圣教条”逐步被打破了。例如：葡萄牙的“历史使命”不再是“葡萄牙在非洲的存在”，因为“历史每天都在创造自身，国家的使命，不管是否遵循过去的路线，都必须完成”。“保卫西方”是另一个被抛弃的论据。过去，他们一再使用这一口号来说服那些“对我们在南半球的立场持敌视态度并象对手一样行事的”盟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义务单枪匹马去保卫一项涉及到那么多国家和那么多人

的事业，因为他们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不承认也不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帮助”。萨拉查分子如此看重的“海外领地不能放弃，放弃它将使葡萄牙失去独立”的论点终于到了被打破的时候了。卡埃塔诺现在突然明白了：“葡萄牙多点或少点领土都将生存下去！因为葡萄牙不在于数量、空间和土地，而取决于作人的方法和作为一个民族的方式！”

显然，打破这些论据是有一定的意义和目的的。对萨拉查在非洲政策的本质进行讨论本身就表明是一种进步，它必将产生重要的后果。它粉碎了造成停滞不前的旧禁区！例如：极端分子用来对付反对官方政策者的惯用伎俩是指控他们“背叛祖国”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来也不曾有过！)。马塞洛·卡埃塔诺允许重新审查海外领地问题以便看看是否能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为什么其他葡萄牙人不可以这样作并得出与他不相同的结论呢？多年来，“背叛祖国”的指控禁锢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对继续进行这场无希望的战争开始感到厌倦。

马塞洛·卡埃塔诺在抛弃旧的萨拉查式的“辩解”之后，并没有迈出符合逻辑的步子，恰恰相反，而是编造出新的论据来为保持同一政策进行辩护。难道这就是他的一些最亲信的朋友建议作的那种政治评估的产物吗？

内阁总理说：“必须保卫海外领地，因为那里有数百万黑皮肤和白皮肤的葡萄牙人。他们信任葡萄牙，希望继续在我们的旗帜下生活并分享我们的和平。”还说：“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是一项保卫领土价值和人的尊严的事业，它正在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范围内进行。”自然，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疑问：如果内阁总理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民众，他怎么能那样振振有词呢？但是，即使殖民地人民有马塞洛·卡埃塔诺所说的亲葡萄牙思想(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可谁能保证他们在短期

内不会改变意见呢?基于这种假设,政府以什么原则阻止为这场冲突商谈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呢?按卡埃塔诺的意见,葡萄牙人在非洲不是正在"创建一个开放的、宽容的、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吗?

提出巴西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暗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可以成为"巴西式"的国家!那么,不首先结束战争,怎么能到那一步呢?"谈判"就合乎逻辑地成了演说的中心。卡埃塔诺并没有忽略这一思想将在葡萄牙人的精神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不久前曾向葡萄牙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姿态。他在亚的斯亚贝巴以非洲统一组织的名义宣布,已经准备好同葡萄牙一起"友好地为葡萄牙殖民地问题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同样,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也提出一项"和平计划",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1.停火;2.谈判自治;3.在葡—非共同体范围内人民享受到独立、自由、友好合作。这样的计划会被接受吗?桑戈尔肯定地说:"会的。"因为"民族主义者接受了所建议的计划,但是葡萄牙至今仍对我们的呼吁装聋作哑"。

当时,新闻检查准许葡萄牙报纸不加评论地转载上述建议,并在没有多大歪曲的情况下发表了我在《世界报》的声明。声明谈到葡萄牙政府应该接受卡翁达的建议,把谈判作为迅速结束冲突的唯一途径,以减少葡萄牙宝贵的生命的损失。在一个所有的政治新闻都必须按政府的利益筛选后才能在报纸上发表的国家里,这些事实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卡埃塔诺放出的一只试探殖民主义阵营反对势力究竟有多大的气球吗?

内阁总理在上述演讲中问道:"我们同谁谈判?谈判什么呢?同那些按照苏联或中国意愿相互战斗的人去谈判吗?为他们鼓劲把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交给他们,把他们不尊重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吗?"

显然，这些问题本身就很荒唐。要谈判，就需要事先得到可靠的保证，而人身安全是这些保证中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拒绝所有伸向我们的手，愤然回避所有的接触，怎么能知道是否会得到那些保证以及民族主义者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妥协呢？

实际上，政府没有勇气就这一根本问题采取明确立场。它过分谨慎地试图摸索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试探对手的抵抗能力。但从根本上讲，他对自己追求的方向是犹豫不决的。所以，每进行一次试探，它都被迫发表一通庄严的声明，说什么“海外政策没有任何实质变化”。安抚谁呢？对那些自称为反殖民主义的民主人士的迫害也与日俱增。这是给极端分子的“抵押品”。这些比政府要人更极端的人是一些随时准备战斗的极端派。

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70年4月我在纽约“海外新闻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由政府指挥的那场针对我的、极其恶毒的运动。难道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什么在大选前、大选中、大选后或是在葡萄牙内外没说过的话吗？绝对没有！我只不过重复了在刚刚结束的大选运动中已表达过的观点。他们只不过是以此作为小辫子来动员舆论进行“捉鬼”，并迫使报纸同声反对所谓的“叛逆”。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提高当局败军的士气和恐吓那些尚未作出决定的人。我在纽约所采取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似乎成了全国的大新闻。须知这一立场甚至得到了某些亲当局者的支持。一名御用文人甚至胡说我是“唯一的例外”：唯一一名犯下不理解官方非洲政策大罪的葡萄牙人。我就这样成了（完全不是自愿的）“小零钱”，即变成了政府给极端派的一种保证。可怜的国家！公民的自由完全取决于下流的党派政治把戏！马塞洛·卡埃塔诺甚至不惜亲自粉墨登场，在电视演说中向我投石头，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可悲的表演，真不希

望看到！想想看，好几名政府成员多年来一直宣称支持与我并无不同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而这时却象受惊的耗子一样一声不吭……想想看，有的法官甚至以自己的签字使一项起诉生效，而这项起诉包含的法律以外的政治意图是清清楚楚的！

还有马西埃拉·利沙教区的教区长马里奥·奥利维拉的案件。他被监禁数月后，受到波尔图法院的审判，因为他在一封寄给一名"没良心的人"的信中曾表示反对殖民战争。对这一案件没有使用同样的宣传方式。但是所用的恐吓手段是一模一样的，其最终目标是波尔图主教——反动的法西斯神父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当政府或许是由于其内部"部族"的压力这样行事的时候，殖民地的局势也在继续恶化。事情的惯性使国家在军事、经济、政治战略和国际方面承担了新的责任和许诺。某些联盟的逻辑使为将来而计的（不是为现在也不是为过去！）寻求一项解决办法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当继续进行战争从而破坏了葡萄牙人同当地土著人之间的各种纽带，包括语言这一极其重要的基石时，怎么可以援引巴西为例呢？难道可以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黑人中的精英利用一切机会出国并到葡萄牙以外的地方去学习（而往往变成反对葡萄牙的人）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吗？

殖民战争的特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在莫桑比克，斗争日益激烈。例如：经常发生绑架，还有象安古切号货船那样的神秘破坏事件。这就是民族主义运动对考尔扎·阿里阿加发动的一系列进攻的回答（考尔扎曾是与卡埃塔诺争夺最高权力的对手之一）。结果怎么样呢？国人不知道。例如，不知道入侵几内亚（科纳克里）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突击队的进攻（营救出了为几内亚非洲独立党所监禁的葡萄牙

人)是否真的象联合国和世界上一部分负责的新闻媒介所指出的那样,是在葡萄牙领土上组织的一次冒险行动?但是无论怎么样,重要的是由于事物本身的规律,非洲的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

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没有取得什么惊人的胜利,而且在非洲国家之间还存在着经常为殖民者加以利用的深刻矛盾。结果如何呢?这是一项只能推迟而不能解决问题的政策。对于那些一心只想立刻发财,捞一把就溜掉的人来说,这项政策可能有某些可取之处。但对那些真正关心祖国和后代人前途的人来说,这项政策必将把一切希望化为泡影。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相互牵制。爱国主义的解决办法——和平与非殖民化,由于缺乏决心和勇气会拖延下去。人们有理由担心悲剧会一直演下去!现在,当局喜欢使用"统一葡萄牙国家"中的"自治领地"这个词。统一的?人们有理由怀疑,自治的逐渐扩大(将导致"自治领地"变成真正的国家)难道不会走向联邦式的国家(马塞洛·卡埃塔诺原先的意思),或是走向由独立国家组成的联邦吗?对常常提到的巴西的例子就可作这样的理解。

但是,在政府内部,官方的论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省",同米纽和阿尔加维一样是统一祖国的组成部分——似乎正在悄悄的死灰复燃。

实际上,宪法修正案公布之后,最信奉萨拉查式一体化的党徒感到害怕的就是这件事。他们或公开或暗中开始喊叫反对"背叛"!但是,这次是谁在背叛呢?自然是政府!

安哥拉叛乱初期的关键阶段,海外领地部长阿德利亚诺·莫雷拉在一篇文章中以谨慎的但又非常明白的语言严厉批评了改变某些用词的时机和准确性。据他说,它们不仅仅在今天是危险的,而且还代表着一些对未来是非常不适当的东西。费尔南多

·阿莫林的《真理的时刻》一书可说是反对马塞洛·卡埃塔诺奉行的殖民政策的檄文，他把这一政策称之为"定期放弃政策"。他说："自治或称自治政府是政治完全独立和全面非殖民化的合乎逻辑的历史性的第一步。"对于上述这位作者来说，毫无疑问，全国正迷惑不解地看着"这一阴谋活动"，因为它企图通过在政府首脑的演讲、法律和宪法条文（修正）中玩弄词句来肢解祖国，并限期使葡萄牙殖民地独立。这是十分严厉的指控！这样我们的马塞洛·卡埃塔诺就在大庭广众之中被指控为"背叛祖国"。真是无奇不有：内阁总理和他的政治警察也曾使用过同样的论据和逻辑指控我和其他对手，因为我们采取了反对殖民战争的立场；……不过，这有实质性的区别：马塞洛·卡埃塔诺被指控为用建立一个白人占优势的国家（忠于南非的罗得西亚式的国家）来摆脱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困境。而我们反对派建议，在承认自决原则基础上采取一项能导致和平并在非洲的葡萄牙领土上开始不可逆转的非殖民化程序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只有这条道路才能使各种族和睦相处，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成为黑人占大多数的一个真正的多种族的国家，通过亲密友谊的纽带和合作同葡萄牙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项解决办法是否意味着牺牲已有的重要利益和同长达数个世纪开发的历史彻底决裂呢？对此，谁也不会视而不见！但这又是应付时代对葡萄牙挑战的唯一解决办法，也是唯一能迫使老宗主国葡萄牙对其结构（现代化及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进行彻底改革的解决办法。

尽管两国之间有巨大的差别，但是戴高乐 1958 年掌权时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他勇敢地向它进攻！在《希望的回忆》一书中，他用下面这段文字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重新取得法国的领导权时，我就决心使它摆脱那些对于

法兰西帝国的前途毫无价值的负担。人们可以相信，我不会象所说的那样，无缘无故地去做这件事。对于象我这样年纪和教育的人来说，从仅仅是国家元首变为还是改革事业的主人，这本身就是严峻的。”

从中可以知道，对于戴高乐来说，那样的选择代表着什么。环境条件已成为全国的真正要求。尽管他要战胜各种阻力、面临利益受损害者的不断抵抗、疯狂仇恨、阴谋、反对和密谋……但是他仍毫不犹豫。

但是，马塞洛·卡埃塔诺不是戴高乐！我不打算用对比来暗示内阁总理没有才智解决摆在国家面前的问题。我仅仅认为，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这三年中，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来解决问题，而这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他无可挽回地错过了本来属于他的历史使命。同样严重的是：由于这一事实，萨拉查主义得以延续下来，失去了进行有效变革的可能性。他只能是一名过渡性的政治家……

事实上，只要殖民政策不改变，就无法考虑解决葡萄牙的中心问题，更不要说立即解决了。

马塞洛·卡埃塔诺 可以提出的补救和辩解是他并未给国家带来什么新的东西。他无法为进步加入新的动力，而这又是当务之急的事情。他不能赢得青年的创造热情，甚至就连全国真正的信任也得不到。

看看1969年的竞选吧！各种许诺都是以往大选中陈词滥调的重复，只不过在一些细节上作了点修改。上当受骗的是谁呢？看看“毕得——DGS”的例子吧！对它的权力在开始时本想加以限制，但由于积重难返，这种打算很快就被放弃了。一个反民主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一个警察国家呢？工会法似乎想在其体制中引入某些真正有生气的东西，但当这一蛊惑人心的宣传付诸

实施时，象往常一样立刻变成了公开镇压。宪法改革案更是如此，它的修改除了确保现状继续下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对后者多说几句是必要的。根据卡埃塔诺主义的某些“自由派”代表人物，宪法修改案的基本目标有三：第一，给体制以某种合法性，恢复通过直接投票选举共和国总统的作法。第二，切实恢复（而不是纯理论上）某些必要的政治自由，给现行体制一些“现代气息”，特别是有条件的新闻自由和某些人身保障（缩短拘留时间，律师可以出席在警察局对犯人的审讯）。第三，在“海外省”一章中引入能使僵硬的官方政策灵活一些的改变，以获得新的支持和国际谅解。

但是，在政府的建议中，所宣布的三个方针没有一个得到保证。政府在一些派别的强大压力和影响下，只好一让再让，终于没有触动任何实质性问题。卡埃塔诺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就这样化为乌有。当开始专门讨论宪法修正案时，十二名“自由派”众议员退出国民议会的意义不是昭然若揭吗？此外，政府的让步是如此明显，以致在他们使用的言词中就可以看出（尽管这些言词多次被用来蒙蔽事实）。事实上，卡埃塔诺最后的这些演讲与萨拉查写的演说如出一辙。

有关殖民地问题，我们已经充分分析了修改案的意图及其可预见的结果。让我们看看有关合法性问题和公众强烈要求的自由问题吧！

有必要提一提马塞洛·卡埃塔诺一直力图给自己树立一个尊重法律的形象：一位法学教授反对个人专权，主张容忍、中庸倾向、自由主义，尤其是追求“合法性”。但是，葡萄牙现行体制中，法律何在呢？象其他民主国家那样，把普遍的愿望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吗？不是！它仅仅代表政府的愿望。通过“法令”制定法律，并随心所欲地修改法律。在葡萄牙，政府是等级森严的机

构，内阁总理不是第一部长，而是凌驾在其他部长之上、可以任意任命撤换他们的真正首脑。他仅仅依靠（如同我们看到的）共和国总统的信任。自1959年起，总统由有限的选举人团任命，而选举人团的成员由内阁总理推荐。因此，任命总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阁总理。

马塞洛·卡埃塔诺一上台，他的党羽就立刻散布说内阁总理要修改宪法，建议恢复直接投票选举共和国总统的体制。他对此感兴趣有两点理由：给这个实际上不曾有过、现在仍没有合法性的政府一些"合法性"；与萨拉查相反，他有理由想于1972年把这个最高职位授与他自己，因为这大概是唯一躲避政权内部对他攻击的方法！

然而，在宪法修正案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修正建议。为什么？对此，马塞洛·卡埃塔诺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鉴于他在理论上与这个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选举国家首脑的方式将是可以讨论的。但要在这次修改宪法时就此问题作出决定（离上次修改时间太短），或者说重新改回来，是不适宜的。必须采用适当的方式，继续进行试验，积累经验教训，以便为今后就解决这一问题提出有根据的看法——是保留还是改变原来的作法。"

真是幼稚可笑！作为前宪法学教授的马塞洛·卡埃塔诺对自己长期教授的这一课程，竟没有言之有物的理论！真正的理由是内阁总理把修正案看作是对他本人的侮辱。明白吗？翁伯托·德尔加多将军的竞选运动之后，很快就实行了间接选举国家首脑的新制度。他不正是这种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吗？不是表明他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吗？恢复以前的选举制度不是使那个缺乏"合法性"的时期变得更引人注目了吗？而这正是他力图使人们忘却的东西。这样，在寻求暂时平衡的困难的行动中，马塞

洛·卡埃塔诺无力推行他的意图。但是，还有另一有关政治实践的理由可能与采取上述决定有关：对1972年的公开总统竞选缺乏信心，政权的稳固性和他本人作为首脑的能力都将在运动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如同萨拉查忠告的那样，沉默总是最好的策略……

在评论这个自1959年起开始实施的制度时，众议员佛朗西斯科·卡尔内罗有勇气在国民议会上宣布："共和国总统的选举程序不符合宪法中宣布的国家主权的原则！"这是非常明显的！

而另一位众议员则转弯抹角地说："我比较希望国家有一种宪法体制，以便共和国总统真正有权进行治理，亲自行使行政权……通过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在其任期内进行治理而不依靠议会表决，但是也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这就要顺理成章地确立总统制。尽管有这些批评和建议，最后还是选择了维持"现状"，即萨拉查发明的杂交体制。它规定了一种政治格局：尽管总统处于宪法体制的顶峰，但却与全国的普选无关。其中有两点严重违宪：他有权解散国民议会(议会的作用完全受到限制)和任意任命政府。政府(如我们所看到的)同时拥有行政权和立法权。这样一种体制既无民主也没有代表性。创造这一体制是为了使1926年通过武装政变获取政权的集团永远毫无困难地留在政府内。自那以后，从未有任何自由选举使它合法化。

马塞洛·卡埃塔诺没有能力改变这一格局，于是放弃在葡萄牙创建法治国家而保持独裁！

虽然这种对立是不可辩驳的，但是可以考虑创造一种不那么紧张的政治气氛，一种仁慈的、温和的专政，使国家走上"有控制的自由化"之路。卡埃塔诺在其王国建立最初几个月里可能有这样的黄金梦，至少他对这类建议抱有明显的赞许……几位理论家宣称，鉴于国家的客观条件，现行体制也需要发展。这就进

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心。处于扩张阶段的葡萄牙资本主义不缺少强硬的法西斯手段。萨拉查是这种陈旧势力的代表：土气、迟钝、孤陋寡闻。马塞洛·卡埃塔诺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具有欧洲式的保守、可亲、宽容的特点……有着新"政治经理"的欧洲不是正在指明必须变革的道路吗？尽管西班牙处于一个远比葡萄牙先进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吗？它通过一项充满着前进与后退的矛盾，但又方向明确的政策，试图摆脱内战遗留下来的过时的体制。

这一论证是有趣的，其中包含着不少真理。但是它没有考虑到殖民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依赖和退让的可怕负担。如果没有殖民战争的背景，卡埃塔诺肯定会成为另外一种政治家。但是，他被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捆住了手脚，没有成为戴高乐式的人物，而是注定要重蹈萨拉查的覆辙（不仅是在形式上，而且是从根本上趋从他）。

关于政权内部的所谓"自由派"呼吁的公众自由，前景并不那么令人鼓舞。宪法修正案提出的变革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毫无价值。卡埃塔诺解释了原因："在第8条关于权利的声明中包括了在欧洲式的文明社会里一切有关个人的基本保障"。既然宪法里一切都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修改它呢？即便是这样（实际上不是！）当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政令时，上述权利又被取消，而有关段落也就成了"死亡文字"。多年来，反对派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事实。后来一名议员终于第一次以全国不习惯的、明确的、毫无遮掩的话语说出了这一真理。佛朗西斯科·卡尔内罗说：

"十二年来，人们都承认急需一部结束恣意行事体制的新闻法（国家受制于这种制度）……期刊有页数限制，要有许可证并按期预付保证金，规定了出版企业、印刷工人的责任，警察以行政手段封闭印刷厂、国家对其资产的监督、法律上毫无控制的没

收，这些都是政府法令的基石，它形成了一堵不可逾越的、禁锢思想自由的高墙。”

又说：“所有葡萄牙人都有集会自由，如果他们在一起不讨论行政当局认为是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话。”

他最后说：“除天主教徒之外，宗教自由至今只是一项空洞的许诺。官方强制性的大纲和统一的课本使教育自由成了徒有虚名的东西。”

但是，更黑暗的是有关最基本的自由——人身自由及其保障。禁止无期徒刑并不妨碍实行常年的而且可以无休止地延长的安全措施……防卫保障和相互矛盾的指令常常向警方调查让步，受嫌疑者成了主要的证据来源；他在警方手中可以长达六个月之久，不准进行法律规定的探视和聘请律师。

这样，实际上是取消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们的宪法保障实际上取决于政府的意志。

对这位众议员的控诉谁敢出来辟谣或在其中找到夸张或片面的地方吗？严重的是他所描写的不是过去的局势。萨·卡尔内罗揭露的是在自由问题上，这部修正案不但毫无补益，而且试图使出现过的不公正、暴力和专横局面永远存在下去。

已经通过的新闻法是一项漏洞百出的、不能满足任何要求的东西。记者和作家提出抗议，指出这项法律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使现存的限制更加严厉，但是他们的呼声没有在政府里引起反响。提交的其他的议案，特别是由萨·卡尔内罗和巴尔塞芒议员签署的议案，甚至未能得到讨论。说到底，新闻检查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改换了名称而已。

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在公众自由方面，象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改革”只不过是一个烟幕，为的是欺骗无知的或那些甘愿受骗的人。政权的独裁结构保持下来未被触动，与民主的不调和仍

然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在宣传领域，马塞洛·卡埃塔诺的似是而非的改革政策也是失败的！

国家仍然处于象萨拉查时代一样的死胡同里，怎么走出来呢？

某些外国的观察家对葡萄牙反对派的处境感到惊奇并对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深表叹息。事实是，没有高尚的政治，有的只是幕后的阴谋诡计和明争暗斗。国家的重大决策是由当权者决定的，广大民众只有通过对其后果的亲自感受或意外的渠道方才知晓。这是绝对君主制的办法，只听最高首脑的意见而不问国民是否赞同。

拖延了四十五年的这种局面，对于葡萄牙人民来说是耻辱的，其后果是可怕的贫穷。不仅仅是对整个国家，而且对于强加给她的这个政府都不允许存在一个合法的反对派。它面对一个影子般的国家，在真空般的封闭环境里运转！

葡萄牙的优势被蓄意抽掉了，真是误国之罪！在掌权者眼中，在政治方面或其他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领域中有个人的想法，就是离经叛道。如果想独立自主地通过可能的方式表达这些想法，那么就更是犯下难以宽恕的“罪行”。

葡萄牙的政治家要么是由独裁者遥控的木偶，要么得有勇气面对随时可能入狱流放或转入地下的命运。形势要求人们具有勇气。那些仍然准备战斗的人却被无情地排除出公共生活之外，被捆住了手脚，虽然他们的私生活还未被破坏、自由尚未被剥夺。这就造成很大一部分具有政治才能，而不愿当木偶的人，宁愿无所作为和保持沉默。这是人们的生存手段，虽然十分可悲！

在葡萄牙这块土地上，原则上只有一种意见可以自由表达，

那就是官方的意见。反对派的意见注定要采用隐晦的手段，如果坚持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发表，那就随时可能被依法宣判为"犯罪"。没有正常的政治方法来监督政府的活动，它置于一切批评之上，并且自认为永远没有错。通往权力的合法途径被封住了四十五年！

那么能做点什么呢？如何为反对祖国的衰落而奋斗呢？她似乎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如何为欧洲最悲惨不幸的葡萄牙人民创造相当的生存条件呢？

这是些复杂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折磨着数以千计的优秀葡萄牙人。它不仅证明了存在着被动反抗，而且还证明了他们并没有为了高官厚禄而与当局沆瀣一气。这是有关如何参与人民的斗争，如何找到有效地参与这场属于大家的斗争的方式，为改变政权强加于人民头上的压迫的现实作出切实贡献的问题。

在象葡萄牙这样一个超级警察社会中，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尽管进行了那么多表面上毫无光荣可言的斗争和牺牲，问题仍然继续存在，无法解决，给一代又一代人留下了痛苦……。

"做什么"的问题自然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行动的手段和制定一项对葡萄牙、对当前有效的政治选择。做什么和怎么做？再有就是：同谁一起做？一项共同的事业需要联合，至少在漫长的第一阶段……

首先，反对派必须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条件，必须学会参与国民生活的每一步骤。这就要在实践中使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克服政府一再玩弄的排斥和阻止反对派的诡计。我是说"一切手段"！这关系到反对派的成败。它必须主动并学会适应变化的形势。在一个所有信息均被政府窃为己有的国度里，这是极难做到的事。除此之外它还必须具有严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方

面，反对派与法西斯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妥协！

那么，在政治方面，在一个警察国度里怎么行动呢？在葡萄牙所处的具体历史时刻，面对在共同的、确定的民主标准下正在开辟通向有效的统一的道路的欧洲，我是相信所谓“合法手段”价值的人之一。这些手段虽然有限，但还是存在的。显然，仅仅凭这些手段还不能使全国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如果能够有勇气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就可以使人民群众的战斗精神和反抗精神得到发扬，揭露政府的行为，大大缩小其在国内外进行阴谋活动的余地。

群众运动，通过可能的方式散发文件，系统地批评政府的活动，在同业工会内外进行斗争，实现真正民主的方针并把政府束缚在自己的蛊惑宣传上；在所有层次上谴责任意行事的作法、警察的暴行和腐化……总之一句话：我主张利用很少的“合法手段”。当公民们表明决不放弃合法手段时，即使是一个专权制度也不能阻止反对派继续赢得公民！

显然，只有纳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总战略中，运用上述手段才有切实意义。这里引出了另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暴力问题。

面对一个非法政权，一个不顾国家利益、没有良知和理性的政权，一个制度化暴力的典型代表，怎么能够无视只有革命的暴力才是绝对有效的呢？

我个人厌恶所有形式的暴力。我认为，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暴力，所有使暴力减少的作法都是积极的，我的政治选择是非暴力。但是，我是健全的人，不愿当伪君子！在葡萄牙最近这几个月里，人们看到暴力行为变得更加严重了。这是一个事实，它不仅完全符合逻辑，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象一部开动起来的机器，任何人都很难预见到它会把国家带到哪里。

由于政府拒绝对话、拒绝宽容并窃据了国家政权，谁能否认政府在使这部机器运转方面负有巨大责任呢？但是政府对这一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而且固执地遵循其一贯的路线：进行迫害！但是，单单凭借警察手段能解决政治性的问题吗？在同非洲游击队的关系上，不正是遵循了这条道路，结果不是明摆着的吗？

不可否认，在葡萄牙存在着制度化的“恐怖秩序”，正是它在激起反叛。潜在的不满随时可能爆发。成千上万的移民事件如果不是意味着完全拒绝生活在那种经济和政治压迫的环境中，又意味着什么呢？听一听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宽厚聪明的年轻人的呼声吧！应该尽量理解他们对反对派的某些传统势力和坚持使用“合法”手段提出的批评的含意。他们认为这些手段不能带来任何东西，只有年复一年的监禁和无谓的牺牲，而且不少青年人已被迫参加了这场各方面的后果均难以预料的殖民战争。对于葡萄牙人民来说，这场战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所暴力的学校。青年人怎么能不试图换用一种有效的手段并掉转武器反对那些用武器压迫他们的人呢？

在这方面，很多天主教徒的转变同样是有重要意义的。面对到处存在的暴力，他们划清界线，犹豫彷徨，但却不加以谴责，而是试图予以理解。卡米洛·托雷斯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但这一圣职并没有阻止他成为当代传播革命暴力的信徒。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越南、葡萄牙，面对非正义和迫害，许多人正在走上同一道路。最近在法国电视台播出的关于“葡萄牙教会”的节目，通过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方式，使所有的电视观众了解到激进主义在增长的局势。

在一个象葡萄牙这样的社会里，一旦暴力被当作恢复国家权威的手段，非暴力主义者便被置于无法反对暴力的痛苦境地。

但是，除复杂的方法问题之外，还需要对目的进行明确的规

定。这两方面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规定明确的目的并被国家完全理解毫无保留地接受，伴随而来的必然是众多的行动方法，大大提高成功可能的比率。

政府多年来总是有意说各反对派而不是笼统地说反对派。人们很理解这种固执：这是在暗示各反对派不可能就一项最低纲领达成谅解，它们的对立和分歧远高于临时组成的团体的利益……实际并非如此。政府的战术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分而治之，而反对派的利益正好相反。

在反对派内部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区别，对战略战术理解上有分歧，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另一方面，反对当局的社会集团乃至经济集团的利益也并不总是很容易协调起来的。但是，如果不无视所有这些困难，那就必须承认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团结是救国的头等大事。

经过四十五年的无数牺牲和斗争之后，很难说哪一个反对派（不管它组织得多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负起变更政权的重任。接受这一简单的事实，使团结作为一种实际需要并迫使所有的政治团体努力使自己理解其它的团体，这样才能就反对卡埃塔诺主义问题提出一个共同解决办法。团结还要求在实践中相互尊重和尽可能寻求谅解和相互让步。

掩盖仍然存在的根本分歧是无益的。在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要把大同放在突出的地位并通过深入的意识形态上的讨论和相互了解尽可能达成协议。尤其是要加强把所有反法西斯人士（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信仰或对党派的选择）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对我们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并且正是这一点使反对派的所有派别成为同一政权压迫的牺牲品。警察首先选择手工业工人进行迫害，而政府制定的“政治平等”仍然是有阶级性的平等。必须指出不管警察的暴力指向何方，对所有的民主人士来说，都

同样是一种侮辱。这是一个侵犯公民的尊严的问题，对所有的人都应当是同样的！兄弟情谊具有高度的政治激励价值，它迫切需要置于派别争端、意识形态和个人对立以及党派竞争之上。

我知道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集权社会的生活常常造成不可调和的分歧和仇恨。挫折使人忘却了斗争的根本意义，给自己最亲近的伙伴抹黑是最容易的事……在这方面，必须承认所有各派都毫无例外地负有责任！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求尽力去解决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是在通向团结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尽管会非常困难，但是我相信这必将产生积极的效果。

人们要问，多年来，痛苦的内讧经历还记忆犹新，团结可能实现吗？这种团结是否需要？如果假设是肯定的，那么它的范围是什么？

人们还记得，马塞洛·卡埃塔诺的假改革政策曾使国家看到一线出路：以逐步的温和的和无重大冲突的方式从法西斯主义向民主过渡。很多人相信，卡埃塔诺所谓的"自由化"政策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也仅仅因此，一开始全国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支持他，从某种角度说，已经停止了反法西斯斗争（有些理论家说已经战胜了法西斯！），短期内将过合法生活的憧憬更加深了反对派业已存在的分裂。但是，掌权三年之后，这一幻影破灭了。现实跳到了眼前：如果反对派任其下去，卡埃塔诺就会让"没有萨拉查的萨拉查主义"永远存在下去。这就意味着他将没有能力解决任何国内悬而未决的问题。

必须改变制度。这一不容置疑的结论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考验。它使国家面临无法回避的抉择，反对派的各种力量不得不相互和解。这是性命攸关的需要。但是，认识到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它，找到一种行得通的，为全国所接受的，取代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应当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党派

性的。必须使所有明确拒绝“马塞洛—萨拉查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达成一致。马塞洛·卡埃塔诺代表旧体制的延续，即无限期地将独裁保持下去；代表寡头政治、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邪恶势力的加强；他还代表殖民战争的继续，直至国家被消耗殆尽为止。有他在，局势将象至今一样找不到出路。客观形势首先要求团结起来，国际大环境也需要这样。

但是，一种什么样的团结呢？应尽可能围绕三种基本的(政治体制、经济和殖民地)选择建立起团结。这些选择可以由全国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根本需要的三大方面为出发点组成：1. 破除法西斯的“秩序”并且重新建立政治民主；2. 结束官僚—国社组织，以便推行一种社会公平合理，有计划发展，保护劳动者的政策；3. 通过开始同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政治谈判，承认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和自决权，立即结束殖民战争。

今天，葡萄牙人之间的分界线正是通过这些选择划分的。这些选择是真正的试金石，是现政权和反对派之间的分水岭。的确还有些反对卡埃塔诺但却比他立场还右的人认为卡埃塔诺还不是十足的法西斯和殖民主义者。这是一些三十年代萨拉查主义的遗老遗少们！有些卡埃塔诺的反对者赞成公众自由，但认为应该继续执行在非洲的现行政策。他们反对国社机构，但又赞成加强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他们是些自由的保守派，持不同政见者，没有被封官的君主派和某些幻想破灭了的“卡埃塔诺分子”。反对派也包括这部分人。反对派是由既反法西斯、又反国社制独裁和殖民主义的派别组成的。这不是从反面下的定义。否定仅仅意味着同“马塞洛—萨拉查”体制的决裂并依此确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抉择—它可以作为葡萄牙当前问题的全国性解决办法为全国大多数人所接受。国家必须摆脱政治和经济的不发达状态并且在各国的大合唱中重新获得声誉。

我认为，当今在葡萄牙有四股势力有能力参加制定反对卡埃塔诺主义的政治抉择：共和党人、天主教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除了这四股势力之外，必须说到的是有争议的极左派：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新无政府主义者，毛主义者、托洛斯基主义者，格瓦拉派人士，他们的立场往往很难区别。

根据他们各自的规模和对未来的影响，这些流派在当今国家生活中的影响和份量是不同的，它们各自的组织水平、乃至本身的凝聚力都是不同的。共产党人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秘密政党（拥有一整套专职工作人员）并且在某些地区拥有传统的组织机构。摇摆于正统右派和极左派之间的天主教人士，在政治上不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政党（或运动），尽管它有初创的组织形式（由"天主教行动"的各种组织组成的）。在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中产生的共和党人，尽管多少还保有一些衰败的阵地，但是处于分散状态（社会民主领导机构的成立是一次尝试）。大部分社会党人集结在一种非政党的组织中—葡萄牙社会主义行动。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种动荡的局势（唯一可能出现的局势）清楚地提出了整顿难以解决的各派力量的问题。

然而我认为这些党派或准党派（或其他将要组织起来的别的党派）的存在，对于团结来说不是一个障碍，而恰恰相反，是团结成功的条件，因为它意味着划清了意识形态和重大政策的界线。

但是，除了那些多少有组织的政治流派之外，还有反法西斯的民众，他们没有确定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仅仅反对现行体制，支持反对派的一切政治行动（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他们认为能产生某些效果。在反对派中，他们是摇摆不定的人；在数量上构成了很高的比例。通过制定统一政策，这些群众是可以动员

起来的。承认这一事实是有利于团结的另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但是，反对派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

在当今的葡萄牙资本主义中，存在着潜在的分裂状态（或犹豫不决）。各种矛盾的力量和利益往往在同一经济集团和实体内部交织在一起。一类是依赖国家的庇护来进行发展，它的命运同继续剥削殖民地息息相关，因此反对任何类型的变化；另一类比较现代化和具有活力，它力图用自己的方法开辟新的道路并同欧洲一体化运动结成联盟，以便在失掉被认为是生命攸关的殖民地之后，仍可以生存下去。

我们看到，马塞洛·卡埃塔诺在感到这种抉择对于政权构成的危险时，如何想通过双管齐下的办法来绕开它：继续进行殖民战争；与共同市场开始谈判，以便看一看有无可能加入。但是，发展经济和战争是矛盾的，不可调和的现象。另一方面，没有真正的民主机构，葡萄牙就没有任何加入共同市场的可能性，也很难获得成员国的资格。至此，在该政权历史上，葡萄牙资本主义中有代表性的部分可能第一次有兴趣引进一项民主的和反殖民主义的选择，（确切地说是反殖民战争的甚至是象其欧洲伙伴成功采取的那种新殖民主义的解决办法）以代替现行的体制。这种新的状况加上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扼杀性的渗透和庞大的多国托拉斯对葡萄牙经济的巨大影响的日益增长及其反应，给当局的生存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反对派必须善于加以利用。

同时还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非政治性的）工会运动。尽管行业工会、国社制工会制造了各种障碍，该运动还是力图开辟新的道路并表达劳工阶级的要求。如同已经表明的那样，这是一种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施加压力的工具。

还有其他这类因素。技术官员在国家行政和经济生活的所

有机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们受到现代管理技术和同极端反动的国社——法西斯结构不相容的欧洲思维的影响。自梵蒂冈第三次教长大会后，世界天主教采取了新的立场，结果葡萄牙天主教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被迫遵循一条与政权不妥协的路线。如果各方面都自行其事，兜售绝然相反的解决办法，教会又怎么能继续维护政府的专制思想、维护一种专门为富人的利益而建立的社会——国社秩序以及一项反动的殖民政策呢？

显然，在反对派一致地向国家提出一项政治解决办法时，这些复杂的国情因素都应考虑进去。重要的是尽可能使政策切合实际。真诚的乌托邦虽有无可争辩的价值，但是在政治上往往造成对抗。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是代表人民群众愿望的选择的总和，人民群众通过民主辩论而觉醒，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要善于通过各种方式并在各种层次上促进这种民主辩论。这些选择应体现在为过渡政府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当然，对目前的葡萄牙来说纲领应是切实可行的、没有蛊惑宣传味的。实际上，仅仅谴责独裁和殖民战争，指出国家的经济落后和惊人的不平等仍是不够的。必须积极地规划祖国的未来，寻求现实的办法，解决困扰她的无数问题，以赢得人民的参加，舍此不可能真正作到任何事情。

情况日益令人沮丧，百废待兴，而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树立信心并鼓起全国人民的热情。为此，必须优先实行某些紧急措施。当然，必须重新使全国获得政治和工会自由，认真地保障人权，同时又不陷入党派过于分散的混乱之中。尽管政府应民主地受到代表全体公民的议会和自由的新闻界的制约，但它必须是稳定并且有力量采取行动的。

考虑到失去殖民地并同欧洲结成亲密联盟的前景，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国家生活，废除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复

存在的旧特权；采取尽可能广泛的措施消除不平等现象；解放国家的创造力；根除国社组织体制；镇压投机倒把；最终使国家的财富用来完全为集体服务。

在总的经济方面，必须确保民主计划性和某些基础部门的国有化，比如：大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国防工业；某些可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尖端工业和那些从事为公众服务的大垄断企业。应保证劳工和其他公民对国家、地区和大型公私企业（自主经营）的基本决策部门进行民主监控。加速经济发展必需的外国投资要根据国家的利益进行控制。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根据集体的利益进行有领导的、彻底的税收改革和农业改革。群众性的旅游事业应受到鼓励，但是不能象至今那样“拍卖国家”，也不能把葡萄牙人变成外国顺从的仆人。必须千方百计鼓励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以改善国家机器的效能。同腐化、无所作为和逃往国外的现象进行斗争。各级教学民主化，通过客观的报导保障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经常教育，救济、社会保险、居住、公共设施、合作精神、休息的权力和有较高质量的生活的权力，这些都是要绝对优先考虑的。必须提供条件，以使政治流亡者和经济流亡者在短期内能够返回家园，给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因拒绝进行殖民战争而被驱逐出祖国的年轻人以在国家生活中应有的位置。祖国必须是所有人的，不应有任何经济及意识形态上的歧视。

在国际方面，必须忠实地同联合国和所有其他已加入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同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年轻的非洲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在服务于和平、确实有利于裁军和各国人民互相了解的前提下，不应抛弃传统的联盟关系。

考虑到欧洲和葡萄牙目前总的情况和各种现存力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想行之有效的话，决不能超越阶段（或前进过快）。我

认为，如果希望象欧洲其他部分那样通过民主的道路到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话，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和平革命或暴力革命不是现在讨论的问题）必须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由此得出结论：对于卡埃塔诺主义来说，政治选择（如果我没错的话）应是实现上述目标——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平及非殖民化，舍此别无它途！

自然，作为一名社会党人，我认为葡萄牙的问题只有通过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找到完美的解决办法。然而由于国内和国际的条件，我并不认为葡萄牙现在就可以开始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的意见是，因为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所以反法西斯斗争的要求仍然是绝对优先的。要赢得民主必须联合各种同盟者，包括大国，这样就可以使敌方的阵营得不到加强，绝不可由于胆怯和犹豫不决而持中立态度。另一方面，我认为在葡萄牙要使任何政治变革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在国际方面，不要损害世界现存力量之间的脆弱的平衡。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似乎都不准备改变这种平衡。

马塞洛·卡埃塔诺发动"自由攻势"的根本目的是要扩大支持其政权的基础。"自由化"是幌子，目的是公开得到某些国际援助。去掉这一论据的虚假内容，回到"法西斯或反法西斯"的选择上——毫无疑问这个题目仍继续控制着葡萄牙社会，斗争将走向政府最害怕的领域。统治这个王国的寄生虫式的寡头会更加孤立并在国际领域里给它造成一系列困难。

我不相信，在上述范围内更换政府可以引起四种政治势力是否接受的重大问题。不管怎么说，它必须是各派协商的结果。但是，肯定会遭到捍卫"新左派"立场的人的非难。这些人认为葡萄牙正创造条件以"建立革命的经济"，把革命进程分成阶段"是不能容忍的拖延"，"是把工人阶级绑在了资产阶级的战车上"，

因此必须直接跃入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念必然引起重大分歧并在联盟的总战略中有决定性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某些左派一直疯狂地攻击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天主教人士并把这些人贬为可卑的“改良分子”的原因……而对反法西斯斗争本身却缺乏兴趣。两条路线之间的差别大致可以用拉丁美洲的两个典型经验来加以说明:古巴和智利。

我不认为古巴的经验可以在葡萄牙或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中再次发生。尽管我对这一经验表示赞赏,但却认为它对葡萄牙既不需要,也不符合民意。我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尽管某些古巴领导人特别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值得我尊敬。相反,智利的经验是尊重各国的特性,所以我认为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为此必须首先取得民主的基础和政治稳定,它包括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基本价值,舍此不可能对未来进行规划。

我根本不想垄断真理。反对卡埃塔诺主义的政治抉择产生于有关力量的合作,同时也是民众创造力的产物,它可以创造出符合各个时期需要的方法。但是,我想葡萄牙的“左派”没有充分认识到全国的实际情况,它与包括西班牙本身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绝然不同。葡萄牙“左派”喜欢生活在乌托邦中,并为乌托邦而生活;但在政治方面却是无所作为的立场。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行动为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向全体反对派提出了维持健康意识形态的要求。我向他们致意!

我个人确信,在法国五月事件之后席卷整个欧洲的左倾浪潮(在此之前已在北美出现,而在葡萄牙主要是萨拉查下台之后)迎合了青年人的迫切要求。在所有地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青年人拒绝成年人为他们准备好的、不公正的世界。他们有理由这样作!

他们以自己的拒绝向成年人提出的问题——以突然和暴力

的形式出现在现实中——是完全有价值的。急需找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我认为这正是左派政党，特别是社会党的任务。如果不善于扮演这一角色，把青年纳入其干部队伍中，并信任他们，那么左派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必要！

我希望反对派能联合制定一项政治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应对青年有充分的吸引力，以使他们巨大的热情和想象力得以发挥。必须把他们那分散的能量引入彻底地改变祖国面貌的事业上来！

很多反对派人士对制定一项统一的政策持保留态度，因为他们害怕共产党的参加。他们援引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并且退回到"冷战"时期热衷于讨论的问题上去。对于他们来说，团结天主教人士以及共和党人似乎更自然、更容易得多。勿庸置疑的是共产党在工人当中拥有一定的影响，把受共产党影响的那些工人排斥出去；或对他们背转身去，是不可能达到左派的团结的。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欧洲，当局使用多年的为其系统镇压政策进行辩护的"赤色危险"的稻草人彻底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此外，西方的共产党修正了老的教条，放弃了某些过时的行动方式，正在经历着值得重视的变化。葡萄牙共产党对在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共产党内发生的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前景只能有益于加速这一进程，这有利于整个左派和整个国家。

长期以来，法西斯一直想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把某些人排除在国家生活之外。这一僵硬的政策导致了国家的贫困化。我赞成多党制和不同宗教、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们之间的对话。我想，共产党人也是葡萄牙人，有同其他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和义务。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把他们从当局限定的孤立中解救出来。

在这部“未完的见证”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解释一下我们社会党的立场，这样就完成了我何以走到目前这种地步的历程的描写。这既不困难，也无惊人之处。

首先，我注意到，当今世界上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一个令我完全满意。而对于共产主义或通常讲的人民民主，我批评它们牺牲了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自由的价值，批评我所憎恶的国家集权观念。对西欧国家单独或联合掌权的社会民主党人推行的“准社会主义”经验，我批评它们虎头蛇尾和缺乏理论的活力——这几乎常常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的忠实代理人”……

在这两方面的经验中，确有出色的成就，应作为人类历史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里程碑予以重视。上述消极的方面不应使人忘记这些经验的根本价值，更不能对社会主义失望 。

我坚定地相信，人们在通向进步的缓慢进程中，将能够创建一个人道的社会，即摆脱人剥削人，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为所有人服务的社会。我相信，人们将可以在不牺牲自由的前提下摆脱贫困，摆脱对前途的恐惧。因此我赞成自由的社会主义，或者是使人产生那么多希望的“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

就葡萄牙的局势来说，我确信国家的基本问题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可以解决。人民的悲惨生活、无知、饥饿、疾病、迷茫——长期笼罩在人民头上的灾难——只有通过为集体服务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对国家资源的合理利用才能得以解决。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但也不应通过取消自由，更不能通过破坏人权来达到这一目的。恰恰相反，葡萄牙人民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要自由地设计和创造自己的未来：在农村和工厂，在工会和地方，他们应参与国家机器（并在各级控制它），领导市镇政府，进入高等学府！

“新政”的理论家们辩解说，目前尚未创造出自由的条件并

把这作为无限延长独裁的借口。长期的宣传起到了效果，即使是主张“自由”的人也受到了影响。马塞洛·卡埃塔诺在作为内阁总理的第一次演讲中说道：“在那危急的局势中，必须继续要求大家作出牺牲，包括牺牲某些希望恢复的自由在内”。现在我们才明白这只美人鱼的歌声①是想把我们引向永远保持独裁专政的方向。

不！我确信在数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葡萄牙人充分证明了自己是有头脑的！阻止他们享受与其他国家人民同样的自由和权力的任何奇谈怪论都是不可能得逞的。再说自由同秩序和进步所必需的安定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如果自由是以压制人权和缺乏自由为基础的自由，那它就是一种墓地式的秩序，代表着死亡的另一面！

祖国的衰落是从16世纪的专制和宗教裁判开始的。准确地说，是以丧失自由为开端的。我坚定地认为，只有紧密相联的自由和社会主义才可使她重获新生。

岁月和经验加强了这一深刻的信念，一直指导着我那充满失败的政治旅途的步伐。在我懂事的30年中，就与我同代的绝大多数葡萄牙人一样，一直不知自由为何物，一直生活在屈辱之中。缺乏最基本的权利，随时会遭到监禁、驱逐和流放，这也是保持独立人格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我不能说这条道路是平坦的或者是非常光辉的。但是我可聊以自慰的是：不管当局有多少禁令和环境如何恶劣，我从未向谎言妥协，也从未屈服过。特别是没有当过独裁政权的同谋（哪怕是通过沉默的方式）。在一个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里，能够昂首宣布这些已经是不错的了。

---

① 希腊神话中，美人鱼的歌声引诱水手把船开向她们，以致触礁沉没。

在品德方面，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在政治方面确非如此。因为在这方面要衡量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成就。关于这一点，必须承认，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是谈不上的。我们生不逢时，从未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我们所作的只不过是共同保持反抗的火焰继续燃烧。如果一位青年向我们指出，他目前仍被迫生活在屈辱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只能以自己的羞愧来回答。

这种局势迫使我和我们大家——所有不准备放弃公民资格的葡萄牙人——继续进行不懈的战斗。葡萄牙必须从独裁的耻辱中解放出来，而这项任务只能是葡萄牙人自己的事业。我们必须从悲惨、恐惧和受压迫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我们在那里任人禁锢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明智的行动或精神上的义务，也是共同获救的爱国要求。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我必须以参与实现的不懈努力和决胜的坚强意志——因为我坚信只有放弃斗争的人才会被战胜——去反对那种在一切都完了，不可能再作什么的借口下不时冒出来的放弃斗争，置身度外，追求舒适、私利或个人、家庭、职业前途的诱惑。

凶恶的独裁和斗争中众寡悬殊所造成的挫折把我抛到了目前这种暂时流亡的境地。在漫长的数月中，我常常要抵抗舒适生活的诱惑。这种生活不同于现在的生活，没有迫害和入狱的魔影。但是祖国的召唤更强烈。在法国的一百万移民每日每时都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再没有比解放我们备受屈辱的祖国更必要、更急迫的战斗了。

我虽然在法国避难，但却受到了在国内从未受到过的理解和关怀。我利用这一暂歇的机会完成了这部“未完的见证”。结束这痛苦的一页后，一旦情况允许，我将返回葡萄牙。那时，我将以从未失去过的对未来的信心坚定地面对法官或刽子手。这是

对国家、对我为之献身的理想和我个人必须的效忠行为。

1972年2月于巴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轭下的葡萄牙
作者＝（葡萄牙）马里奥·苏苏亚雷斯著　李小冰　王华峰　刘克新　张翠薇　孙龙昌译
页数＝４５４
ＳＳ号＝１１２４８７１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０８月第１版